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1946-1949**

被遗忘的大使

司徒雷登驻华报告

1946 - 1949

肯尼斯·雷 约翰·布鲁尔 编

尤存 牛军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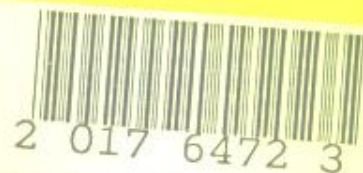
江苏人民出版社



肯尼思·雪 约翰·布鲁尔 编

沈存 牛军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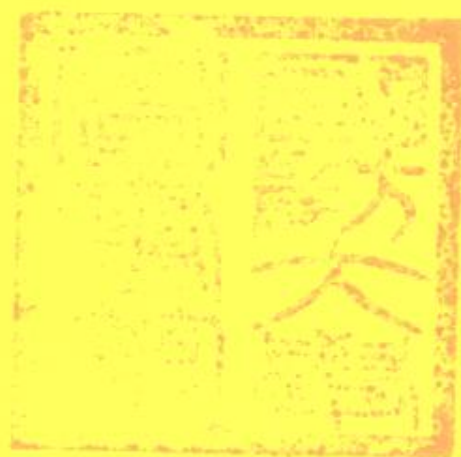
世界人民出版社



被遗忘的大使

司徒雷登驻华报告

1946—1949



译 者 序

司徒雷登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位重要角色，为国人所熟知是从抗战胜利后开始的。1946年7月，时为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荣登美国驻华大使的宝座。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位新上任时还是踌躇满志、身手欲显的大使先生，四年后竟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炮火声中、在毛泽东主席“别了，司徒雷登”的诙谐的告别声中黯然离去，在美国默默无闻地度完残生。

也就在司徒雷登1949年仓促离华时，美国国务院精心炮制了所谓系统、全面回顾美国对华政策历史的中国白皮书，企图为杜鲁门政府业已宣告破产的对华政策辩解。白皮书的发表是否完成了其剪刀加浆糊式的编者的初衷，很值得怀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们不难从白皮书所录电文、报告的字里行间捕捉到美国对华政策由起步到衰亡的蛛丝马迹，倾听到美国政府对所谓“中国局势日渐恶化”的哀叹，从而洞察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性悲剧。这场悲剧的 执行者、体验者，正是司徒雷登。可以说，他在

任驻华大使期间给美国国务卿所写的大使报告本身就是这场悲剧的最合适的解说词。

《被遗忘的大使》(以下简称《大使》)一书所收录的正是司徒雷登1946年至1949年期间致美国国务院的大部分报告,计212份。这些报告脉络清晰,自成体系,且多是第一次公布。与白皮书不同,这些报告较比全面、客观地介绍、阐述了历史事实。本书的编者雷教授、布鲁尔副教授为使这些档案文献公诸于世,曾多次与美国国务院、国家档案馆交涉,最终得许出版。对中国国内学者而言,这些报告当然珍贵,是研究中美关系史、中国现代史、民国史、革命史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

《大使》一书记载了司徒雷登任驻华大使期间的所经所历,展示了司徒雷登及美国政府对国民党蒋介石由充满希望到彻底失望的过程。起初,司徒雷登相信,国民党“是促进中国民主进程、造福于民的唯一大党,蒋介石是当之无愧的政府首脑”。因此,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司徒雷登积极扶持、袒护国民党,为蒋出谋划策。他怂恿蒋“拒不承认李闻血案的责任”,同时奉劝蒋开放报禁,以息众怒。他多次建议蒋厉行政治、经济、民生等方面的改革,以此战胜共产主义。他姑息蒋的独裁专横,并为蒋百般开脱。司徒雷登也相信“CC系^①是使国民党臭名远扬的根本原因”,

^① 指国民党内以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为代表的右翼集团。因二陈姓名的英文首写字母都是C,故称CC系。——译者

并试图以其个人的力量促成蒋介石摆脱CC系的束缚与影响，但又很快发现CC系的胡作非为、党同伐异恰恰是因为蒋介石的支持和庇护。随着形势的恶化，司徒雷登日益流露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失望：“委员长日益顽固不化，一意孤行。对我的屡次建议，他表面上点头称是，实际上我行我素。……他任人为亲。平庸无能但会奉承效忠的人反倒能官运亨通”。“国民党弊病百出，令人痛惜，而共产党毕竟有许多为民谋福的优秀作风”。最后，当司徒雷登认为国民党已经完蛋、蒋介石“民心丧失”以后，他又寄希望于国民党内所谓民主势力，设想逼蒋引退，然后由某些民主势力与共产党达成妥协，组成联合政府。这样既能遏制中国共产主义潮流，又能维持亲美的中国政权，保护美国利益。尤其是在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在全国取得胜利前夕，司徒雷登忙于与一些既与革命队伍有联系又与国民党反动派有交往的所谓“民主分子”运筹、谋划中国南北朝方案，以达到苟延反革命势力、伺机东山再起的目的。但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所表示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彻底态度，使得美蒋的南北朝方案化为泡影。

《大使》一书全面展现了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和基本脉络，道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悲剧所在。由于美国政府的出发点是维护一个亲美的蒋记政权、确保美

国在中国及整个远东的利益，这就使美国对华政策必然带有姑息养奸、“助蒋内战”的基本属性。在《大使》一书中，司徒雷登替蒋说情、帮助国民党牟取军援、经援的电文和信件很多。他认为“没有足够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援华，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和经济改革势必难以进行”，亲美的蒋记政权也将难以维持。但是，美国政府深知，清除国民党自身的腐败与从体外向它“输血”同样迫切。因此，只有国民政府实行富有成效的改革，消除国民党内根深蒂固的弊病，才能使美国的援助具有意义。于是，司徒雷登作为美国政策的执行者与蒋介石政权的拥护者就面临着这样的矛盾：没有美国的进一步援助，国民党的改革难以进行；而只有国民党进行改革运动，美国才愿提供进一步援助。到后来，这种矛盾日益裂变、扩散：美国需要扶持蒋介石政府以维护其在华利益，而扶持一个不得人心的蒋介石政府，又会使美国威信丧失、遭受谴责；美国意图对蒋记政府大声棒喝，施加压力，令其醒悟，但又犹豫共产党及民主自由人士借此推波助澜，反而加速蒋介石政权的崩溃；并且，美国对华政策几乎引起了中国人的普遍不满：“共产党人指责美国是中国内战的后台老板……并发起浩大的反美宣传攻势；中间派民主人士攻击美国扶持一个反动政权从而延长中国内战；国民党则抱怨美国援助太少、见死不救”。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痼疾在司徒雷登焦虑而又无

可奈何的报告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它正说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悲惨结局的根本所在。

《大使》一书披露了许多有关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资料。司徒雷登精通中国人情世故，与国共及民主人士有着长期交往，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也是任何一位前任所不能比的。《大使》中对中国要人的论述很多，如蒋介石、宋子文、张治中、张群、邵力子、毛泽东、周恩来、黄华等。他对这些人的刻画以及对中国问题的见解都有其独特之处。例如，他认为，毛泽东的“天性和欲望更适合成为铁托式的叛逆人物……毛真正期望的是：他自己成为亚洲的列宁。”从这一分析出发，司徒雷登判断，即使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也不可能在亚洲形成俄共与中共的强大联合，相反，很有可能毛泽东与斯大林分道扬镳，因此，一个共产党中国是不可怕的甚至是可以利用的。司徒继而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自己的大胆设想：一旦蒋氏政权的崩溃不可避免，是否可以考虑彻底颠倒美国对华政策（即以美国对中共代替美国对国民党）。为了消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司徒雷登还建议“美国新闻总署应发挥主要作用，运用一切可能的宣传媒介向中国输送自由主义观念和民主生活方式。”由此看来，战后美国所推行的“和平演变”策略似乎可以溯源到司徒雷登。

毋庸置疑，司徒雷登毕竟是代表当时扶蒋反共的美国

政府的立场与利益，他的使命也只能是扶持、帮助一个亲美的蒋介石政府以维护美国的远东利益。因此，在他的报告中所表现出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憎恨与漫骂、对历史是非的颠倒以及对中国人民革命解放事业的恐惧，也就不足为怪了。这需要我们在阅读与研究过程中加以鉴别与批判。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确实可以从司徒雷登的报告中领略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轰轰烈烈的光辉历程，把握到那一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民心等方面剧烈变动的脉搏，倾听到国民党统治走向死亡的丧钟和中国人民新政权诞生的辉煌乐章。

一 前车之辙，后车之鉴。40年过去了，作为一场历史悲剧，美国政府的一些朝野之士或多或少地从中总结出那一时代的“历史性错误”，并以此为鉴，重新建立了一种新的中美关系。然而，也有一些美国人士至今还没有从这场历史悲剧中醒悟过来，仍然在当今的中美关系领域，继续扮演着悲剧角色。从这一意义上说，历史的悲剧并没有结束。但无论如何，对中国人民来说，从40年前的中美关系的历史联想当今的现实；或者，从当今的现实反思40年前历史，一定会有助于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保持自己的清醒头脑。

本书前言和第一、三、五部分由尤存翻译，第二、四、

六部分由牛军翻译。译文难免有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需要说明的是，肖星同志审读了全部译稿。书中的第六部分曾参考窦晖先生的部分译文。在此一并致谢。

译 者

1988年12月 上海

前 言

1945年12月下旬，杜鲁门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赴华，其使命是调停国共武力争端，建立联合政府。马歇尔竭力寻求结束中国内战——这是日本投降后中国最棘手的问题——的解决方法。他旋即组成了一个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三人小组^①。1月7日，三人小组在重庆开会，制定停战协定，并组成执行机构。停战协定由军调部监督实行，于1月13日生效。

与停战协定相呼应的，是政治协商会议，其目的在于重组国民政府。这一由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中国各党派组成的会议从1月10日开幕，到1月31日结束，通过了军事问题、国家建设和政府组织的决议案，并特别呼吁召开国民大会，制定新宪法。会议同意在国民大会召集之前，由国府委员会行使权力，而蒋介石的否决权应有所限制。但蒋本人可以挑选国府委员会成员，其中一半由国民党占据，其余一半由其他政党瓜分。

马歇尔的斡旋与政协会议的成功表明，有可能防止大规模的全面内战。但是，3月间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国民党保守分子对政协结果不甚满意。这一情况促使中共领袖申明，政协决议的任何修正须经各党派同意，国民党必须保证履行政协修改草案。其后，中共进而拖延其政府代表候选人的提名，并造成

^① 1946年1月，国民党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举行停战谈判，1月5日签订了国共两党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即停战协定），并根据停战协定组成了由国民党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美国政府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译者

了国民党中执委会议推迟召开，而这次会议预定要审议政协决议。共产党的拖延策略以及满洲出现的危机，使蒋推迟了国大的召开时间。

满洲战事使战火复燃。从出使中国的那天起，马歇尔就意识到俄国从满洲的撤退必然引起满洲危机，因为国共双方都想填补这块真空。马歇尔希望能够阻止国共军队的局部冲突，一直力劝蒋派遣军调部执行小组进入东北。而蒋直到3月底才勉强发布了这一命令。在这同时，中共武力业已深入满洲乡村，并获得了俄国从日军接受过来的日式武器。最后，苏俄4月开始撤退，5月3日撤退完毕。这样，满洲危机就迫在眉睫了。

马歇尔本人3月间返美向杜鲁门总统述职。当4月18日返华时，他发现停战协定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了。就在这一天，共军占领长春，而这一行动恰好给蒋提供了反击的借口。在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有力支持下，蒋不顾马歇尔的反对，决心收复共产党新占领的地区。马歇尔即以退出官方调解表示抗议，但仍继续寻求妥协方案。在马歇尔的压力下，蒋在6月间同意实行临时休战，以便三人小组寻求一种结束满洲战事的解决方案。国共领袖于6月1日同时发布停止攻击的命令。司徒雷登正是在这期间到南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马歇尔需要一个既精通中国事务又能被国共双方所赞许的助手。他请求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这一消息使司徒雷登极其惊诧。但他还是接受了此职。不久，参议院批准了这一任命。

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又接受了美国教育。在中国，他是位受人尊敬的学者，又有多年的理事经验。中国的大部分领袖们他都熟识。这使他或许能很好地行使职责。但另一方面，大使之职对他来说并非轻松。他不仅目睹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兴起，也亲历了国民政府的衰亡。他既不能有效地影响蒋介石，又无法更改美国对华政策。南京政府与华盛顿大多都不理睬他的建议与劝告。而

他的一些建议与劝告不免带有某种书生气的公正与超然：既富有力量，又软弱不堪。

国民党于1949年春逃往广州，但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该年仲夏，他离华返美。在美国，司徒雷登受到当局的冷落。随后又遭受中风病魔的打击。他的大部分余生是在医院里度过的。1962年，司徒雷登默默无闻地死去。

在本书所选入的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文中，司徒雷登报告了中国日益恶化的局势，报告了国民政府的衰落过程。其报告中存在着一个主题：国民政府将美国的援助作为中国改革的前提，而美国则以改革作为援华的条件。于是，事情变得富于戏剧性。中国宣称没有美国援助难以改革，美国则不愿提供更多的援助，除非中国政府实行改革。

司徒雷登走马上任的时候非常乐观。他的最初努力虽说一片苦心，但过于天真。他劝告中国实行“新政”，以为只要政府向人民提供有效的民主和经济利益就可以战胜共产主义。因此，他坚信中国正在没落但仍可挽救。他的思想充满智慧的力量，但真正实行起来就难上加难了。对此，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了。司徒雷登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之职，因此，他的报告带有一种学究色彩，反映了一个基督传教士的赤诚、失望和惆怅。

司徒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陈述了中国局势并提出了自己对人物、事件的看法。这些报告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决策者所面临的困境，也说明了传教士外交的得失。不仅如此，这些报告还表明，他终于对蒋介石彻底失望，并向杜鲁门当局提出一项逗人的建议——美国在共产党中国充当一个角色。即美国对共产主义的“片面”冷战。这些思想为后来的乔治·凯南所重视，并在约翰·加迪斯的1980年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的报告中得到阐述。

编 者

一 出任初期的乐观

东北临时停战到1946年7月中旬，战火已复燃。以后数月，马歇尔将军和司徒大使继续寻求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但马歇尔旋即失去成功调停国共争端的希望。司徒雷登则不然。他熟谙中国政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并试图利用他与国共双方要人的长期交往来促成中国和平与新政。

在1946年致国务院的报告中，司徒陈述了当时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并对国共双方的立场发表了自己看法。尽管他力求客观公正，但报告中明显流露出对国民党方面的偏向。他偏袒国民党，视蒋介石为孙中山的合法继承人。而且，作为一个具有基督教观念的民主人士，司徒在原则上是反共产主义的，他与蒋介石的私人交情也远甚于毛泽东、周恩来。他相信蒋是位精明能干的领袖、世理练达的政治家，并宽恕了蒋介石的专断，以为此乃中国专制传统及蒋本人军事生涯所致。这样，在国共之间，无论是个人感情或理想原则，司徒都较倾向于支持国民党。司徒同时也深感政府改革的必要，民族利益与蒋政府的生存同样至关

重要。他指出，政府每一水平上的政治经济改革都能削弱共产主义的蔓延。1946年的报告反映了司徒对中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坚信不疑，也反映了他对中国未来的天真乐观。

文献 1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7—2146

南京 1946年7月21日

阁下：有幸向您报告最近赴牯岭递交国书时与蒋委员长的会谈情况。马歇尔将军和我在大使馆参赞巴特沃斯及天津总领事罗伯特·史密斯陪同下，于7月18日黄昏抵达牯岭。当晚与蒋夫妇共进晚餐。互致问候时，我对蒋委员长表示，希望他不要过多地将我看成美国官员，而应将我当成他的旧交，一个一直努力为中国效劳的朋友，我的现职仅是暂时以另一种形式服务于中国，以协助马歇尔将军的特殊使命。我希望他尽可以让我一效微力。看来他对我的表示反应亲切。

晚餐后，蒋委员长询问马歇尔将军对最近事态的看法。马歇尔将军指出近于无休无止的内战迹象和一些似系政府方面的过格行为。他旋即极坦率地谈到昆明的两次暗杀^①及其对美国舆论的有害影响，这使委员长尴尬万分。事后马歇尔将军说，他当时曾犹豫是否当着中美双方的面这样直接了当地说出这件事。然而，是蒋委员长自己提及这一点。我本人对这种会谈方式以及马歇尔将军直率的谈吐感到高兴。依我之管见，中国问题很大程度上、在某种决定性的意义上，有赖于委员长的心理因素。

^① 指“李、闻血案”。——译者

次日上午，我被告之委员长下午接见我。会谈约1小时，一开始，他就询问我对基本局势的印象。我谦让一番，表示在倾听他高见前不敢冒昧。他再三坚持后，我告诉委员长，我将以他的旧交和中国的挚友身份表示己见，这就未免逾越外交礼节。随后，我表示，对我5月1日返华来与日俱增的内战危险及其结局深为担忧，生灵涂炭，通货急剧膨胀，无法摆脱的物价上涨，共产党的宣传优势，而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正赐予掠夺成性的俄国良机，诸如此类，令人不安。政府在知识分子及老百姓中的影响正在丧失，而委员长现存的威望并不能弥补整个党及政府信誉的丧失。作为政治思想和行动上镇压政策的开始，最近的暗杀业已引起广泛震惊，并在全国上下广为传闻。接着，我提出我的可行方案。

我渴望看到国民党领袖们真正具有崇高的爱国思想和为民主政府及独立中国而临危不惧、忘我奋斗的英雄精神，并由委员长领导党复苏既往的革命改革。我了解他本人对此矢志不移，并躬身笃行。我完全相信，中国各阶层人民希望在他的领导下，实现国家的团结、稳定与和平，并在此种愿望尽快地实现后，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进行内部改革，以消弊除害。这些弊害已臭名远扬，破坏了中国的内外信誉。同时，积极制定社会立法，以造福于民众。对付共产主义运动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土地及其他方面的改革，它将比共产党所鼓吹的改革更加得利，而且能避免暴力、专制手段及外国对共产党可能施加的影响。

我提出三条措施。一是不对暗杀事件公开承担责任……并公开保证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不必因党派、政见的不同及其他活动而惧怕……二是取消对大量业已查封的报刊的禁令。……三是如果可能，不日内即召集政协综合小组会议，作为结束训政建立宪政的及时措施。

蒋委员长当即表示原则上完全同意我的看法，随后就较详细

地为他对付共产党的政策辩解。他问我，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否证明这一信念：历代王朝及其统治者，其成败无不取决于在对付政治叛逆和其他有组织的暴力对手时，运用恩威并施这一原则。委员长随即引用了一句相应的成语，并提醒我，他已成功地以这种两面手法击败一系列对手。他不能容忍武装的反对派。一旦共产党放弃武力，他绝无消灭和迫害之意。他也承认反对党为民主政治之必需，并一直愿意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来完全自由地宣传他们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政策。

我说，在我看来，共产党所以对放弃武力而成为合法政党之步骤犹豫不决，主要是他们确实担心：无论委员长本人的政策如何开明，国民党内反动分子对共产党是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一点也许部分地成了共产党宣传的口实，但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这也许不无道理。我表示，如果他同意，我愿就此向共产党作出个人担保，尽力使他们得到保护而不必疑惧。我指出，共产党方面对我已有友好表示，我也与共方某些要人相识已久，他们曾建议我访问延安。委员长立即劝我造访延安。我答曰，就我看来，时机未到。一旦时机成熟，我会期待他的具体建议。

分别时，他让私人秘书护送我回去。这位年轻人恰好是我从前的学生，并具有中国学生对老师通常具有的虔诚，接见时他也一直在场。于是，我继续与他谈论了上述看法，希望他提醒委员长，重视这些问题的迫切性。我要他为我讲讲话，这些话在中国人际关系中常常以间接方式来传递。他回去后当晚就借机向委员长作了陈述。这样，委员长在我第二天下午启程前再次会见了我。

谈到出版自由时，蒋委员长要我相信，他极愿实行。在政府统治区，只有共产党出版物例外，直到或除非他们停止使用武力。我表示这种立场合情合理。倘若并无其他限制，我现在所寻求的方案即应获得结果。他指出，召集政协及其综合小组在程序上有一些技术性的困难。但他保证下月或九月底即可召开类似会议。然

后，我们再次就昨天所讨论的诸种其他问题进行商谈。临走前，他再次劝我到牯岭度夏，这样既可与他保持接触，又可以疗养身体。

当然，我迅速将这些谈话报告了马歇尔将军。我的经验使我确信——第一，我感到蒋委员长此种态度使我不再因现在的官方身份与他自由交谈而窘迫。他依旧欢迎我提出建议，那怕是善意、坦率的批评。我一度为作为一名美国政府代表与他交谈的礼节及其所允许的自由度而多少有点困惑。这些担忧而今已烟消云散。第二，显而易见，交谈中他极其敬慕马歇尔将军，甚至敬慕马歇尔将军的个性。马歇尔将军交谈中的坦率——它常常令人不快——不是削弱而是增进了蒋委员长的敬意和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对此，我并不十分惊诧，但这确实一目了然。如您所知，整个局势极为混乱，几乎接近崩溃：紧张的军事冲突、经济恶化、通货膨胀及与各种集团相关的骚乱——他们在绝望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制造这种骚乱。另一方面，如您所明察，其利害关系极端严重，需要我们努力尽力。我们认为，蒋委员长强有力的爱国领导，以及大多数中国人民所怀有的与美国人民共同的期望，同样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他们渴求我们帮助，以至不惜希望我们干预他们内部事务。当然，完全有可能在他们坠入失望之渊时，某个党会煽起反美之火，一旦得不到控制，势必岌岌可危。

我个人由衷地赞同我国政府对华政策，并愿在我的职责内坚定不移地予以执行。马歇尔将军现正付诸实施，我力图全力配合。

文献 2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8—746

南京 1946年 8月 7日

中国国内事态的发展诸如经济、财政、军事、心理等方面以

及有关美国舆论的报道，不能不使我倾心关注，于是我取消了原赴北平处理善后的计划。与马歇尔将军协商后，7月27日我再赴牯岭，尽可能认真地规劝委员长注意我所获得的印象，并进一步敦促他尽可能改弦更张。

不幸的是，那天上午一到牯岭我就染病，只好休息几天。不过这倒能够通过两位年轻的中国人与委员长保持接触。其中一位是他的私人秘书，也是我从前的学生。事实上，这样也就能更详尽的讨论诸种问题和我的建议。‘这些建议本该在起初的私人造访中系统阐述。这样他也有时间来考虑我本人的见解。

8月1日下午，我有机会与他坦率交谈。我向他解释了此行匆匆的原由后指出，在我看来持续数月的国共谈判显然没有达成充分协议的希望。无论如何，其未来就象过去一样，流于无益的拖延。我列举了我看来是最实际的分歧，并根据蒋委员长的心理加以论述。我强调指出，继续这种无异于不宣而战的内战，他将得不偿失；希望他珍惜他现在的最大资本，毫无意义的消耗会使他的资本消失殆尽。我详细论述了这两种资本：一是他的个人威望和忠诚的民族立场，这赋予他凝聚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绝大部分中国人民的能力，在他所高举的启蒙和改革旗帜下，在他所激起的国民党原所具有的爱国热情和自我献身精神中，中国人民将团结在他的周围。二是美国政府和人民与所有中国人民所共同抱有的对中国的殷切心愿，并将一如既往地全力帮助实现这种心愿。

谈到具体建议时，我提议成立一个分别由国共双方各二人或二人以上组成的非正式委员会。当然，政府方面代表由他指定。我表示，如果他赞同，我愿参加这一委员会，努力促成协议，打破僵局。倘若协议能为国共双方接受，在代表五方党派的10人综合小组加以认可后，即可从速召集40人国府委员会。这将是经提名组成联合政府的重要因素。同时，他应发布停战令，延安也随之

发布。我告诉他，我已与马歇尔将军交换了所有这些建议，马歇尔将军也完全赞同。委员长表示同意我的建议，但鉴于共产党在北平附近袭击美国海军陆战队^①，俟马歇尔将军回到牯岭，带回较多的关于此一事态发展的消息后，再做结论。我表示，在这之前医生也不会允许我下山，委员长幽默地说，他也不允许。

我想冒昧地重复一下蒋委员长对共产党的看法。因为这很大程度上集中了他的个性及心理。他不相信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委员长详尽论述并解释他与共产党打了20多年的交道，曾试图以他认为可行的方法寻求国共共处的切实基础，但终未成功。中国共产党以微妙的方式获取苏俄援助，他认为这使中国的统一更加麻烦。他的天性以及他对国家实际境况的切实认识，使他不赞同其亲信同僚的观点。这些人无疑是想以武力来根绝或者至少是遏制共产党，委员长虽对此颇表同情，但并不苟同。看来委员长有这样的考虑：在武力解决还是政治解决问题上，暂且不急。于与亲信同僚力辩是非去从，他们的见解马上即会捉襟见肘，难以实施到时他们会寻求美国的援助。而那时，美国则可以以其所处的强有力的位置实现某种解决方案。可以设想，他利用谈判失败，在战场上大举进攻战略要地造成既成事实，而且这可以狡辩为是由于共产党违反协议，并声称可进行公正调查。而周恩来将军的争辩与上述情况如出一辙。

委员长也许为款待我而用心良苦，他确实为我的健康操心，劝我充分休养，待康复后再离牯岭，而且，他也希望我放松一段。

在我回南京的当晚，周恩来将军和他的一位同事与我共进晚餐，直到午夜才离去。周恩来较详细地讨论了安平事件，但其解释难以令人信服。他矢口否认事件受命于共产党总部，也不承认有此种意图：引起舆论从而导致美国从该地撤出陆战队。但他明确表

^① 这里的所谓“袭击美国海军陆战队”即指1946年7月29日美海军陆战队进犯共产党冀东解放区香河县安平镇的“安平事件”。

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美国以此种方式支持国民党军队。

我将蒋委员长组成非正式小组的先决条件转呈给他。在离开牯岭前，我与蒋委员也商讨过这些条件。这些条件是：

1. 苏北共军撤至陇海路以北；
2. 共军自胶济路撤退；
3. 共军自承德及热河省承德以南地区撤出；
4. 共军须退至东北北部两个半省内地区；
5. 共军须撤离于6月7日后所占一切地区；
6. 放弃地方行政尤其是苏北地方行政，但共产党总部可允许保留。

周恩来将军指出，这是一种独裁专断的片面行动，不可能考虑这些条件。我提醒他，蒋委员长毕竟为合法政府首脑，无论如何，就他来说这是最后条件。一旦拒绝，内战蔓延，势必不可收拾，使民族与百姓灾难更重。周恩来据理力争，认为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应具有同等义务；而且，这些条件一条也没有在与马歇尔的商谈中讨论过，仅属悬而未决的条款。他力图说明，这种要求从6月29日即临时停战期满前一天起就开始层层加码。但是，周的真正意图是：要共产党接受第六项条件较为困难。看来，这确实是他们所害怕的结局。

我努力避免给人以这种印象：我过于成为政府立场的支持者。我对敌对行动日益拖延而又无法避免甚为担忧，我们正期待马歇尔将军不日内从牯岭归来，从而商讨下一步的日程。

与蒋委员长及共产党方面的商谈，使我得以了解两党的分歧是多么难以调和，这使时局难以改善。

文献 3 马歇尔将军司徒雷登博士联合声明

893.00/8—1046

南京 1946年 8月10日

马歇尔将军司徒雷登博士共同尽其全力，以谋求结束中国目前正滋长的冲突，并谋采取初级步骤，发展真正民主化政府。政治问题的和平解决显然是人民的一致愿望。从经济形势来看，也需立即解决以免经济崩溃。日益扩大的冲突有蔓延全国而不可收拾之势。国共双方领袖也渴望结束冲突，但某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尚未达成协议。双方显然不能使诸问题获得解决，否则即可发布完全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某些未解决问题关系到军事整编。这一问题的困难虽比撤军区域保持政府一项基本问题容易，但须待国民大会从根本上解决。

文献 4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8—1346

南京 1946年 8月13日

马歇尔将军和我的 8月10日声明已产生效果，它促使蒋委员长也发布一项声明，此声明拟于南京时间8月14日上午8时公布。

然而，遗憾的是委员长在某些方面依然如故。不过我以为，值此和谈紧要关头，此声明的公布不无帮助。

文献 5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8—3046

南京 1946年 8月 30日

自我8月7日电稿发出后，某些微小步骤已付实施——尽管极其缓慢。比如，我8月1日向蒋委员长提出的成立非正式小组作为联合政府开始之准备的建议，只是到昨天，我方得知政府代表名单：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和内政部长张励生。他们于今日赴牯岭听取专门指示，明天返回。共产党两名代表早已决定：周恩来和董必武。因此，我希望小组能在9月2日开会。

小组所讨论的问题大致限于国府委员会名额及否决权诸类具体问题。根据去年冬天所达协议，国府委员会由40人组成，其中20名由政府指派，其他20名由共产党、两个少数党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共同瓜分，并最后经蒋委员长任命。共产党是得到8名、9名还是10名？他们怎样才能保证已达协议不被违反？这似乎是共产党的主要忧虑。他们视政协协议为生命线，并寻求保障以反对任何篡改。也许2/3的否决权能向共产党提供这种保障。当然，若双方真正寻求解决，所涉及的诸种问题看来不很困难。假如他们能够而且确实达成协议，即可由政协综合小组加以认可，随即就实行召集国府委员会的计划，并可作为类似于临时会议性质的机构，依次筹备国民大会，筹备11月12日通过宪法。

与此同时，马歇尔将军和我仍努力谋求停战方案。马歇尔将军8月27日离牯岭时，蒋委员长表示，一旦共产党停止进攻，他即可停息战事。我们现正想“诱其摊牌”：问他一旦毛泽东真的发布一项三四天的停战令，他将如何表示。今天，马歇尔将军主要是抱此想法再赴牯岭。周恩来将军也致电延安，以确定毛泽东对此

建议的反应。一旦这种方法不能如愿，我们仍将依据政治解决的步骤，敦促委员长协助尽早停战。共产党方面看来确实渴望停战。

还要向您报告一则多少有些令人鼓舞的消息。我业已与政府领导人商讨，提出比共产党更加为百姓谋幸福并进行严格的内部改革，是征服共产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如果不是唯一方法的话。昨天，宋子文博士向我披露了仍被严格保密的土改方案，方案的要旨主要是以粮食而不是以货币向大土地所有者征购土地。宋还向我谈及正在执行的反对政府官员贪污的新措施等等。一俟和平实现，一党政体结束，我们可望出现更多的此类改革和建设性发展。

文献 6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8—3146

南京 1946年 8月 31日

在日益蔓延的内战局势中，人们极其渴望寻求实实在在的希望之光。而上周透露的组成五人小组商讨国府委员会重组的消息，则给人们某些鼓励。

与此相反，除内战本身外，8月28日的两项声明也许更能准确反映双方原则性分歧。共产党南京代表团一位发言人声称，如果在11月12日前未组成联合政府并进行政府改组：届时共产党除召集各区领导到延安考虑下一步方案外，将别无选择。同样，周将军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也表明了共产党目前的态度。

同时，政府在一项声明中宣布，将于11月12日之前作出愿意接受政府条件者参加的改组政府的决定。并将停战的全部义务推向共产党：停止战斗，取消动员令，并从对安全与交通构成威胁的地区撤出，以证明其诚意。声明也宣布了政府结束训政时期

的决定，并表示无意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声明指出，政协草案现必须加以修正。一般认为这一声明源于委员长本人。

文献 7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9—446

南京 1946年9月4日

由于周恩来似乎没有准备，五人小组今天未能开会。昨天下午从上海返都后，他即派代表王炳南拜会我。王炳南重申了他们发布的公开声明，即：首先委员长必须保证停战并收回先前的“五项条件。”问题在于，目前周将这两点作为参加五人会议的前提。当然，他并未明确向我作此表示。王先生又说，周拜访马歇尔将军后即来我处。我知道周现正在马歇尔将军那里。在上周，周恩来曾向我保证过，虽然他对这几点有些担忧，但并不妨碍他和同事(董必武)及助手(王炳南)参加五人会议。而现在的变卦也许是他接到延安的指示，或者在上海(或南京)已有过会议，或者这是一种策略。不论怎样，我只能等他来访，避免任何公开评论。

文献 8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9—1846

南京 1946年9月18日

阁下：目前国共立即停战难有指望。

先前我曾表示，非正式五人小组有希望9月2日开会。8月29日，周恩来将军再次向我保证，他和同事准备参加五人会议。但随后他坚持认为，鉴于政府官员发布的至少四项有关声明，鉴于

我们剩余物资转让协定的签订，也鉴于其他在他看来是威胁时局的迹象，他深感不安。

9月5日与他商谈了3小时之久，马歇尔将军和我均在场。会议似乎表明我们打破僵局努力的终结。在我们准备散会时，周在我们谈话中了解到事情非同一般，他随即建议由他起草一份信件，向延安请求新指示，并在第二天送交我们过目认可。这便促成我们与周的又一次会谈，经过某些改动，我们同意他的电文内容。

马歇尔将军当日赶赴牯岭。9月10日返都，并带回他与蒋委员长商谈的备忘录。经过一番努力，马歇尔获得条文的某些修改，这些修改能够导致停战令。备忘录的某些条款已不很苛刻，其他条款则已因政府军的实际控制而自然规定。但若干问题在周将军看来具有附加条件的形式。周恩来将军与马歇尔将军就条文诸款详细审议后，又和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会谈。会谈中，我竭力劝促他如约参加非正式五人小组，并向他保证，那时——也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有效敦促政府加快实施停战。这显然也是他所寻求的结局。周以通常的洞察力和雄辩力解释为什么他不能也不会答应。而且即便答应，并无停战保证。他提出一反提案，要求马歇尔将军的三人小组开会，解决军事争端，并进而发布停战令。但马歇尔将军深知，恢复原先拖延数月之久并终于在6月破裂的那种无效商谈，是无济于事的。

于是，9月13日我答复说，我和马歇尔将军都认为，我们不很反对他的建议，但提醒他，我们的主张是政治方式应先于军事磋商，也为恢复军事磋商之必需。无论何时，我们都将准备不遗余力地与他进一步协商，或在其他方面予以协助。我正告周将军，中国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他的决定。当天下午，他的代表立刻来安排第二天会谈。这表明重新恢复谈判也许有一线希望。

9月14日，王炳南先生代表周恩来再次来访。他显然因政府精心策划的大举军事进攻而激愤万分。他详尽论述说，一旦这些行

动计划付诸实施，势必对共产党人产生灾难性后果。他还谈及许多百姓日甚一日的苦难，表示了共产党解决这些苦难的愿望。我回答时，再次力劝参加非正式小组会议，指出即使会议无法获取关于国府委员会席位和否决权问题的协议，但至少可以向政府证明共产党人的诚意。这样马歇尔将军和我就能够再次努力，以停止敌对行动。而且，会议可以提供就各种争论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的机会，在这一环境下，共产党可以提出其全部观点。我还指出，如果不愿在我的住所举行商谈，周将军可以让我们作为他的客人到他那里进行讨论。王先生又问起美国政策是否会改变。我向他保证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我们两位外交使节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仍具有全权。我表示，如果他们担心委员长玩弄计谋，我们可以官方身份承担保护义务。王再次要我向政府两位代表那里获取担保，让他们允许在国府委员会中有14名“共产党控制席位”，以便共产党方面否绝对政协决议的任何修改。……当然我将此事转告了两名政府代表，并也已说明了他们的态度，即召开五人小组会议恰恰是为了商讨此类问题，而预先从中获取一项保证也就使会议的存在没有必要了。但我还是请来两位政府代表。我发现他们同样难以说服，并且同样言之有理。

此时，周将军已赴上海，临行前向我许诺一旦14票否决权的保证能达到五人小组的原先目的，并导致马歇尔将军的三人小组讨论停战，他即可返都，他还送交马歇尔将军一份正式要求：无条件召开三人小组会议。此外还有两件很长的备忘录——一份关于立即停止冲突的备忘录，一份抗议美国转让剩余物资以援助国民政府军事行动的备忘录。

9月17日，王炳南先生来打听政府两名代表的最后答复。我再次耐心向他解释，为什么从共产党利益出发，他们应该参加五人小组，以利用我们的调停努力。最后，看来他表示同意，只要能保证马歇尔将军也支持我的观点，即我们确有信心以五人小组开

辟一条通向渴望已久的停战令之路。我提醒他，这是获取和谈的唯一方式，但我们无法在日期或具体程序上做出担保。不过相信这是有希望的一步。当日下午，马歇尔将军自牯岭返回，立即表示同意我的这种声明。第二天，我将此转告王先生，他答应与上海周将军联系，以便在这一基础上回来参加五人小组会议。

此类持续不断的商谈以及我前面电文中提及的商讨，说明我们企图力劝政府——最近很大程度上是劝使共产党——接受调停所费之时间及所花之努力。此间，共产党显然首先关注停战。他们参加五人小组的争论和前提多变不一，但这不是他们强调的重点。另一方面，尽管近来他们的军事处境日益恶化，但仍旧顽强坚持在国府委员会中维护政协决议，坚持修改宪草，坚持以联合政府为目标，以之作为民主政体之先导，并实行军队国家化。但这又与他们的拖延策略自相矛盾。主要是由于漫长历程造成的不信任和疑惧以及生存本能？还是由苏俄策划和唆使的一种伎俩，以此寻求暂时停战，以图东山再起，用暴力夺取政权？我自己较倾向于前者。并且，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相反方面令人信服的证据。当然，后者也不可等闲视之，也许两种策略兼而有之，既准备小心翼翼地加入民主进程，又企图实现夺取政权建立共产党专政的最终目标。

但不管怎样，不能一味指责政府领导人对共产党诚意的怀疑或者对意识形态对立基础上共同合作可能性的怀疑。这主要是因为长仇久恨、根深蒂固的猜疑及彼此的权力欲。最能设想的是政府意欲结束“训政”时期，并且无论共产党参加与否，都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大，通过民主宪法。政府也认识到根本改革的必要，正制定根本改革的计划。但这些计划之贯彻并不如目前与共产党作战那样顽强坚定。也许这要由我国友好而又严格的督促来推动执行。

最近，我们的行动方针是鼓励双方——现在尤其是共产党方

面——采取走向宪政的既定步骤，尔后再想方设法力劝双方——尤其是政府方面——实现停战。我们尤要避免给共产党代表以任何认为我们或政府终止谈判努力之借口。对延安甚至南京共产党总部那种心胸狭窄、粗鲁不恭的漫骂及大多是无中生有的宣传，我们一概保持缄默——尽管在他们日趋恶化的险境中，我们继续为他们帮忙。

文献 9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9—1946

南京 1946年 9月19日

在9月1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南京中共发言人王炳南宣称，除非政府接受中共之恢复三人小组会谈的请求，否则没有商谈的理由，周将军也无从上海返回之必要。

王否认中共接受任何苏联援助，并且将来任何时候也不会接受。他声明共产党的先决条件是停战协议，即如有可能，政府现在立即决定实行一项军事解决方案以实现停战。

文献10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9—2546

南京 1946年 9月25日

阁下：我有幸汇报马歇尔将军和我调停内战的最近进展。中共代表王炳南近日每天必来。他对不断蔓延的内战甚为担忧，希望能够保证进一步和谈，以便真正结束内战。据此，9月20日我再次向他详细解释：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保证，即一旦政府对

共产党参加五人小组并在联合机构中真诚合作确信不疑，就可召集三人小组以达成军队调整协议，并颁布停战令。我相信这同样是蒋委员长的意愿。我们也会力所能及地劝告蒋委员长实行它。最后，我指出，我们如此强烈地劝说共产党采取这一步骤，实际上就是保证他们不会失望或被骗。他似有所感，仅仅要求我的这些保证须获取马歇尔将军认可。我照办了，并于次日转告了他。他表示他即派人赴上海，亲自向周将军转达我们的建议。

次日上午，他将一封周将军的信面呈马歇尔将军。这封信随后转送给我。王先生与马歇尔将军讨论一番后，即来我处报告了全部情况。他重申军事局势极其危急，必须立即采取补救行动，并要我作出反应。我仅表示对此后果深感遗憾，由于我们的建议无人理睬，我们无力帮助获至和平。

此种行为显然与他们无益，周将军及其同事的态度也前后矛盾。对此似乎有两种可能解释：

1. 这是一种典型的综合恐惧症或多疑变态；
2. 这是一种蓄意的企图。鉴于美国所予合法的国民政府的利益，企图消除美国参与。这在我们方面并非有意。随着美军的撤退及其他物资援助的停止，他们想通过俄国求助安理会或者让俄、英联合美国一起进一步调解。

也许他们目前的执拗行为是这两种因素综合所致。源于前者而具体化于后者。也许这种行动方针自马歇尔将军使华后就有某种机会主义色彩。这一方针在目前军事局势趋于恶化的情况下，仍旧是一种拖延策略。

预计蒋委员长本周返都。我们与他磋商后再采取进一步行动。

文献11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0--746

南京 1946年10月7日

马歇尔将军和我考虑在蒋委员长返都后，向他提交一份供他公开发布的建议草案。公开信以一种宽宏平和的口气敦促共产党恢复和谈，并规定非常明确、清楚了然的停战条件。同时我们还决定联名致信周恩来，让他返回南京。在这封信中，我们努力以最温和友好的态度来表述。

9月27日，马歇尔将军将起草好的公开信呈交给蒋委员长。起初蒋委员长明确表示赞赏。但他建议改动草案，表示想在占领战略要地张家口后再停战。这种意向在随后的磋商中逐渐明朗。据悉委员长的某些反动幕僚强烈怂恿他采取这一行动方针。同时，周恩来表示，对张家口的进犯若不解除，他拒绝离开上海或参加任何谈判。

马歇尔将军对政府显然想占领张家口而后停战的意向无法容忍。作为调解人，一方要求停止对张家口的进攻，另一方则置他的劝阻于不顾，决心占领张家口。这一状况有损于他本人及美国政府的公正。因而他要求杜鲁门总统立即将他召回，我也只能勉强同意——这是他所能体面地采取的唯一步骤。我本人对调停努力深为担忧。但只要和谈一日不破裂，我终将满怀达成协议的希望。

经与马歇尔将军协商，我提议共产党代表接受以下四点，以作为我们要求政府停攻张家的基础：

1. 国府委员会中，共产党有13名席位的否决权；
2. 共军撤出苏北；

3. 共产党的国大代表名单托交给马歇尔将军和我，以便我们相机转呈政府；

4. 撤消对大同的包围。

三天后，来自上海周恩来的答复是对四点全盘否定。但同意一旦停止对张家口的进攻，他即回南京参加三人小组或五人小组。

此间，蒋委员长、马歇尔将军、我本人及其他有关人士之间磋商频繁，并在10月6日上午两个半小时之久的商谈中达到顶点……局势危若累卵，双方分歧极大。想象到马歇尔将军坚持要求召回所产生的结局，我就不寒而栗。而马歇尔将军与蒋委员长都表现出其真正伟大之所在。前者坚持原则，洞悉对我国声誉的严峻考验——除非召回。后者固步自封，有感于其本人与政府威信丧失，深知对人民所负之道义，因而控制开始时的冲动，礼貌地听取马歇尔将军的分析。这次最后会谈，在业已结成的友谊和彼此崇高的敬意的基础上，开诚协商，努力寻求共同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这也是我渴望已久的协商方式，对此，我幸慰万分。

一回来，我就派人约请王先生。他迅速赶来——看来共产党希望有所进展。我向他谈论了备忘录的大意。他答应立即转达周恩来。第二天，我认可了王先生所要转呈的备忘录。

文献12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0—946

南京 1946年10月9日

阁下：有幸向您报告延安对我们建议的答复。这是10月8日上午共产党代表王炳南向我陈述的。为方便起见，概括如下：

1. 休战应无时间限制。不然，据过去经验，不会令人满意。若政府军不撤到原先防地以表示政府诚意，则方案似乎仅系一种

策略。

2. 共产党希望召集三人会议或五人会议。但所讨论问题不应仅限于蒋委员长10月2日声明中的两项。在休战的条件下讨论这些问题，应视为军事压迫所致。

3. 共产党方面对10月2日的声明尚未答复，是因为共产党希望获得马歇尔将军和司徒雷登博士阐明和平局势的消息。而最近的建议表明，局势并无多大进展。周恩来将军将准备书面答复，但以为并无回南京之必要。

这实际上是完全反对。我立即报告了马歇尔将军，他即当面起草了联合声明(已于昨天发布)。您会知道声明的形式是完全客观公正的，从而使我们有恢复调停角色——如果共产党重新考虑他们的态度的话，为了帮助他们决定重新考虑，当日下午我们邀董必武、王炳南两位先生商谈。我们竭力消融他们的异议，奉劝他们避免终止一切和谈努力的悲惨结局。但唯一明显的结果是，他们同意将商谈的精神报告周恩来。

今晨，马歇尔将军尽量不声不响地前赴上海，进行最后戏剧般的努力，劝说周将军返回南京。这确是整个调停过程中极其谦逊而友好的行动。这一磊落姿态说明，他在结束使命前甘愿不遗余力的善意。不论结果如何，这都将给中国人民以伟大的印象。这对令人信服地证明是否共产党真正希望在中国和平、统一和民主进程中实行合作，也极有价值。

文献13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0—946

南京 1946年10月9日

大使馆10月1日下午1时第1601号电已对国务院第803号电

所提的第一个问题有所论述。第二个问题答复如下：

问：国民党是否如中央社所宣称的那样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政协决议。我们认为，政协遭到国民党中执委的强烈反对，但我们想知道国民党有保留的接受政协决议的根据，并请尽力探究此种保留的性质——无论是公开的还是潜在的。

答：二中全会闭幕后，虽然中执委5月16日发布宣言，保证全面履行政协协议，非国民党方面却普遍认为，尽管国民党形式上接受政协协议，但并非如所公布的那样有真正付诸实施的意图。从纯法律意义上说，中执委是批准了政协协议。但一般有这种说法：中执委实际上以含糊其辞和自相矛盾的语气，对协议总体认可，从而否决政协通过的某些关键条文。事实上，人们较多的接受这种说法：只是出于蒋委员长的个人呼吁，二中全会才被迫名义上对协议加以批准。自那时起，委员长在公开言论和私人谈话中都一直声称赞成政协方案。

这可以追溯到1945年10月最初的国共谈判，追溯到杜鲁门总统对华声明后，马歇尔将军衔命使华并斡旋召集政协，并进而联系到这一点：政协并无执行1月13日停战令的法定权力，因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才是政府最高决策机构。二中全会上中执委的批准，从本质上说，是使政协协议生效。

显然，随着政协闭幕，有理由对国民党右翼分子蓄意阻碍协议之贯彻表示担心。政协协议公布不久，在重庆庆祝政协的群众集会上就发生了一阵据说是CC系煽起的骚乱。2月22日，重庆的共产党报馆亦遭冲击。此类事件在西安也时有发生。在那里，左翼刊物由于发行部被袭击而暂时停刊。

二中全会于3月1日开幕。会议的第七、八两天，政协决议正式提交中执委。会议充满了对政协决议的激烈抨击。而且对国民党政协代表特别是孙科、王世杰、邵力子、张冲等进行剧烈的人身攻击。尽管这些抨击表明了对整个政协协议的不满，认为是

对共产党无原则的让步，但会议对政协之第五项协议^① 尤为关注，因为它容忍了在1936年五五宪草基础上的修正原则。

这些抨击导致了3月8日开始的党内非正式讨论，以图解决分歧。讨论的中心围绕三个法律问题：第一，国民党希望修改政协关于国大并非实体而仅为召集全体选民之名义机构的决议；第二，国民党希望修改政协关于行政最终向立法负责的决定；第三，国民党希望修改政协关于准允各省制定地方法权力的决定。

政协综合小组与政协宪草审核小组的联席会议经过多次审议讨论，于3月15日就上述3点，达成有条件协议。非国民党方面同意修改政协协议，俾国大成一实体，但关于所赋之权力有待进一步磋商。也同意删除政协协议中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之条款。但修改后的二者关系，及删除后的行文表达，有待于进一步磋商。最后，同意修改政协关于省宪的协议，而以“自治政府”代之。但是，上述有条件的协议承认：首先，国民党应保证不再有修改政协协议之进一步要求；其次，国民党将上述有条件协议予以公布，并公开责成其党员贯彻。

3月16日，中央社公布了这些协议概要，但立即遭到共产党和民盟的非议。因为在中央社所加以概括的新闻摘要中，协议承认赋予国大选举召集权和动议、复决权，立法院也不对行政院监察，也没有独立的省宪。而且，中央社也没有提及联席会议关于不再修改和予以公布的两项协定（这两项协定可能在中央社公布消息的前一天晚上做出）。

3月16日，共产党及民盟的政协代表向孙科递交一份对中央社发表错误新闻的抗议。政协助理秘书长（公认为与CC系有联系）解释说，中央社所报道的消息是，3月15日晚讨论前，由他根据国民党中执委的要领起草的。这份稿件被误转到中央社。此后，国

^① 指政协通过的宪法草案协议案。——译者

民党政协代表也对此误会表示歉意。但中央社并未就先前错发的协议消息发表更正声明。从此，共产党频繁地猛烈攻击国民党对整个政协方案的诚意。

3月底4月初，政协综合小组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使解决悬而未决的法律问题获得一些进展，但很难在行政对立法负责问题上达成任何牢固协议。根本症结在于，国民党企图修改政协协议，改“内阁制”（行政明确对立法负责）为“总统制”（总统被赋予至高权力，并无类似美国政府有关监察和制衡权力的约束）。同样，政协地方省宪的概念也与国民党高度集权的国家统治的愿望格格不入。对于这一问题，政协综合小组4月9日实际上在相持不下的僵局中休会。

除了有关纯政治问题外，尚须注意，政协综合小组会议期间由满洲局势所左右的全部形势，要追溯到1月10日最初的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中央政府以恢复主权为目的调遣军队进入并驻扎东北不受停战条款限制。但共产党继续将武力输送东北，陆路主要经察哈尔和热河，其次是经海路从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同时，东北的俄国人显然对中央政府恢复主权横加阻碍。而中国共产党至少则享有俄国心照不宣的宽容。同时期，共产党的报刊电台则比以前更明显地显露出亲密依附于苏俄亚太阵线的倾向。这就使中央政府完全有理由怀疑中共的最终企图。

4月9日以来，政协综合小组并无进一步会议。有关解决履行政协协议的任何政治问题也无明确进展。

文献14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0—1246

南京 1946年10月12日

10月11日，政府发布11月12日召集国大声明。这表明政府全心履行国大程序，不管共产党参加与否。

随之是中央执行委员会10月9日再次推选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并行使权力，直到国大通过新宪法，选举产生新总统及新总统宣誓就职为止。根据临时宪法，总统前一任期到10月9日期满。

文献15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0—1546

南京 1946年10月15日

从直接目标看，马歇尔将军访问周将军的上海之行毫无结果，但它向世人表明了我们不遗余力致力调解的诚意，从而间接激励着少数党首领和其他人士效法斡旋，以避免最后破裂。在他们显然大功将成时，不幸的是，恰恰在同一天张家口陷落与国大召集令的公布同时发生。前者在情绪上激起强烈反响，而后者则导致争论：总统是否有权擅自决定国大日期而不与其他党派领袖协商。蒋的单方面行为反映了独裁专横倾向。共产党正是利用这种反感情绪，将小党派拉向自己营垒。

但蒋委员长向我解释说，早在去年秋天，他就决定1946年5月5日为国大召集日。当时并无人对政府首脑此举的权力提出异

议。1月份召开政协时，又进一步认可了这一日期。到4月24日，国大筹备工作显然尚未完成，他即宣布延期，并通告了其他各党派代表，他们也默认了。7月间，他宣布召集日期是11月12日，根据已达成的协议规定，官方应提前一个月发布公告，他在10月12日就确立了此日期。在他看来，所有这些都与他最初的声明并无冲突，而且也在认可的权限内。但当我向民盟一位最具影响而且宽宏大度的领导人加以解释时，他辩驳了这一事实。很清楚，这些显然属繁文缛节的问题，在他们眼里是生命攸关的原则问题。

这一事件说明了意见不一、商讨经久多磨的本质所在。当然，这些细末微节争吵的背后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权力的纷争。而私仇党怨又加剧了纷争。但这倒使我们难以判明：这些疑惧和尖酸的对峙气氛中的争论是因为共产党不愿合作？还是有某种更重要的意义？能够可信地设想是有更多的内涵。但是，有多少？从何而来？

这期间，马歇尔将军和我与几个少数党首领不断磋商，也与蒋委员长协商。他准备以马歇尔将军所拟建议为基础，再向共产党发表一敦促和平的公开信。在上海的孙科博士也在奔走，以挽救时局。这简直是和平的最后努力。

文献16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0—1746

南京 1946年10月17日

阁下：有幸向您评述中国基本政治局势。这主要是涉及共产党问题的，以作为进一步引导美国政策的背景。以下篇幅中，我大量引用纳撒尼尔·佩弗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的备忘录。这是佩弗博士口头报告后，应我的要求写下的。在广泛周游

及与中国知识界各类人士(多是他的旧交)广泛接触的基础上,佩弗博士形成了自己的印象。他的概括实际上是对我在有限的机会中所观察的目前思想趋势的确证。但是,就我看来,也有某些乐观的积极因素,得以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他的极端悲观主义。

1. 也许最为严重的特征是通常所说的诸如政府完全腐败和无能。它比我们在报刊上所看到的介绍更为恶化。社会动乱,通货膨胀,贪污成风,拉帮结党,平庸无能,无视百姓疾苦,以及显然具有法西斯手段的滥杀无辜。这在知识阶层中激起普遍的恐惧和愤慨。那些大权在握的人大多是武将而非文官。

2. 此种状况在所有有识之志中自然产生失望和叛逆。这是新组成的政府所激起的高度期待后的失望和叛逆,因此更为不幸。日本投降后,敌占区人民热切欢迎政府代表的光复。但他们一开始面临的就是普遍的敲诈勒索和作威作福,这时,期望转为震惊,再变为痛苦的失望。那些并没有在某种形式上得利于国民党统治的人们,其所以在原则上支持国民党,是因为他们厌恶共产主义。另一方面,甚至很多人承认,在这两种罪恶之间无从选择。退一步说,坚实的共产党统治,毕竟有较少的“压榨”,而且可以比较容易避免压迫和暴力的肆虐——中国人民遭受这种肆虐已久,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

3. 政治动乱在经济和财政方面所致之后果极为严重。除非迅速获取和平与稳定,否则会导致政治和经济的混乱。而物资短缺是削弱民众士气、滋生不满情绪和颠覆活动的潜在因素。

4. 共产党近来一直进行猛烈的反美宣传,今后可能更甚。这些宣传多属无中生有,其企图在于使我们撤军,而这也是非共产党方面对美国政策的普遍情绪。佩弗博士所言不无道理:

“美国正丧失其在中国道义上的声誉。一种反感情绪正在产生。国民党党徒及那些所谓反动分子怨恨我们没有积极帮助他们消灭俄国支持下的共产党。而实业界、知识界和文职人员中的较

大阶层也不满我们，因为我们给予政府充足的援助使得政府自以为能为所欲为，而没有给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使其改变作风和手段。非共产党激进分子认为我们的支持既使内战无法避免，又扶持坏人当政。那些极左分子则愤愤不满，确信我们扶持一个法西斯统治，以作为实现我们帝国主义目的工具。虽然对我们的指责因人而异，但都在指责。我们第一次处在不满和怀疑之下。如果人们听到目前有人提起美国是中国的友邦，那么这往往有一种潜在含义——这或者是来自要我们充分援助军事装备来打败共产主义的那些人之口；或者来自要我们以我们的压力来敦促国民党改革的那些人之口。美国第一次开始在中国人心中承担新角色，这一角色意味着道义上声誉的丧失，从失望到公开的反美情绪，对此不应忽视或低估。”

与上述悲观论调相反，一些令人消释疑虑的特点也不容忽视：

1. 我感到政府本身从未象目前这样充满绝对正直和真诚爱国理想的分子，最高层机关尤其如此。但这在各级机关中也屡见不鲜。在年轻职员中更为显著。在这方面已有扎实的进步。体制和公认的社会水平都是以往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拟的。当然，推翻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打碎全部国家机器，培养百姓的共和国公民意识，向官员灌输民主所必需的公共义务新概念的过程难免产生现时的弊病。而实际上自民国建立以来就发生的日本侵略，则如雪上加霜。最近的内战又导致庞大的生活开支和巨大的通货膨胀，使得多数人无法靠薪水度日。人生安全无以保障也是一个有影响的因素。蒋委员长声称，他最近处决了11名贪污罪犯，但并无明显的“儆百”作用。这使人们想起一句法国谚语：“宽恕一切才是理解一切。”在诸类问题上，政府也制定了专门计划，以便在获至广泛稳定后改善民生。蒋委员长的人格，他的笃信躬行和坚定不移，他那表里如一的高尚情操以及他即使现在仍在人们心目中所保持

的威望，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积极因素。当然他也具有因军事生涯的习惯和性格而造成的弱点。但他继续执政既是当前棘手局势的需要，也是目前时局最大的唯一的依赖。

2. 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盛行的对政府的批评和普遍不满，仅仅是长期内乱的表现，这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惯于否定。古代社会模式阻碍着团结统一，也是革新过程中的个人奋斗的桎梏。民主政府大概总是被百姓说得一无是处。因此，只有激发公民的组织意识和表达意识，才是对中国新生民主政治的校正。而目前的努力，部分意义上正是唤醒幼稚意识的开始。

3. 一旦和平实现，安定确有保障，经济形势一定会迅速改善。中国百姓只需官方稍稍干预，就有一种神奇般的恢复力。政府已详细制定了诸类计划，如改善铁路、高速公路、航空和航运的运输，新能源及农业工业的发展，等等。

4. 至于反美倾向，我并不想对佩弗博士的正确估计质疑。近几十年，中国国民意识的逆向面就是排斥情绪。每个中国百姓都潜在地存在这一情绪，无论任何一国挑衅，都会随时很容易地在群体或个人中引起激愤。这对我国并非杞人忧天，佩弗博士的综述是一及时警告。事实上，我怀疑他所采访的那些人是否——也许是无意识的——被这种感情所激愤。几乎所有中国人民在其祖国的危亡关头都如此渴望我们的帮助，以至于他们极易产生剧烈的突变。但我的感受则不同。自去年秋天我从日本监狱获释，到我去年11月离华赴美前，以及今年4月底返华以来，我第一次了解到，中国人民对我们正为中国所做的和将继续做的努力，是如此感激不已。此种真诚友情，无论在多次私人交谈和私人信件中，还是在报刊评论及许多微妙暗示中，都可略见一斑。如果说，目前有一种潜在反美情绪即将爆发，那么同样可以说，同样存在着增进传统友谊和以往两国关系中产生的继续友好合作愿望的充实根据。但是，事态要求我们极为谨慎地考虑我们的政策和手段，这

种政策和手段将在未来数月后有所展现。

文献17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0—3146

南京 1946年10月31日

阁下：我有幸继续报告几个少数党及无党派领袖试图进行的和谈活动。周恩来将军在上海已数周之久，以表示退出马歇尔将军和我的调停，孙科博士和另外几个政府代表也赴上海参加商谈。最后，经说服，周将军同所谓第三方面人士返都。据说临行前，他巧妙地取得两个少数党领袖的书面保证：他们与共产党一道或参加或抵制联合政府及国民大会。

会议在南京举行。马歇尔将军和我与他们保持接触，但谨慎避免出面卷入这场纯属中国人解决自己问题的努力。以前曾有一次行将达成协议时，政府攻占了安东，从而导致共产党强烈反应，中止了和谈。

一天下午，周将军来会见我。他显得激动万分，神色憔悴，失去常有的活泼气度，言谈无力。……谈话给我的印象是：他丝毫没有看到政府态度的善意，也很少看出美国态度的善意。在日益增多的怀疑和不信任气氛中，一切对于他都乖戾失常。

次日，他又会见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将军礼貌地留他共进午餐。谈话主要在军事方面。就我看来，没有希望达成共同意见。

同时，第三方面几经修正，提出了他们的建议，并于10月28日递交国共代表。数小时后，又由于周将军对其中几点的反对而撤回建议。蒋委员长10月29日热情接见第三方面代表，表示他们作为调停人，应限于他所提八条或共方的反建议，而不应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政府利用现在的拖延采取军事进攻，旨在摧毁共方根据地以削弱共方军事势力。这显然有悖调停精神，增加了美方困窘。国民党方面的辩解说，这是为了使共产党理智些，从而可能导致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此外，他们同样怀疑共产党的诺言，决心避免重复终归无效的1月13日停战令。但尚无迹象表明，久经失败、挫折和困难锻炼的共产党人会屈服妥协。他们的军事力量依然大致完整，就是退至险峻崎岖的山地，他们仍能进行游击骚扰。

政府显然不管其他党派参加与否，想如期召集国大。所有一切似乎表明，调停时期已经过去。假如这样，将有赖于蒋委员长及其同僚允许结束一党训政，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并进行人们求之已久的内部改革。可着重进行以下几点：

1. 改组政府军，大力缩编，增强战斗力，以防将来共军侵犯，平定无论来自何处的地方暴乱，维持和平与秩序。

2. 在收复的共党占领区及邻近共区内，进行真正的行政改革。如能做到这一点，从而保障地方利益，将能最有成效地克服共产主义，开始实现民主制度。

3. 以上两点是恢复经济的最可靠方法。中国人只要给予他们一定的安全，毋需政府多大帮助，就能进行自己的经济活动。中央政府可采取极其有利的措施，如土地改革，厉行税制，发展交通和技术等等。

以上诸点如能实现，就有可能最终将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纳入政府，使其军队国家化，部分则加以遣散。假如杜鲁门总统12月15日宣布并由马歇尔将军始终坚持贯彻的政策^①终归失败，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自慰：我们已尽了我们的最大努力。我感受到马歇尔将军的耐心、机智和同情心、直率而又总是建设性的批评，以

^① 指美国总统杜鲁门1945年12月15日发表的对华声明。声明阐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观点。——译者

及他在无休止的交涉过程中所表现的策略。我本人参加调停不长，贡献微薄。但我深深感到，我们已做了一切尝试来诱使共产党合作。我们也承认，共产党确实认为他们屡次让步，并遭受挫折。政府要人应负破裂的大部分责任。积20多年的仇恨、疑虑和恐惧，加上中国传统中所缺乏的大规模自愿合作的精神，以及共产党的纪律训练，自然会产生心理变态。

以上所述，主要是根据局势发展情况来重估美国政策的建议。与马歇尔将军及大使馆同事商讨后，不久当提出进一步建议。

文献18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1—1046

南京 1946年11月10日

中国政府经由马歇尔将军书面通知共方代表，从11月11日中午开始停火，要求迅速举行军事三人小组会议。

文献19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1—1346

南京 1946年11月13日

自我上封电报后，所谓第三方面(包括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领袖们)连日来积极调停国共纠纷，他们与马歇尔将军及我经常保持接触，我们则力所能及地鼓励他们。后来，其中几位11月6日访问我，承认他们过去三周的努力未能奏效，要马歇尔将军和我再次参加谈判。我回答说，共方对蒋委员长11月16日经由我

们交给周恩来将军的声明至今尚无答复，说明他们完全忽视我们。而我们只在国共双方都请求我们进行调停时、我们才能参加。第三方面人士离开时，表示尽力劝说共方予以答复。

次晚，他们把周恩来将军和王炳南先生领到大使馆寓所。周将军对为何未答复加以滔滔不绝的解释，否认其中有什么反美情绪。他谈到蒋的八点，指出不能接受蒋介石的八点，但他也不愿驳斥它，从而招致谈判决裂。我建议由他发表一简短而又和气的信，指出鉴于政府和第三方面敦促，他返都商谈一切有关事项。因为中国人尤为注重书信的口气和分寸，加上严重事态所产生的激动心情，他们(指共产党)为这封短信整整斟酌了一天。到第二天晚上6时才完稿。英文译件送给马歇尔将军，原件到11点钟才送给蒋委员长。

同时，蒋委员长告诉我，由于国大召集日期日益迫近，他决定听取我们的忠告，发布无条件停战令。我建议他此外再发表一个有助于和平的声明，争取第三方面——如有可能，也争取中共——参加国大。11月5日，他送给我两份这样的文稿，要马歇尔将军和我按我们认为最佳的方式予以修改。这一文稿措辞散漫，既为自己辩护，又批评共方，这对共方肯定是一个挑衅。而且文稿冗长，删去几段后，我们认为还是重写为好。最后，只好由马歇尔将军亲自执笔重写。我们将信稿送交蒋委员长之后，他解释说，在他的原稿中，他已经说服了他的文官，特别是说服了他的军事官员，要他们同意发布停战令。在这点上，他说他几乎是孤立的。他做了几点文字修改，除了有关宪法那一段外，他同意了我们所拟的稿件。

11月10日，他请求我建议第三方面领导人，让他们交出国大代表名单来换取国大延期。第三方面表示时间太短，等等。当晚及第二天，各方都积极努力争取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结果，经过各方多次会谈，宣布国大延期3天(至11月15日)。青年党和民盟

的一部分^① 准备提交国大代表名单，共产党态度则更为顽固了。国大将先召开两周的“预备”会议。

周恩来将军和王炳南先生11月11日下午会见我，当晚会见了马歇尔将军，他们的意思是前往延安前辞行。会谈气氛相当沮丧，他表示看不出有解决问题的一线希望。他对蒋委员长及政府领袖们极为失望，而且他如此顽固地追求问题的细节，以致对我奉劝应集中关注两个真正关键的问题——停战及起草名副其实的代议制宪法——的呼吁全然不顾。他一再声称，蒋委员长是“将绳索套在共产党脖子上”或“用匕首对着我们的胸膛”，表示一旦他同意解决部分的问题，将会招致严重后果。周强调，政府必须依照原政协决议的一切程序行事，否则不行。

只有一点他表示疑惑：美国政策究竟有没有改变。我回答说，他对此应该非常清楚，即，美国政策始终恪守杜鲁门总统1945年12月15日声明。周引用美国官员的两个谈话，说我们为了对付苏联威胁而需支援中国政府，亦表示怀疑共和党最近选举中的胜利是否意味着我们外交方针的改变。我重申了我国政府屡次表示对中国和平统一的愿望，以及我本人对中国民主改革、开明自由及消除普遍的贪污和无能现象的关注。我指出，要达到以上目的，中国必须具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而共产党能对此作出爱国主义的贡献。我告诉他，我曾为此与蒋委员长辩论过，蒋也由衷地赞许我的观点。我提醒周，假如美国的支援能更富有成效，那将有利于整个中国。又指出，假如由马歇尔将军负责进行军事改组，那对共产党及其占领区更加安全。这时，我因故离开片刻，他即问我的中国助手，有无可能整个地取消美国军援五年的计划。后者回答，这很简单，假如政府与共产党共同有此要求。这表明，周将军及其同志们为了与不共戴天的国民党进行内部纷争，不惜牺牲

^① 指民社党。——译者

整个国家利益。这一点在他们最近的反美宣传中也有体现。共产党的态度最终会导致交涉彻底破裂。周将军表示，代表团中将有一人留下以代表共产党，但他的撤离意义重大。我问他，他的撤离是表示对前途失望还是为了返回报告并请求新指示，他沉默片刻，回答说两者兼而有之。

以上烦人冗长的报告旨在扼要叙述将共产党拉入联合政府的努力所出现的晦暗气氛。不管出于何故，这看来——至少是现在——难以实现。值此结束报告之际，我愿以令人喜悦的建设性口吻表示，我们不必悲观。并且我相信美中关系尚有许多潜在希望。

文献20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1—1646

南京 1946年11月16日

国民大会于11月15日上午10时召开。2030名代表中1400人出席。国民党代表全部到会，参加政协的9名无党派人士中7人出席，其余2人拒绝到会。

议程主要包括，选出一位年龄最高的代表为会议主席，会议全体起立向国民政府致敬，委员长致辞。委员长叙述了宪政大会的历史，号召全体代表制定一部促进中国人民利益的宪法。会议至此休会，延至11月16日再開第二次会议，进行大会组织工作。后又推延至11月18日开会。青年党11月15日交出120名代表名单，委员长将选择其中100名。其他党派是否参加现尚不知。

大使馆的中国法律顾问，作为知识界代表参加大会。他说，他所属的湖南代表团在其他代表团中活动，建议大会有权不管“五·五”宪草和政协宪草而独立制定宪法。这位法律顾问说，这一运动并非来自国民党的怂恿。大使馆以为，根据现有的组成成员，没

有国民党的同意就制定不出宪法。

周恩来将军昨晚来辞行，说他将在今天请求马歇尔将军帮助解决返回延安的交通工具。他重申董必武留下作为共产党代表，希望谈判不致中断。周今天上午已向马歇尔将军提出请求，希望11月18日或19日返回延安。

文献21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1—1946

南京 1946年11月19日

周恩来拜会马歇尔将军，请求解决交通工具。他说，他的行程不应被解释为中断谈判，而是短期返回请示并重拟方针。他重申留董必武为中共代表团(南京40人，上海10人)团长，并表示希望不久会继续恢复谈判。

同以上相反，周近日在两个场合对美国记者说，他返回延安实际上意味着谈判终结。

文献22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1—2446

南京 1946年11月24日

上周突出的政治形势是有关11月1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大会已举行了四次全体会议，许多代表发言，大概下周可能提出宪法草案。虽有大量幕后活动，但从表面上看不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多。大会议程尚不算极为混乱。孙科博士是大会临时主持人，难以控制同时踊跃发言的人，以维持会场秩序。代表们显然被西方新颖

的麦克风所吸引，争着发言，以武断口气提出离题问题，如争取妇女平等、蒙古自治、主席团内增加西藏人选等等。只有委员长能够控制这些离题过分的熱情，他前排就坐，不时向大会执行主席传递提示字条。

但也并非一无所成。政府所提程序规则最终稍加修正，被大会通过——虽然履行起来并非没有困难。在推选主席团的方法上产生过分歧，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按代表比例产生主席团。55名主席团名额中已选出46名，余下的9名，5名留给中共，4名留给第三党派——如果他们将来愿意参加的话。

第一天开会后，青年党的100名代表被提名，但尚未参加大会讨论。民社党代表的参加正在交涉。看来民社党行将出席，但张君勱本人也许不参加。其他的第三方面人士一直未参加。大公报的胡霖是唯一的例外，他作为无党派代表参加了第一天的会议之后，回到上海在报上发表社论攻击大会的一党性质。他认为，政府意欲通过与政协原则大相径庭的宪法。

周恩来将军11月19日返回延安，同日发表讲话，表示在三个条件——召开新的党派会议，组成联合政府及召集新国大——之下，可以恢复谈判。

国防最高委员会会同国民党中执委，宣布改组行政院，扩至18个部，7到8名不管部部长。人们对新政府的组成有很多猜测，并有委员长可能兼行政院长之说。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宪法草案，准备提交国大。内容尚不清楚，据说是政协草案和“五·五”宪草间的折中妥协。行政院和立法院已通过此宪法，不日内可能提交大会。据报纸上的消息说，在最近召开的绥靖区会议上，委员长表示五个月内在军事上消灭共产党，五年内政治上消灭共产党。这一消息震动极大。宣传部长随即发表声明指出，报纸所登据说是委员长的讲话，措辞之愚，不值一驳。

11月22日，共产党发言人王炳南来访，希望劝阻政府不要进

攻延安，并奉劝马歇尔将军留华。

同时，有关军事准备的传说日甚一日。共产党人认为政府将进攻延安……舆论也都认为进攻肯定会成功。19日，共产党发言人对大使馆官员表示，一旦延安遭进攻，共产党军队将在政府军后方还击，在西安以至深入到华中开展游击战争。他举例说明已有先例，1944——1945年间国民党军被打垮^①后，共产党王震将军的军队就成功地深入到湖南、湖北。

文献23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1—2946

南京 1946年11月29日

国大全体会议周末休会，延至11月25日。主席团周末继续开会讨论程序规则——关于此问题，虽在11月22日全体大会上已决定采纳政府方案，但又老调重弹，很少有进展。

本周末最重要的进展是民社党提交代表名单并参加会议。此事是以委员长与民社党主席张君勱发表交换信件的方式公布的。张君勱信中提出的条件是：必须实行停战；进行军事改组；用政治方法解决纠纷；政府国库不能挪用作国民党经费；从前许诺的人民自由必须执行；在学校内停止党的活动。蒋的答复是：他欣赏民社党参加国大，民社党的纲领与国民党相同，张所提条件大多已在实行，尤其是有关人民自由的，其余不久也将付诸实践。据此，民社党已完全屈服。但其40名代表并不包括政治上知名人士，张本人也未参加大会。

11月25日的全会由委员长主持。他宣称政协宪草仅对参加政

^① 注：这里指豫湘桂战役。——译者

协的各党派有约束力，但不能限制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他又宣布蒋——张函件仅约束国民党而不约束其他党派。国民党再三声明，国民党人仅占国大代表的少数（实际上国民党约占50%，但它毫无疑义能控制其余的25%）。

在蒋——张函件公布的同时……共产党发言人重申，假如召开新政协，组织联合政府并重开国大，可以继续和谈。陈立夫（国民党组织部长）在记者招待会上攻击共产党，阐述忠于中国传统道德……。罗隆基（民盟领导成员）在声明中再次强调并重新解释了民盟不参加国大之立场。

11月25日的两次全会集中讨论并最后采纳了程序规则。唯一真正的争论点集中在第18款。它规定国大只可就两项问题接受动议：（1）接受所提交的宪法诸款并最终通过之；（2）宪法的实施日期。这一款遭到强烈反对。后来，委员长在主席团的一次不公开的会议上声称，如国大不通过第18款，他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之职。至此，第18款方获最后通过。但尽管如此，条款仅以微弱多数得到通过。这样，湖南代表团所发起的旨在使国大具有就任何问题采取其所选择的一切行动之权力的运动，自然而然也就烟消云散了。送至大使馆的报告表明，政府试图在张群将军（其妻是湖南人）的指导下安定湖南代表团。对湖南代表团的控制比原先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大多数杰出的军事将官都是湖南人。

多数代表普遍希望程序规则的最后通过能获得一定程度的秩序。到目前为止，甚至委员长主持会议，也不能完全维持大会秩序。送交大使馆的报告表明，在国大上蒋较难对付占支配地位的CC系势力的“反抗”。大约一年前，国民党中执委会议就开始不满受CC系控制的局面。而目前则表现为对湖南代表团运动一类事件的不满。这也许是为为什么陈立夫辞去主席团成员职务以集中全力于驾馭国民党的活动的原因。迄今为止的事态表明CC系至少一直有效地保持着它的控制。委员长仍倾向于依赖陈立夫。正

如一位代表所言，陈立夫依然是委员长的专宠耳目。

最终事态如何尚难确立。但是，内战以来，全国各地观念不一的代表们在共同的事业中汇聚一堂，仅仅这一事实也必将影响深远，其社会影响也必将超过国大的直接成果。有趣的是，全部国大代表，无论是否国民党员，几乎毫无例外的来自资产阶级分子、知名专家、商人和地主，而纯粹的农民、工人或少数民族代表是必定没有的。

宪法草案主要由张君勱起草，经行政院和立法院通过。宪草现已公布，将有待国大讨论。

文献24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2—246

南京 1946年12月2日

周恩来将军11月19日离南京返回延安前，马歇尔将军要求他尽快从延安获至一项明确声明：他们是否希望他继续调停。周将军也答应了。共产党坚持政府发布停战令之失败，周将军要求召开三人小组会议之遭挫（除了一次“非正式”会议）以及周将军宣布回延安，这一切都足以证明马歇尔将军提出这一要求之必要。确实，周将军也指出，他已留下两名代表，以表示进一步和谈的可能。

到11月29日，仍无任何音讯。马歇尔将军与我商谈下一步步骤后，我即邀来共产党代表董必武。长时间交谈后，他竭力表示共产党从未声言他们反对美国调停。当我问，他们是否愿意更明确对此表态并声明希望继续调停。他不置可否。但同意以马歇尔将军提要求的形式发送一封信件：“需多长时间他们才能使他得到对此问题的答复？”董认为答复两三天后即可收到。董先生同样坚持

共产党关于在三项条件基础上继续谈判的公开声明：

1. 以政协协议为根本基础，召开新政协；
2. 在此基础上改组政府；
3. 重开国大。

对提出这种不切实际的建议的幼稚很难解释。明智的共产党领袖也一定意识到，政府在近12个月的无效商谈和最近的共产党背信后，对在此范围内即刻恢复和谈的怀疑态度。更不能期望政府宣布正在举行中的国大为非法，宣布国大成果无效，并遣散五六百国大代表，等国大重开的时候再来。政府现已决定实行会议的第二项议程了。

12月1日，蒋委员长、马歇尔将军和我进行会谈，会谈几乎持续3小时。由蒋夫人充当翻译。蒋委员长一开始就询问，一旦争取共产党合作的努力最终失败，该怎么办？马歇尔将军以令人敬佩的直率明确重申，他坚信不能以军事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因为长此以往，不久就会使国家陷入财政困境。他深知，在现在这种敌对猜疑情绪下，说服共产党在程序的繁文缛节上妥协，以在较大问题上达成协议，难有很大希望。但他认为应尽力到底。蒋委员长最后也表示同意，但又重申，他相信共产党行为大多并非是因为恐惧和怀疑，而是想以蓄意的阻碍拖延政策来搞垮国民政府。据他的经验，只要政府占优势，俄国就会完全基于现实而不援助中共——尤其鉴于现在俄国全神贯注于其西部边境问题。尽管经济局势普遍恶化，引起广泛困难，港市和工业中心尤其如此，但他相信国民经济体系在今后两年中经受得住考验。他自信在今后9至10个月内，可以粉碎共产党军事力量，然后即可以政治方式光复共产党统治区，就象16年前共产党撤出江西等地后所证明的那样。他辩解说，随着共产党根据地的破坏，加上摩托化公路和飞机等等，如今游击战争不再象过去那样容易。他完全赞成政府改革及增加地方自治的重要性，以此作为削弱共产党势力的最

可靠方法。但他坚持说，假如共产党保持武装并拒绝恢复和谈，内战就将不可避免。蒋委员长认为，问题将最终归结到东北局势。他意欲保持对东北长春以南地区的控制，那是重要的工业区。目前并未进攻哈尔滨，以避免与俄国发生任何可能的冲突。他又表示，他年已60，说不准什么时候他的积极努力会突然结束。他感到，在他当政期间，以某种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责无旁贷。最后他极力要求，鉴于局势变化，美国政府应重新考虑其政策，以获至中国的统一与和平，及远东的稳定。

最后达成非正式协议：认为以下行动似系明智之举，即一旦国大完全赞同所提交的宪法，经选举产生国府委员会，并留有非政府方面席位（包括9名共产党席位），同时明确宣布关于改组行政院的决定，就再次向共产党呼吁，要他们从民族利益出发，采取必要步骤参加联合政府。呼吁应该语气极其温和婉转。至于这一呼吁是取公开呼吁的形式，还是致信延安，两党自己协商，有待进一步斟酌。

在此期间，国大每天开会。许多迹象表明，会议辩论缺乏经验，并夹杂有举止粗鲁杂乱现象。但这一切至少表明生机盎然，也表明国大完全由国民党机器操纵的嘲弄是无稽之谈。事实上，也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代表受国民党操纵。其余的或是多少有点独立的国民党党员，或是少数党及无党派人士。这些人也许是最有影响的势力。修改后的宪法草案与政协协议极为相近，这主要归因于蒋委员长的强大压力。宪草遭到国民党反动人士约200名代表的强烈反对，也许是由于蒋委员长的坚定和警觉，才未发生骚乱。照目前所示，草案将以约900人的多数获得通过。就目前迹象来看，预计反对派将纠集其他200多名代表。另有二三百名代表游移不定。果真这样，这将是蒋委员长的个人功勋，也是他精诚开创现代民主形式的鼓舞人心的证明。

文献25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2—446

南京 1946年12月4日

委员长将宪草正式提交国大。正如所宣传的那样，宪法合情合理，基本继承了政协原则。委员长提交宪草时宣布，随着提交宪草，训政宣告结束，开始还政与民，并表示他将视此为他一生的顶峰，此后再无任何政治抱负。大使馆得到的全部报告一致认为，委员长的声明感情真挚、虔诚坦白。实际上，这一声明与他数年来定期发表的宣言一脉相承，并无两样。他的承诺显然是在违反多于遵守的情况下兑现的。甚至在履行时，也常常机不逢时。因此，也许很容易以此为根据被合乎逻辑地指责为虚伪。但另一方面，事实证明委员长确实言行一致。委员长自信他是注重实践的民主主义者，这正是中国所需要的。但同时他将中国及自己与帝皇及帝国的形式加以等同。他对民主的理解受到其本人经历及中国传统的严重限制。

此番国大和行将通过的宪法最终是否证明确系再次欺骗，还是委员长全力废除一党独裁，支持宪政——那怕是有限或不完善的宪政，尚有待于观察。

大部分国民党和青年党代表、以及大量无党派人士已保证支持宪法。但由CC系组织的抵制显然仍在增长，他们的宗旨是消除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并相应增强总统权力。一旦抵制成功，这将是宪法命运的灾难性兆头。因为很简单，它只能有助于传统的中国独裁政治。而宪草的通过——这一点委员长已公开保证过——将促进政府对公民负责。

文献26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2—946

南京 1946年12月9日

在12月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南京中共发言人宣称，中共将在政治战线上——如必要也在军事战线上——为联合政府而奋斗。但并无以政治或军事方式推翻现政府的企图，也不会进攻南京——如果得以逼进南京的话。

文献27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2—1246

南京 1946年12月12日

委员长在12月9日的纪念周仪式^①上发表演说，重申政府政治解决而非军事解决国共争端的意图。据报，他已表示，周将军作为重开谈判的两项条件——重开国大及恢复1月13日的军队防地——不能接受。蒋委员长进一步指出：“政府仍未关闭和谈大门，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内争端乃政府不变方针。”他说，政府期待共产党对有意参加和谈及改组政府的商谈有所表示。又报，共产党致马歇尔将军之电并未答复马歇尔将军的问题。共产党声称，委员长提出了两项要求。委员长指出，国大召开已三周多时间，席位仍替共产党保留着。

^① 指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周仪式。——译者

文献28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2—1846

南京 1946年12月18日

国大上周依旧进行小组会议，逐条讨论宪法151项条款。会上提出大量修正案和修订，有些获得了通过。获通过的主要修改是，迁都北平，以重建对三民主义之中华民国的控制，取消以联合国宪章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宪法基础。并且，某些修正案对国民政府下的地方政府代政范围和性质也有所更改。

这期间，有证据表明，CC系挖空心思，企图使宪章的每一基本修正回复到“五五宪章”。

委员长12月5日私下表示，对付CC系很棘手，但最后能以充分压力控制CC系。审议小组15日结束工作，将其报告提交综合小组。审议小组工作如何卓有成效，国民党对最后结果的有效控制的实际程度如何，有待在12月16日的综合小组会议上见分晓。毋庸置疑，综合小组实际上是在委员长的监督下就审议小组所做的每一项修改进行投票的。一项关于修正案条款的措词的技术修正案除外。因此，一旦被政府推荐，宪章将以同样方式提交给12月18日的全体会议。

据报道，委员长在纪念周上告诫国民党，必须按他的建议支持宪法，不得含糊。新宪法将在国大最后一次会议之后6个月生效。

报道表明，共方军事态势骤然变得更加主动，在各地广泛展开攻势。但并无证据说明这些攻势是协同一致的。这些进攻只是共产党估计到政府不久开始的军事进攻而采取的不断骚扰——尤其是进攻交通线——给政府的大规模进攻造成困难。12月12日，周

恩来在西安事变周年纪念时发表演说……明确重申共产党恢复谈判的条件：解散国大，恢复1月13日军事位置。其攻击政府和委员长的措辞极为强硬，目前对此唯一可能的解释只能是：共产党并无稍微接受任何和解方案的意图。周一一直比其他领导人更倾向于和谈，而现在竟有这番演说，其意义重大。

文献29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2—2146

南京 1946年12月21日

阁下：我有幸报告延安对马歇尔将军的答复，以及由此出现的磋商。

我们认为这(指答复——译者)实际上表明了共产党结束美国调停的愿望，以及进而放弃和谈的意图。因为，他们肯定明知两项条件不能为国民政府所接受。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项条件与起初由共产党公布并由董必武先生所强调的三项条件有某些不同。……政府不会答应所提的恢复1月13日军事位置的要求，那样做会因部队的调遣以及中国目前混乱的交通运输而毫无止境地争吵不休。

马歇尔将军征询我的意见，我提议考虑一项美国的政策。概括如下：

1. 在马歇尔将军指导下，改组政府军，以裁军裁员，并训练、装备部队，提高素质。这一切将以不足以侵犯共产党而仅系自卫措施和维持地方和平与秩序为条件。当然，区分进攻共产党还是剿匪、或是从事自卫，相当困难，但并非不可能，而且这也值得。如果共产党确实想寻求保护，那么，他们对由马歇尔将军控制国军将会再赞成不过了。至于他们是继续其破坏活动和游击战争，还是

满足于其独立地方政权下的自由——只能让时间来说明了。条件将因时因地而异。我认为，相比之下，这一程序较能导致共产党与政府的合作。

2. 坚持在民政尤其在地方民政上厉行改革。这是最终战胜共产主义的唯一出路。我方应提供大量包括预算、税收及其他财政事务方面的有权威的顾问。这就需要机智、恒心和具体情报。我觉得，这种受欢迎的帮助和真正不断改善的潜在可能，都是不无希望的。正如在军事上的努力一样，这将是一项重大的对华援助，并会在这一领域里有助于世界稳定。

3. 继续促成共产党重新考虑他们目前这种不妥协的态度。毫无疑问，和谈大门会保持向他们敞开。

宋子文博士12月7日来访，讨论了延安的答复。稍后王炳南先生也因同样目的来访。我告诉王，我们只能认为这一答复无异于中断和谈。王承认我们的看法，但坚持认为共产党确实希望和平解决，希望美国调停。我强调，在此种情况下，最佳方案应是双方都同意恢复商谈，而不是强调任何条件。

随后，蒋委员长约见会谈。他希望了解我们对延安答复的反映。商谈后，他坦率表示，一旦俄国对其西部边境的关注减弱，它在东亚活动的危险就会增加。因此，共产党问题必须以某种方式在半年内解决。他深感这是他对中国人民而且也是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责任。并且也相信能够在六个月内粉碎共产党军事力量。他重申，如无这种想法，他实际上就是坐视人民痛苦而有负于人民。他以为解决共党问题的任何进一步企图均属渺茫——尽管他严守向共产党敞开大门的许诺，并想方设法实现这一目标。他渴望美国支持，相信美国的援助对阻止全球性的危险也是必要的。但即便不能获取美国支持，他也将独立自主、责无旁贷地继续奋斗。他要我请求马歇尔将军作为他的私人顾问继续留华。我表示这不可能。而且在任何内战的情况下美国援助都不可能。这使蒋委员长窘迫

不快。

后来我又几次参见蒋委员长，询问是决定动用武力全面摧毁中共武力，还是听从我们劝告，将其军队限于自卫及维持地方治安的范围，同时全力进行建设性改革和经济恢复。对此，蒋委员长自己举棋不定，与其反动同僚也有冲突。

文献30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2—2446

南京 1946年12月24日

11月30日，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宣布：自中国新宪法公布起到下一届行宪国大这一过渡时期，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仍维持现状。其间，许多实际问题，诸如制定新法律，将通过现国大研讨解决。国大代表在下届国大召集之前，行使其所属权力，并监督宪政的执行。

陈指出，宪法通过后，未出席国大的任何党派对宪法的任何反对都将被视为对人民而不是对政府的反对。

他说，共产党联合抵制国大的行动“无碍于新宪法的实行”。他未提及共产党人要求延长国大(24日闭幕)的传闻。他还指出，共产党不参加国大表明，他们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

陈否认国民党有意组成党政联席会议。他解释说，国民党仅仅是借召集全国各地党员开会之机，讨论党的一些日常事务。

陈说，他并不知道政府何时改组，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有关改组的商讨，但表示假如在行宪之前的过渡时期改组，组织部和宣传部仍将保持目前职能。

他否认他正参加关于恢复国共和谈的谈判。

文献31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2—2946

南京 1946年12月29日

12月25日，国大通过了实际上与原先所提交的草案相同的中国新宪法。宪法政府组织形式的理论或宗旨也无变化。虽然在某些条文表述上有几处不大的变动，并删去某些条文，诸如定都、以联合国宪章作为宪法之一部分，等等。

国大进而通过决议，规定新宪法将在1947年12月25日生效；在今后三个月中，政府将起草选举法，并废除法令全书中一切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令；九个月内完成选举。同时，下届国大产生前，现国大继续行使其职权。

尽管最近的共产党声明并未表现出有很大的成功希望，但如果政府在短期内进行过渡期的国府委员会和行政院改组，决定派使者前往延安寻求与共产党人会谈不是没有可能。

现在纵观国大，它起初在大多数代表中间引起极大热情。他们以为，他们实际上可以自由地修改政府主笔的宪草。但随后的局势日益表明并非如此。许多代表兴味索然。很多会议到会者还没有半数。国大开始时，某些集团明目张胆而又顽固不化地企图改变所提交的草案。最大的抵制来自CC系，并一度有得逞的迹象。无论如何，委员长最终表态，并赢得了除CC系以外的几乎所有其他党派和个人的支持，他们一起反对极右势力。国大因委员长对局势全力而又可靠的驾驭宣告闭幕。这也许是他最伟大的政绩。这也证实了他所公开宣称的意图：为过渡期多党制政府的建立预先采取步骤。

孙科博士与佩弗的一番谈话给国大增添了一项杂闻。约两个

月前，孙科曾经表示他已得出结论：国民党“不可救药”，因为他的领导不可救药。那时他对共产党及其意图满怀希望。而数日前佩弗再次见到孙科博士时，后者态度起了相当大的变化。孙科说，国大表明，由CC系所控制的党的机器并非如所料想的那样无所不能。在政治生活中，国大代表为这一事实所震惊：抵制是来自党内而并非象所想的那样来自外部，甚至党员也不能确信毫无阻力。孙博士感到，这的确是大有希望的迹象。他同样认为，委员长也从中得益非浅，这使得委员长深知，至少有必要听取少数党意见并且甚至也许有必要向他们作出实际让步，以便在控制国民党机器时获得并保持他们的支持。鉴于最近几周与共产党人的商谈情况，孙博士对共产党已大失所望，他感到共产党已完全表明他们缺乏诚意和不可信任。

二 政治现实

马歇尔离华返美后的8天里，国民政府试图与共产党人重开和谈。但共产党发言人仍毫不让步。他们拒不改变原先要求，坚持必须废除国大12月通过的宪法，坚持恢复双方1月13日军事位置。共产党人的这种顽固姿态使蒋介石一怒之下命令共产党代表离开南京，并开始改组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蒋记政府。

新宪法将从1947年12月开始生效。宪法奠定者坚信本年度将会使国民党结束“训政”，并准备宪政。但是，新宪法指导下的建立政府新机构的工作导致尖锐冲突，国民党与国内各少数党纷争难解，而国民党内自由分子和保守分子又争相操纵国民党。军队冲突，经济衰退，工人抗议，加上学生的煽动，这一切使得政府改组困难丛生。

司徒雷登1947年的电文，报告了蒋介石所面临的难题和政府恶化的军事困境，司徒对政府改组的终究出现而幸慰，但他认为改革速度过于缓慢。他对党派强权政治的影响业已结束这一点表示怀疑。此外，司徒也意识到，在内

战之火继续蔓延的时候，改组政府的任何企图都将增加蒋对美援的更大需求。于是，司徒试图以政府的进一步改革作为美国援助的先决条件。

文献 1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1847

南京 1947年1月18日

中共代表团领导人王炳南今天早晨访问我，他声称已经接到延安的答复：只要政府接受中共的两项要求（废除国大和宪法，恢复1946年1月13日的军事位置），中共立刻派代表团到南京恢复谈判。但没有必要派政府代表去延安。

文献 2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2347

南京 1947年1月23日

民盟发言人罗隆基发表评论说，民盟对政府改组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建议表示强烈反对，这是企图拖延内战，使国家继续分裂……。民盟赞成各主要政党恢复和平谈判，但谈判不可作为向另一方面发动“和平攻势”的手段。民盟不反对任何谈判方式……。重要的是两党应遵循一年前成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和传统，所有政党都必须尊重和维护政协决议。民盟不反对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政协决议的某些部分，这对恢复谈判的确是必要的，但已经签订的政协决议不能摒弃。民盟极力主张建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但这不能被解释为在排除其他党派和组织的情况下，邀

请一些党派参加政府。

张东荪被提名接替张澜，任民盟秘书长。他告诉我，他对中共的态度有如下印象：

中共正在军事上继续使政府遭受严重损失，以致在最近几个月里，当中共能够提出它自己的条件时，政府将被迫寻求恢复和平对话。中共现已得悉，美国从太平洋岛屿上转售的剩余物资对政府价值不大。政府正在重开它的兵工厂，这表明政府缺乏武器供应。一些政府军队正在使用日本武器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中共指望以政府的经济困难进一步削弱人民对政府道义上的支持。他们还希望莫斯科的外长会议对他们有利。

民社党的领导人张君勱和伍宪子，青年党领导人曾琦和左舜生等，与委员长商谈了两党参加政府的问题。两党公开发表声明表示不愿参加联合政府，但他们在私下似乎附和政府，并等待适当时机公开宣布他们的主张。

在与我的一次谈话中，张君勱表示，他不希望在政府中有任何特殊地位，而宁愿做立法院成员，在那里他可以帮助制订实施宪法的措施来为国家服务。他还表示希望在全国进行一次演讲旅行，解释新宪法对人民的好处。

一旦政府1月20日公开声明所提的最后要求被中共拒绝，预计政府改组可能会推迟。情况表明，下一步行动有待总统和国务卿的华盛顿会议。估计会议会导致执行美国对华政策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文献 3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2347

南京 1947年 1月23日

阁下：我有幸向您评论目前对国民政府和中共恢复谈判的可能性的看法。国民政府最近提出正式建议，派一个代表团去延安。似乎不存在障碍，政府领导人没有不利于中共对此建议做出反应的言行。但中共的答复干脆明朗，即如果政府同意以前提出的两项条件，谈判可以在南京恢复，否则派代表团去延安也是一无所获。不过，南京的中共代表坚持不打算就这样结束谈判，而是宁愿为将来的和谈开辟道路。这似乎不可思议。我相信他们确有此种想法。

中共越来越自信，以为在今后几个月里，政府会被迫重开和谈，那时他们就可以提出自己的条件。因此，等待是对他们有利的。这不仅是因为政府财政经济的恶化更趋明显，百姓怨声载道，他们还指望美国的对华政策更加消极，指望3月份的莫斯科会议产生有利于共产党目的的进展。我的印象是，前几个月，中共明显地急于结束战争，而现在他们倍受军事形势鼓舞。也许这与其说是因为中共军事形势的改善，不如说是由于腐败无能的政府官兵士气低落导致政府的军事失败。不必按照中共的统计数字去猜想政府没有公布的损失。对中共强硬姿态的另一解释是——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他们正感到在最初的政协决议中，他们在军队整编方面的让步太大，所以决心不再忍受此种无缘无故的约束。如果此事属实，那么政府领导人就更加大错特错了：政府本身在遵守政协决议时三心二意，共产党又如何能对政协决议信心十足呢？

关于黄河工程及其所达协议的争吵集中体现了谈判的错综复杂、不可思议，中共一直坚持以5个月为限，在此期间，他们可以在老河床恢复之前，从那里疏散居民。他们一直猛烈指责政府——或多或少是真有其事。共产党无疑受到自己根深蒂固的猜疑和党派性军事考虑的影响。而政府在业已许诺的供应方面不负责任，完全从其军事考虑出发，而非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政府的工程师们坚持迅速关闭水坝，这从纯技术观点看是明智的。这些人主要关心的是他们的专业声誉和生计。艾格登(联合国救济和复兴总署中国分署署长)和他的美国助手为两个月的拖延而争论，拖延是出于对政治问题情有可原的考虑，而非工程本身的确切需要。蒋委员长最后把期限划在2月15日。1月20日，经过1小时激烈讨论后，董必武先生同意延迟三个月。此时艾格登将军感到，他的忍耐力已经耗尽，并准备以撤去联合国救济和复兴总署一切援助相威胁。确实，他指出他必须获得当地农民的许可，必须说服政府反对工程师们的劝告，但在签约的问题上，前景完全是充满希望的。

正如我在以前的一份电报中指出的，只要蒋委员长能以目前的精力和体力继续执政，他将依然是政府决策中的决定性力量。蒋断言能对付他那些反动同僚，这无疑是正确的。在这一意义上说，周恩来在最近的声明中所说的蒋介石本人是头号的反动分子的提法，只是稍有几许正确。他意志顽强，加之军事锻炼和天生性情形成的习惯，无疑使他在政策上毫不妥协。与其他人相比，他也许更为恐惧和希望所驱使。他盼望完成民族的重任，并一直为中国的民主建设而努力，希望成为自由分子和开明志士的领路人。其顽固执拗主要根源于一种恐惧。他的希望在于那些所谓同胞的响应和美国的援助。当然，美国的援助无疑主要是指物质援助。并且，在蒋的心目中，这种援助最终将造福于中美两国。至于说，如何向蒋提供忠告，使其接受并付诸实施；如何激励蒋为中国乃至为国际事务发奋求雄、百折不挠；如何既保持美国对他的总体的

友善而又在某些方面对他实施善意的批评和否决，这确实有待于美国政治家精心而又大胆的努力。

文献 4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2947

南京 1947年1月29日

中央政府已从沈阳增援长春。显然在长春以北和以东地区，与数量可观的中共军队发生了激战。有消息说，中央军因自动化装备的防冻准备不足而受阻，弹药供应特别是美械装备师也极其缺乏。

(O·爱德蒙)克拉布从长春报告，目前在长春东北的九台地区的军事调动表明，中共军队已完整无损地撤出战斗。新一军指挥官孙立人于1月21日向克拉布承认，中共避免打硬仗，投入的兵力不多。孙说中共现在退出了松花江对岸的原阵地，大约还有1万中共军队部署在那里。这一说法与长春的副武官所做的双方各有2万人在前线作战的估计有出入。

按照孙将军的说法，中共现已退出了原阵地。但中共声称在战斗过程中缴获大量物资，并通过进攻使国军无所适从。克拉布报告说，新闻报道表明，国军没有取得实质性胜利，共军在第一阶段取得主动，并显然保存了它的全部战斗力。

从沈阳增援长春是不可能的，这会使中共在南满的行动更趋积极频繁。一般的事态进展表明，中共将继续使用“打了就跑”的策略，这种行动在山东和河北目前已经加强。情报观察人员不相信国军还能在任何地区向中共发动全线有效进攻。但南京中央政府的军事官员仍然相信，如果照此下去，他们可以成功地解决中

共问题。

文献 5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2947

南京 1947年 1月 29日

委员长昨天晚上要我回电，无疑想预先探明我今天下午与他约见的目的。我与他的谈话是一般性的，然而谈话中的如下内容也许是有趣的：

我问他军事形势和政府改组计划。

关于前一个问题，他说在苏北的陇海线以南地区已全部收复，他希望在1个星期内控制整个苏北。我问是否有进一步扫清铁路沿线的计划，这条铁路贯穿山东省。他答复说那要花时间。他给我的印象是各地军事形势没有重要的发展。

至于政府改组，他指责中共联合少数党派，使它们不参加政府。后者对参加政府表现得漠不关心。我告诉他，您（指马歇尔国务卿——译者）对中国事态的任何进展表示强烈关注。希望他随时通知我形势进展情况。

文献 6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2—847

南京 1947年 2月 8日

2月7日与蒋委员长举行会谈。蒋委员长说，他本人正在积极研究政府改组细节。他较详细地解释了包括小党派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部分说明他们人才缺乏，部分说明他们对参加政府犹豫

不决。这是因为他们处于小党的地位，而国民党仍居统治地位；或者因为他们担心经济形势有可能导致政府崩溃。我认为有三种可能的步骤可以考虑：

1. 除行政院外，在现在的机构中普遍增补非国民党员；
2. 注重行政院的内部调整；
3. 短期内集中实权于国府委员会。

蒋委员长倾向于最后一点，但需作某些其他方面的修改。他认为，行政院是实际上的施政机构，其重要地位不可妄动。张君勱被考虑任命为司法院院长。

委员长认为，在军事形势方面，山东南部的威胁已经完全解除。在其他危险地区，由于阎锡山的合作，太原可能还是安全的，可以依靠阎保护他的首府。苏北现在已经完全收复。委员长表示，改善苏北地方政府的计划正在实施。……在河北，特别是在沿海地区，正在制定同样的计划。

委员长以前并不关心经济和财政状况，而宋子文是如此焦虑，前天与我通话三次。在那几天里，巴特沃斯、布兰福德（美国派驻中国政府的财政顾问）、阿德勒（美国财政部代表）和我本人随后进行了讨论，认为当国家首脑对某种形势漠不关心、无动于衷的时候，对他施加压力不合时宜。而现在委员长提出了财政状况，认为财政举足轻重，并表示强烈希望美国迅速批准贷款。

文献 7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3—347

南京 1947年3月3日

下午宋子文与委员长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并递交了辞呈。后来的谈话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友好的。委员长尽管坚持让他保留最

高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仍准备接受他辞去行政院院长的职务，后来没费多少口舌，也接受了他辞去经委会主席的职务。我从已获得的情报推测，在第1次会谈中，委员长向宋子文提出了强化内战的特别计划。考虑到目前的物价，此计划会在最近的将来增加部队薪水和供应。一方面是无情的战争需求，一方面是日益棘手的物资短缺，这就使得群情不满，而蒋对此又无法摆脱，他意识到，与其倍遭责备与诽谤，不如重整旗鼓以维护他的声誉。

尽管宋子文谨慎地与委员长打交道，直到最近宋对自己的地位仍充满信心，因为他相信委员长需要他甚于他需要委员长——他这样说。多半是出于感觉或知道宋的自负，委员长不再为财政和经济困难的增长替宋公开承担任何责任。他让宋离职，甚至没有半句感激之言。我发现蒋夫人的话是在挖苦，她说“他们使我哥哥成为替罪羊”。她附带补充说，她认为在她的经历中，这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

我确信，委员长决定采取全力以赴的军事行动，尽力解救中共控制下的中国民众，在3个月后结束战争，中共将被遏制（他们显然是狂妄不已）到一个更小的地区……我猜测，尽管委员长对莫斯科会议忐忑不安，但他并没有指望美苏关系会有永久的改善。因此，他没有那种希望，即美国会在适当的时候有所变化，或给国民政府的援助会达到一定程度。无疑他现在越来越关注财政恶化的程度及中共延长战争、造成破坏的能力。但是，他告诉向他呼吁的中国人，中国必须自力更生，并面对没有美国援助的未来。我觉得他的这种态度受着CC系的影响，他不能既面临财政每况愈下，又得不到美国援助的补偿，那样他会在国内外声败名裂。正如在今天的讲话中表明的那样，他心情焦急，苦衷显而易见。如我所见，今后几天对改组计划至关重要。

文献 8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3—347

南京 1947年3月3日

在2月最后的几天里，据地方报纸简要散乱报道，警方在上海、重庆和北平围捕了许多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小贩。

调查揭露，在北平发生了大规模的行动。从2月17日开始，持续了几个晚上。警察实际上包围了二三千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被扣留。当局后来宣布，这样做是为了收拾流氓、吸毒者、私藏武器者和非法居民。但是，被捕的人中有中美报刊的发行人、联总福利处负责人和著名的辅仁医院医生。这些人全部失踪。被捕的人还包括一些学生、知名的自由主义者、同情左翼人士的教授、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敌视中央政府的人，以及许多知名的共产党人。结果是北平的自由主义者组织，特别是大学生担心，目前这些事变预示着当美军撤出华北后，政府会立即大规模强行镇压为政府所不容忍的人。据报告，北大有600多人弃学，去各地隐藏起来。

北平13名著名教授目前已宣布，强烈请求保护被捕人士，并要求政府充分保证公民的自由权利。据大使馆得到的可靠消息说，北大校长胡适似乎默许了政府的行动。学生不再相信他坚决保护学生权利的许诺。学术界对他的批评正在增加，尽管在另一方面，王世杰似乎没能说服他参加改组后的政府。

上海捕人的报道显然极不真实。

重庆显然有些人被捕，尽管相对来说规模有限，迄今为止没有涉及知识阶层。自由主义组织已预先采取措施以免招是非。遭逮捕的是一些搅得城市不得安宁的学生和群众示威的领袖。

在华北和重庆可望会对共产党采取行动。由于组织了军调部，即使政府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共产党人也可以相对自由地行动。他们利用这一时间和机会，渗透进各种至关重要的岗位。这些岗位目前对共产党彻底执行其在中国的目标极为有用。随着军调部和调处结束，只能希望现在正进行全面内战的政府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消灭或遣散那些人。据说共产党分子将从内部同政府战斗。不幸的是，各地的围捕都无不滥用权力，并且最终将不仅包括共产党人，而且包括任何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及任何与地方当局有个人分歧或麻烦的人。自由主义分子甚至可能将比共产党人遭受更多的痛苦，因为后者是有组织的，能够较好地保护他们自己，而且作为最后的办法，总是可以通过他们的途径进入中共控制地区。自由主义分子反对独裁主义和目前政府的无能，但还看不清他们与共产党联合的途径。由于明显的原因，他们处于非常不幸的地位。

在这种气氛中，我寻机与委员长的私人秘书沈昌焕进行了一次坦率的谈话，并非正式但却有说服力地提出，因为共产党人而普撒政治罗网是多么不幸和不公正，那会威胁或逮捕自由主义分子，而改组的国府委员会和行政院将要寻求他们的合作。

文献 9 司徒致国务卿

第538

南京 1947年3月4日

阁下：我有幸向您报告昨天才结束的从广东到香港的旅行。这次旅行大约一个星期。在此之前我在上海待了两三天，主要是在华盛顿诞辰纪念日发表一次演讲。出席者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利用这个机会，我不仅强调了我们两国的传统友谊，而且强调在他

们的国家发生危机时期；华盛顿的性格和经历对中国爱国者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广东我出席了两个冗长而且是大型的记者招待会，会见了美国人团体，与张发奎将军（蒋介石在广东的指挥官）和其他中国官员进行了几次谈话，作了大量演讲并参加了一系列社交集会。在孙逸仙纪念堂，我向8000多学生讲了话。在那种场合下，用中国国语演讲并且能被人们听懂，这确实令人欢欣。

在香港，我们是马克扬总督的客人。逗留的日子里并不非常紧张，但有许多雷同的活动。我们原打算到海南做短期旅行，主要是想访问在那里居住的15名美国人。但由于昨天的气候和这里政府形势的重要进展，我们放弃了这一计划。

张发奎元帅对华南的控制富有成效，包括严厉镇压一切颠覆活动。知识分子抱怨缺乏任何真正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较高级的官员似乎是忠诚的，但普遍存在贪污。走私也很猖獗，但正在加以控制。城市的经济情况不很景气，不过农村正在改善。在大约125万人口里，几乎有30万人（和依赖他们的人）失业。工业的恢复受到兑换率和限制进口的妨碍，迫切需要机器和原材料。我们访问了一个被严重轰炸所破坏的纺织厂，给人的印象是正在努力利用那里现有的设备加紧生产。参观的这个厂和其他工厂并不缺乏技术合格的经理和坚韧的决心。尽管条件不好，广东的农业在科学指导下有巨大改善的可能。不断谣传华南要与政府分庭抗礼，但我提供不出证据，除非中央政府崩溃。

放弃香港和租界显然是一个严重问题。侨民居住地的两位重要的英国官员向我问到这件事。我大胆提出，中国状况变得稳定时，英国可以采取主动，通情达理和慷慨地宣布，它打算在约定的日期，将全部地区归还中国，同时为逐步放弃提出一个程序。作为对中国进步的贡献，总督会愿意发展两个模范的地方自治性政府。英格兰在这方面特别成功。他认为这至少需要30年。

昨天下午到达这里时，我被邀请会见宋子文，晚宴后我们一起拜访蒋委员长。宋博士无拘无束地谈到他辞职的理由。CC系和政学系正联合起来对付他。他深感此种情形令他无所作为。他坚决反对CC系，并把政学系的动机归结为权力欲。宋看来非常高兴，并无怨愤之情，他愿意继续非正式地帮助蒋委员长。有关这两个人疏远的谣传看来没有丝毫根据。事实上，我还从来不知道他们在最近数月的关系是如此融洽。蒋委员长暂时代理行政院院长的职务，估计国府委员会将选举张群先生接任。

蒋委员长负担沉重。尽管他仍象平常一样冷静自信，但在我看来他比以前憔悴多了。他焦急地问我从您那里来的消息，以及联合国救济和恢复总署的棉花和小麦计划的结果。我解释这几乎相当于大约50万美元的价值，并且还没报告最后的决定。他认为在一个星期内有可能宣布政府改组的全部计划。他认为军事形势如长春周围、山东地区等已完全控制。在下个月底之前将扫清津浦路地区的中共军队。他保证4至6个月打通这条铁路。

蒋委员长和宋博士充分表示，他们抱着极大的希望等待美国的财政援助。前者希望我在您前往莫斯科前电告您上述谈话的实质，但我怀疑，鉴于我们至今未能报告改组细节等问题，这将无济于事。

今天我与本地共产党代表团的4位代表及其夫人们共进午餐。巴特沃斯和康诺斯在场。共产党代表相当直爽地表示，他们希望重开和平谈判，并希望美国调处。我再次向他们保证，在我的权力和给我的指令的范围内，我准备尽力而为，无论适当的机会何时出现，而且我从未放弃这些卓有成效的谈判会在某一天恢复的希望。我问候了毛泽东先生、周恩来和其他我认识的在延安的人。南京和上海的共产党人默认了——但显然是勉强的——他们返回延安的计划。

文献10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3—747

南京 1947年3月7日

大使馆得到完全可靠的情报，其大意是，在最近的将来，上海大批被捕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情者将被处置，方式可能与日前北平的围捕一样。……据说上海当局把3000共产党人编入名单，集中起来送到山东的集中营。

宋子文博士告诉我，委员长让他向我保证，此番行动不会出格。

文献11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3—1247

南京 1947年3月12日

中国事态在过去10天里变化多端，错综复杂。因此，现在对以前的电文报告做一番简要总结很有必要。军事问题和政治——经济问题当然是两个主要方面。而前者迫切需要一种政治调整，因为内战的持续使得国民经济不堪负担，而这一情形又使得推动经济正常发展的努力化为乌有。

目前的军事战斗远甚于以往数月的情形。政府显然打算并且特别需要在山东取得一场重要的胜利。但一直未能如愿。共产党在满洲取得主动，正设法打通进入长春的道路。他们现在被国民党的增援部队挡了回去。如果共产党的目的是取得一场完全胜利以壮其声威，并作为莫斯科会议上苏联为他们下赌的筹码，那么

从这一意义上说，共产党失败了。但另一方面，如果共产党的目的主要是进一步削弱国军，那么，他们成功了。根据武官的情报推测，满洲的伤亡是政府1万，共产党2万，在其他地方，主要是在山东，政府是1万，共产党是2万。

在苏州建立国民党军事总部看来是必需的，也很有必要。……武官指出国共双方都不想多战，特别是国军更为厌战。高级官员甚至对他说，当敌人是日本人时，持久作战尚有意义；当战斗是针对中国人时，就没有那么多欲望了。部队没有士气，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而战。在某些场合，他们受共产党的号召影响，放下了武器。委员长为改善军队士气，坚持增加薪水，这也正是宋子文辞职的部分原因。

与这种阴暗背景相对应的是最近10天的政治变化，但目前尚未明了。国府委员会和行政院改组还处于谈判阶段，障碍是民社党是否或在什么条件下参加政府。对蒋经国任中央银行总裁没有不赞成的反应，但人们普遍认为如此这般难有什么大的变化。蒋经国是政学系的成员，该组织希望加强对财政部、中信公司和中央银行的控制。与此同时，另一名政学系成员被宣布从中信公司转任中央银行副总裁职务。政学系扩大到财政领域证明，政府的银行和商业信用不会增加。这也表明了委员长的策略，他不允许任何组织单独控制国家财政。

委员长指令监察院调查上海操纵黄金案，公布的报告直接牵涉到宋子文的一些部下的一些很值得怀疑的活动。但报告充其量仅指出这是工作和管理粗心，当然宋子文必须对此和对允许这些活动的一般性金融政策承担主要责任。

在其他的骚乱中，由政府、第三方面和无党派人士给立法和监察两院、国民参政会和宪法实施常务委员会的声明仅仅引起小波动。政府认为这是结束一党统治的重大步骤。结果反应冷淡，看来在国府委员会和行政院改组之前，不太可能采取这一步骤。

据广泛报道，遍及全国，特别是共产党人最活跃地区的警察镇压行动迅速扩大，人们根据其政治观点对此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无党派和左翼的集团强烈谴责这种行动。与此同时，人们普遍认为，无论怎样谴责这种行动，只要国民党一天不摆脱这种生死之争，它的控制就一天不会削弱。同样，人们也普遍相信，随着共产党谈判代表撤回延安，和谈及政治解决的可能遥遥无期，阻止经济恶化也更加难有指望。

文献12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3—1247

南京 1947年3月12日

共产党调处人员撤退期间，11各美国记者借机飞往延安，进行观摩和采访。一些人待了5至6天，而其他人仅逗留了一夜。根据大多数可靠的观察表明：共产党没有召集他们自己的国民大会的明确计划。这很好理解，因为他们正谋求全国的权力，而非局部的支持。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采取的路线使他们没时间为共产党的国民大会费心，因为他们致力于全国范围的军事行动，那需要他们倾注全部精力。

共产党坚定地相信他们的军事能力，相信他们实施游击战争破坏政府交通线的能力，并通过破坏继续损害政府的经济。共产党认为，靠这种手段将迫使政府屈服，并在共产党提出的条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办法。

延安大规模的撤退进行得很好。在延安几乎没有妇女和儿童。共产党声明撤出所有不必要的人员。记者估计大约有50000人撤出延安。但共产党宣布，以前城市50000人口中的15000人仍留在那里。

共产党坚持两项条件——恢复1946年1月13日的军事位置，废除国民大会和宪法——是与政府重开和平谈判的最低条件。然而一些记者感到，共产党会把第1个条件解释为他们保留控制与达成停战协议时大致一样的地区，而不必是确切的地区。尽管如此，其他的人坚持认为共产党决心坚持他们的两个条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稍稍改变他们的立场——除非是提高条件。

记者报告，注意到在访问的一个星期中，共产党的困难明显地增加了。领导人严厉谴责美国政府和马歇尔将军。周恩来声称，他私下从美国得到的可靠情报是美国给了国民政府1.75亿美元的棉花贷款，5千万铁路贷款，还有其他所有被批准的贷款。只有技术才要支付现金。他声明，美国还将剩余物资中的武器和弹药送到菲律宾，转卖给国民政府。周还宣称，经共产党同意，美国大使馆计划派武官到延安，但国民政府反对这个计划。

周恩来声明，美国的助蒋行为，帮助国民政府将共产党代表空运回共产党地区会使整个民族陷于分裂。

文献13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3—1947

南京 1947年3月19日

阁下，我有幸向您报告，政府改组的计划一直在中国政治和社会关系的迷津中缓慢地取得进展。蒋委员长一直勤奋地为完成此一任务工作，但在各方面都遇到了障碍，给予小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领导职位，对于改组计划是必要的，前者很适当地坚持使他们参加政府的成员在国家和省的政府中取得实质性的职位，但这意味着目前占据职位的人和——如果保留中国的惯例——他们的部下中一大部分人带着经济困难和个人嫉恨离开原来的职位。用更合

格的人代替他们并非易事。那些人现在宁愿受到政府的憎恨。这个政府不得人心，面临着可能崩溃这种令人不愉快的结局。那些无党派人士向我表示或多或少也有这样的考虑，张君勱博士便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他领导他那一伙人从民盟中分裂出来，在自由主义和进步的基础上组织了民社党。他主要负责起草去年11月制定的宪法。他被提名担任司法院院长。他非常适合这个职位。但他犹豫不决，担心他自己党内的嫉妒和疏远。一旦共产党主宰中国，他会前途无望。因此，与担当正式责任相比，他宁愿写写说说。

国府委员会的体制将要改变，以便由12名国民党成员和12名其他代表组成——青年党、民社党和无党派人士各4名。但五院院长是当然的委员，这实际上给了国民党17个名额。如果张君勱任了司法院院长，让青年党的人担任另一个院领导人，那样总计国民党15人对其他党派14人。对非国民党方面来说，这种安排似乎相当公平。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3月15日召开例会，1周以后可能结束。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选举国府委员会中的国民党委员。这次中执会议设想停止党治，强调终止国民党享有的特殊权利，使之与其他被承认的政党平起平坐。

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向我透露，在国民党内部的各集团间重新分配内阁职位，无疑将引起混乱，这比顺利和有效的交易更困难，反动的CC集团正变得更积极，甚至更有力量。比较自由化的政学系与它联合，推翻了宋子文博士。但是，几乎不能指望这两个互不相容的集团会长期协作。

蒋委员长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考虑到共产党拒绝在任何可行的条件下继续和平谈判，政府决定——完全可以理解——在许多中心地区将被发现的共产党人遣回延安，根除他们的宣传人员和颠覆活动。以后那些与和平努力有关的事宜由我们转达到延安。但是，另一方面，在执行这些指令时，特务行动大大出格，成

为一种恐怖主义。特别是在自由主义者和学生中，许多人被逮捕、恫吓。例如，最突出的是在北平地区，当当地特务得悉驻扎在那里的军调小组就要撤走时，即组织了一起对通县(通州)共产党方面的袭击。北平当局很担心在北平市也发生类似的行动和后果。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实行言论和出版自由、保护人民权利等等——就象在宪法中和蒋委员长以前在许多场合真诚打算承诺的那样，共产党就会利用这些特殊的权利，使之成为打败他们仇敌的全部目标的一部分。因此，政府认为，为着政府的生存和民族的独立，必须与肆无忌惮的反政府武装殊死斗争。但在这一斗争中，政府中的反动分子也随之权势日盛，并借助权势，排斥、打击异己。他们指鹿为马，组织严密，对自由分子构成威胁。

中央经济委员会的会议，将建议作最后的努力，说服共产党为恢复经济实行合作，允许重开津浦和平汉铁路。如果他们同意，这有可能导致恢复和谈。如果不同意，占优势的情绪是用武力扫清这两条铁路线的沿线地区。这次会议赞成起草经济改革的全部方案。

福摩萨(指台湾——译者)是当前局势的一个悲剧性例证。由于该岛从日本帝国的统治手中接管过来的，国民政府本可以向岛上居民表明，他们那些来自大陆的同胞有能力给予他们一个高度自治的有益政府。然而与此相反，到处是管理混乱，罪恶多端。误解和利益冲突无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避免，但是，由于愚蠢行为有增无减，贪污风行，为眼前利益而滥垦滥伐，更加重了误解和冲突。

CC系反对政学系支持的陈仪，他是政学系的成员。在这一事件中，我较同情CC系，他们毕竟是在党内谋求控制，谋求对蒋委员长的影响优势。

我意识到许多客观的报告不一致，很伤脑筋。报告是关于福摩萨所发生的事情。这些报告到了蒋委员长手里，并影响他的决策。

在这方面与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我不断地试图超出外交礼仪，扮演一个友好的非官方劝告者的角色。

蒋委员长要求我向您表示，您在莫斯科会议上坚持提出把中国列入外长会议的议事日程，他对此非常感激。注意在中国反对这个提议的自发和广泛的反应是有意义的，在许多“极左”分子中反应特别明显。杜鲁门在给国会的信中建议向希腊和土耳其贷款，这对政府领导人和他们的同情者有一种令人感到放心的影响。至于弄清这究竟如何最终影响共产党的政策为时尚早。但我倾向于那种观点，即这两个声明有利于使他们最终心甘情愿地重开和谈。如果计划中的政府改组加强了美国进一步援助的可能性，以便使政府能立刻恢复经济力量和成功地进行实际的改革，这种观点可能会更加真实可信。

文献14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3—2147

南京 1947年3月21日

……尽管政府军在山东作战中损失严重，但目前处境不能被认为是处于“危机”之中。据可靠情报表明，在最初几个月里，政府在徐州以西损失了两个师。随着临沂陷落，在后来博山以南的作战中，又损失了3个师。传说在山东的历次作战中，都有3个以上的王牌师参加，这是不可信的。其中在博山以南的一次作战失利，但大部分人员成功地逃到了济南。无疑，中央政府失败使得共产党缴获了数量可观的装备。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大批部队完完整整成建制地投向共产党。

目前这一点是清楚的，从济南向南推进的中央政府军已与从徐州向北推进到泰安的另一支政府军取得了联系。这可能表明，政

府有能力扫清津浦路山东段。似乎还有一种可能性，即共产党正控制德州和沧州之间的安全通道，以便使他们的军队从山东撤到河北。一旦封锁这条安全通道，中央政府就能控制津浦路全段。

关于被破坏的胶济路，大使馆得到的可靠情报是，中央政府在这条铁路线上控制不到100公里，它已发布命令破坏从青岛延伸的60公里铁路，以防止共军利用它的任何可能性。放弃修复胶济路可能有利于津浦路，那里对政府军的地位更有利。从前一条铁路抢运的任何装备都有可能改为利用后一条铁路运输。

文献15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3—2347

南京 1947年3月23日

政府军占领延安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事件，并将满足政府的实质性需要。大使馆以前的报告提到，政府为了维持其地位，需要一个惊人的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显然是在这个月决定攻占延安的。因为，委员长在2月16日的讲话中还表明，政府打算巩固它目前的地位，集中力量打通交通线。讲话如下：

“在这方面，政府将使其军事努力限于保护和修复为国民经济所必需的交通体系。我们将不遗余力地继续寻求用政治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

那时宋子文向大使馆明确声明，他和委员长的见解一样，不会进攻延安。随后，国防部给予军事顾问团类似的通告。因此可以确切地推想，攻占延安主要是后来政府，特别是陈诚将军出于战略的需要。还有迹象表明，俄国对中国占领大连和旅顺的方针的改

变，以及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建议，增加了中央政府对俄国人的疑惧，担心他们可能正策划另一次行动，甚至担心他们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承认延安。占领延安会挫败这个计划。

事实上，占领延安对于政府来说，代表着一种有意义的精神和政治胜利，政府现在正试图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认为延安是中共政府的首都，占领延安会被许多人解释为中共末日的开始。实际上延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挥部，是许多地方政府中的一个政府的首都。

政府宣布消灭了10万共军，但这一数字显然严重夸大了。在共产党调处人员返回期间，美国观察员报告说，延安实际上疏散了。显然很久以前共产党就为这一不测事件作好了准备。他们从来没有任何保卫延安的真正打算，如果保卫延安意味着蒙受损失的话。他们更注重坚持长期发展的战略，从一切遭受敌人压力的地点撤退，把敌人引到口袋里，然后用游击战术逐步暗中破坏敌人的力量。目前政府的战线严重地发展到孤军深入、四面为敌的地区。军调部负责联络组的美国军官从延安返回后报告，朱德告诉他，控制延安及其周围地区，并维持那里的秩序，会牵制政府17个旅。

军事顾问报告说，国防部通知他，空中侦察表明，共产党分成两部分，撤到延安周围的山区。人们会看到他们或许将使用他们传统的游击战术，或在适当的时候，全力以赴地夺回延安。

文献16 司徒致国务卿

711.93/3—2647

南京 1947年3月26日

阁下：我有幸就美国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可能给予现在的中国

政府援助一事，提出一些建议。据设想，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政府停止一切对共产党的攻击行动，一是政府本身进行有效改组，激起进行剧烈的改革和建立真正进步的民主体制的愿望。

内战发生了新的变化，共产党从去年年底起一直坚持他的那两项不切实际的条件，并开始发动军事和其他方面的进攻，指望数月内就能削弱政府，以便在对他们更有利的条件下恢复和谈。直到去年年底，他们还真诚地希望停战。从那以后，他们一再发动进攻，随着财政和经济形势迅速恶化，政府要么屈服，要么采取有力的措施，防止威胁性的崩溃。但在铁路线恢复运行之前，经济无法恢复。政府估计这大约需要3个月。即使这个估计正确，而且随后共产党愿意重开谈判，从军事装备的消耗、财政问题和人民的不满增加等角度看，政府能在斗争中维持多长时间，尚无法回答。

在写这份报告时，政府的改组仍未确定。国民大会的选举于3月24日晚停止。无论结果如何，蒋委员长将以压倒多数登位。在不断争吵和竞争的全过程中，在个人和同伙的妒嫉或野心中，他使自己不容置疑而且是策略地取得了有利的结果。在我看来，在可接受的条件下，他或者力求做一个独裁者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他只是一个受到青年人尊重、能把人团结在周围的人物。确实，不管什么政策，只要他真正要实行，都会推动其落实。因此，由于他赞成建设性的改革，这些改革就可以最有效地付诸实施。不能指望其他人或集团维持国民党的团结和与其他小党派的统一。他带着自己所有的缺点，真诚地根据民主原则为他的国家谋幸福。在完成这个任务时，他盼望与美国全面合作。并且他也一直是这样的，这证明给中央政府实质性援助是正确的。因此，可能值得花时间考虑进一步采取一些行动。

军队改组 中国的一切问题或迟或早都要触及到这一点。不

大量削减军费，就不能平衡预算，也不能提供任何足够的基金，用于实质性的改善。所有行政机构的改革、铁路和其他公共事业、国会的礼仪等等，都处于遭到敷衍塞责、毫无头脑的军官干涉的危险之中。更积极的办法是建立规模较小的军队，训练和装备良好，有充足的食物、衣服、医疗和薪水，配备迅速机动的设备。它能镇压其他地方的暴动和边境骚乱。年轻的和经过现代化训练的军官与应征入伍的士兵能够一起被灌输对其职业的全新概念，一起受到爱国主义和职业观念的激励。为了贯彻那种改组，需要美国的训练人员。这也是防止共产党的最可靠的办法。共产党的军队会被吸引到国军之中。美军顾问团所拟的有关计划无疑极其全面，令人敬佩。但是，除非最近的将来政治方面能够稳定，否则已有的良好开端会被荒废。随着美国指导改组的军队加强，正受到训练的未来的军官应主要致力于中国和世界的和平。美军顾问团的参谋长、陆军将军约翰·P·鲁克斯看来在考虑在北平唯一的专科学校中，进行陆海空军的一体化训练。

如果未来数月里，政府的进步改革效果明显，而共军的抵抗依旧受挫，就可以确信，中国政府有可能经我们同意，向共产党领导人提出建议，停止仅系破坏的游击战争，参加新的联合政府，直到12月宪法生效，或立刻成为被承认有充分权利和保障的政党为止。在建立起真正的公民投票制度期间，某些地区可能暂时保留地方政府。美国控制军队整编会得到充分保证。如果共产党拒绝劝告——不论是以事实上的或公开宣称的理由——他们的武装力量和所有被揭露的阴谋活动，都可以被当作扰乱和平、秩序和破坏恢复经济对待。同时，公开解释政府的意图，号召所有热心从公的人民拥戴政府，以逼迫共产党人及其军队放弃以前的信仰。

铁路 在政府控制的地区及某些由此延伸的地区，有多少铁路需要修复，有一份封存着的详细计划。这是交通部的美国顾问

E·C·贝利上校按我的请求提供的，贷款应专门用于特殊的铁路线，以及支付铁路设备和其他需要。协议应包括足够数量的美国顾问和审计员。

稳定通货 这可能最容易实现，只要在适当的时候与国际银行合作。

发展生产 这对国民经济当然是重要的，可以鼓励进出口银行援助一项专门的计划，在私人或半私人的财政投资的基础上，由政府出一部分，这些方面已经拟定了指导原则。在最初阶段，美国在任何程度上的参与都将富有成效，并会受到普遍的欢迎。

教育贷款 作为对华援助的更有远见和更基本的计划，此种援助非常有益。在战争年代里，教育设施和设备的破坏到了悲惨的程度，政府为在最近的将来恢复这一切，能做的工作很有限。现在的教育部长对我谈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感到了他的呼吁的全分量。剩余物资协定已提供了教育援助的直接间接利益，但其不足之处是缺乏必需的美元。中国青年聪明、敏感，无论是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因素，还是作为一种危险的激进因素，中国青年都很明显。

福摩萨 自从中央政府从日本手里接收后的18个月里，这个岛的管理混乱是毫无疑问的。唯一有希望的标志是岛民坚决抵抗，并对台湾省长及其助手进行广泛的批评。在写这个报告时，争端正变成CC系和政学系之间肮脏的争斗。省长属于政学系的成员。危险在于没有任命什么较好的军官，一系列的改革没有带来通盘的改善。如果仍是进一步的腐败和混乱，后果不堪设想。醒悟的岛民或多或少的处于反叛的状态，巨大的经济潜力被浪费。在日本人统治下，每年的海外贸易高达225,000,000美元。一种可能方案是把它当作经济特区对待，雇佣一个美国组织或其他外国顾问，帮助发展自然资源。这多半可以在签订对日和约之前确定，或者成为对日和约的一部分。显然，从经济利益出发，本地

居民的意愿以及根据历史环境实行开明的民主原则是至关重要的因素。通过这种方式，美国的贷款至少可以保证得到部分清偿。如果能灵活地制订计划，不伤害国民政府领导人和他们的群众，不伤害岛民的感情，受到双方的欢迎并非是不可能的。

以上建议都是尝试性的和初步的打算。如果在原则上赞成，您是否认为值得向他们提出更详细的办法。

文献17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3—2847

南京 1947年3月28日

有充分迹象表明，委员长已决定克服张群明显的犹豫。作为CC系与政学系斗争的结果，张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自愿退休，重返大学教授的生涯。上海市长吴铁城被提名接替他的位置，俞大维将军(交通部长)接任市长。

如你所知，宋子文几乎单枪匹马地表示竞选行政院长的职务。决定任命吴铁城反映了使行政院的关键机构富有活力的决心。吴在上海的困难条件下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成就。

我感到这些决定如能执行，是可以象所希望的那样有利。但是，将陈氏兄弟排斥在国府委员会之外的斗争，还没有决定性地结束。

文献18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3—2947

南京 1947年3月29日

在与委员长会谈时，他一开始便解释说，他满怀信心地希望完成的改组再一次被青年党的新要求拖延。民社党同意参加，尽管张君勱个人不要官职。他焦虑地询问，本地的美国人和其他美国人在给我的报告中都说些什么，特别是我是否收到您的信。我答复说，多数美国人正等着看期望已久的改组的人员名单，这确实也是我的看法。我准备决定一经公布，就尽快通知您。他没有直率地询问财政援助的可能性，但心里显然有所考虑。我告诉他，当内战存在时，这不会予以考虑，除非有明确的迹象表明趋向民主改革……

我提醒说，他曾宣布在收复主要铁路地区后，会给共产党参加政府的另一个机会。对此他表示同意……。他保证一俟政府改组彻底完成，他就通知我……

然后我提到福摩萨的形势。他坚持认为形势没有报告中说的那么严重，受害者很少，等等。我问他是否有兴趣读一读我们报告的摘要，这是专门为他准备的。他欣然答复说他愿意拜读。在讨论迫切需要一个更好和更廉洁的政府时，我提出在美国技术顾问的充分帮助下，开发岛上巨大的经济资源的可能性；并补充说，这需要岛民的善意合作。开发后的收益可以用于支付或作为将来任何美国贷款的担保。他表示坚决赞成，并要求我继续提出具体的建议……他至少两次评论说，没有美国的帮助，中国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我提出在海南可以做类似的事。他表示他本人同样准备承担。

当然能接到您就所关心的问题发给我的指示，我很感谢。

文献19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3—2947

南京 1947年3月29日

目前中国军队的高级指挥官显然态度乐观，并对军事形势感到满意。参谋长宣布，两月内打败和摧毁共军主力。

满洲松花江以南的形势接近正常。当然，共产党在长春以东的桦甸—海龙—辉南地区采取的骚扰行动仍然存在。国民党空军轰炸了松花江的桥头地区，仓促地炸裂了冰面，取得了防御性的效果。国民党正从张家口调动部队增援大同，割断共产党在长城一线的威胁。国军占领了延安，正谨慎地向东北面移动，肃清残敌。国民党国防部报告，朱德的指挥部(在)绥德。

国军在山东泰安会师，一部沿铁路线向北移动，一部由肥城向东。国民党控制了济南—潍县一线和青岛。控制胶济线的共产党继续威胁着国民党控制的城市。国民党国防部宣布控制了黄河的所有渡口，估计山东的共产党军队会在3个星期内溃散。

文献20 司徒致国务卿

711.93/4—447

南京 1947年4月4日

……没能报告政府改组有更多的进展，这多少有些令人失望……。蒋委员长反复告诉我，他几乎准备承认发生的一些新的复杂情况。最近的一件事是青年党要求大量占据中央和省的职位，

委员长认为这无甚道理。他请假一个星期或更长的时间，这表面上是在清明节拜谒他的祖坟，或许又是在使用熟知的中国谋略来解决此类问题。这意味着在制订最后的宣言之前，扫墓可能一直持续到月底。到目前为止，唯一明确的决定是任命四川的张群先生为行政院院长。尽管某些其他议题已为我知悉，但我准备在弄清全部名单之后再加以报告。

蔡文治将军在北平军调部结束前一直是全权代表。最近他向我表示了对共产党的看法。他相信靠军事冲突不能解决问题。一方面共产党人力损失严重，一方面政府也受到损失，而且物力方面的损失是实质性的，总的看来或许结果更严重。而这种消耗战是共产党战略的精髓。共产党人有可能被赶到山区，他们在那里粮食和弹药与过去相比都更成问题。但是，政府将同样面临困难，它要防止共军的经常性的出击，而共军正是靠这种方式获得足够的粮食和弹药，破坏铁路，等等。假设那时国际关系没有实质性变化，大约在今年年底或来年年初时，共产党会有可能表示愿意和平。他认为俄国支持共产党只会是在共产党将要夺取政权的时候，而不是在它失败的时候。他引用了一些他认为很有意义的评论，这些都是前军调部的共产党同僚叶剑英将军就3月间回延安一事所作的评论。大意是莫斯科会议肯定会讨论中国问题，在那里会达成协议，由俄国和美国，也许还有英国共同解决。既然国民党靠美国支持，就没有理由不让中共得到苏联援助，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经是苏联的卫星。

正如我以前报告的那样，蒋委员长认为，政府最迟到9月就可达到军事目标。他的参谋长陈诚甚至更乐观——他总是倾向乐观。

企图预测但却无法确定的问题之一是共产党人的心理。根据目前的广播和其他的公开声明判断，他们对美国计划的误解比以往更为反常。事实上是如此荒谬得不现实，以致人们怀疑他们是

否有希望与国民政府合作。中共确信，美国为了自己的长远目的而指使和庇护国民政府；并公开承认中共与世界各国共产党有联系。例如，王炳南先生在将要离开南京时向我评论说，在政府能打垮中国共产党之前，得先打垮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另一方面，王先生一再对我说，他们并不认为和谈破裂，在这几个月里，他们无疑还要靠美国调处。我仍然倾向那种信念，即当他们确信，通过赞成或表现出赞成联合政府的妥协符合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将准备恢复和谈。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继续遭受国共两方面的困扰，这表明国共冲突错综复杂并日趋恶化。国民党军队不顾政府飞机不再扫射黄河工程的工人的保证，也不顾陈诚的类似命令，第三次完全没有事先警告，便在山东沿海地区攻击正在向岸上提供物资的登陆船。船长受重伤，还有4名船员受伤。为了补偿这一损失，联总刚刚宣布空投远东最大规模的救济物资。美国陆军运输机在华北共产党地区空投100万磅衣服和药品，每捆80磅，连续无偿飞行94次。但我从一个值得信任的护士那里了解到，她每次都有机会亲眼目睹所有这些东西实际上给共产党军队多于给城市人民，而这些东西原打算是给后者的。这些是我们知道的最近的两件事。

蒋委员长真诚地接受了我个人的建议，任命朱子文博士为福摩萨省长，并组织一批美国经济顾问。如果没有他的行政院继任人的干扰，宋博士本人是胜任愉快的。所以制订一项适当的方案是一件大事。比起军人政府来，他更强调文职，强调经济复兴和更好地对待岛民。总之可能有一个更可靠和开明的政府。

国民党内“反动分子”——这里主要指他们真诚但又狭隘、顽固而不是他们贪婪自私、愚昧好战——的问题在于如何吸引他们参加建设性的计划。这特别适用于陈氏兄弟。宋博士曾经打算甩掉他们，结果反被他们甩掉了。观察蒋委员长如何驾驭他们是有趣的。他显然相信，与尝试消灭他们相比，这会造成更多的困难。

蒋委员长本人强烈地依恋他们，多年来一直比较尊重他们的意见。他知道他们对他和党的忠诚是绝对可信的，况且他们精力充沛，办事效率高。他还将他们的行动限于相对说来并不重要的公共事务中。而陈氏兄弟也无贪污恶行，且对此深恶痛绝，但他们属于社会中的极右势力。因此，抱着比您在华时略多一些的成功希望，我再次试图激励他们实行土地改革，严惩各地的营私舞弊，使他们相信，只有政府更多地为广大农民谋利益，才是反对共产主义唯一真正有希望的办法。如果他们能被诱导将精力集中在这方面，相信会做出有价值的贡献。这样也许能够部分抵销他们阻挠议案通过的极坏影响。

总之，在被动地等待局势时，我得承认我有些按捺不住。这种发展有可能使美国更积极地提供援助。我提醒自己记住，中国在整个世界形势中无比重要，如果它能开始走向建立进步的政府的话，这个政府可以立即提供政治自由和为公民改善经济。

文献21 司徒致国务卿

693.0023/4—1947

南京 1947年4月19日

昨天下午我拜见了蒋委员长，在喜出望外地对国民党的提名和无党派人士表示特别地赞成后，我就建立国府委员会一事向他表示祝贺。他评论说，小党派还代表着品格优秀的学者，尽管他们不那么出名。

蒋委员长带着强烈的感情，就大连问题发表讲话，说政府打算坚持它在那里驻军的权利等等，但要依靠外交方式公开解决，避免挑衅行动，首先通过陆路和海运派去两支军队。

早在他月初离宁前，我就表示要向他提供一些领事馆从福摩

萨所做的报告。今天他问及此事，我给他一份已由大使馆译成中文的备忘录。

分手前，我对他说，目前的事件正趋向共产党和民主生活方式间的斗争，其中检验的标准是哪一种生活方式能为所有人民谋求更多的幸福，并且让人民来判断，是我们坚信民主事业，是我们强调自由、公开性、民权等。这样，以我们的建设性发展来与共产党形成对比。我表示希望中国为她的人民和她的全体利益，作出她自己的全部贡献。他点头称是，但是在向更民主的观念努力过程中，他需要别人经常提醒、督促。

文献22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4—1947

南京 1947年4月19日

现在就确定4月17日宣布的国府委员会的后果，为时尚早……。并且任何这种论断都要仔细地参照中国政府的屡次改组，因为这些改组只有对外的作用，对于中国内部，很少发生有影响的变化。

但是，大使馆的初步印象是，这次国民党任命的国府委员的才能与地位表明，他们的确尽力把国民党内最能干最新式的人才安排到权力机构和负责机构。使人感到有希望的是，国民党此次任命国府委员，显然排除了和CC系有密切关系的分子。可能的例外只有前新疆省政府主席吴忠信一人。

政学系中最杰出最能干的人物，如张群、翁文灏、王宠惠、王世杰等的被任命，也是令人兴奋的事。虽然一般人不把陈布雷和蒋梦麟算作政学系分子，他们却有可能支持政学系的政策。

孙科被选为国府副主席无疑是想加强进步或自由主义分子的

力量，同时为政府树立楷模。邵力子和宋子文被包括在内，至少表明逐渐脱离中国政治保守主义的传统作法。

居正、于右任、戴季陶、张继和邹鲁都可算是国民党领袖中的元老。他们对委员长忠诚，政治眼光基本上是保守的。但是一般都认为他们素来主张维护极高的道德标准。

政府改组令人失望的一面是，除行政院外，其他四院的院长都未更动。张群代替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使委员长卸去临时兼任的职务。计划最初原打算请民社党领袖张君勱出任司法院院长，青年党领袖曾琦出任其他四院的院长之一。后来，因为张君勱虽然允许民社党参加政府，但他本人拒绝担任职务，这个计划就无法实现。因此，至少在目前，所有五院的院长都是国民党党员。

民社党的情况是，一直到国府改组的最后阶段，他们的党员还不愿意参加政府。4月17日晚上，民社党的4名委员只提出3位。他们已经宣布尽快提出第4位。

青年党和民社党的委员多半不是知名人士。青年党的委员是一群代表四川学者兼地主的人物，过去同国民党右派有联系。民社党的委员是一群老学者，在国内并无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无党派的委员和社会贤达都很令人满意，尤其是陈光甫，他是最能干的中国银行家。不只在中国，就是在纽约和华盛顿，他的政治眼光和道德品质也享誉颇高。现任经济部部长王云伍是无党派代表的委员，社会贤达。他似乎也很称职。陈光甫和王云伍都同情政学系，因此在国府委员会里，一定会加强政学系的地位。莫德惠之所以被选，显然因为他与满洲事务有多年的联系。现任新疆省副主席包尔汉是维吾尔族人，选他无疑是想对西北少数民族表示好感。国民党委员中包括一位西藏人章嘉呼图克图，也是同样的用意。

总而言之，组成新国府委员会的分子，无论从国民党还是无

党派人士两方面来看，在目前情况下都是不能再好了。假如委员们能如期到达南京，新的国府委员会将在4月23日正式开会。但它能否做到实现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具体改革，当然还是一个问题。决定这个问题的因素很多，其中并非最小的一个是委员长的态度和他控制国民党的能力。国民党仍是目前中国的主要政党。

耐人寻味的是：国民党在选出他们的国府委员之后，同时又成立他们的中央政治委员会，让陈立夫做秘书长。我们可以大胆地说，这个委员会对于控制国民党的政治机构和决定国民党的政策，将有重大的作用。

国府委员会为民盟和共产党留下11个名额，假若他们愿意参加这个过渡政府。4月17日夜里，罗隆基通知大使馆，民盟在这个时候参加是不可能的。至于共产党，在目前和年底宪法生效之前，似乎不会参加政府。

从国府委员会即将改组政府，多少可以看出它的决心和努力，同时也可以看出它的发展动向。但是无论如何，因CC系把持国民党机构，在改组中对他们的让步可以预料。

撇开内战不谈，中国内部问题如此严重复杂，企图在此时要求迅速的改变是不现实的。但是，根据这次国府委员会中国国民党与无党派和社会贤达的委员的质量，我们有理由指望他们努力进行健全与具体的变革。但是这种变革将是缓慢的，同时在变革过程中，我们也要记住，CC系现在虽然不在前台，但他们还是很有力地控制着国民党的机构。非国民党集团参加政府至少使激发政治活动和非共产党反对派的发展有了希望。但分析的结果，最难估量的还是委员长到底能否征求与听从开明进步官员的忠告，能否对效忠他个人的反动幕僚毫不让步。

文献23 司徒致国务卿

711.93/4—2247

南京 1947年4月22日

阁下：我有幸进一步评论这个国家反美情绪增长的一些原因和可能的结果。

从我国政府和私人对中国福利的长期贡献，特别是他们在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方面的大量援助来看，我们很可以对这种明显的忘恩负义感到痛苦震惊。然而，我的看法是，中国人充分意识到这一切，并非常感激。解释必须从各方面寻找，除了我们过去已经为中国所做的一切之外，我们反复宣布切实可行的良好愿望，导致他们在目前的贫困中产生了虚幻的希望。而幻想一旦破灭，自然激发起憎恨和抱怨。中国人还生来就依赖别人，甚至宣布这是他们的权利。缺乏自信可能部分产生于家族制度和古老社会的模式。无论如何，我们是他们所认识到的依赖对象，如果我们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欲，必然对我们产生不利的反应。

除此之外，最明显的因素是共产党不断宣传说，我们一直通过援助一个腐败和反动的一党政府来怂恿内战。他们的宣传、而且他们也无疑相信这种宣传，大大地夸大了这种援助的范围，误解了援助的目的。这等于蓄意锻造武器，迫使我们撤出，以削弱他们的仇敌。由于共产党反复宣传，加上人们缺乏对真实情况的了解，许多人上当受骗，特别是那些已经对政府感到不满的人。

这种异常的基调是由于对长期内战不满和对我们调处的怀疑。共产党人和他们激进的同情者责备我们，这当然是因为我们使政府可以维持下去，反之，国民党激烈地争论说，只要我们能放松约束，任他们大干一番，他们早就获得军事解决了。在这两

个极端之间，还有那样一些人，他们或者不同程度地敌视我们介入中国事务，或者惊奇为什么我们不能完成我们试图要做的事，或者怀疑我们出于私利，利用他们的国家作为反对俄国人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更多地是依稀地感到不可思议：在他们对经济和其他方面病态增长绝望时，为什么具有财富、力量和友情的美国却作壁上观，坐视他们的苦难。在中国人中，因为一个人自己的灾难而嫁祸别人的民族性格，或许加重了这种态度。这种性格并不限于中国人，但作为“面子”的一部分，在他们中间高度发展了，并且无疑掺进了他们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情绪之中。

中国人的这种不义举动，有时激起了个别美国人的义愤。但就其本身来说，这仅是个人行为，是道德败坏，并没有普遍不满的基础。零星发生的事件尽管同样令人遗憾，却从未激起那样一阵广泛的反美情绪。这种情绪主要是由于前面提到的反美宣传。

反美情绪的增长对影响美国的政策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即使中国的内部条件可以证明，向改组后的政府和私人企业提供实质性的援助是正确的，但这种情绪会不会成为一个障碍因素？可以预料，共产党会用毫不吝惜的咒骂，肆意指责我们是经济上的帝国主义，等等。这将被极左的组织，或许还有其他组织和煽动起来的学生，作为泄愤的一个借口。我们在这方面的任何大错误和个人的不端行为，都可以导致激烈的示威行动。但在我看来，我坚信中国当局不仅欢迎物质上的好处，而且也欢迎最彻底的监督。我相信他们会得到热心从公的公民的普遍支持。我仍然认为，只要我们的援华计划开始显出其成效，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社会胆怯就会烟消云散。因此，这就更多地取决于我们的步骤。在中国做什么同采取什么方式一样重要。就我们的打算和参与的程度作一个充分和坦率的声明很有必要。更可取的是由我们选出并保留所有顾问，选择他们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专业能力，而且要看他们个人的性格，对中国的态度，等等。

由于我们目的的纯洁性，我们对中国人民掌握现代技术的能力和真正达到公共道德方面的民主水平所持的带有冒险性的诚意，使我相信，我们给予政府和开明的领导人全心全意的合作，会随着包括学生在内的广大民众的赞同而增长，使反美情绪趋于缓和，而那些其政治目的及私利因为我们对华政策而受到损害的人，他们的反美情绪则不会平息。

然而，大使馆的乐观是有保留的，我们的感觉是，对美国以对华实质性援助作为驱散中国反美情绪的办法，不应期望太高。当我们的援助用于控制和缓和不利经济形势时，不可能通过这种援助本身消除产生这种形势的根源。只要这种不利的形势继续下去，美国将成为最方便的、到处通用的替罪羊。我们会被同时指责援助得太多或太少，介入的太多或太少，加强了稳健派或保守派，以及没有让中国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共产党当然会攻击我们所做的一切。国民党中颇具影响、畅言无阻的阶层基本上是排外的。他们认为我们的援助——实质性的援助——在任何情况下都唾手可得。这个阶层倾向极端排外，并利用外国人充当中国无数的弊端的替罪羊。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观念会由于美国的援助而发生任何变化。

文献24 司徒致国务卿

893.01/4—2547

南京 1947年4月25日

阁下：我有幸转达一些人对新公布的国府委员会的性质所作的个人评论。已经发出的电报将向您本人提供这些人的情况。国府委员的名单于4月17日最后完成。这是20年前这个政府首次施政纪念日。这件事还表明，在难以驾驭的民众之中，那怕进行温和

的改革也需要耐心。这些民众构成了今日之中国。我可以证明，自从宪法通过后，蒋委员长一直为此孜孜不倦地奋斗。他竭尽全力来诱导尽快完成这一任务。结果表明，为开创立宪政府，他在扩大代表的基础方面作出了努力。在把更多的进步分子召集到国民党内，保证两个小党派的支持，选举特别优秀的无党派人士，以及避免因利益冲突而公开分裂等各个方面，他总的说来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功。

在国府委员会的国民党人名单中，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没有反动的CC系和居统治地位的军人集团的成员。不幸的是五院的所有院长没有变化，这有利于增加国民党代表的总额。但是，张君勱不愿接受任命。如果他愿意接受司法院院长，一名青年党党员可能成为另一个院的院长。然而目前的情况有利于政府工作的连续性。因在党内坚持独立态度而闻名的3位元老实际上又被召回。他们是张继(华北)、于右任(上海)和邹鲁(广东)。蒋梦麟博士、王宠惠、王世杰和翁文灏是代表有爱国之心又受过西方训练的典范。宋子文愿意继续为政府服务，对他的声誉大有好处。这个政府最近曾迫使他辞职。他这样做表现出来的优秀精神，加强了他的信誉。邵力子由于宽宏大量，又是来自学者阶层的谨慎官员，因而受到普遍尊重。陈布雷多年来一直是深受蒋委员长信任的秘书。因为技术方面的需要，他也可能包括在内。从西方的观点看来，吴忠信似乎是最不合适的成员，不过他长期以来一直对党忠诚。

与列入名单的其他人相比，将两个小党派的成员包括在内，这更多的是一种象征。这些党派中主要是一些老学者，很少有行政管理的经验。实际上民社党中的缺额是他们之间分裂的结果。而青年党则拖延组成国府委员会。他们要求给予他们数量不等的各省任职名额。

无党派人士之一的陈光甫是一位受过美国教育的、品格和能力均优的银行家。他接受邀请是一个吉祥的兆头。莫德惠有丰富

的行政管理经验，这主要表现在满洲。由于稳定的判断力，为人正直；他受到普遍的尊敬。王云伍帮助建立了商业报，并有“大企业”的一般背景。包尔汉和国民党里的西藏人章加呼图克图为国民政府增加了非中国人分子。

名单中大多数是元老。由于在这短暂的过渡时期，各种关系微妙复杂，困难重重，也许正需要他们。但为了培养和促进，不应拖延吸收青年人。

当蒋委员长急切地问我对于人员组成的看法时，我认为可以非常真诚地祝贺他。然后我告诉他，美国舆论似乎普遍持赞扬的态度，但有所保留，直到有证据表明，新的政府机构有多大权力，以及它会用那种权力做什么为止。我借机向他提出，这是一个好时机，中国将由他开始使中国从长期的“人治政府”转变为“法治政府”，将军事管制只限于军人，停止秘密逮捕和监禁。他象通常那样点头赞成。但是，在他为使他自己和他的人民实践民主原则的斗争中，仍需要不断地提醒他。他在这场斗争中是有些孤立的。

当我应新任总理张群的邀请访问他时，他提到我第一次获悉他可能被任命时所作的评论，大意是我的怜悯多于祝贺，并说他真正是作出牺牲，并从责任感出发承担了这个任命。他表示希望我们的相互关系仍然基于过去的个人友谊而不是严格的官方交往。然后他很实在地谈到国家的状况、内战和共产党问题。他表示缺少管理经济和财政的经验，而他的前任在这方面则很精通，并表示要继续保持和充实宋博士的政策。他把他的任务勾划了一番，在短短的8个月内，使国家适应立宪政府，就象为了在一条本身就需改善的公路上旅行而修理一辆被损坏的旧汽车一样。他形象地比喻说，要输入新鲜血液，要吐故纳新。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希望获得美国的财政援助。他谈到他继承下来的问题：时间短促，形势复杂，等等。他考虑有三方面的因素：气候，他们自己的努力和外部援助。他提到的第一个因素表明，农业在这个国家居支

配地位，收成在国民经济中极为重要。

我乘此机会，谈了美国援助的可能性，主要是重申了我一直对蒋委员长本人表达的意见。我说我没有接到命令，也没有理由认为华盛顿已经作出了决定，美国政府首先关心的是所承担的财政援助应当真正有利于全中国人民，而非任何集团或组织，在内战的情况下，这种援助既不会延长战争，也不会使党派得利。在短期内，政府尽快地停止军事行动，向共产党敞开和平大门；现在的政府改组应使未来的进步改革成为可能；这是华盛顿和热心从公的中国人民所共同期望的。

文献25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4—2747

南京 1947年4月27日

就改组后的国府委员会的状况而言……确定行政院的改组在中国国内是否起作用为时尚早。然而有一点很清楚，政府的实际行政机关没有真正改变，仍被牢牢地控制在国民党手中。应注意的是，外交部、国防部、内政部、财政部、教育部、交通部、社会事务部、粮食部、司法部等各部部长都没有变动，仍由国民党官员充任。当然，他们有多方面的政治素养。

据说，青年党的左舜生担任了农林部部长，青年党的李璜担任了经济事务部部长。但这都尚待证实，无迹象表明他们二位能胜任此职。消息灵通的中国人士指出，就经济事务部而言，其职能将被剥夺，重新分配到国民党控制的各个部中。民社党仅取得不管部的职务，与此有关的是民社党的领导人张君勱仍然拒绝在政府里供职。这很令人注目。

著名的无党派人士，云南战时工业厅主任苗云太，接受了不

管部部长的官职。陈公甫最有希望出任国府委员，行政院接受他可能是作为一种象征。

在17名部长和委员里，国民党控制了14名，青年党两名和无党派人士一名。所要说明的是，交通部长俞大维虽是无党无派，但他与黄埔系关系密切。

不管部由两名国民党党员、两名民社党党员、一名无党派人士、一名青年党党员组成。值得庆幸的是，政学系的拥护者对目前的行政院有强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尽管行政职务缺少任何真正的变化。有一种可能性继续存在，即张群任总理可能会给行政院带来迄今为止更协调和更坚定的指导。随着行政院的职能更有效，总理的政治权威自然取决于委员长支持他反对国民党堕落分子的程度。

文献26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5—847

南京 1947年5月8日

阁下：我有幸向您提供一些对中国目前形势的印象。将蒋委员长的那些要求制成文本可能是适当的，其中包括棉花和小麦贷款、军火供应、8 $\frac{1}{2}$ 个航空大队的协议尽快和完全生效、任命高度合格的军事顾问。这些请求的文本已由4月28日夜发出，电报编号是916。

巴特沃斯先生和我于4月28日晚拜访了蒋委员长。巴特沃斯先生赞同我的意见，并就华盛顿可能会提出的或这或那的问题做了一番估计，建议蒋委员长推迟正式提出上述种种广泛要求的时间，而且所需物力也难以适当配备。对此蒋委员长最后也表示同意。会谈后的次日上午，我飞往青岛和天津。回南京后，直到现在

也未见蒋委员长。

1. 尽管蒋委员长坚信他的军事目标最迟可于9月达到,但即使许多同情他的中国人士也认为这未免过于乐观。我们自己的专家也这样认为。一个因素是对军官和士兵的薪水支付不够。以往中国士兵的境遇总的来说是艰苦的。由于厌战,共产党的宣传,加上缺乏令人鼓舞的动机等等,这种境遇变得更为恶化。所有这些都使得士气低落,似乎有人开小差投向共产党,有时甚至整个部队都瓦解了。对缺乏进展的另一个解释是,高级指挥官对全局的战略意见分歧。总参谋长(陈诚将军)鼓吹大范围围剿,迫使共产党人退到山区,一旦他们突围到平原地带寻找粮食和供应,那时就可以摧毁或击溃他们。国防部长(白崇禧将军)和原军调部的两位政府代表坚持另一种战略,即把中共军队分割成小部队,限制在不同的地区,并一块一块地吃掉他们。总之,来自各个前线的新闻近来都不能不令人疑虑。满洲的形势似乎特别危险,人们的不满甚至比关内更普遍。杜聿明将军尤其不能胜任,一切都是因为他的……自负。

2. 共产党人显然相信——不论他们有什么挫折和缺陷——形势会对他们越来越有利。迄今为止,他们的信心是基于国内形势。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设想,经济和财政的困难将把与政府深刻的对立加重到迫使政府为和平重开谈判的地步。他们指望阻止美国在内战继续时援助政府,并加强了为达此目的而进行的谩骂性宣传。他们在这方面是成功的,至少使他们的人民担心我们与国民党结盟反对他们,以致反美情绪超出了共产党的影响所及之地区。中共接受了俄国人的辩证理论,即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有周期性萧条,并且不久就会在美国再次爆发,因而我们在外国的行动将随之减弱。来自广大孤立的地区和通过各种来源得到的证据似乎都进一步证实,共产党的统治具有独裁的性质,许多地区的民众嫌恶他们的领导。“军事需要”驱使他们使用与典型的中国地方政府中没

有什么区别的暴虐手段。国共对于人民来说无甚差别，在任何一种体制下，人民都困苦不堪。而战争更加剧了这种暴虐，尤其在那些国共统治经常更迭的地区。总之，对国民党统治的较早醒悟现在正变成对共产党的信任。这在知识分子和农村群众中都是一样的。

共产党有些方面对进一步实行调解的努力有重要的影响。在我看来，他们盼望组成联合政府一直是非常真诚的——如果能就他们满意的条款达成协议的话。但他们宁愿把这看作是长期的安排，而非暂时的办法。在此期间，建立一个立宪政体，通过民众选举，决定由这个或那个党掌权。较早地讨论这个问题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一旦战斗停止，组成足以成事的政府，这个问题可以成为有希望的未来。或许这种想法仍然有效。但由于和谈目前陷入绝境，加之宪法于1947年12月25日生效的决定，临时联合的时间非常短。我的看法是，如果宪法生效以后，共产党加入联合政府，并能维持相当时期的联合，那共产党一定有所企图。

3. 我们现在正目睹没有共产党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面临的一些实际困难。经济部部长和农林部部长分给青年党党员。前者在名单中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任职之一。李璜先生迅速拒绝接受任命并没有使人震惊。在国府委员会中，民社党成员空缺。取得官职的三人之一(胡海门)现被开除出党，从而造成了一种令人困惑的窘境。从政府的立场看来，小党派的党员缺乏经验，一点也不比得到锻炼的工作人员强，而这些人必定要被取代。这将降低效率。特别是青年党，急于确保为其党员谋求许多职位。两个党中的这些人对在行政机构中没有更多地任职不满。新总理的老练和毅力应该能够把这些分裂的分子团结起来。控制权力的党在数量上占优势时，部分难题是必然存在的。

4. 在过去一两个星期里，在本地的报纸中，常看到从这方面或那方面涉及到期待中的美国贷款的新闻题目。这些报道，既

表明政府正面临令人绝望的困境，也表明我们的国家已到了为混乱的局势所纠缠的程度。中国人普遍认为，由美国提供一些援助是必要的，以便防止存在于整个政府范围内的灾难，虽然说中国局势极为糟糕但期望这不妨碍使用贷款。这些意识甚至在象张总理那样与我们友好的人的私人谈话中，都可以觉察到。在领导人中，唯有蒋委员长以冷静的现实态度承认，他的国家不论是人力还是物力历来虚弱，并告诫他自己，美国金融援助支付的代价将伴随着很大程度上的美国控制。这对他可能不是非常公正的，因为我们的印象是——甚至在您离华前很长时间里——他深刻地意识到这种需要，几乎可以说，财政和经济的迫切需要迫使他通过赊欠或借贷寻求救济。但是，在他自己首先感兴趣的领域里，他越来越明白以美国专家作为顾问的实际价值。总之，在我们为了专门的目的给予财政援助的问题上，为了控制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一定的支持。

5. 问题的实质是，直到军事行动为和平打开道路为止，国家的财政机构能否承受得了。如果蒋委员长相信到9月能解决问题，我们的专家认为，在此之前不会发生财政崩溃。陈凯明（前军调部的成员）修改了蒋委员长的诺言，大意是如果能得到必要的军火，津浦路地区和整个山东省可以在9月收复，但要在平汉路和山西省完成这样的任务，需等到年底。

不论何时能说服共产党领导人认为重新为和平解决作出努力符合他们的利益，原先为国家幸福仔细考虑的一切都可以着手进行。相信这会得到那些不善于表达内心想法的群众和所有的人比以往更多的支持。那些人敏感的自尊心和自己的利益在此进程中不会受到伤害。我们自己可能为更明智地管理那种援助获得经验。同时，形势是多变的，在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暴民的狂热行动可能随时爆发，迅速扩大，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导致崩溃。

文献27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5—2047

南京 1947年5月20日

为对付已经持续两周的抢米风潮和学生示威及骚乱，政府作出镇压的姿态，于5月18日发布一系列命令，禁止公开的群众游行，并规定民众向政府请愿的办法。与此同时，委员长发表一个文告，号召严守纪律与执行合法制裁。……对这个越来越严重的危机的背景及其发展似乎可作如下说明：

正如前几次电报中已经报告过的，起初的暴动发生在上海到成都的广大地区，主要是在长江下游地区，群众抢米店的米。这些暴动发生后，紧跟着是米商拒绝卖米，大量囤积，米价随之暴涨。为了自卫，米商们开始自己组织起来。警察的有效行动减少了抢米事件，制止了事态进一步恶化。

同时，大学中的不安定已经扩大，实际上全国的每个学术中心都在罢课。原来大学生游行的要求有些滑稽，这些要求包括杭州之江大学反对取消航运课程，抗议现在已规定的学期考试，要求某些学校迁移校址等。但是，随着学生游行越来越扩大，其基本要求也日益增加，他们现在主要要求增加学生公费和立刻停止内战。

大多数教授同情学生，这使事态更加严重。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们发表宣言，成为教授抗议政府的高潮。他们强烈谴责政府忽视教育，指责政府教育经费分配极少，并企图控制学术思想的自由。宣言要求提高教师的待遇，增加教育经费和购置图书仪器，并警告政府，除非断然改变基本政策，重视教育，否则中国的教育制度很快就会走向崩溃。

每次参加游行的学生人数估计在3000到10000之间。

游行的领导和动机已经出现明显变化。多数内行的观察家认为，这次学潮最初是由CC系发动的，他们希望激起一系列骚乱，以便公开打击政学系把持的政府，证明政学系无力维持秩序，并且还可以通过政变或操纵今秋举行的选举，使一个富于暴力的右翼政府掌握政权。所有这些都与群众发动的新的和平运动共同发展着。除了自由主义独立的报纸再三主张和平外，两个突出的事例是：国民参政会的3名参政员要求约请共产党代表出席将于5月20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议；立法院的13名委员签名，请政府立即提出新的和平条件。有了这种公开支持，CC系策划的骚动的领导权目前显然正转到民盟和共产党手中，CC系对这种发展并不犯愁，他们正好把秩序紊乱的责任归罪于他们的对手。究竟共产党领导这次学潮到什么程度，目前还很难说。但可以断言，其中一定有共产党员参加。即使现在还不活跃，他们一定准备在必要和适当的时候利用这种局面。

张群的政府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考验。5月18日刚下令禁止游行，5月19日上海几千名学生就不顾禁令，发起游行，要求和平。政府未曾加以制止。5月20日是国民参政会开幕日，南京学生又组织游行要求和平。政府派兵包围金陵大学，防止学生出入。国立中央大学学生领导其他学校的大学生组织起来，发动“解放”同伴的运动。他们冲进金大，和那里的同学会合，共同出发。警察和军队除了放空枪之外，仍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当学生们走向正在开会的国民参政会会场的时候，他们遇到障碍物、水龙头和皮鞭的阻挡。结果秩序大乱，若干学生受伤，而参政会也仓惶宣布午前休会。

大队的学生此时还聚集在国大会堂附近，面对宪警看守的障碍物。政府对于公开蔑视它的权威将如何处置，还不得而知，可是，显然一个相当广泛的学生运动正在酝酿，若不设法阻止，很

快就会扩展，并将使已经危机的政治经济形势更加恶化。

文献28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5—2147

南京 1947年5月21日

阁下：我有幸向您报告在中国与重开和平谈判可能有关的事态的发展情况。

对目前的学生罢课和工人罢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政府认为，已发现由中共在上海的指挥部指挥的共产党组织，即众所周知的“行动委员会”，职能就是煽动骚乱。谣言流传说，陈立夫博士一直在煽动学生不安，以便使现在的教育部长，也可能使新总理和内阁为难。蒋委员长引用了这个谣言，说它是共产党使国民党丧失名誉和分裂的阴谋。学生示威大部是由于对生活状况不满和深深地失望，这一切都被学生中间受过训练的共产党代理人利用。但粮食风潮和工人罢工很容易自动爆发。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是经济上贫困和政治上不满的朕兆。有意义的是所有这些行动都直接指向政府。政府怀疑他们是被人利用以达到颠覆性的目的，因而作出让步。当局第一次开始承认，他们可能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到处都有反美情绪的潜在倾向，激进派指责我们使政府继续打内战，忠臣们指责我们不关心这个国家的危机。

与此同时，在上海和北平，很有可能也在各地，正形成一些团体，这些团体组织起来呼吁国共双方停战，重新为通过谈判获得和平而努力。看来这些主张深得人心，而且任何类似运动都有可能得到广泛的支持。从或多或少的过激行动中，从自发的或被煽动起来的抗议中，这种和平浪潮可以略见一斑。

5月20日国民参政会开会。民盟代表已保证出席。几乎可以

肯定会提议结束冲突，保证谈判和平。

蒋委员长和总理都忧心忡忡，但也非常理智。前者同我谈话一开始就急于询问您是否有何表示。我昨天去汉口，仅离开3天。但每天他都要求我赶紧回来，甚至提出旅行可否推迟。这暗示着形势紧张。

从华盛顿召回王世杰博士，以协商诸如整个对贷款和赊欠的要求。细节一经完成，他便转赴美国。在我看来，他对中国的问题，以及美国的困境的理解比较全面、公正。

文献29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5—2947

南京 1947年5月29日

整个政治舞台仍然主要取决于政治和军事形势，情况正在加速恶化。最近几个月，由于军事需求和大量囤积，大米供应糟糕，从而加剧了骚乱。5月18日，政府公布了一项禁止学生游行的法令，但这些禁令在主要城市毫无效果，结果是政府进一步失去威望。目前学生正积极鼓动于6月2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罢课。但学生运动迄今具有犹豫不决的特点，还没有落入任何组织或政党的控制之下。然而，很多迹象表明，学生运动将形成较大规模运动的一部分，并最终置于反政府组织的领导之下，即使不受共产党控制，也会受民盟的领导。

张群领导下的行政院经过改组，比以前宋子文体制的基础更强大，但其政治策略和经济、军事形势发展的速度，捆住了它的手脚，使它无法施展。更有甚者，在解决现存问题方面，参加政府的非国民党成员毫无建设性能力。但在大使馆看来，展望今后几个月，除了增加政府的权威和控制恶化，不会出现令人吃惊的

崩溃。与此同时，政府的普遍态度仍是继续把美援作为治疗经济和军事形势进一步恶化的手段。

当动乱四起、百姓失望的时候，共产党目前在华北和东北节节取胜，声望增高。尽管还不能得到完全可靠的情报，这一点是明确的，即在满洲，中央政府沿中长路受到挫折，至少部分政府军队已有从东北撤退的必要。目前共产党在满洲的军事行动得到在华北和热河铁路沿线发动大规模袭击的有力配合。这种局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杜聿明将军在满洲的指挥错误。华北形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共产党有能力破坏开滦煤矿到入海口之间的交通线，这会继续影响煤的供应，特别是对上海。

尽管反内战情绪正在增加，主要是在大学生和商人中增加，但迄今还未达到决定性地影响政府的程度，这被委员长本星期发布的两个声明所证实……他认为事实要求发表声明来为它自己辩护。在政府里的自由主义的国民党党员中，正在形成认为和谈是一种解决办法的意见。一个迹象是立法院的20名成员最近呼吁恢复和谈，据报告这得到孙科博士的默许。5月27日，国民参政会通过一项决议案，要求邀请共产党恢复和谈。当然这可以理解为是国民党挽救目前军事失利和阻止反战情绪高涨的一种策略，企图把持续内战的全部责任归咎于共产党。在共产党军事胜利的形势下，他们准备参加和谈似乎不太可能，除非政府能够接受大大有利于共产党的和谈条件。

不要幻想共产党不见机行事、不因时制宜，也不要幻想他们愿意在此时接受公正可行的建议。

在最近的将来，对政府来说，最严重的危险会导致这种气氛：由于政府不能提供足够的给养，军队是否会出现不满。政府军队的士气低沉已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在满洲。但在一定时期里，据信政府能保持其王牌部队的忠诚。可以预料，政府的努力将取决于充足地供应这些军队，并指望靠显示武力，通过制止和镇压，控

制住城市的骚乱。

2月16日公布的紧急经济法令，正如普遍预料的那样，暂时缓解了6个星期到两个月。到4月间，这种影响消失了，经济危机的征兆再次清楚地显现出来。价格稳定保持到4月1日，然后突然不断上涨。粮价是最好的指标，在上海，粮价超过12月31日的6倍，超过2月15日的3倍，并且还在继续上涨。对大米供应的担心很大程度上是神经质的，抢米风潮在许多城市正在出现。政府现在正摸索放宽对米价变动的控制，也在上海探索配给方案。这个方案的目标基本上是健全的，尽管如此达到目标尚不确立。

以后的3个月里，即使按季度正常地为食品供应标明增价，困难还是不可避免。因为冬季作物刚开始成熟，主要农作物到八九月才收获，而地租和各种形式的军事必需品使形势进一步复杂化。根据农业专员的报告，各种作物产量预计达到一般水平。财政部长宣布，根据来自其他各省的报告，四川省的估计特别有利。但关于华北平原和湖南等地的消息则令人悲观。收成总是决定着中国经济的面貌，而今年收成欠佳。工业形势已表明没有改善。

在财政方面，到五月中旬发行纸币7600亿元，相当于年初发行纸币的一倍还多。货币发行增长率与1946年同期相比，显然急剧上升。由于1947年头4个月的收入只是支出的40%，预算的一般情况仍是不平衡。财政部已将1947年的支出额修改到100%。恐怕在年底之前有必要再进一步修改。国家和财政部联合出售的国库券，根据4月1日公布的记录，仅达到2500万元，涨价不可避免地带来美元黑市复兴，尽管受到约束，但地下的方式仍在进行。随着输出和汇入额不断减退，官方汇率日益呈现出它的不现实性。

大使馆提议，准备向美国发出一份分析行动方针的报告……。

文献30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5—3047

南京 1947年5月30日

5月26日，国民参政会以大多数通过一项决议案，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到南京来商讨停战办法。决议案如下：

“和平已是全中国人民和决心尽力挽救国家危机的参政员的一致愿望，因此我们决议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参政会，以便共同商讨国家大事。”

这个决议案已经由所有政府电台广播。

这个决议案表明，特别在左翼与知识分子集团中，目前对和谈的要求继续增长。这个运动的第一种情况是：有许多，甚至是多数参加这次运动的人诚恳相信，要解决中国千头万绪的问题，第一个主要的步骤是和平。也许不幸的是，迄今为此有关的团体或领导人没有一个提出如何达到这个值得赞许的目标的具体建议。同时，也没有人提到，共产党现在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可能不愿妥协。

第二种情况是，在这次风潮发生后，政府大概对能够指望或不能指望共产党答复的事已心中有数。它对于这次和平运动的发展，不会完全不高兴。假使可以按字面理解政府权威人士的讲话，政府一定相信，任何和谈的建议都将被共产党拒绝。因此，在参政会通过决议案和立法院作类似的呼吁之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政府接着会向共产党提出正式谈判。这样的设想不无道理。

文献31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5—3047

南京 1947年5月30日

在中国最杰出的国立研究机构中的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员，对大使馆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即认为由于粮食问题，中国的经济形势普遍比已知的情況更糟。他们声称，在长江流域和华南，80%的农民现在完全没有大米，大米都在富裕的地主手中。农民只能坐等春小麦作物。由于春季干旱，春小麦收成低于正常年景。他们预料夏初的情况会进一步恶化，甚至会发生更广泛的混乱。

他们认为，大学普遍要求于6月2日罢课，这会导致过激行动，特别是如果伴随着普遍的工人罢工的话。一旦如此，学生对政府的背叛将无可挽回。他们认为，政府5月18日公布禁止游行的法令，是大错特错；而政府对南京和北平的游行群众施以暴力行动，则更加激起了那些本来在动摇观望和犹豫不决的师生对示威者的同情。美国中国学研究人员因此认为，由于危机加深，由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右翼势不两立，一部分不偏不倚的中间势力会转向民盟一方。

有趣的是，上海吴淞警备司令部封闭了三家有影响的独立报馆，理由是它们泄漏了军事情报，不利于军队士气。这些报纸是：《文汇报》，一般说来，它特别紧密地追随共产党的路线；《联合晚报》，多少比《文汇报》右一些；《新民晚报》，这是自由主义的和高度批评政府的报纸。现在，《大公报》成了上海唯一有影响的独立的报纸。

如果政府不能令人满意地答应学生提出的到5月26日期满的3天通牒，学生就决定南京所有大学继续罢课，直到6月2日总

罢课为止；并重申他们决定加入到6月2日的罢课之中；学生派流动小队到南京周围的城镇张贴宣言；哪条街道上有听众，他们就在那里鼓动。

文献32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5—3047

南京 1947年5月30日

阁下：我有幸尝试解释目前这个国家的趋势。我在1947年5月21日电报中描述的为和平呐喊的两个因素，正在迅速有效地增长。这种要求实质上是获得民主政体的基本素材。特别是在上海，由于没有足够的后备军队来对付，局势近于大乱。参政会正在开会，会上有人坚持强烈呼吁和平，但受到国民党政客的抵制。学生正计划于6月2日举行全国范围的游行，这标志着国民参政会的完结。学生运动如往常一样，是公众舆论的完全可靠的晴雨表。学生是民众中最觉悟的分子，并很少有约束。因此，他们比其他人反应更快、更冲动。

军事形势至少在目前对政府不利，并且如果不能通过经济和心理的因素加以控制，势将更加复杂。政府领导人对任何和平呼吁犹豫不决，认为这是向共产党示弱。

根据新的公开原则的精神，政府领导人是将人民的愿望作为命令执行呢？还是他们将继续按过去的传统，试图镇压那怕是和平示威的行动，靠强制手段控制经济法则？迄今为止所有的迹象都指向后者，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一些被标明是保守派的主要人物，正在内心反省。

从某种意义上说，问题的尖锐并不全是因为贪污的官员、自私和无能、他们在人民中的地位等等。问题在于这些热心从公的

领袖其思想和行为充满了狭隘的偏见和陈规陋习，而他们的困境和恐惧则更加强了这种偏见和陋习。共产党方面的顽固不化和猜忌，与国民党那种令人绝望的顽固颇为相似。

蒋委员长最有机会宣称他本人是民众愿望的代表者，为了群众的痛苦和国家的危险，要求共产党再次共同发布停战令，并再次共同努力，确保和谈。这表现出他的智慧和接受新的民主标准的真诚。他应该团结人民中的仁人志士，团结那些渴望和平的广大民众，抛弃派系冲突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干扰。如果他真能提出此类和平建议，并且不附带挑衅性的武断，如果公众舆论在这方面支持他，那么，共产党就得对持久的民族灾难和不明不白的内战承担责任。

文献33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6—447

南京 1947年6月4日

阁下：我有幸报告即将来临的政治危机的进一步发展，最显著的特征是政府的愚昧态度。蒋委员长和他的亲信把学生和其他动乱解释为共产党或民盟的煽动和利用。毫无疑问，学校等各地都有共产党安插的代理人，他们一直怂恿骚乱，并加剧学生和民众中不满分子的不满情绪。共产党的这种策略是一目了然的。可以预料，他们不会坐失国民党造成的这种良机。但是，如果让人民明白无误地表达他们的愿望的话，目前这个愿望就是普遍高涨的和平呼声。局势的悲剧在于，首先是蒋委员长和他周围负责的人不能理解这一点，而只相信他们自己的情报机构。因此，他们倾向依靠武力镇压，这样干的结果当然对共产党有利。这种政策主要产生于恐惧，也几乎来自绝望。认为共产党到处肆无忌惮地

渗透，连政府机关亦不能幸免。在这方面，他们高估了共产党的影响和鼓动的能力，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仅仅是中国人。他们关心自己的生存，本能地支持国民政府。甚至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激进的、革命的行为，也主要是因为物质上的痛苦和精神的幻灭。把这些都归之于共产党的阴谋，并企图靠蛮横的武力予以消灭，只会加剧不满。

与此同时，我听说共产党象普遍猜测的那样，并不是那么反对恢复和谈。在政府局势恶化的时候，他们也在经受着物质上及道义上的困苦。在我看来，他们似乎尚无企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目前准备不够。但他们提出的和平条件会比过去谈判中提出的更苛刻。他们暗示再次寻求美国调处。顺便提及，在目前的学生和其他游行中，似乎没有反美情绪。

军事形势对于政府至少可以说不如以往。随之而来的经济、精神或情绪等因素的恶化更为显著，这些不久就会直接影响作战的士气。

蒋委员长迄今仍顽固不化。他无视目前所实行的方针的危险，也拒绝许多人劝他改弦更张的建议，他完全了解我的看法，但似乎不情愿与我进一步争论。我感到我自己实在软弱无力，不能在这方面帮助他理想主义的抽象词语应用于具体问题。而在形势平稳时，他是表示过赞成的。我极为谨慎地表示，我担心他的行动是否受美国援助的希望的影响。我希望他明智地为他的人民着想来履行他的职责。

但是，不论何时，只要他给我机会，我打算做出更多的努力，使他认识到继续战争是无益的和危险的灾难。只要他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就根本没有必要害怕共产党。在向共产党呼吁时，为人民的利益负起领导责任，公开和无保留地对民主原则作出他自己的保证。他对此经常重申，但迄今不能实行。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团结他的人民，使他们对局势表示出过去的热情和信任，只有

这样才能根本阻止他所头痛的共产党叛乱。但要他实行这条路线目前很困难。他无论如何应该牢记亚伯拉罕·林肯的格言中的真谛：“没有人能够不经其他人同意而支配另一个人。”

在所有或多或少是自由主义的独立的组织中，几乎普遍存在着忧虑。政府职员同样如此。但他们很少畅所欲言。普遍认为崩溃只是时间问题，我仍然希望在崩溃到来之前，中国人共同的理性将多少保护他们自己。

文献34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6—1847

南京 1947年6月18日

阁下：我有幸专门报告有关蒋介石委员长的近况。形势总的说来继续恶化，在军事、经济和精神各领域都一样。当然这些都是互相关联的。极端的冲突和生活费用的上涨激起知识界和觉悟群众对政府的不满甚至敌视。简单地说，抱怨的中心围绕着自由和粮食。

蒋委员长认为，他有证据说明，6月2日形成的广泛的动乱，是共产党的阴谋，并且坚信必须采取措施挫败这个阴谋。他无疑过高估计了共产党对最近学生游行的影响，现在他本人可能认识到了这一点。各大城市出现的情况并不一样。在武汉大学，学生在向汉口警备司令部前进的路上，3个学生被打死，3人受重伤，许多轻伤。后来汉口警备司令被解职。

参政会的和平决议……已通过该机构的常委会递交国府委员会。国府委员会原则上赞成，但要求他们为下一次国府委员会会议的决定准备更具体的意见。而共产党则抱蔑视态度，认为这是政府没有诚意的又一个证据。

蒋委员长一直非常焦急地仔细考虑形势，他被迫承认现实，也认真考虑了我迄今收集给他的劝告，这些劝告的意义非常相似。总的来说，和平呼声到处都有，而且经久不息。政府要么说服共产党停止战斗，恢复和谈，要么就必须把内战责任归咎于他们。进一步讲，政府应致力于改革，并发布官方宣言，让人民知晓国事，了解政府的问题和意图，从而赢得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在与蒋委员长的私人会谈中，他很欣赏我的坦率。在最近一次会谈中，我感到特别振奋，因为他对我的建议已不是原则上赞成，而是比较具体了。

几乎与所有其他重要官员相反，蒋委员长一直保持着冷静的自制和多少有些持重的信心。在其他人中普遍存在着由客观形势而产生的挫折感，这些人都同样由于神经质地对共产党的恐惧而紧张。实际上，共产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显出威力，主要是由于国民党的无能和腐败，以及——随着惊恐的加剧——民众失去了对政府的忠诚。有一点可以充分肯定，只要有充分有力的能够胜任的政治领袖，只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政府同样能够恢复对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控制。

现在还不能轻率地预见结局，但三种可能的结果之一，很快会从目前的危机状况中出现。

1. 蒋委员长将表明他自己是解决共产党问题的领袖。他或者使共产党赞成重新和谈；或者宣布共产党实际上是武装反叛，危害民族利益。我一直希望他以激动人心的革命性手段来为民族奋斗，重新燃起人民的希望之光。他正在抛弃过去的很多偏见，并选择了进步的观念，我相信可以影响他进一步前进。当然与其他进程相比，这未免缓慢了一些，且不尽如人意。但这确实真实可行，而且可能是最有希望的解决办法。

2. 随着威胁性的灾难来的更快，很有可能的是出现开明的无党派的领袖核心。他们凭借政治意识的公开性，并通过与共产党

达成协议，会从国民党中吸收更多的自由主义分子。蒋委员长也许会从舞台上消失，张群总理，宋子文和其他一些杰出的人物可能担任领导，建立一个过渡的联合政府。其不利之处在于新组织没有经验，联盟松散，没有能力有效地合作。这在中国人中特别明显。

3. 现在的中央政府与共产党各自为政，共产党在自己的控制区域建立强权的地方政府，并努力扩张。这个政府将是混乱和不稳定的罪恶之源。

文献35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6—1847

南京 1947年6月18日

阁下：我有幸报告，在6月14日下午，外交部长王世杰博士召见我。谈话一开始，他便叙述了新疆最近发生的事件。外蒙古骑兵在乌克兰军队配合下打击反苏的哥萨克，并把他们驱向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已受命避免一切挑畔，但不得后退。支援这次作战的飞机似乎标有苏联标记，但可能是外蒙的飞机。没有莫斯科的赞成，外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采取行动。据报告，莫斯科广播电台否认苏联参与了这一事件。中国政府认为，不论最终可能做什么解释，都立刻充分地予以公开报道。王博士借机补充说，有不容置疑的证据证明，外蒙帮助了中共在满洲的行动，尽管没有可靠的情报说明援助的程度。

王博士然后提到最近我和蒋委员长的谈话，表示蒋委员长正仔细考虑我的建议，但委员长为目前的形势所迫，计划非常小心地避免已经很严重的军事、经济形势和其他因素进一步恶化。他本人感到，最迫切需要的改革大致由三个题目组成：(a) 裁减和

改组军队；(b) 改善省级政府和地区政府；(c) 经济复兴，包括交通、工业和农业。我们详细讨论了每一个问题。

然后我告诉他，我多么高兴地向他重申我最近与蒋委员长谈话的实质。谈话其实没有新内容，但都对紧迫的形势有所确认。所强调的重点是人民真正渴望和平——包括学生运动。因此，要么敦促共产党重开和谈，要么向国人表明共产党不愿和谈，由共产党承担内战责任。政府应操纵公众的和平要求，公布和保护公民自由权利，显示出民主和社会改革迹象，这样才能恢复人民对政府的支持。所有这种进步的发展会受到华盛顿由衷的欢迎。

我再次指出美国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的一些实际困难。完全撇开中国的内部事务不谈，还有诸如控制进出口银行贷款的法规，国会休会等等。

王博士叙述了蒋委员长正在考虑的一些策略性问题。例如，在他发表将政府行动限于单纯军事防御的声明之前，政府的军队配置等等。不过他向我保证，正在考虑具体的条款，并将提交6月20日的国府委员会会议。

文献36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满洲/6—1947

南京 1947年6月19日

今天下午，蒋委员长召见我。他一开始便声明，满洲形势非常严重，长期坚守满洲是不可能的。共产党在俄国人帮助下，已经越来越强大。四平街的战斗特别惨烈。他预料该城的陷落意味着失去长春和吉林。他说，由于在将军队输送满洲^①等问题上您

^①指抗战胜利初期美国帮助国民党政府运兵抢占东北。——译者

给予了积极援助，他深表感谢。所以现在的满洲形势应立即向您报告。他还寻求您对未来政策的忠告。委员长支支吾吾地承认形势危急，的确希望能予以帮助。他本人在三天前就充分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近两天还作出决定，必须守住整个满洲。失去上述城市，会波及沈阳和其他地区。与俄国人达成谅解接收大连是不可能的。俄国人坚持派往那里的市政官员必须与已经建立的苏军指导下的共产党政权合作，并拒绝允许国军在那里登陆——所有这些都违背了中苏条约。

在中国，有军队就有权力。共产党正不断地得到大批装备。他们的人力损失恢复很快。政府的人力损失则不能填补，而且装备锐减。共产党的战术酷似俄国人与德国人作战的方式。失去满洲将会威胁华北，危及全国。蒋希望能尽快向您报告所有情况，要求我一旦得到您的答复就通知他。谈话结束时，他询问了我的看法。我答复说，对于他来说，采取紧急措施的时刻可能已经到来，他应组织一个经过精挑细选的班子一起工作，并将为人尊重、办事负责的人士组织起来，削减一切对紧急时期无关重要的花费。向人民发布宣言，如果共产党拒绝最近的和平建议，应让他们对中国人民负责；如果共产党希望维护在立宪政府下刚刚出现的民主生活方式，他们就应一起工作，从危险中解救国家；为此，所有的人都应为共同的目的奋斗，贡献他们所能作出的力量和财富；政府应尊重公民的自由，危机时期需要政府以极大的勇气和无私的态度厉行改革；通过所有这些方式，政府才能赢得民众支持。否则，政府将不得人心，为人民所唾弃。我一直认为，那种革命的计划会吸引有识之士，特别是学生和其他极左分子。他本人应游历全国，发表演讲，唤起民众团结在新的运动周围；有人民的支持，他不必因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或其他行动而担惊受怕，而可继续敞开恢复和谈的大门；失望和失败情绪瓦解着那些为国献力人们的斗志。而在这样意志坚定、开明进步的领导下，可以激起他们新的

希望和努力，最终，我相信这一方案将赢得美国及世界各国的充分同情。最后，他说他也早有同感。

三 魏德迈使华及其结局

国共和谈的希望随着7月4日政府宣布共产党非法而消失。中国局势使马歇尔国务卿牵挂难放。不几天他即致函蒋介石，表示了对最近事态的关注，埋怨蒋依然无视美国劝告。他再次力劝蒋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使得美国援助颇具意义。马歇尔决定对蒋进一步施加压力。在马歇尔建议下，杜鲁门总统派遣艾伯特·魏德迈使华考察。魏德迈使华不仅使司徒及其使馆同僚感到突然，而且也在中国人中激起复杂反响。一些人士相信魏德迈使华会导致美国援助的增加，另一些人士则关注魏德迈对国民政府的尖刻批评，关注魏德迈提出的立即实行广泛改革的坦率要求。魏德迈吵吵闹闹地出场，加强了马歇尔和司徒敦促改革的努力，但并未带来美国援助的实际增加。

魏德迈使华并未改进中国局势。所需改革并未产生——这在南京是司空见惯的。政府宣布民盟非法，限制其参加新国大的选举，并允许政治派系扩张他们的势力。共产党的胜利与国民党的失败使得失败情绪在军队中日

益蔓延。国民政府犹如落叶之秋，严冬在即。

司徒雷登的报告在1947年底变得愈加悲观。它反映了国民党的困境和蒋介石统治的破产趋向。这时，司徒雷登面临的严重困境是：没有美国援助，中国就不能进行改革；而在中国进行真正改革之前，美国不愿提供更多的援助。

文献 1 司徒致国务卿

121.893/7—1647

南京 1947年7月16日

我在北平时才从政府中央社的消息中得知魏德迈将军将使华。7月15日返回南京后，得悉大使馆的情形也差不多。在中央社得到消息几小时后，才收到国务院电报。中央社来大使馆核实消息并询问详情。不用说，大使馆首先向我报告了来自中央社的消息，而后才收到国务院7月11日下午5时发来的正式电报。

相信您有充分理由在您决计派代表团使华之前不通知我这一消息。但是，我还是认为你们在发布消息时应避免使我及我的同僚尴尬。

②③

文献 2 司徒致国务卿

121.893/7—1747

南京 1947年7月17日

白宫宣布派魏德迈作为总统特使到中国和朝鲜进行实地调查的消息立即得到国民政府及国民党的发言人及报纸的欢迎。所有

报纸的头条新闻都宣布了这一消息，继而就是对使团任务、性质及意义的各种估计和揣测。多数新闻已得出结论，认为魏德迈使华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将大量增加对国民政府的援助。

外交部长旋即发表声明，欢迎魏德迈将军，认为他是中国公认的朋友及熟悉中国问题的专家。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也发表类似声明。诸如胡适这样的佼佼者也有良好反应。

政府和党的反应一致表示称赞。各大报纸如国民党的《中央日报》，CC系的《大公报》（注：大公报系政学系系统）和《申报》，以及军方的《和平日报》都发表了社论，欢迎使团，称赞魏德迈将军会对中国问题采取正确立场，并预示美国政策将会大大转变，很快会大量支援中央政府，将中国纳入马歇尔计划。

文献 3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7—1747

南京 1947年7月17日

从北平返回后，蒋委员长于7月15日下午约见我。表示对魏德迈将军即将使华感到高兴。然后，他问及我对北方形势的印象。我回答大致如下：

中方或美方来自东北的报告一致认为形势极为严重。这不仅是从军事观点上这样说，百姓对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同样嫉恶。中央政府各级长官剥削百姓，中饱私囊。分崩离析的情绪到处可见。我对蒋委员长说，我强烈认为，应当依靠可以信赖的地方领导，给他们大量自主权，这样可以加强政府地位，抵销共产党力量。

我说，我发现华北人民因政府军在东北稍稍得手而感到略为平息，但其严重不满不亚于东北人民。这种不满似乎遍及全国，

而且程度日益加重。

委员长说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我指出经济和财政的恶化只是症状。大难临头和悲观失望的情绪普遍存在，导致军队贪污日益增多，尤其是在东北。简单地说，厌战心理和日甚一日的不祥之兆正瓦解军心。我委婉地责备委员长，说他在最近的声明中只引用我关于新革命的词句，而删去我强调改革和宪政自由的内容，并将他的声明只局限于与共党战斗一个方面。委员长好象比以前较诚恳地听取了我的意见，承认别人对局势发展的看法可能比他更明了。他要我提几条具体的书面建议。但我暂时尚无此意。

文献 4 司徒致国务卿

121.893/7—2947

南京 1947年7月29日

在较为可信的中国新闻界中广为流行这一传说，即委员长有两点对魏德迈将军的使团颇为生气。第一，使团在其活动范围中包括朝鲜，这有损于中国的尊严和主权；第二，宣布使团来华事先未与他商量，这是对他的怠慢。后一点看来可能是事后之见。因为大使馆向他递交国务院关于魏德迈使团通知时，他确实表示极为高兴。

另一方面，这一事件也许部分说明了中国新闻界和官方明显流行的反响，即高度期望和兴奋后的失望沮丧。最初的反应似乎是认为魏德迈将军会使军援和经援涌进，并带来美国政策大转变。现在，中国人认为这是办不到的。无论如何，只有等魏德迈将军回国与有关美国官员磋商后，任何可能的援助才能实现。

文献 5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8—1147

南京 1947年 8月11日

阁下：我有幸向您报告昨晚与蒋委员长的会谈情况。郑介民将军与委员长会见后，我随后与蒋委员长会谈。郑将军和我近来经常商谈如何努力劝说蒋委员长真心实意和毫不犹豫地致力民主改革。郑将军最近就此写了几点具体建议给他（译文已交魏德迈将军）。

我简略地谈了我的济南之行的情况后，蒋委员长询问我的看法。我的回答可概括如下：

1、中国应参加反对共产党侵略的国际民主集团。

2、美国一直准备以正当和可能的方式援助中国，条件是现政府必须足以证明其进行改革，以恢复非共产党人民的支持。

3、程序可包括以下措施：

(1) 国民党应与政府截然分开，就象民主制度下的其他党派一样（蒋委员长已让郑将军准备一份有关美国两党的材料交他审阅）。

(2) 军事方面，在美国军事顾问团帮助下，从目前内战的实际情况出发，按政协原则改组军队。军队短小精悍，训练有素，装备优良，物质充足，士气高涨，这将比目前的军队更有效率，开支更少。如何裁官减兵，这一问题不可忽视。

(3) 行政方面，在开始阶段可扩大监察院职权，以制止文官中猖獗横行的贪污腐化现象。在宪法生效日期（12月25日）之前，先宣布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条款生效。但比这更重要的是要树立对民主制度的真谛和价值的崭新的革命精神，具有全新的热情

与生意盎然的信念。蒋委员长必须对此有献身决心。他本应是国家的元首，但他太多的只是一党之魁。

当然，所有以上这些，在我以前与他的谈话中皆属老生常谈。蒋委员长在我谈话中偶尔稍加评论，我谈完后，他表示基本同意。

他说，他决定提高军政人员的工资报酬，以便适当减轻一点他们的生活困难。

关于军队改组，他说他曾当着我的面请求您（指国务卿马歇尔——译者）担任他的最高顾问，权力与他相当。他准备向魏德迈将军提出同样请求，并真诚地希望能被接受。

关于新闻自由，他说业已具备了。涉及孔宋两家在内的两大公司事件在报纸上广为宣扬，就是例证。我回答说，报纸编辑并不明白他们可以依赖这种自由权，尚须发布明确声明，并附带报纸可以申请补偿和保护的具体措施。

最后，他表示他将仔细斟酌所有这些问题。我指出，如果他准备做出这些激进改革，最好是发表一项旗帜鲜明的声明。

今天上午，委员长离开首都去牯岭，他计划在那里稍留数日，闭门独思，考虑行将实行的这些重大决定及其有关细节。

文献 6 司徒致国务卿

第945号

南京 1947年8月19日

阁下：我有幸试图就美国援华这个总题目进行补充评论。

如我上次电文所告，蒋委员长要求魏德迈将军担任他的最高军事顾问，权力与他过去答应您的完全一样，他享有什么权力，魏德迈就享有什么权力。魏德迈将军认为难以接受这一建议，但旋即

另提二人代之，而其中任何一人都为蒋所不允。当我向蒋委员长提出这两位代替人时，他表示失望，表示那样将有损于中国威望。至于魏德迈将军(如您一样)，委员长可以不经任何程序，便赋予他自己享有的一切权力。他还不知道能够有其他人能够被委以这一重任。他表示鉴于这一问题事关重大，希望您能给予支持。

魏德迈使团的中国之行使中国国内议论纷纷。共产党人咒骂；自由分子疑虑重重，担心魏德迈使团为反动派所利用；政府许多人则对魏德迈使团怀有奢望。他们仰赖我国来代替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使人又可气又可笑。但我必须承认，在政府内外有着日益增多的人士，他们的思想很值得同情。他们承认我们所争论的，例如中国人应自助以及首先整顿国内秩序等等，都极其合理。但鉴于有权进行改革的当局的保守主义、封建意识、自私自利和狭隘偏见，他们感到自己绝对无能为力，而共产党人则迅速得利。这些人士中的佼佼者既不想袖手旁观，由我们包办一切，他们自己也无意选择这一道路。但他们对中国的情况一筹莫展。我也如此。而我与他们大多数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旦执政者和普通百姓开始看到前途有望时，我对他们的精神与心理影响是抱有希望的。

②4 目前，仍然可悲地缺乏进行逐步改革的意愿与能力的迹象，仅仅稍见端倪。蒋委员长最近召集各省主席开会，除了一些激烈批评和适当指示外，还允诺了某些利益。此后各省税收主要用于各省之需，中央政府各部及其他机构所派官员应在各省权力之下。蒋委员长从那时就与我争论，说虽然从理论上讲省主席应由文官担任，但在宪法生效及军队改组前，文官很难与军人统治对抗。他又表示，鉴于几番努力的教训，在目前局势下，他很难规劝精明能干者接受省主席这种职务。他正制订明确计划以便在9月9日举行的会议上使党政分离，并迫使国民党接受与美国政党相同的处境。他已对有关这一问题的备忘录研究过。此外，他正在制订计划，以扩大地方警察权力，使之取代宪兵（实际上只对他一人效

忠)和特务,由地方警察来处理有关民权事务。我指出,如果充分准备实行这种改革,就应尽快制定公开的文官考试制度,并对新政策及程序进行正式的解释说明。中央机关与地方机关之间、下级官员与上级官员之间所存在的重叠现象应予纠正,以便减少冗员和开支,提高效率。细微的步骤才刚刚开始。这多半是由于中央政府素来怀疑地方官员,也是保护制度所造成的结果。蒋委员长实行这种个人控制的手段也是登峰造极。而目前,由于他对无孔不入的共产主义感到恐惧,这种个人独裁变本加厉。这足以说明——如果不是作为借口——五月间对学生罢课^①采取的恐怖手段以及类似强制侵犯人权的措施。

蒋委员长最近对陈立夫的处理表明他企图着手清除进步运动道路上的障碍。而这种障碍的出现当然大多是由于他与这类同志相处中形成的观念与行动的旧习惯。两三个月前,他指使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将军免去陈立夫组织部长职务,并责成他与张群院长拟定代理人选。因为他俩同系一派,并常常为共同对付异敌而与CC系合作。这就将他们置于尴尬的境地。最后,他们提议让陈立夫博士自己指定继承人选。而陈立夫巧妙地回答说,由于他不明白哪些方面证明他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不能希望他找到合适继承人选。但问题并未了结。大约两周前,蒋委员长赴牯岭前,他派人找来陈立夫博士,将他责斥一番,告诫陈立夫在他离开期间不要乱动。但无论如何,陈立夫不久后一直极为活跃,扩大其在政府银行、工厂企业等方面的经济控制,以此来扩张CC系势力。在所有这些勾当中,他对张群院长具有一种阴险的左右力量。毫无疑问这部分是由于这两个派系的共同的政治权谋,部分是由于当蒋委员长总是握有最后决定权时,张群在极端困境中倾向于妥协或顺从。特别是来自陈博士的任何压力都是源于他与蒋委员长

^① 指1947年5月国统区爆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译者

的众所周知的关系。在上周我与蒋委员长会谈结束时，我提议让陈立夫到美国考察美国政党，蒋委员长亲切地笑着说，他本人也考虑过让他到欧洲旅行，但眼下鉴于选举日益迫近，他不能没有他。而对我来说，正是鉴于这些原因，我才尤其希望他出国。自那以后，郑介民将军告诉我，可能要早点安排陈博士启程。

文献7 司徒致国务卿

121,893/8—2647

南京 1947年8月26日

魏德迈使团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沈阳、广州和汉口等地忙碌一个月之后，于8月24日离华。在上述各地，使团成员会见了中外人士并收到代表各种不同观点的函件。

使团接触到一些人，他们自认为是共产党人，但声称是与该党无直接关系的人士。这些有限的接触并没有影响共产党的宣传。这种宣传在使团在华期间一直漫骂使团，特别是对魏德迈将军个人，普遍地怀疑并指责使团的目的。少数人士敦促由美国发起恢复国共和谈。但普遍的情绪显然是认为这不切实际。

8月22日，魏德迈将军向国府委员会委员、各部部长及约40名中国要人（包括蒋委员长及蒋夫人）发表讲话。魏德迈将军这一特殊举动将随着其讲话的要旨为更多的中国人士所广泛知晓（必将如此），将会继续引起重要的反响。正如国务院所知，魏德迈将军非常坦白地道出国民政府的缺点。但是，他在讲演的开始和结束时，都明确诚恳地声明他对中国的友谊，他希望对中国有所帮助。出席会议者多属士大夫阶层，一位外国客人发表唐突的公开言论会使这些人感到不悦。据可靠的报告，考试院院长会后竟哭了。国府委员会曾建议委员一律不到机场为魏德迈将军送行，但蒋委

员长否决了这一建议。出席会议者部分是由于顾及“面子”，但也包含其他含义，担心总统特使的此种言论会鼓励共产党，并引起无党派人士反对政府，也考虑到这会引发金融市场混乱。

有趣的是，在魏德迈将军对国府委员会讲话前，蒋委员长打电话建议我正告魏德迈将军，不要过于指责政府，因为国府委员会及其他出席人员代表着非常复杂的集团。我告诉蒋委员长，大使并无资格左右魏德迈将军的讲话范围，因为这种讲话是蒋委员长提议的。

魏德迈将军在赴机场途中拜访蒋委员长，正式辞行。蒋委员长指出：根据报告，魏德迈将军在访问各城市中，拒绝接见诸如商会和参议会代表等等。魏德迈将军争辩说，他只能在时间许可的情况下尽量会见各方人士，他在各城市中的日程是当地美国领事安排的，这些美国领事与地方要人及其他人士都非常熟悉。魏德迈将军还声称，有些人士要求与他会见，但后来因为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便取消了他们的要求，所以引起关于恫吓的推测。蒋委员长坚持说：他的命令是使团应自由地接见他们希望接见的人。他显然认为，他所提到的那些人士不会象使团会见过的这些人那样批评政府。

蒋委员长再度企图让魏德迈将军将其所掌握的在外国拥有大量财产的中国人士的名单交与他。蒋委员长措辞强硬的指出，因为他希望强迫这些中国人士对国家的需要有所贡献，而且魏德迈将军也曾劝告过这样做，如他不愿在这方面加以协助，便是一种不友好之举。魏德迈将军坚持认为，因为这些名单是极端保密地给他的，所以他除了拒绝之外，别无他法。魏德迈将军在友好的气氛中告别蒋委员长。政府要员都到机场为魏德迈将军送行。吴鼎昌也代表蒋委员长到机场送行。8月25日晚，蒋委员长召见我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到他的官邸，详细询问魏德迈使团的背景。蒋委员长希望知道：我本人是否参与了这起使团的组织或派遣；而且在

有大使及其人员报告中国情况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派遣一个未被邀请的使团来华。

然而，在这一异常过程中，更有趣的是委员长显然注意美国是否有意逼他退休或是以别的手段让他离职。傅泾波如何处理此番谈话我尚不详，他只是告诉我他“小心谨慎”，“没有表态”。

蒋委员长所注意的美国希望他退出舞台的可能，也许是因为魏德迈将军用了“感人的领导”为中国所必需的提法，以及美国人可能感到他自己不能再担任这种领导而引起。我从可靠方面获悉，蒋委员长曾亲自指示对魏德迈将军最后向报界所发声明的评论应予限制。并且，据说还下发一道指示，规定了报界对魏德迈将军在国府委员会的演说应持的意见。因为，如不这样做，报纸对美国的评论势必过于苛求激烈。

在使团在华期间，虽然许多中国要人似乎明白，他们很少有希望因使团的到来而毫无阻碍地得到以军事或经济物资援助为形式的鼓励，但是魏德迈将军在国府委员会的谈话和他最后对记者的声明无疑是对中国政府的一个猛烈打击。

我曾借机向蒋委员长和张群以及其他重要中国人士指出，魏德迈将军在国府委员会和在此行中的其他谈话所说的一切，都包含着对中国的最诚挚的善意。许多中国人士对魏德迈似乎粗暴的言辞不满，但他们承认他的友善，而且多数有政治觉悟的无党派人士和自由人士对使团所做的一切声明无疑是基本肯定的。

文献 8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9—847

南京 1947年9月8日

阁下：我有幸重点报告我在访问北平期间形成的印象。

魏德迈将军离华时所发表的声明在其他地区引起同样普遍的反响，政府官员灰心失望，激进分子欢欣鼓舞。这样，原先魏德迈使华的消息曾引起的政府愉快的期望与自由人士及反政府集团的忧心忡忡，在魏德迈将军言论的严厉批评面前颠倒换位。这显然足以表明，国民党阵营中的知识界和无党派人士对政府普遍而又深刻的不满。

无论如何，学生的一般向背极为明朗，尤其是当学生被看成民意晴雨表的时候。据报，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反共势力肯定占90%，甚至可能95%。但是，反国民党势力的比例也占90%。政府支持者宣称北平大学反对现政府的人数比例要低得多。我估计这些数据一般表明了学生对其国家的普遍反应。很明显，结论看来是百姓——那怕是幼稚的激进人士——是本能地反共的，并且能够被轻易地疏导过来，支持真正革新的国民政府。但在学生中间，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统治的象征已光辉大减。坦率地说，在多数学生看来，蒋时代已告结束。

另一印象是，学生中流传着苏俄的鼓动宣传品。学生不加考虑地加以吸收并从中引经据典，例如关于对美国的错误之辞。如果我们从事一项积极援华方案，我衷心盼望能用一种深谋远虑的宣传措施加以配合。

据报，共产党统治区情形是这样：开明人士与其说没有实际不满或生活困苦，倒不如说因任何时候都会降临的不测风云而担惊受怕。至于其他百姓则具有相对的经济保障，并相当被动地接受着管理和控制。共产党政权所在之处，对幼童的哺育较为积极，他们教育儿童相信国民党和美国是罪恶之源。当然对这种情形多少可以矫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固定成形。一般都认为，有较好的地方政府，并完全保证一旦共产党回来不会有任何报复的危险，这会导致对国民政府的欢迎。经济贫困仍属普遍，但人人都能度日。

陈诚将军被任命为东北最高权威，而熊式辉则被罢免，北部中国对此极为满意。地方的新闻报道认为，官员的任命及其他革新业已开始产生良好影响。

李宗仁将军正博得舆论信任。关于他对国民政府无足轻重的谣传看来不足置信。湖北省主席孙连仲抱怨没有放手由他所指挥的军队来对付湖北共产党。南京市市长正孜孜不息地奔走，以便激起人们对未来选举的兴趣，并选派大学教授及其他人士分访南京各选区，宣讲选举。但登记选举的人数微乎其微，这使市长心灰意冷，搞不明白这种冷场有多少是因为害怕，有多少是因为漠不关心或愚昧无知。

文献 9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9—1247

南京 1947年9月12日

本大使在一位交往多年的中国人士那里得悉（这位中国人士坚信他了解到影响将来选举的两条规章）：（1）任何擅自竞选进入立法院的国民党党员将开除其党籍；（2）省主席、专员及地方行政长官应对党所提名的候选人负责。

8月13日我就向委员长提议，让陈立夫出国考察民主国家的政党形式。委员长说他也考虑过让他赴欧洲考察，但由于将来的选举需要陈，所以现在不能没有他。人们不禁要推测，国民党是否有计划地将被认可的党员塞进立法院。

另一方面，因为中国选民大多无知少识、漠不关心并且毫无选举经验，国民党的某种控制看来可望保证国民党政府延续，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文献10 司徒致魏德迈将军

121.893/9—1547

南京 1947年9月12日

亲爱的艾尔：您9月3日自东京发出的信函我已拜读，并立即作此答复。

如我当时就表明的那样，我完全赞同您对国府委员会的演说和公开声明。大使馆同僚及我本人一直试图尽量如实报告随后的反应。但就我看，当初我的口头评述更为真实准确。您言词谦恭，并且也意识到中国人的感情。就我所知，并无中国人士对您的善意或您所陈述的事实表示怀疑。我自己也很满意这种开门见山、一切挑明之举，并且这是由您来完成的。我后来也提醒委员长说，您所说的实际上在我与他的私下交谈中都讲过。但这需要出自您的权威之口，因为您担负着特殊使命，您的观点宽容而又新颖，而且您深为委员长及其他人士所尊敬。

至于这种公开批评是否恰当、明智或有益，众说不一。我的评价当时是现在也还是这样：鉴于政府局势极为严峻，只有这样才能棒喝领导人的惰性与自满，促使他们克服真正困难。我未能这样做，也不知道有无别的方式能这样做。对您此举的最好答复大概是自那以后所提倡的——尤其是那些出席国府委员会的代表所提倡的——实际改革运动。他们声称，他们的改革运动并非因为您的批评而是由于他们一直专心于改革，这或许部分正确。但他们从未象现在这样醒悟到他们正接受中国人民的考验，接受世界的考验，醒悟到必须图强。我也相信他们会这样——当然是在一定程度上，不会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迅速，那样全心全意。

关于中国官方的反应，可大致归纳如下：

(1) 公开揭露刺痛了一些耆老，这些人深受中国古代社会行为传统的熏陶，在他们中间不能对亲朋不如人意的事随便品头评足——这确如此，尽管他们也承认你满怀善意，理由充足。他们的这种反应乃势所难免，不必注意。

(2) 委员长本人主要担心实际影响。担心您的声明会使得共产党更加坚定顽强，进一步疏远无党派人士、自由人士和一般的反政府分子。我所收集的几份材料表明，当委员长要您发表声明后，他随即对可能的后果感到不安。并且自那以后，他及党内耆老和极端分子多少处在这种困境中。他的一点良好品质是他乐意听取其亲信分子的直言，但明显的缺陷是对公开批评极其敏感。无论如何，对您的讲话，主要是担心令人不快的影响。但有足够证据表明他所一直坚持的让您任其最高顾问的初衷并未改变。事实上，我怀疑是否您或我们其他人士的讲话真的能对中共产生多大影响。相反，您的声明很有价值，它消除了知识界的广泛忧虑，他们一度担心您会无视他们的感情而全面援蒋及其政府。

(3) 张群院长及其他人士所表示的又一不满足，他们认为我们忽视了政府业已完成的改革或正继续准备付诸实行的改革。而您并没有给予他们机会，以便他们更详尽地收集这方面情况供您了解。张群对此极为遗憾。当然，明显的回答是：您主要留心的是提醒他们对所要完成的任务的关注，而不是试图对迄今为止他们的全部政绩作出综合评估。

甚至在得悉您的电文之前，我就已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对您全面、友好而又富有建设性的意图加以解释。我仍将不失时机地继续这样作。

再次对您使华和您(以及使团的全体成员)的工作表示高兴，这是一次出色的使命。如果这会导导致积极援华——正象我衷心希望的那样——您将更易于推动之。

文献11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9--2047

南京 1947年9月20日

几周前，当国民党宣布将于9月9日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大会时，引起极大惊异，因为夏天刚开过三中全会。据宣布，会议目的是为了进行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国民党的合并。开会的前10天，人们对会议猜测很少。但当一些评论出现后，一般都推测有更重要的原因。谣言也随之而起，大多认为政府将厉行改革并将广泛清除所谓的不良分子。不管官方如何否认，多数消息普遍认为改革的谣言是魏德迈使团的一个余波，而且也是一种愿望，以此向美国表示，为了获得实质性援助，中国政府有遵守美国的条件的能力和打算。但对这种改革所将遵循的主要原则，谣言并没有特别清楚地予以透露。

至于青年团与党合并，这一步骤显然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希望把国内青年人拉入党内，利用这些人的年轻、力量和思想。第二是希望消除党团之间日渐增多的磨擦。国民党目前在全国行政上虽以政学系为主，但在地方和组织系统则大致由CC系所统治。青年团主要由CC系控制，并通过军队的优势来支撑其势力。青年团已与日俱增地喧嚷要求更多的机会参与国民党党务，但这种野心已被国民党拒绝。国民党不赞成青年团活动的独立性，CC系则赞同合并，希望继续控制，而蒋委员长希望消除隔阂。虽然合并形式上完毕，但据说至今仍不很成功。据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其他方面实际上很少有所作为，而发生的诸种政治操纵则瞒天过海，欺骗舆论。开始的几次会议用于听取政府主要官员的报告，这多是例行公事，而且除了蒋委员长和行政院长的演讲

外，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意思。

蒋委员长的讲话中最可注意的是，他斥责国民党没有解决中国问题，而他自己则推卸了全部责任。他宣称以后中国将永不依赖美国援助。他讲话的其余部分则是老生常谈，诸如消灭共党，国民党需要复兴等等。应附带一提的是，蒋委员长的讲话大部分是重复今春他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上的讲话。

行政院长的讲话中最可注意的是关于外交问题：一、中国正考虑派军舰到印度尼西亚保护华人利益；二、中国对日政策大致与苏联对日政策相符，反对美国对日政策，因此，中国应加强对苏关系，同时维护与美国传统的友好关系。

会议的另一特点是企图在党内进行改革并清除“不良”分子。为此，曾提出一项详细而概括的改革方案，各种迹象表明，方案将会被通过。最后一次会上，蒋委员长强行要求放弃这一方案，而代之以实行过去两年中未予实现的诺言。结果，会议的最后宣言空洞无物，老调重弹。

因此，对这次大会的特殊成就似乎毫不足道。它只是在常务委员会之前进行了职位的预先瓜分和政府的一些调动。鉴于合并青年团的计划规定党员要重新登记，所以可能出现改革和清党。但现阶段尚难预见改革和清党的形式及性质，不过可以推测，它符合于最有势力的集团的愿望与野心。这里应该注意到，CC系比以前更强，因为它控制了青年团，并且能够利用目前的国内国际局势。

中国人观念中对于魏德迈使团的结果捉摸不定的事实，无疑起了重要作用。政府一度推测——并且也这样宣传——说魏德迈使团会带来大量援助，或者至少是关于援助的具体诺言。这自然会大大加强政府中当权的政学系分子，他们将视这种成就为他们的功劳。由于这种希望至今仍未如愿，CC系便可以指责现政府以削弱其力量。当然不是说CC系基本上比政府稍微喜欢魏德迈

声明，而是因为它过去和现在都能利用它作为政治资本。CC系所以没有进一步作为，部分是由于对未来援助仍捉摸不定，部分也是由于蒋委员长不愿在这未定阶段采取过分的强硬态度。他一言既出，必是强硬坚定，而且势必包含着愤怒、失望和政治权术等等。

文献12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9—2047

南京 1947年9月20日

近数月来，中央政府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局势如前所料想的那样继续恶化。现在，由于对魏德迈使团可以带来大量财政军事援助的希望破灭，加上共产党又展开军事行动，两者交相影响，使得中国危机恐慌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国务院也许已注意到，中国正再次努力采取措施，以争取美国的军火援助。大使馆虽已声明，军火问题取决于华盛顿，但他们还是不断来询问此事进展如何。最近，政府高级官员还发出一系列不加掩饰的建议，显然是想使大使馆相信，如果美国援助不能很快获得，中国便需向苏联寻求援助。甚至有人向我宣称，苏联大使不久返任，可能被请求出来调停内战，而且他也会乐于接受这一请求。

虽然大使馆并未忽视中苏接近的微弱可能，而且正密切注意这一局势，但大使馆认为这些言论主要是为了影响美国，其次也反映了中国领导中的一种失望情绪。国务院也会明白，在目前情况下，在根据魏德迈将军的报告与建议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副主席和行政院长在报纸上向苏联献媚，与1942年1月孙科博士致《纽约时报》函件中所采取的策略差不多。全部局势中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中国担心美国将远东政策的重心逐渐由中国移向日本。

目前，政府最为关注的是刘伯承势如破竹地大举入侵安徽和

豫南，这一攻势始于8月12日前后，此后便声势日增。对刘伯承的最终目标有许多猜测，有的说要在汉口与芜湖之间某处渡江，南进福建或广东建立共产党根据地，或甚至与越南胡志明建立联系。看来刘伯承除骚扰更大地区以便进一步逼政府于困境迫使政府从重要地区调遣军队追击他以外，似乎尚无其他具体目标。

政府已从鲁西南撤出三个师去追击刘伯承部。同时，政府声称，被围困在山东黄河三角洲的叶剑英^①，也已向西南方向移动，并已在东阿附近渡过黄河，兵力大约4万人。

东北的军事局势仍然平静。陈诚到达东北及其所进行的军事改革，对整个军队和市民的士气有良好效果。然而，共产党在东北的第六次攻势发动在即，而且似乎只是等待道路更为干燥而已。这一季度中由于遇上往年所没有的大雨，使得道路泥泞的时间很长。陈诚的改革是否有足够时间消除熊式辉和杜聿明控制时所造成的腐败，这是令人怀疑的。即将来临的共产党攻势似乎将与华北共产党的军事行动相配合，以便将国军充足的换防部队或增援部队拖在关内。最近刘伯承在华中和叶剑英在山东的活动，也逐渐可以证实这一说法。共产党电台广播声称，“解放”长江以北的攻势业已开始。不过共产党似乎难以在可预见的将来顺利地达到这一目的。但是，这一军事行动无疑将进一步在全国尤其是在华北震撼中央政府的经济政治组织。

在目前的中国局势中，经济和其他方面最使人沮丧的特点，就是公然依赖意外而侥幸的美国援助，以便把中国从危急形势中解救出来。同时，随之而来的是缺乏应付这些形势的自信和自助精神。8月17日采用“官定”公开市场汇兑率，虽然表明了这方面的一个可喜开端，但过早采用计划不周的银币计划，视之为儿戏，希望中国的支付逆差将由美国以某种方式补偿，对于与日俱增的恶性

^① 此为原报告之误，这里应是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译者

通货膨胀仍旧熟视无睹，这些都明显反映了一种依赖外援的主导倾向。需要外援固然似乎理由确凿，例如，以外援解决部分支付逆差。但是，如果政府方面具有实施大胆果断的有关政策的迹象，那么政府地位必当更为强固。

判断“官定”公开市场汇率对中国支付平衡的影响，尚为时过早。因为问题主要在于政治压力是否会抵销外国顾问的影响，外国顾问正确地希望抑制美元黑市汇率。不过，制定这一措施仍是走向正确方向的一个步骤，只是稍嫌过迟。中央银行每月损失外汇3千万美元，2千万用于商业进口与出口所得之间的差额等等，另1千万用于政府进口及海外开支。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在第一个月的的工作中，其收入除应付商业进口支出外稍有富裕，但除非能维持此种趋向，否则中国现有的外汇资产2.6亿美元，包括4500万英两白银，尚不足维持9个月。

任命魏德迈使华以及魏德迈使团在中国的出现。这些消息重新恢复了对美国援助的希望，并对7、8两月的价格上涨起了暂时控制作用。但9月初，上海批发价已上涨到20%以上，虽然眼下夏收呈现出至少是相当不错的迹象，米价还是上涨了1/3以上。后来，批发价又上涨了85%，米价上涨了50%。

到8月底，通货比5月底膨胀了64%，比年初膨胀了270%。1947年的头5个月一直维持着这样高的通货膨胀率，从年初始，预算赤字与通货膨胀几乎同步上升。而预算收入还不足1至8月的16.5亿美元支出的40%的程度。并且，鉴于价格飞涨和目前的军事局势，在这方面恐怕还要导致进一步恶化。

政府处境继续恶化，行政上仍旧无能，这仍属基本趋势。现在，中央政府犹如病入膏肓的病人，衰弱不堪。

文献13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9—2947

南京 1947年9月29日

阁下：有幸向您报告最近诸种事态并试图阐述其意义。

关于改革：在日趋恶化的经济形势下，贪污更加盛行。对此处理究竟有何成效，至今尚无很多证明，但至少蒋委员长在设法解决这些问题。监察院的权力已大大增加，并奉命处理这类问题。人们常常听说某某被提审。例如，现邮政总局局长，他是蒋委员长一位挚朋老友的儿子，被控从事罪恶昭彰的投机。蒋委员长下令依法惩办，不必顾虑。这对每一个中国官员多少是一种严峻考验。

地方警察权力正在扩大，这是取消或至少限制宪兵和特务活动的计划的一部分。

关于亲苏倾向：据政府其他人士声称，孙科博士最近的声明尤为表明其个人之见。但又指出，鉴于其周围的党派集团（包括著名自由人士邵力子），这也不能轻估。这些人主张由俄国出面劝促中共实行停火，撤至东北，使东北成为半自治地区。这些人士提议通过一个贸易系统代替外汇，以大量减轻经济困难。这派势力一直为争取CC系对其观点的支持而苦心努力。但他们并未如愿，这也许主要地归因于蒋委员长的态度。敢向蒋委员长直言的为数不多的人士中的一位指出，这一方案会导致他成为实际的傀儡，他是不会轻易充当这一角色的。

关于何应钦将军所转来的魏德迈将军的信件，蒋夫人转告我，委员长收悉此信后极为恼火。信的大意是，魏德迈将军希望中国政府领导人能够理解他所作批评的道理，一旦误会，势必使他难

以争取对华利益。委员长将这一信函视为恫吓或某种形式的讹诈，认为如果问题并非极端严重，那么将中美人民用来攻击敌人的策略方式，应用到中美关系中，这未免滑稽可笑。就我对魏德迈将军的了解来看，我能理解他那不与人苟同的全部见解及其所包含的对华友好感情的善意，也理解其建设性成效。但受语言媒介的影响，加上电报译码和心理因素，很容易产生这种误会，这完全可能。

政府领导人几乎绝望地努力寻求解决堆积如山的问题的良方。要不是这种紧张气氛，这一插曲本会无关紧要——或者就不会发生。随着对美国援助的需要继续变得更加急迫，他们一直这样长久地期待，以至那些对我们持妥协和解之见并为我们辩解的人遭受嘲笑。这也就容易解释，他们中的一些优秀分子为什么总是怒言怨语，而其他的人则要么企图以俄国人吓唬我们，要么目光短浅而又一本正经地胡思乱想。他们不负责任的言论在美国引起令人不悦的反应，而这些反应又传到中国国内，这就进一步引起误解。而苦难的中国人民——他们将最终决定中国命运——则毫无帮助。

政府里不乏努力从公的进步人士。他们和我们一样对政府不满，渴望中国能够变成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但他们确有其难。只需一例就足以说明。为扩大政府基础而纳入政府的两个少数党人员，贪心于争权夺利，超过了许多国民党人士。而其行政效率则毫无提高。政府内的进步人士和政府外的支持者，若我们表示有意帮助他们，他们会得到极大鼓舞。而且，就我所见，他们会形成核心，我们很可以通过他们来实现我们之于中国的目标，并实现中国的稳定和平。但是，若无我们的这种援助，他们将无甚希望。而我们政策上的任何权威性表示，都将使他们消除疑虑。

文献14 司徒致国务卿

711.93/10—247

南京 1947年10月2日

我在9月28日晚拜访委员长，进行了非正式交谈。我提及有关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的许多谣言。委员长以强调的语气保证，表面上的利害冲突不会影响中美两国的长期友好关系，并表示他的政策明确而坚定。鉴于我得到的报告说国民党内向他施加压力，让他脱离美国而改走亲苏道路，我认为他的这些评论意义重大。

我问他关于中国对对日和约的态度，他毫不犹豫地作了回答。他解释说，鉴于中国人民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破坏，他们应当在和约中得到保障和赔偿。蒋委员长又说，他已指示外交部长与您讨论这个问题的一切方面，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文献15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0—2947

南京 1947年10月29日

阁下：有幸向您评述中国局势，也许多是报告我目前的印象，而不是由于这里的局势发生了什么实质性变化。评述的大部分是重复大家已熟悉的东西。

共产党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的战斗力和士气降低。毋宁说正相反，他们似乎获得了较好的武器供给，自信有继续战斗两三年的能力，估计到时会控制长江以北地区。他们正稳步地改良组织和训练，官兵同甘共苦，为理想而献身战斗，抛弃一切自私的

野心和个人享受。很少或者没有迹象表明莫斯科供给他们物质援助。当然，他们的目标和手段非常相近，意识形态也彼此共鸣，这是毫无问题的。而美苏裂痕日益扩大，后一点将会愈益明显。现在对美国的仇视超过了以往的反蒋叫嚣。报告表明，青年学生之类的党员在无保留地亲苏和同情共产国际方面超过他们的老一辈领导，这些老一辈人中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因外来侵略而产生的民族感情。青年人争辩说，既然美国能帮助国民党，为什么俄国不应当帮助他们。另一方面，考虑到对公众产生的不利影响，共产党的正式宣言则矢口否认任何此类的援助或联系。大量可靠的报告说到共产党人的行为惨酷无情，举动恐怖，尤其在新占地区是如此。毫无疑问，他们正推行破坏性战略，直到打垮现政府为止，其后他们才会同意采取暂时妥协或联合，使他们得以扩张其控制，从而达到将中国全部赤化的目的。我充分相信，他们的统治将采取固定的共产党模式的警察国家制度，限制思想或行动的自由，野蛮屠杀，以及对那些被视为前进道路上的挡路的人进行剥夺。

国民党 国民党内充斥腐化和反动势力已是尽人皆知，无须再说。然而，必须铭记的是，一党统治永远会导致腐败。在国民党当政的全部时期中，其内部分歧从来没有停止过。生活费用的日益增长使中国局势更是雪上加霜。前途渺茫中产生的失败主义情绪桎梏了一切创造性努力。即使这样，最高领导层中具有高度正直品质的人物大有所在，他们在逆境中英勇奋斗。政府内外也有许多类似的人物。

其他党派 各少数党相当令人失望。纳入政府的那些人士贡献微薄，忙于为自己的党员捞取一官半职。民盟的共产倾向仍令人怀疑，很少希望它能具有自由运动的核心作用。我目前主要担心的是，政府在对民盟的鲁莽迫害中，将进一步使自己声名狼藉。而民盟则获得主张开明宪政的人士的同情，这使民盟更加左倾，并从事地下活动。

另一愈益明显的因素是共产党人的渗透，不仅渗入民盟，而且渗入政府内部。北平破获的共产党机关就是一可怕的例证。在其他城市，由于发现文件证据而被捕的人士中，只有两人是政府官员。但由于使用新的活动计划并得到同伙与大众的配合，很难大量侦破这种人。其罪恶影响将会继续增长。

中国的最大希望在于受教育的青年。应当扩大这部分人，以便囊括那些一度是热诚爱国、后来对恶劣现实丧失信心而变得有些愤世嫉俗的学生，可望他们在较好的环境下复燃业已失去的热情。假如实施我们考虑的那种美国援助，这些青年人就会成为我们的“突击队”。如果我们能将美国的军事财政援助升华为在民主原则下引向和平、自由和经济复苏，包括使人民负责参与革新其政府的运动，这就可能赢得青年们的民心，使他们消释对美帝国主义的怀疑，成为一支巩固这一虚弱政权的可靠的反苏力量。学生阶层具有强烈的民族感，而现在则更为警觉。中国百姓天然是倾向民主而非倾向共产主义。彻底清楚地解释我们的目的，可以有助于唤起他们的精神觉悟。学生过去是，现在仍是革新政府和改善民生运动的富有活力的核心。1911年革命及最近的抗日战争都是如此。而且将来可能仍然如此。民主青年与共产青年的各自信念互相竞赛，而当代哪一方青年赢得胜利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命运。值此公开竞赛行将进行之际，如果我们真正相信民主生活方式，相信它同当今最强的对手的竞争能力，我们就无所畏惧。如果我们在这一过程中不能战胜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伎俩的话，其他方面也就不必说了。这一高层次挑战也将对亚洲其他各地发生深远影响。

我去年5月从美国返华。在南京暂停并向委员长致意时，他询问我对时局的看法。我回答说，情况比我从美国报纸上看到的更糟，但我相信，如果他能象起初参加国民党时那样，具有勇往直前和毫无私心的热情，全心全意领导崭新的革命运动，汇集当

代青年——就象他自己原来也是其中的一员那样——形势是会改观的。国民党号召团结，可以导致在革新、统一和建设性努力中所表现出的爱国忠诚。共产党号召团结，也同样可以唤起阻挠这一切努力的叛逆行动。目前形势对他来说可能更加不易。但我仍认为，在我们的帮助下，这个有点幻想式的解决办法最终是最切实际的。

文献16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1—1947

南京 1947年11月19日

从不同的消息来源得悉：中国高级官员对中国局势的严重程度以及对美国援助的迫切需要的认识日甚一日。我原先考虑，这是否是他们有意放出空气来影响我，并通过我来影响美国国务院。但我最终改变了这一想法。我不认为他们简单地试图对我们施加压力，他们真的惊慌泄气了。

例如，我已确凿得知，委员长在与我商谈关于最高军事顾问之事后不久，他即召集亲密的军队部属，向他们通告了他对我的请求。因此，其所引起的日渐增长的不满以及非难美国的趋势，是可以预料的。

同样，在另一天，新疆主席张治中邀请我会同外交部长王世杰博士、国民政府秘书长吴鼎昌将军、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将军、国府委员邵力子先生以及行政院秘书长甘乃光博士共进午餐。宴后的话题照例转到严峻的国内形势，并谈到了继续与共产党达成一定协议的可能性。鉴于选举有可能危害和谈的效果，他们建议应该延期选举。邵力子说，他已在国府委员会上提倡过这一行动，但被否决了。他说委员长坚持认为，举行选举是走向宪政的必要

步骤。

甘博士坦率地谈到严重的军事前途及其对选举的影响。在长江以北的所选代表很难参加全国性会议，那样将有受到共产党报复的危险。壮丁被征入伍，农业收成不佳；代表只能来自大城市，这也许影响选举的法定人数。共产党先头部队已深入到江南地区，并且将以恢复其原赣东根据地为目标。共产党在两广地区也极为活跃。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农村，那里有物质产品保障，而这在城市则非常短缺。中国军火主要来源于美、日以及中国自己的兵工厂。而日本的军火供应已极其匮乏。他们虽有美国造的枪炮，但没有弹药。而中国兵工厂的生产能力又有限。甘又说，政府将失去东北。石家庄业已陷落，平津也岌岌可危。

随后又谈到上海商贩因其利益与国计民生相冲突而导致的不爱国行为，而政府对这种不良局势显得无可奈何。整个交谈也恰恰充满了这种无可奈何的情绪。会谈结束时，大家都严肃地认识到迫在眉睫的危局。我很了解他们。我感到，他们在会谈中坦白真诚，而又带有一种被压抑的明显沮丧。

文献17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1—2447

南京 1947年11月29日

阁下：我谨再次对中国内战中的精神因素或人的因素加以评述。这些因素随着军事和财政局势的急剧恶化而日趋明朗。共产党组织者狂热地信仰其事业，并能够激励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和大部分的部队及当地人民，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事业是正义的，是有实际利益的，并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与此相反，政府人员更加灰心丧气，毫无斗志，并最后变得一蹶不振，或无所顾忌地营私自

肥。这就进一步疏远了必将成为政府主要依赖的自由分子。甚至高级官员也开始失望，这对军队士气的影响不堪设想。在此大难临头之际，他们抓住美援这根救命稻草，苟延残喘。而全部的问题是：只有国民党领导具备高瞻远瞩、责无旁贷和力挽狂澜的全新意识，并表达为振奋人心的口号，以激起人民新的热诚，引导他们，在壮阔而又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中毫无所惧，毫无野心和猜疑。这样，经济援助才富有意义。我以为，应该敦促他们以下两点：

(1) 自由观念。共产党统治下绝对不可能有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经济保障程度的满足规定了对政党专政的沉默接受，而人们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是错误和蓄意的灌输所引起的。假如国民党能够认识到揭露它的宣传价值，置一切似系颠覆活动的危险于不顾，走向另一极端，允许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那么这将比任何其他东西更能赢得知识分子的拥戴。共产党代理人在报界、学校、甚至政府机关中所进行的有害煽动，就能够让各单位的有建设性的分子自行解决。国民党如能在这一问题上敢作敢为，发动思想攻势，必会产生很大效果。不过，政府需要采取一种冒险性步骤，并停止其对特务及其他镇压机关的依赖。

(2) 民生问题。著名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在讲话中和报刊杂志上常常颇受推崇。共产党实施民生主义较有成效，而国民政府则相形见绌。确实，中国内忧外患不断。但即使如此，政府政绩直到今天仍是不光彩的。无论如何，如果一切无意使中国赤化的人们团结一致，支持政府改善地方行政，就有可能出现革命复兴运动，这将立刻荡涤政府官员的贪污无能，冲击共产党的暴虐破坏政策，而这两种劣迹都同样被视为叛国或不爱国的存在形式，都应象对外敌一样为所有的爱国仁人所抵制、消除。

美援的根本意图在于协助国民党区域内的人民获得双重利益，即民主政治所必需的自由与唯一足以抵制共产主义侵入的经

济福利。如果美援的供给是以政府竭诚决心为人民争取这两点利益为前提，那么这种援助将首先会产生全新的希望。没有这一希望，政府领导几乎不可能从消沉情绪中复苏。同时这还将使我们掌握着最强有力的杠杆。有了这一杠杆，我们就可以在每当有进步迹象时向他们提供所渴望的援助，或者可以在其反动分子或腐败势力有所抬头的时候，停止这种援助。

通过我对蒋委员长的观察，我逐渐产生这一印象：他的主要恐惧是俄国。这对解释他的行为很有帮助。反过来说，如果他感到美国各种形式的援助保证会阻止这一威胁的话，我相信他会愉快地接受我们所强加的任何条件。他已经原则上——我相信也是诚恳地——接受了上面所强调的两点。

文献18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2—247

南京 1947年12月2日

阁下：这份林同海(音译——译者)博士的信函是应我的要求写的，现呈送给您。这是自由分子对其所处困境的入木三分的描述。另一位中国朋友12月1日拜访了我，他刚从东北和华北返回。他向我报告了那里的局势，描述了人民的苦难以及他们的沮丧。这进一步说明局势的严重性。他告诉我，北部的一些无党派人士怀有某种成功的希望，正再次试图影响和谈的恢复。但我总对此半信半疑。共产党必定提出比目前更加强硬的要求，而国民党会将任何和谈的考虑视为实际上的妥协让步。在他们看来，任何其他命运都远比这更可取。

9月以来，CC系在政府中一直稳固地攫取权势，现在控制了政府大部分的经济金融机构。尽管蒋委员长9月初已向我表示，

他准备让陈立夫出国，但看来他显然在不断向他施加的强大压力下妥协了，这也与他早先的偏宠非常相符。张院长及政学系其他人士过多地卷入与CC系的交易，他们合纵连横，共同对付宋子文。实际上，他更多地怂恿同党控制政府的财政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陈氏兄弟不仅渗透了CC系，而且渗透了整个党的机构。他们委官任员，操纵特务，权力无比。他们狂热地相信，必须粉碎共党，坚信共产党分子乔装成国民党员或自由分子，在各处进行颠覆活动。这也有足够证据证明他们的担心——如果不是指他们的手段——的必要。渴望能为国效力的自由分子，又遭到阻挠或恐吓，并且即便完全组织起来，也是软弱无力的。沮丧情绪日益蔓延，大难当头又无法逃避，在这种形势下，反动分子对自由分子极为仇视。这也许部分地是因大祸临头而出现的一种鲁莽的蠢举——“上帝要毁灭他们，必先使他们失去理智”；部分地是由于一种错觉，以为我们惧怕苏联侵略，这样他们可以期望获得美国援助，他们可以利用对他们的有利之处，而不被自由分子的理想所扰，他们认为这种理想是一种空想。于是，这一巨大而又具有很大的潜在影响的自由阶层极易同样被极端反动分子或激进分子两面夹击。

鉴于您正考虑援华的可能性，所以我再次冒昧地评述援华计划中设置顾问的问题。应中国政府要求，我们指定布兰福先生的专职文官到顾问团帮助决策，他们将就此种具体援助向您提出建议。这将永远是上策，它能保证援助按原来所计划的那样加以使用。蒋委员长已重申他对这一代表团的要求，从这些要求出发，不再拖延。去年冬天麦科莱尔将军备忘录所建议的民用航空顾问团也同样适用。在这方面，是否考虑为继任的托马斯将军放宽指示，以便包括某些此类专职人员？我以为很值得安排三四名农业专家，辅导国民政府农业部，以更快履行一年前中美委员会报告书中所需的条文，这就需要在任何未来的贷款中包括一份不过量数额，它

对帮助心烦意乱的政府领导人从根本上战胜共产主义颇有价值。我希望在此问题上能提出更为具体的建议，但目前只是在原则上提出这一问题。

但愿我的见解能对您运筹决策有所帮助。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想象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您在日理万机中对此问题加以考虑，我由衷同情。

文献19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2—447

南京 1947年12月4日

委员长的私人秘书沈昌焕告诉我，委员长在11月29日赴机场途中，经过北平西门外时，发生一起刺杀委员长事件。显然只打了一枪，子弹穿过委员长专车座位顶部。据说孙连仲将军马上跳下车，抓获暗杀未遂者。

沈解释说，委员长已经命令军事法庭审理原94军军长牟庭芳，他被指控犯贪污罪。据说这激怒了他的部下，于是，一些人就计划伏击。

政府官方的消息则是，大约在委员长专车通过这一地点前8分钟，一名中国空军上尉开枪猎禽。上尉被捕，经调查后释放。

12月2日晚上，我与蒋委员长会谈。我觉得他比以往我所了解的更加情绪低落，但他未向我提及谋杀的事。

文献20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2—2447

南京 1947年12月22日

如果在阁下向国会委员会提交援华方案之际，我在中国发表一项声明，相信会产生有效影响。声明我已起草完毕，若国务院赞成所拟声明的全文，望能及早指示，以便准备中文翻译。

“对中华民国咨文：

马歇尔先生的国会声明使你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美国人民准备继续援助中国人民。因此，我愿借此机会向你们解释美国对华决策的意图，以及所涉问题。我生长在中国，一生的大部分精力也贡献给了中国。我和你们一样，对中华民族的安居乐业深表关注，而这正是我的出发点。

令人欣慰的是，美国政府和人民全心全意地期望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赢得中国的自由与独立，以及国内的和平和繁荣，并建立名副其实的现代化民主政府。除此以外，美国别无他求。我们毫无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也不追求文化渗透、商业剥削和政治操纵。中美两国的长期友好交往以及一直与我们亲密无间的中国人士的亲身感受，是对那种恶毒荒谬的指责的最好回答。

抗战胜利后，中国百姓倍受内战蹂躏，如何解民倒悬，一直是我们的议题。中国人民急需在一个关心民生的政府领导下实现和平，发展生产。

更突出的是如何造福于民并保护他们不受极端反动分子和利己分子侵犯，不受那些具有顽固思想和推行野蛮破坏的革命策略的极端激进分子的侵犯。而上述两者都组织严密，都将其党派或

私利凌驾于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之上。

美国人民完全崇尚民主。我们相信，只要有适当的时机和充分的时间，中国大地也必将开出民主之花。消极地讲，民主政府保证在人民日常事务中享有自由，不受强力侵犯，保证自由没有恐惧之忧。积极地讲，民主培育出一种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开明进步的领导人应运而生，并在其他方面致力于培养百姓在民主生活中的义务与权利的公民意识，同时在法律的而不是在个人反复无常的基础上，运用宪法程序，履行这些义务和权利。

中国的历史表明，老百姓所追随的是他们所信赖的德高望重的开明领袖。这是一种旧式的中国民主程序。将它改变为现代宪法程序会逐步消除各地区、省及地方政府中的腐败无能分子，而以那些民选产生、为民谋利的人士取而代之。

我与中国学生生长来久往，我相信他们的爱国主义理想。无论是在校学生或是毕业后在政府的教育、实业或其他各行各业中任职的人士，他们都是努力爱国从公的先锋。他们是克己奉公的典范，必能战胜极端分子。这些极端分子狂热地效忠党派，他们不能容忍其他政治信念。他们采取的手段也极为冷酷，以致为达到专横的目标，他们不惜损害个人财产和公共利益，使无辜的人民饱受劫掠和战火。

在马歇尔先生领导下，我们美国人士尽最大努力帮助中国创建联合政府。在这一政府中，共产党完全享有地位，并具有最充分的机会，和平地推行它的原则。我们的努力失败了。但我们仍愿看到一个代表全民的中国政府，目前看来不太可能。不过，鉴于美中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鉴于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的经济福利有助于全球利益，这就导致我们不可避免地继续支持国民政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这一政府在蒋介石委员长的领导下，过去曾作为我们的盟友，英勇地与日本侵略者搏斗。

无论如何，这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而不是美国人民。造就中国

稳定与经济恢复的任务，并不能由美国的物质援助和娴熟的技术顾问来完成，必须主要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依靠忠诚的决心，并坚定地抛却自私自利之心，为大众利益而奋斗不懈。

至关重要的是，要洞察问题的症结，因为在千头万绪之中，很多是混淆不清的。例如，到处滥用自由和民主，而在一个极权专制制度下，不能够有理性的自由。那些有独立见解的人们屈服于恐惧，或被灌输，或干脆被清除。民主——正如它本身的含义——是民享民治。在此真正民主意义上，无论如何，人民必须防止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因此，民主既强大又软弱。同样，民主要求辩论自由、出版自由，要求新闻客观报道的自由。在一个专制政体下，宣传一直作为一种不着边际的漫骂和无休无止重复的机器而存在，而目前所需的是反复推敲调查，避免在花言巧语和激奋的武断中以讹传讹。

目前中国面临的危险日益加剧，这需要全民尽力奉公和共同努力来克服。必须继续坚持让宪法权利充分告白于天下，拘捕、投狱必须依据法律程序，自由选举的宪法权利必须坚持。必须唤起公民意识，使之得以充分明确地表达。反对政府官员的弊政，反对其他分子的破坏性煽动或武装暴力。在所有中央政府充分控制的地区，应培植良好的地方政府，支持地方保安团以防止武装劫掠，这就需要组织得力、高瞻远瞩，需要高度胆量和坚强决心。有如此酷爱自由的中国爱国者的通力合作，美国人民准备通过国民政府向中国提供援助，期望政府会日益值得你们忠心拥戴，期望调动一切因素于建设性发展的进程，而这一进程将造就全民族的统一与和平。”

⑬

文献21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2—2247

南京 1947年12月22日

12月20日，张治中将军告诉我，委员长在那一天邀他共进午餐，席间唯一在场的是委员长之子蒋经国。张说，他规劝委员长不要进行这场旷日持久而又徒劳无益的战争，他将在这场战争中失利。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灾难正威胁着国家。他力劝蒋介石，唯一的出路就是恢复政协协议，这时，委员长争辩说，他不能主动建议重开谈判。张声明说，他有理由相信共产党是准备对此建议做出反应的。于是委员长当即要他谨慎促成此事。张还说，委员长静听他的劝谏，允许他继续努力，并没有对此加以辩驳。这在他的感受中还是第一次。

和我交谈时，张回忆了当初他们与您赴东北时与周恩来的一段谈话。他曾向周建议，让俄国进驻东北。但周立即强烈回答说，这决不可能，那样会使问题更趋棘手。

张将军还告诉我，在与委员长谈话前，他到南京的苏联大使馆，谋求他们帮助劝说中共恢复和谈。他正告苏联，中国不会被拉到苏联一边反对美国，而中国持久的困境与灾难也与苏联无益。他还向他们表示，他坚信美国在援华过程中并无不可告人的反苏野心。而苏联对此猜疑，有所误解。张说，看来苏联人有所反应，并问张意图何在。张要求他们敦促中共停战，另谋上策。

张委托我将上述情况转告您。同时他要我严守秘密，因为尚无眉目。但有希望在下月报告事态进展情况。

我们认为，这表明政府处境进一步恶化。共产党人将全面取胜，不能想象他们目前会接受和谈。当然，也许共产党人会同意

谈判，指望以此阻止美国广泛援华的方案，并遏制我们所实行的任何类似方案。张与苏联大使馆的接触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尤其难以相信，他有可能会在没有权限的情况下采取这一步骤。

③

四 局 势 恶 化

军事溃败，通货膨胀，政府舍本逐末，乱忙一气，这就是1948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国的惨状。军事形势的恶化，加上蒋介石依旧顽固不化地坚持战争（而不是改弦更张），滋长了人们对蒋介石的领导的反抗情绪。3月间举行的行宪“国大”，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但否决了他的副总统提名人，而将与共产党主和的倡导者推上副总统宝座，这是对蒋的政策之否定。擅长政治斗争的蒋试图努力维持其个人权威，但并未如愿。

司徒大使的电文表明，他本人是赞同——如果不是怂恿——蒋的反对派的阴谋计划的。司徒对蒋日益失望。蒋通常是听取司徒的劝告但并不付诸实施。而在蒋的反对派身上则可看到有效改革和结束战争的希望，这两者司徒认为都同样必要。他对中国人民倾向共产主义表示怀疑，但他深知，中国人民不会再支持腐败无能的国民政府。司徒认为，只有改革才能获得人民对政府的支持，但即便美国政府继续援助，没有和平为其先决条件，改革也

不会有效。因而，他赞同与共产党人恢复和谈，尽管和谈成功的把握不大。

司徒雷登1948年的电文报告了日趋恶化的中国形势及逐渐滋生的反美情绪。不仅如此，报告无疑等于触及到美国对20世纪忙于内战的诸国政府的政策这一根本问题：在内战中改组某一政府困难重重，而一旦某一失去其人民的拥戴的统治难以维持，美国就面临着道义上的困境。

文献1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3148

南京 1948年1月31日

领事馆的报告进一步证实，国民党在国民大会选举中取得完全胜利。除受国民党控制和支持者外，几乎没有无党派人士中选。据报告，唯一显著的例外是青岛。在那里，一位无党派人士压倒了CC系的候选人，随之而来的是指责他在战时与敌人合作，努力迫使他辞职。

尽管所有被选举的代表几乎都是国民党党员，但大多数并非直接受到中央党部的操纵。这些候选人势力强大，他们与南京指定的候选人或得到国民党支持的少数党候选人竞选。由于还没有公布全国范围的选举结果报告，因此缺乏仔细的分析，不可能确定已发生的情况的程度，但一般的状况现在是清楚的……。

根据基本可靠的情报，选举结果真实地反映了中央政府对选区的控制程度。哪里中央政府比较强大，国民党中央党部就可按

它的选择操纵选举，哪里比较虚弱，地方势力就为维护他们自己而蔑视国民党的命令。有证据表明这些势力并不能代表自由人民的意志，也不能代表与国民党右翼相对峙的自由主义分子。但他们的出现暴露了各阶层的不和。结果，为了加强党的纪律，确保CC系控制国民大会和使少数党满意，党的领导人一直试图加强对未经指定因素的规定，禁止未被党指定的党员竞选，但这遭到强烈反对。在两个月的谈判中，迄今未达成令人满意的妥协。

事实上在一些地区出现反对CC系的领导，可以被理解为表明CC系的控制正被削弱，……但更为可能的似乎是，这只是简单地使已经存在的局面公开化了。由CC系和其他右翼分子控制国民大会看来是确实的……。

文献 2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2—548

南京 1948年2月5日

我们认为，上海近来的骚动象征着与日俱增的不安，以及对
中国现政府的失望。当事情不妙时，中国人比起其他民族来，更
倾向于寻求一个替身。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注意到有一种与日
俱增的倾向，即委过于委员长，寻求改弦更张。

自1月29日至2月2日，5天内上海发生了3起较大的市民
骚动事件，结果是发生暴动或者群众骚乱，破坏财产，警察和群
众都有死伤。在2月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上海市长发表政府对
这些事件的解释。他说骚动是“共产党策动的”，并且“上海是长
江流域有组织的赤色群众叛乱总部的主要目标”。

我们觉得，说共产党参加市民骚动，大部分是理论上的问题，
共产党无疑热心于利用这种事件来达到其目的，但这种局势本质

上表明，由于政府行政上失当，它已失去民众的拥护。这种行政失当现已发展到危及政府稳定的程度。每次百姓骚动中，人们都倾向于认为是政府毫无道理，专横地侵害人民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政府没有提出适当的办法，以便有秩序地解决争执中的各种问题，致使人们除了放弃要求或以群众示威表达这些要求外，别无选择。政府以警察控制这一局面的行动是愚昧的，而且激怒了群众，以致于使这群人变成暴徒，由于或有或无的冤屈而从事暴力报复。而在真正暴力行动发生之前，警察是不能——警察也不愿意——限制暴民的。

这些地方性的具体情况正确地反映了政府在全国面临的困境，大部分是政府自作自受。迄今为止，政府最有效的办法便是滥用武力。在长江以北地区，反政府的主要分子是共产党组织的。在政府控制的其他地区，政府消灭异己与强迫人民拥护它的这种无济于事的企图，以及无法制订并实行改善自己地位的建设性政策，都使它迅速濒临危机的深渊。大规模的城市骚动日益普遍，可能就是促成危机的一个因素，而共产党显然准备利用这一点。

中国高级文武官员对于经济、政治和军事形势日趋恶化的悲观与绝望情绪与日俱增，这早已是很明显的了，最近似乎又出现一种更尖锐的看法，即政府不久便会失去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民众支持。在大多数人中，这种倾向甚至认为政府如无外国援助，便无能力从这种状况中拯救自己，更有甚者，许多人认为，即便有外国援助，政府的处境仍无希望。

在此情况下，有几类反应正在形成。蒋委员长及其效忠他的人赞成的策略是继续抵抗共产党，并镇压其他持异议或可能持异议的分子，同时希望能够得到任何援助来维持其统治，而且相信最终美苏战争将挽救他们的危难。

另一不确定的集团对这种局势的反应却是认为，要通过苏联

调停，与共产党和平解决，并希望他们在停战后建立的联合政府中保持优势和权力。最近来自未经证实但却是来源可靠的报告指出，这个集团正在军人中获得许多附和者，而且已经在探求与苏联谈判调停的办法。虽然这个集团或许由于缺乏坚强的领导，可能尚未取得反政府运动的地位，但有许多因素极利于它的发展。因为军人在这一集团中占优势，不能忽视武装部队哗变的可能性。

局势完全足以悲观。如果美国援助能以适当的数量和合乎胃口的方式来实现，便可能使局势迅速变得于我有利。反之，当美援的细节公布时，它们将对诸种因素小心地加以权衡；如果我们的计划被认为不足或令人不悦，或者似乎不够有效，那么现政府中某些分子的不满将随时发生，这不只是可能而已。这种不满的结果可能是以另一希望由苏联调停而与共产党联合的集团取代目前占统治地位分子。一如我们从前所报告的，蒋委员长固执不变地反对这一建议，如果那些赞成与共产党合作的人取得优势，那他的引退将是不可避免的。

文献 3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2—648

南京 1948年2月6日

我们绝不相信上海治安总崩溃迫在眉睫，虽然我们相信仍可能再度发生零散的市民骚乱。现在尚无迹象表明共产党的组织能够制造并控制上海的混乱。正如我们在2月5日已经报告的，我们仍然认为上海市民骚乱的基本原因是经济而不是政治，应以经济措施配合坚定的警察管制来对付。我们觉得，政府已深知，须以一切代价在长江下游地区维持现状，目前我们还未判明政府的地位在此地区受到严重威胁的程度。然而，事实是政府对上海的

控制有被政府内极端分子的政策危害之虞，他们的政策甚至是利用国民党的秘密警察来压服由于施政不善所引起的合法的不满，结果是使不满分子与有组织的反对派团结起来。在这种情形下，得利的是共产党。国民党温和分子倾向于以坚定但合情合理的方法来应付局势，但由于缺乏控制权而无法实现。例如，上海市长无权管辖警备司令部和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吴市长曾要求过这种管辖权力，我们非正式地通过蒋委员长支持他的要求，指出上海形势的恶化似乎需要坚定的措施和集中的权力。因为市长有能力，他忠于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对他也非常重视，所以我们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

上海现在的局势虽然令人忧虑，但大可不必惊慌。事实上，吴市长的妥善处理，以及一些领袖的充分谅解可能有镇定的效果。上海的外国侨民对这种并非举足轻重的政治态度一直表示忧虑，因为这种态势具有日益扩大的趋势，使人有不稳定和不安全感。

我们不愿低估上海局势发展的可能性，但我们感到，目前国民政府还能够控制局势。此外，有些因素，诸如期待中的美援，将无疑对于民众精神有很大的影响，至少可以稳定一段时间。

文献 4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2—648

南京 1948年2月6日

陈志明将军刚从上海回来，他是去调查最近的骚乱。他告诉我，上海的骚乱基本上是由学生风潮造成的。他说，同济大学事件是由于教育部没有充分准备就公布并随后又改变了学生自治会的规定引起的，这激怒了学生领袖。

他说，教育部长和大学的丁校长受的都是德国教育，倾向严

格管理。后者为逃避责任，把责任推给市长。学潮的领导人尽管不是那种粗暴地对待校长的人，但也不是学生。他们是共产党安插在大学里的代理人。一些人已经被捕，并将受到审判。

陈将军说，上海出现的禁止餐馆有歌舞表演的煽动，是因王云伍博士憎恶跳舞。他是一位无党派的国府委员，他女儿自杀与此有关。社会福利部和它的上海局据陈说是在C C系控制之下。反C C系人士坚决反对C C系的镇压方式。

陈将军不认为上海会进一步发生骚动。他承认共产党在积极活动，但坚持认为他们没有高度地组织起来，与在劳工阶级之中相比，他们更多地是渗透到学生团体中，他坚持认为吴市长和卫戍司令在一起配合得很好，他们和警察首脑都反对C C系的行动。因此我们怀疑，吴市长是否会被给予我们认为必要的最高指挥权……。

文献 5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2—748

南京 1948年2月7日

昨天晚上，我应外交部长^①的邀请，到他家拜访，发现他明显地为满洲的军事形势担忧。他说，一个月以前，罗申将军（苏联武官）开始与中国官员探讨由俄国人进行调解，但他的建议遭到委员长本人坚决反对。部长认为，目前共产党加紧进攻沈阳是罗申将军的建议遭到反对所致。他认为沈阳地区极端危急，并且急于要使巴尔将军（陆军准将戴维G·巴尔，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知道这种紧急情况，他还担心目前的训练计划太慢，以致无法发生

^① 指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译者

作用。昨天，苏联的主管人费多林柯根据莫斯科的指令拜访他，请求保护东北的苏联公民，并表示希望能避免再发生苏联侨民1946年在长春经受的苦难。王答复说，他们会受到与其他友好大国的侨民一样的待遇，如果苏联不做对中国不友好的事的话。费多林柯抗议说，苏联从未有扰于中国。作为答复，王提醒他注意1945年8月俄国军队进入满洲后的行为。

王将此行动解释为是一种证据，证明苏联政府预料国军将很快撤出沈阳。他提出两点请求：

1. 我尽快与巴尔将军协商，提出军事方面的建议和援华的所有问题，特别是涉及到满洲问题的紧急情况；

2. 我适当考虑专门前往华盛顿，使国务卿和其他人了解目前局势的危险性，以及自从国务卿离开中国^①、甚至他们二人在美国会谈以来所发生的变化。

我答复说，我只能等待巴尔将军完成他的预定的职责，使他注意此类问题。我准备在我的权力范围内，为帮助中国克服正在增加的困难尽力。我希望得到华盛顿指令后，开始华盛顿之行。我补充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所能给予的帮助只能如此。我一直试图使国务卿充分了解中国形势的发展，了解我对形势的看法。

部长请求我对他会见费多林柯一事绝对保密。

文献 6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2—948

南京 1948年2月9日

尽管从情报的角度来看，派一名领事馆官员到华北地区旅行

^① 1947年1月马歇尔离华返美，出任国务卿。——译者

确的好处……但是我们认为，那种行动会有害地影响中央政府的地位，此刻那样做并不明智。正如我们向国务院报告的，最近谣传增加，大意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或者直接、或者通过苏联调解重开和平谈判。面对这个普遍的谣传，我们不认为任何官方的美国代表可以在此时访问共产党地区。那种访问不消说会为众周知，直接与前述谣传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建议，此时不要采纳有关这一行动(包括从北平出发)的建议。

文献7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2—1148

南京 1948年2月11日

阁下：自从李宗仁宣布，按新宪法规定，他作副总统候选人后，我们便致力于查明这一行动背后的动机。我们在调查中写信给北平的总领事，要求他估计形势。李宗仁现任那里委员长行营的总指挥。(O·爱德蒙)克拉布先生于1948年2月6日给予答复……，对这一行动作了似乎是有理而且有趣的解释。我们现已收到他的答复……。

简而言之，克拉布先生指出，李宗仁认为有必要与共产党进行某种和解。而委员长势必不会同意与共产党和解，因此，委员长不免要让位于副总统承担他的责任。

正如我在电报中报告的，挫折和厌恶无疑使许多人不得不积极寻求与共产党达成某种和解。他们的行动的含义是单纯的。一股怨恨和要求改变中国现状的潮流正在兴起。国民党除了与共产党和解外毫无选择，但我们并不认为大多数人现在希望转向共产主义。也有理由相信，共产党此时有可能希望喘口气，巩固他们的成果。因此，此种局势适合安排一次暂时的和解。我们认为，重

要的是取决于我们援华计划的程度、时机和特点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如果该计划使自由主义者有希望代替共产党，他们有可能抓住这个机会，并会避免与共产党和解，在改良过程中继续改组政府，使这个政府从由相互歧异的力量组成的国民党中演化出来。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可以为与共产党和解寻求增加压力。

文献 8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2—2348

南京 1948年2月23日

以下是2月21日合众社南京消息的原文：

司徒雷登大使今天说，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的可能”是国民政府与共产党恢复谈判。

司徒强调这是他个人的看法，未必是国务院的官方意见。这是大使在与合众社独家会谈时所作的声明。在会谈中，他解释了两天前发表“致中国人民信”的动机。

司徒说，希望共产党与国民党有可能恢复谈判，是他决定发表那封信的动机之一，但又补充说那“不是主要动机”。

在解释他的主要动机时，司徒博士声明，“这封信是由于我深信，在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民主的唯一希望是公民认识到他们的权利和责任。中国有许多热心从公的人民，如果他们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并能明确有力地表达人民的愿望，他们就能帮助政府为国家做最大的贡献。”

大使说是“我主动发表了声明，但得到国务院的赞成”。司徒承认一个外国大使直接向他驻在国的人民呼吁是有些非同寻常。他评论说：“基于中国形势的严重性，我冒昧地寄希望于我一直与中国人民保持着的友好关系，向他们表明，如果政府和这个国家

中的所有集团，特别是有政治觉悟的反对党，自己组织起来寻求一项解决办法，而非继续军事冲突，问题有希望彻底解决。”

当问到“所有的集团”是否包括共产党时，司徒答复说：“我一向认为，最有可能的解决是政府与共产党恢复谈判，寻求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当询问关于他的“致中国人民信”是否应被解释为攻击中国现政府时，司徒说明：“对于我来说，完全没有必要说明，这与其说是反对政府，不如说我帮助他们完成其目标。我始终相信政府领导人一直在寻求这一目标。”

文献 9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2—2348

南京 1948年2月23日

2月23日，合众社记者罗伯特·克拉曼准确地引用了我对他的谈话，我对此表示认可。但我并不完全承认某些报纸的摘要中对有关那些引语的解释。尽管在中国正在进行某种秘密活动，设法使谈判在最近的将来成为事实，或者促成谈判成功，但建议政府与共产党恢复谈判，或提出我有任何希望或期待，肯定不是我的本意。我的目的是表达我所认为的美国人民的基本愿望，即以某种方式在这个国家恢复和平，现在正在发生的十分重要的社会革命可以用民主与和平的方法解决。

随着合众社公布我的谈话，似乎需要向南京的所有美国记者详细阐述我的声明，我那样做是希望能矫正给予我的错误解释。我对误解深感遗憾，相信这不会在目前正与国会讨论援华计划时，给国务院带来麻烦。

文献10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2—2348

南京 1948年2月23日

以下是官方中新社报道的原文，登在本地2月23日的报纸上：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博士在今晚与中新社独家会谈时，否认他曾经对合众社说“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的可能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恢复谈判”。

“我对他(合众社记者)说的是与我早先声明的相同的意见。我说国家目前面临如此严重的形势，对所有热爱他们国家的人，特别是爱国的有识之士，都有机会也有责任组织起来，研究国家的问题，并唤醒和指导人民，以使他们能认识民主政府。”

“在那样做的过程中，爱国知识分子可以纠正他们对现政府的不信任，并以此支持政府的和平努力。”

“关于罗伯特·克拉曼先生提出的具体意见，我知道，各种人一直在进行特殊的努力。我不了解细节。在我看来，使这个国家的人民团结起来并克服其困难的途径是存在的。我没有说解决什么或如何解决。美国的政策一如既往。美国扩大援华是希望带来暂时的宽慰，与此同时可能找到一些其他重要的解决办法。”

司徒博士透露，今天早些时候，他会见了在南京的美国记者，以澄清由于合众社的报道而造成的误解。他说合众社的记者“认为他正确地引用了我的话。但是他从我的声明中引出的结论肯定不是我的想法。”

司徒博士在答复一个问题时告诉中新社，他提出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人，是因为他们有能力领导民众。他提出，知识分子

和受过教育的人可以组织一个新的党，对政府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或者他们可以为提倡改革和进步的运动组织团体。

司徒博士说，他对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人——例如大学教授——对政府采取极左的态度感到吃惊。他指出，他们中的许多人正批评政府，但没做任何事来帮助改善政府。他们应积极地帮助解决国家的问题，在宪法之下发挥他们的作用。

美国大使说，在援华问题正引起美国人民注意之时，他们盼望“能有一个在政府支持下发动的进步运动。美国人正在等待这个运动。这样，援助就会取得最大的效果。”

在强烈要求政府帮助那种进步运动发展时，司徒博士说，国家需要一种精神。在国民党寻求并成功地推翻清王朝时，在它发动北伐战争和领导国家进行抗日战争时，那种精神支撑着国民党。民众也将会支持委员长（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他相信那种精神上的优势会加快运动的发展。

司徒博士说，在中国可以找到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办法。他说他相信，在军事方面抑制共产党的行动不是事情的全部，政府应改变使共产主义壮大的根源。他指出，在各地区，从省级政府到县里，民众、官员和军队之间应密切合作。他表示正因为有这种合作，河北省感到完全可以控制局势。他知道东北人民并不需要共产主义，而需要的正是这种合作。

司徒博士说，他相信问题有可能解决。他说，他一贯对政府抱有最高的希望，并支持政府。希望有理性的人民会支持它，帮助改善这个政府中的不利因素。

关于政府的领导人，司徒说他“对他们怀着极大的敬佩。他们中的许多人我已认识多年。他们比其他国家的官员要好。”

文献11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2—2448

南京 1948年2月24日

委员长的秘书长沈昌焕今天进一步证实，苏联武官罗申将军已提出苏联在中国调处。他说在罗申离华前不久，中国情报人员截获了苏联给南京苏联大使馆的电报，并成功地进行了破译。据沈说，这份电报命令改变对华政策，努力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作出某种安排。如果希望的话，苏联有可能调处。

因此，正当张治中与罗申分手时，罗申表示苏联愿意安排与共产党和平解决，中国人并不吃惊。沈非常强调地说明，张治中后来的有关活动并没有得到委员长同意。

沈认为，苏联采取这一行动是其更大的世界性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说，苏联现正在朝鲜建立傀儡政府。他认为，苏联希望在满洲造成同样的局面。这样再包括外蒙古，就在东北亚形成了缓冲带。沈坚持说，不论是委员长还是中国政府的其他重要官员，都不希望或不相信这时有可能与共产党和解……。

文献12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2—2448

南京 1948年2月24日

2月23日……我与合众社记者早先的谈话在中国激起轩然大波，我随后对中新社作了详尽的解释。结果合众社受到中国报纸和政府的文章的强有力地攻击。为了保护合众社的地位，我于2

月24日向克勒曼先生发出如下一封信，说我相信会结束争执。

“为了一劳永逸地澄清记录，澄清你对我2月21日与你谈话的见解，我希望说明，你所引用的我的话是正确的，我同意将其公布。但是我还必须声明，我不承认在某些方面给予我的评论的解释。照解释的样子，广播的摘要会把某些句子渲染得脱离了上下文的关系，或者超出了其含义。这会把这些解释塞进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理解。我无意给人这种印象，即我提倡中国政府现在应与中国共产党重开谈判。

你可以公布这封信。”

文献13 司徒致国务卿

701.6193/2—2648

南京 1948年2月26日

外交部长(王世杰)通知我，中国政府同意任命陆军将军罗申为苏联驻华大使。根据本地2月25日的新闻报道，2月22日达成任命的协议。显然有关这次任命的会谈至少自2月18日以来一直在进行。

国务院会记得，罗申将军离华去莫斯科之前，据报告他几次与中国军官在南京讨论国民党的内战困难，并表示希望和平。在他临行前进行的告别会谈中，据悉他向中国政府官员提出苏联有调处可能。在坐的有邵力子(国府委员)和张治中将军。但当时政府公开否认苏联存有这种态度。而政府官员在与美国大使馆官员的私下谈话中则承认实际上已提出了和解方针，并有证据表明，张治中至少是经委员长默许，向苏联人了解在停止中国内战方面，需要采取什么步骤。为获此结果，至少委员长没有制止张治中的行动。

尽管共产党迄今未遇多少困难，就获得了他们在满洲的所有军事目标，但完全可能的是，在占领沈阳之后，他们自己至少希望暂时停火。在此期间，他们可以巩固在满洲的地位，为在适当时候加紧南进做准备，同时拒绝对共产党在长城以南的作战负责。还有，在苏联扩张的这一阶段，我们可以确定苏联政府如何通过满洲建立傀儡政府，完成在东亚由它的卫星国组成的缓冲带。满洲在战略上位于朝鲜和外蒙古之间。因此，我们相信，罗申返回任大使，可能意味着苏联准备调处。

另一方面，中国人同意对罗申的任命，未必意味着中国政府打算立刻寻求苏联的调处。但是，我们觉得，这也许是可取的办法，如果中国政府确信它在满洲的军事地位已没有指望的话。满洲的总司令卫立煌表示，他在满洲保持立足点的能力完全视美国立刻大规模提供军用物资的意愿而定。政府在南京同样强调了它对美国军事援助的要求。当我们确信，对援助的这些呼吁是基于真实和迫切的需要时，我们感到，他们可能在此时提出考验我们在目前和未来的意图。如果请求美国给予的特殊类型的军援没有很快到来，据信政府可能利用罗申将军这个渠道，接受苏联调停内战。以前委员长毫不动摇地反对与苏联打交道，反对与共产党恢复谈判，没有理由认为他已改变了主意。但可能的是在这种形势下，委员长为压力所迫而采取这一方针，这种压力产生于结束内战的愿望。对战争的厌倦正在蔓延，支持要求和平的层次增加到高级文武官员，在高级军人的圈子里也普遍地期望和平。它不象以前那样存在于表面上。军人集团日益坚信，除非美国能向他们提供有效的军援以扭转局势，政府不会在内战中取胜。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仔细考虑那类援助。我们觉得，军人集团有可能竭力影响委员长，寻求与共产党和平解决。

我们希望重申我们的信念，决定整个形势的因素正如政府所理解的是军事。我们认为，委员长本人仍然相信，军事解决是可能

的。他坚定地认为，他会控制沈阳、长春和吉林。

正如我们理解的那样，目前政府可能正从苏联的新方针中取得好处，以迫使我们对军事方面的打算作清楚地许诺。同时，看来政府正有意给我们一个选择行动路线的迹象；如果我们不提供它直接需要的军事援助，它就开始执行这条路线。

根据对待尖锐批评的一贯做法，委员长在过去两个星期一直在牯岭沉思。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当他回到南京时，他将动手改变政治和军事体制。现在预料他返回的时间是2月27日。据了解这些改变将表明他打算遵循的行动路线。

文献14 司徒致国务卿

811.20200(D)/3—148

南京 1948年3月1日

阁下：我有幸提及……美国的报道政策。美国正遭受辱骂和不真实的指责，这些辱骂和不真实的指责犹如一股泛滥成灾、经久不止的洪流。大使馆完全同意国务院所说的迫切需要重新考虑我们的报道政策。美国正受到苏联和遍布世界的与之结盟的共产党组织的反对。正如大使馆以前指出的，这一反美运动在中国正取得显著成效，这种成效不完全是由于中国形势中固有的内部条件。中国政府未能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应付局势。这也部分是因为我们不能以确定的方式对待针对我们的指责。大使馆基本上同意国务院提出的原则和程序，但大使馆要提出一些意见供国务院考虑。

根据目前可得到的情报，大使馆很难提出任何行动路线。但为了使我们的努力富有成效，我们认为应该让一些某一领域的权威人士非常详细地研究中国的舆论，诸如哈罗德D·拉斯韦尔(法

学教授、《舆论季刊》的副主编)。与世界其他地方不同,在中国,舆论相对来说很少。在欧洲和美洲的其他共和国,舆论所遵循的方式和传播与我们自己的非常相似,我们可以为争取成功策划行动路线,以及对我们的期望获得的结果提出一些看法。此外,他们表达和传播消息的媒介也与我们类似。而在中国思考的方式和表达的方法完全不同。目前,我们得到有关任何战役的报道并非易事。甚至那些极为精通英语的中国人士也不讲英语。汉语与英语差别很大。例如,说“毫无反应”,他们的理解就与我们的理解不大一样。甚至一些在外留学和长期在国外居住的中国人士,由于已习惯了西方的表达方式和心理,也很难沟通他们与其同胞之间的表达理解方式。不夸张地说,处于东西方交融点的上海人比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更受中国大众敌视。另一方面,有很少一些外国人,有些甚至没有中国语言知识,因不为人知的理由,被全心全意地欢迎加入传统的中国人的圈子里。再举另外一例,我们所了解的每一种关于常见的中国习俗、教养和顾全面子,必然要求我们处世婉转,避免直接了当。还有,目前可能不存在提供给中国人的舆论的宣传方法。正如中共之于国民政府和美国的舆论那样,中国人的舆论是谩骂、侮辱,有时甚至是下流的。看来这种方式并非是不成功的。重要的是我们应知道其成功的原因。公布的和表面上在我们看来至少是按同一方式裁剪的材料,有时对中国人是可接受的,有时却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到目前为止,对各种反应没有明确的解释。

同样,我们往往发现,事实是国民政府的宣传很少被大部分公众舆论相信,而由中共散布的宣传通常毫不置疑地便被接受,对美国无休止地反复指责事实上被大部分人接受,甚至包括那些知情人士。

目前我们无法估价苏联宣传的力量与中共宣传的区别。但有理由认为,这些宣传都产生了效果。

以上的因素使我们得出结论，除非美国的宣传计划牢固地基于对中国舆论的准确认识，否则它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甚至反而损害美国的利益。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提出，执行任何计划都应深入细致地和充分地研究中国舆论。进行这种研究可由大使馆主办，或者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以美国在中国的教育基金会的一项专门计划为掩护进行此种研究。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一项有效的宣传确系紧迫，大使馆现在正为专门和有限的目标制定一两项详细的计划，并将在短期内送呈国务院考虑。

文献15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3—448

南京 1948年3月4日

阁下：我有幸评论这个国家最近的政治趋势，其军事、经济和心理的恶化正在加快。心理的恶化既是军事和财政恶化的原因，也是结果。这甚至在较高一级的政府官员中也变得越来越明显。中国人觉得他们的宿命论和消极接受态度亦无法帮助瓦解了的斗志。除了国民党中央的核心外，普遍缺乏团结。这正是我给中国人声明的主要之点。政府领导人在此声明中看到了对他们的最重要的批评。部分地由于几乎是病态的神经过敏，以及担心也许会进一步扰乱市场和士气，他们憎恨这种批评。

除了士气低落，军事失利也来自糟糕的指挥和装备短缺。在满洲，装备更是奇缺。您反复提及那些不称职的军官后，委员长解除了陈诚（蒋在东北行营的前司令）的职务。在这之前，陈身体不适，又正好赶上了去年夏季共产党发动的“第六次攻势。”当时，他正试图改革。卫立煌将军似乎是一位真正称职的人，但如我们所报

告的那样，他极需武器弹药。由于这一情况泄漏到军队中，已经低落的士气可能会彻底崩溃。

巴尔将军已提出最为必要的劝告，主要是关于沈阳的后勤供应。我越来越满意他履行其职责的全部方式——军事顾问团内部改善与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他仔细研究了问题所涉及的所有因素，特别是如何与委员长打交道。在我看来，艾森豪威尔将军（美军总参谋长）和您选择他，正被证明是极为合适的。我已试图给委员长以深刻的印象，所有那些劝告都是不拘礼节和大胆的，并将继续进行类似劝告。但即便如此谨慎，我仍担心泄漏消息。巴尔将军本人正警惕这一点。

中国公众，包括政府官员，觉得满洲似乎已经丢掉，华北将很快步其后尘，最终将包括整个长江以北地区。这种宿命的心情造成的影响不仅从军队的沮丧态度和通货膨胀中可以看到，而且从人们试图将家属和资金带到诸如香港和台湾等安全地区的行动中得到反映。古怪的谣言接连不断，许多谣言无疑是由投机家们开始传播的。另一方面，普遍的危险是政府内不良分子和有权势的政府领导人的态度，这些人孤注一掷，决心与共产党作战到底。但也有一些人绝望中求助于苏联——倒不如说是对中共——认为停息目前的灾难才是上策。但是，只要蒋委员长在位，他们的影响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仍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俄国正变得对中国事务感兴趣，表示要在其内部冲突中予以调解。

目前的紧张局势突出表明了中国人对公开批评的传统式的恐惧，以及令人失望的思想。这种思想，一句话，是要“面子”。这种“虚伪”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天性，并可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在目前的灾祸中，政府官员发表显然是不现实的声明；为什么他们惧怕和憎恨任何相反的新事物。要他们打破政府自我安慰的习惯是非常困难的。这还可以部分地解释政府的束缚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方针。我在讲演和私人会谈中，特别是在最近给中国人民的信

中，成功地突破外交礼节的约束，促成政府和大批忠诚的、有公益精神的公民之间较好的理解和合作。我比过去更相信政府最上层的人真的想实行必要的改革，并且大多数有识之士不想使中国公有化，尽管他们对政府不满和消极苟安。因此，在这方面，形势仍有希望。我一直焦急地等待着，不论是在政府的圈子里，还是在知识分子中，能再次兴起一个带着几分激昂热情的爱国主义运动。这种热情我在1911年曾亲眼目睹，在抗日战争中再次出现。中国共产党无法长期顶住那种统一和决定性的觉醒。然后我们就能给予许多更容易和更有效的援助，也许这种激励最终会初具形式，但目前士气迅速低落会增加困难，以致抵销掉那种激励。至于经济方面的问题，它已严重到这种程度，即使再崇高的精神也无法改变严峻的现实。

因此，可以指望逐步从满洲撤退到长江以南，或很可能分成地区的和松散的联盟，而不至于迁都广州。中央政府可以鼓励最有力量的人分散和坚持下去，每个人在他的地区依靠实质上独立的当局，这会有利于更直接地控制地方政府，重整队伍，保卫他们的家园，免遭匪徒或共产党的攻击。这些联盟可以保持处理外交事务的共同组织；等等。宋子文在广州正搞了一个杰出的开端，并扩展到湖南。这两个省与广西，最终多半还有福建和江西，也许组成一个单独的集团。

傅作义将军是一个有能力可以完成此事的另一例证。由于他的职业能力加上道义上的目标，由于他真正关心人民和他的战士，使北方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秩序和希望。他正与新任命的河北行政官员很好地合作，他主要担心他的一些部队被调去保卫满洲。

最后，我想强调全局战略的重要性。政府目前似乎没有那样的战略计划，政府通常是防守，充其量收复共产党已经放弃的城市。我仍然强烈地认为，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技术顾问和后勤供应的援助。可以概括地说，如果轮换训练军队并增加部队供应，以

恢复他们失去的士气，那么就有希望使目前不利的局势有一个明显的好转。训练应包括激励和灌输。美国顾问对全体人员应是直率和耐心的。至于我们对民政改革和公开性方面的劝告和督促，在他们目前失望的精神状态下，不应操之过急。当然，以上方案只是在我们现政策的范围内提供了一些原则。但其结果将极为重要，所以很值得我们迅速实施。无论国务卿有何指教，大使馆全体人员都将继续为您效力。

文献16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3—848

南京 1948年3月8日

关于报告苏联在内战中提供调解……；地方性的中国报纸报告说，行政院政治委员会(政务会)3月2日会议根本否认了“一直在流传的和谈消息”，因此，行政院命令各省市政府否认和谈的谣言。但无论如何我们有证据得出这一结论，罗申将军在他刚刚于1月回苏联之前，曾提出这个议题，尽管是非正式的。我们同意莫斯科的提法，他们认为，这种调解是与苏联的基本目标相一致的。

如果我们对中国目前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倾向于认为，从中国政府的立场看，苏联的调解在很久以前就是必要的，甚至是值得向往的；从美国的立场看，任何苏联介入中国形势的打算都是有目的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可以预见，苏联调解可能造成的形势也许对我们有利。

日益增加的迹象表明，尽管现政府的领导人宣布打算继续进行内战，但由文武官员及广大舆论，特别是知识分子组成的强大反对力量，也许会变得强大到可以强迫现领导人放弃这一政策，赞成和平谈判，或使其面临被抛弃的威胁。现在尚不能准确地确

定这种反对力量的规模和力量，但不可否认它的存在及其发展。已成为政府过去几年中行动特征的分裂和腐败仍在继续，近几个星期更为严重。这日益表明，政府再延长军事行动，势将无力阻止经济的恶化，危害整个政治统治。

政府现在仅对满洲1%的地区、黄河以北不超过10%到15%的地区等维持着脆弱的统治。在黄河和长江之间，有强大的共产党军队。政府实际上很难承受和消除每一个威胁。士气低落，人们日益认为政府命中注定要崩溃，并明显地倾向地方主义。每一个地区领导人都在考虑，一旦他们不能求助于南京时，如何自保，抵抗共产党。

由于这种形势令人惊恐，这更需要鼓舞人心的领导，而这并非唾手可得。控制政府的那些人在寻求解决办法方面似乎是手足无措，在发挥必要的首创性方面也是无能为力。这就越来越需要委员长果断抉择。但他仍然摆脱不了过去那一套的影响，不能采取必要的严厉手段。我们认为，也许可以指望他继续顽强地战斗，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他可以撤到广州。宋子文在那里安排建设了一个大本营，并让地方主义再次流行。

但是，政府的反对派有可能反对这一行动。反对派完全意识到苏联调解的风险，但看来倾向于与其进行战争，不如求得调解。他们担心唯一的结果会是共产党一党统治中国。

那种谈判解决有可能使目前居统治地位的领导人——包括委员长——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然而我们不能拒绝考虑这种可能性。目前这种腐败无能和消耗战略只能暂时保住重要的战略地点，但不能长期维持。迄今为止，政府军事和经济资源的较大部分都投入到满洲和华北。尽管投入的规模巨大，它没有推动——也没有迹象表明正推动——政府明察利益从速抉择。如果没有美国所能提供的大量经济援助，如果没有美国积极的军事援助，如果缺乏有能力的领导和计划，势必在国民党各阶层中引起反叛，并在绝

望中接受苏联提供的调解，以指望那种妥协会带来喘息时间，重整旗鼓、站稳脚跟、再现生机、重建胜利意志。反对派中的那些人完全知道与共产党联合的危险。因此，最有可能的调停将置于纯粹地方性的基础上，那实际上是暂时停战，尽管多半会延长。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感到完全有可能的是，非共产党分子通过那种进程，从现领导僵死的传统中解脱出来，他们也许以政治经济和精神资源的显著发展来赢得美国援助，最终在华中和华南形成稳定的非共产党政府。

以上的看法从中国人的角度看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他们希望调解只是作为代替共产党控制全中国的一种选择。还可以争辩的是，从美国的立场出发，这会减少可能发生的灾难，一个完全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毫无疑问会敌视美国。某些解决方式，包括将满洲和华北部分地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抛弃给共产党，能够留给我们一个友好的华中和华南。我们可以有效地参与这些地区的发展，加强那里有朝一日可成为收复中国其他地区的基地。没有那个基地，我们就无以阻止共产党的洪水席卷整个亚洲大陆。

如果调解失败，局势的发展会转向我们预期的地方主义。这将会使共产党最终更易于控制全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调解解决对美国的利益也许不必定是有害的。

不论发生哪种情况，在我们看来，无论美国喜欢与否，调解问题实际上取决于我们美国。目前局势尚可挽回，如果我们增加对国民政府的有效援助，使中国政府在美苏之间维持平衡，那么，尽管现领导瓦解，也可以避免苏联调解。但是，如果我们不那样做，如果进行调处，那么我们就应该利用调处，使之符合美国利益，这是明智之举。

文献17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3—1248

南京 1948年3月12日

中国社会和经济研究社3月1日在北平成立。该社由自由主义分子组成，他们普遍反对政府的现行政策……从通常是可靠的消息来源得到的情报表明，胡适(国立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前驻美大使)虽然不是官方成员，却是该组织背后的推动因素。消息来源进一步说明，他可在南京推举500人，这些人同情该社提出的改革计划。胡适特别提及政府宣传部长董显光、国防部副部长陈治明、警察总队司令官唐宗、上海吴淞警备司令孙德伍。

我们认为，这个组织很有可能演化成政党，并在现政府内部的任何改革中发挥影响。我们还认为，这个组织充分表明了对李宗仁将军任副总统候选人的有组织的支持……。

文献18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3—1748

南京 1948年3月17日

共产党继续掌握着主动权。我们认为，政府军队上个星期的失败表明了政府军事地位的可悲和危机。在华北，军事普遍崩溃的可能性正日益增长；在满洲，吉林和四平街的陷落使中共抽出军队用于攻击沈阳；在山东，济南很可能丢掉；在河南，洛阳可能陷落；政府军队防卫西安的能力也大大不足；山西为饥荒所迫；在河北，共产党军队威胁切断张家口北面的平绥铁路，孤立了沿

线西段的政府守卫部队。政府军队完全处于防守地位，在被攻击的地区也缺少作战物资的供应。在大部分地区，物资短缺进一步削弱了政府继续防守的能力。军队的损耗迅速增长，政府没有时间训练和补充在战斗中损失的部队，新的军队完全未经训练便送到战区司令那里。某些战区司令个别制订了计划，在短期内稳定他们控制地区的形势，但他们缺少物资来执行这些计划。还有，现政府的领导人显然没有组织和使用有限物资的通盘计划。

在过去一个星期里，南京和战区的文武官无不沮丧不振，一派悲观。过去，他们一直被有效的美国军援将会到来的希望维持着。现在他们日益认为，军援的性质可能受到以改革为条件的束缚，以致无法解决眼前的迫切需要，经过最后分析，他们越来越认为，内战失败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以前已经报告，军事平衡正迅速向共产党方面转变，政府任何一次大规模的失败都可能导致普遍的军事崩溃。但我们并不认为，迄今政府的军事形势已经完全无望。政府仍有人力和物力资源，只是这些资源还没有被成功地组织和用于战争的努力之中。现政府领导人显然缺乏此种能力。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在组织这些资源方面的援助，加上我们对供应物资的帮助，仍可以使政府维持下去。我们还认为，仅从提供物资的观点看，援助至多能稍微拖延政府的军事崩溃。我们还认为，政府军事地位的恶化正在加快，援助能生效的时间正在逝去。如果满洲陷落，就没有希望保住华北，那里共产党军队比比皆是。

文献19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3—1748

南京 1948年3月17日

政治与军事的崩溃正接近早已预料的高潮。最显著的证据是军队士气涣散，不仅表现为无精打采和消极冷漠，而且拒绝服从命令，甚至采取违反命令的行动。中国人称后者从民族利益来讲是自取灭亡的做法。不论上下的文武官员都在贪污或打算脱逃。在最高行政长官中，蒋委员长只听信诸如戴季陶、陈氏兄弟和宋子文的话，但陈果夫现已失宠，他弟弟也不如以前得宠了。委员长和戴季陶的关系不和睦，宋子文正专心于他在华南的工作。在一向最忠于蒋委员长的那些人中，已有对他的政策不满的明显迹象，而且也看不出他本人有进行必需的改革的任何意图。绝望中，他们怪罪于美国，认为我们一方面要他们改弦更张，加速改革，一方面又依然迟迟不给予许诺已久并为民主制度所赖以生存的援助。同时，他们建议派人到华盛顿去请求迅速给予充分的援助。最近，他们曾向我提及由宋子文和俞大维等人负责此项任务。

原定3月29日举行的国民大会现有延期之势。戴季陶赞成延期开会，理由是他们正在努力解决选举代表的纠纷，他们采用集权主义的方法，与共产党采取的办法如出一辙。其他赞成延期的人认为，目前时机不合适，或因为副总统的适当人选尚未出现。现在，议论中的副总统候选人有于右任、孙科、何应钦、程潜、傅作义和李宗仁。蒋委员长周围的亲信反对李宗仁，这既是因派系之争，也是因李宗仁是强悍人物，他不愿让蒋委员长独揽全权。有些人主张副总统应该是文人。目前看来委员长会暗助于右任。自由

主义分子正从事各种无济于事的尝试，以便组织起来或发出呼吁，但受管制的新闻和高压政策会打消他们的努力。不过，在国民党领袖中，有一个核心组织正策划类似的行动，或许有希望获得结果。我已被请求为他们谋取蒋委员长的支持，但我回答说，我曾一再建议委员长领导这一运动，却无效果；我仍然认为他赞同此举并非完全不可能，因此，在他们的运动规模扩大后，我也许有更大的力量支持这种普遍的意见。我还说，我认为自由分子使他们起草的宣言在国民党报上自由发表，是头等重要的事。

早已预料的高潮已迅速到来，我们虽不能看到蒋委员长自动放弃他的权力，但任何事几乎都有可能发生。人心沮丧、恐惧，疯狂地想从毁灭中拯救些什么，这些情绪正加速发展，同时心理上又不知所措。

文献20 司徒致国务卿

893.01/3—1848

南京 1948年3月18日

从通常是有资格和可靠的提供消息的中国人那里能够得到如下情报。他们3月17日通知我们，CC系已经失去对委员长的影响力，委员长现在转向政学系；委员长认为，“李宗仁将军是最有资格的副总统候选人；政学系现在对委员长在危机时期缺乏领导能力不满，希望委员长担任行政院院长，与孙科一起控制住行政院。如果委员长既不接受这种安排，又不能在未来的危急关头进行有效领导，政学系打算用政变来取代他。胡适下星期到南京，他将再次被提名任驻华盛顿大使，估计他会接受。

我们认为这一消息可能是真实的。其他消息提供者也报告了政变的谣传，有证据表明CC系与委员长的关系破裂。但首先报告

的是委员长将支持李宗仁任副总统。如果真是如此，就有可能证明委员长正试图调整与政学系的关系，并与他们达成妥协，以免被从政治舞台上完全抹掉。委员长确切地了解政府圈子里对他的不满情绪正在增加，他有可能巧妙利用政治花招，以保证他维持大部分权力，至少可达到继续阻止他不赞成的政策。然而，我们认为政变是一种可能性，但是靠不住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期望政府的某些改组在最近的将来成为可能，那种改组将导致比目前更有效的领导和更积极的政策。

文献21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3—2248

南京 1948年3月22日

阁下：我有幸报告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情况。

你最感兴趣的多半是深刻揭示我所了解的委员长的想法。他对军事形势的迅速恶化和随之而来的问题不存幻想。事实上他对形势作了如下概括：“和平无法得到，战争无法取胜，我们能作什么？”他表示对您的美国援华的态度困惑不解，但他说，从他与您在中国的交往，以及他对您的性格和目标的全部观察，使他相信，您的计划是友好的和建设性的。我自然向他保证，这完全正确，并再次解释了我对您离华后所持的一贯立场的理解。他承认他没有接受您的劝告，但事实证明不对共产党妥协和合作是正确的。

他说他确实试图改革，但不知如何下手。他请求我毫不犹豫地帮助他。我已经了解由他周围的一些中国人起草的此类建议，其中一些是我本人在各种场合提出的。……完全可以理解，他们在送交委员长时，把建议缩小了。一旦委员长接受这些建议，我将继续以建议所表达的思想来进一步劝告他。只要援华计划得到

国会赞成，我将以此条款为基础，或多或少提出专门的建议。我仍然强烈地认为，他们首先需要我们的劝告，然后在他们自己贯彻这些劝告时，提供足够的物质援助。巴尔将军在军事方面正在发现并完成的工作证明了这个看法，同样的证据将始终证明相同的真理。

委员长提出中美反共条约问题，我不予以鼓励。在任何情况下，都可据此看透他们目前的心理状态。

关于即将到来的国民大会，他认为不管多么困难，大会都将如期召开。他被选为总统是预先作出的决定，但他并不完全相信这对国家是最好的选择。另外一些人，特别是政学系，一直在讨论由他任总理。他的声望在全国从未如此之低，现在在政府和党内也是这样，但是，没有人能提出任何一个在力量上能与他匹敌的人选。巴尔将军希望他减少在军事事务中的指导，给他时间去广泛公布国家和政府的政策，将作战的细节留给一个能胜任的总参谋长。委员长似乎在副总统人选上举棋不定，正在看其他候选人的反对理由。

这些和其他细节关系到政治、经济和军事趋势，我们大使馆的人正如实地作出报告。但是，只要美援的前景较为有望，我愿再次表示相信，只要明智地计划和执行，就能有助于完成我们期望的一切。对我们国家的友好感情和他们对我们意图的信任是普遍和深刻的。反美情绪偶有起伏，是由于一时的原因，并很容易消失。即使在共产党人中这也仅系一种蓄意煽动的武器。中国各阶层的绝大部分人不想让他们的国家共产化。我得到的印象是，共产党军队在其现在控制的地区使用残忍的手段，加强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某种敌意。同时政府领导人终于开始认识到，他们与共产党竞争的方法是无效的。他们在军事行动和争取民众支持中都在迅速失败。他们不能赢得人民，就无法赢得战争。因此，他们自卑和恐惧，并更加准备响应切实可行的劝告。美援或许足以作为

一种催化剂，它将恢复领导人的希望和自信，进而改善民众的士气。现在人们就普遍存在进行进步改革的意愿，其主要价值多半是表明对他们来说是必要的新的觉醒。知识分子和无党派自由主义者中间的运动迄今既没有明确表达，也不代表公众舆论的任何密切结合或实际分量，但其中预示的东西可指望进一步受到鼓励。委员长人格具有这些振奋人心的能力。我记得您一再对我评论说，他做正确的事总是太迟。现在也许太迟，但多半不完全是这样。无论如何，因为上面提到的理由，我仍感到一定程度的乐观，并热切盼望关于国会的行动的报告。在中国即将发生的事，作为全球性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抵抗共产主义的范围。我们正帮助这一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民族，消除一切古代政治模式和社会模式，消除严重妨碍宪政实施的内乱、外乱，使中国适应现代趋势。他们有伟大的传统，决不是堕落的民族。他们中许多人具有最优秀的人品，具有巨大的潜力。与物质援助相比，他们更需要同情和理解，以及坚定但却是善意的指导。只要政府加倍努力改善现状，只要知识分子最终与政府密切相处，关心国事，并且由我们来管理美国顾问团的人员使用资金和装备，我相信，他们可以改变目前的趋势。一旦如此，恢复必定卓有成效。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但是，有迹象表明，美援也许在中国前景无望之际出现，我感到有了令人振奋的希望。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将尽力协助计划成功，不论您的指示何时到达。

文献22 司徒致国务卿

868.00/3—2848

南京 1948年3月28日

陈立夫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为解决国民大会选举争执的最后努力失败了，委员长本人也被迫介入。在过去的三天里，他分别接见了申请提名的候选人代表以及未能被提名的国民党候选人，新闻报道表明，他成功地说服了成员可观的两个组织收回他们的要求。

在做了准备的基础上，委员长今天宣布了如下解决争执的准则：(1) 在仅仅涉及到国民党成员的争执中，得到最大多数成员选举的候选人将被认为是候选人；(2) 在国民党成员与友好的党派成员之间的争执，国民党将向少数党候选人让步……。

妥协的方案象征着党的领导人失败，特别是CC系，在争论中不懈努力，在各种情况下加强它的候选人数。因此，妥协方案是少数党的胜利。他们也知道他们在国民大会中仅是国民党的唯一的“民主花瓶”，因此，他们利用这一点顽固地拒绝低于国民党允诺给他们的定额的任何条件。国民大会现在召开，是以几百个国民党成员被迫放弃他们的席位为代价而换来的。

文献23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3—2948

南京 1948年3月29日

国民大会的开幕典礼于3月29日上午11时举行。委员长主持

会议，并作简短演讲，大意是会议的召开象征着长期和艰苦的革命斗争的最高潮。他说，政治权力现在转交给人民，维护和加快民主进程，关心大会对总统和副总统的选择，是所有公民的义务。1600名出席代表作了就职宣誓。

文献24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3—3148

南京 1948年3月31日

3月8日的报告所描述的沮丧和局势恶化仍在继续加速。政府和其他人士中无所依靠的情绪进一步增高，并热切寻求制止内战及随之产生的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办法。大家越来越感到在军事上战胜共产党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要避免共产党控制全中国，便须另找解决办法，甚至委员长也了解到老的办法不行，需要新的方法。我们认为，现在他们正诚恳地寻求有效的新方法，但还没人找到这种药方。似乎对于采取走向和平的积极行动，每个人都希望由他人发起。那些处于能影响委员长采取积极和有效措施的地位的人怕冒犯委员长，因而不愿提出他们的改革主张。他周围需要更勇敢的顾问，也许改组后的政府能应他之需。最近，知识分子阶层主张改革的宣言如指示风向的草木，草偃知风向，这是前途发展的预兆。以往他们不敢单独努力，现在开始组织起来。

中国人民不愿成为共产主义者，但他们看到共产主义的洪流正不可阻挡地前进。在此混乱和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委员长是唯一有所作为的精神力量。我们知道他计划改组政府，但我们怀疑仅调换位置不会产生有效的行动。如果有新生力量的话，也很少。现在需要能感召百姓的领袖，而这似乎是委员长做不到的。不过，他的绝望的局面可能会一如既往，迫使他一改旧貌，成为时代的

领袖。

无论如何，总有迹象表明委员长可能最终会承认局势严重，准备接受意见，并听从善意的劝告。他正改善沈阳的军事形势。如果他能挽救沈阳，如果他能亲自开始进行所需要的政治与经济改革，使他的政府更为人民所接受（这里也已看出他可能达到那个阶段）；如果我们能继续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扩大我们现在的支持（如从现在国会考虑援华法案看似乎有此可能），那末，局势可能并非完全不可挽救。

但局势仍然险恶，如果蒋委员长无所作为或努力太晚的话，与日俱增的迹象表明，国民党内逐渐增多的反对派可能会另觅领导人，而使他下野，也许会由政学系领导，并将接受共产党可能提出的条件。倘达到这一阶段，我们便可看到已任命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到南京就职，而且还可期待接受苏联提出的调解。不过我们认为，苏联调停会产生联合政府，而非地区性协定。而共产党对于在联合政府中攫取政权是较精通的。我们相信，这也会为政府中意见不同的分子所认识。在地区性协定下，共产党军队目前的分布似乎会使他们管辖长江以北和西安以东这片地区——这种分割地盘的办法似乎连那些政府内意见不和分子也不会接受。另一方面，我们听到许多方面表示这样的意见，认为在联合政府下，中国人的基本特性不会导致类似捷克斯洛伐克的联合政府，而且某种形式的民主政府最后会成功。

从现在正开会的国民大会可以看到未来的发展，尤其是副总统的选择，将会成为发展方向的暗示。中国再度处于十字路口。委员长看到他长期辛苦缔造的机构正在他面前崩溃。他或许需要用平素的勇气和能力进行奋斗。或者是那些意志软弱的人粉墨登场，我们将看到一个由苏联支持的联合政府；或者是那些意志坚强的人们团结在委员长周围，重新鼓舞起来，恢复专制仁政，再度吸引人民的拥戴、克服共产主义的威胁，我们企望后者，担心前者。

文献25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3—3148

南京 1948年3月31日

3月29日，我写信给委员长，为国民大会召开在他经历中的重要意义向他祝贺，并告诉他，因为现在美国完全有可能以某种方式援助中国，希望能利用这一点来完成其目标。我准备尽一切可能帮助他。我再次表示，我渴望看到他以在中国建设真正的民主来结束他的历程，我相信实现这一点的时机来到了。作为对此信答复的一部分，他要求我毫不犹豫地任何事情中将我的想法告诉他。我的信由傅泾波（驻华大使馆的秘书）于第二天送给蒋夫人，她似乎欢迎有机会自由交谈。

以下是主要动向的摘要。影响委员长倾向更民主进程的根本，在于我们必须明了他周围的阻碍力量。

蒋夫人描述了新近她在与美国关系的三个阶段中的经验。

(1) 在马歇尔逗留期间，她除了担任翻译外，试图避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这是因为她完全理解美国人的心理，知道那样做会被怀疑是试图靠女性的诱惑或向马歇尔施以社交的压力，为委员长的利益服务。同时她还意识到，委员长本人不想让她干预美国人，尽管在她看来他并不了解美国人的观点。到这一时期结束，她担心事情不尽人意的进程和马歇尔使命的可能失败在中国引起后果。因此，她试图帮助委员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她的一切努力被证明是失败的，主要是因为他周围的组织，特别是陈诚（总参谋长）和胡宗南（陕西绥靖主任）。她补充说，他的军事助手比行政官员更有影响得多。

(2) 从马歇尔离华到魏德迈使华，军队的同志感到兴高采烈，

因为这一时期美国的影响缩小了，被人们认为是强烈亲美的宋氏家族的影响也缩小了。这些军队同志除了上面提到的陈诚和胡宗南外，还包括于志石（中华民国政府军事事务局局长）和顾祝同（中国陆军司令长官），以及其他一些在德国受过教育的人。宋子文很快被他们赶走。他们在CC系和政学系帮助下，促成张群取得行政院院长的职务，而张群是一个容易被别人左右的人。他们宣布很快就会打败共产党，但当事情发展到另一条路上时，他们互相指责。陈诚夸口说，长城以内的战争会在3个月内结束。当这些失败时，委员长派他去东北，以证明他能指挥新战区。然而，那里的形势仍在变坏，政府蒙受了可怕的损失，包括16个大部分是美式装备的师。而魏德迈将军的批评态度反而更助长了这伙人的威风。她几次考虑要求我来商讨问题，但担心被指责或怀疑试图影响美国政策，终于没有那样做。美国的政策仍是犹豫不决。她又说，去年夏天，她曾决定接受马歇尔夫人的邀请访美，但委员长不同意。

(3) 魏德迈使华后：军事形势继续恶化。委员长周围的人继续互相指责，他本人也受到魏德迈批评的压力。她劝宋子文去广东，在那里做他能做的事。在张发奎（蒋介石广东行营的指挥官1946—1947）和罗卓英（广东的地方长官1945—1947）的管辖下的广东，走私猖獗，这是他帮助国家的机会，让她留在这里同反对派斗争。她由衷认为，美援迟早会到来，她想使中国受美国的政治观念影响。现在党内保守反动分子正失去立足点，美国的影响正在增加，她应该待在这里，提供她能做到的帮助，这使她再次谢绝了马歇尔夫人的邀请。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一直用“自我革新”的口号作为独立于美国的真实含义。这种感情由于魏德迈的一部分声明中的令人不快的言词而加重了。她认为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改变委员长的观念。

文献26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3—3148

南京 1948年3月31日

阁下：我有幸引用我和李宗仁元帅（蒋介石北平行营指挥官和副总统候选人）谈话备忘录中如下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部分，国务院也许对此感兴趣。

“3月27日晚，李元帅宴请我，并详细讨论了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及有关的事务。他希望能与蒋介石私下会谈，但因为几天前才到这里，他只见到他一次，当时是被邀请与其他候选人进餐，即孙科（立法院院长）和陈诚（蒋介石汉口行营指挥官）。唯一与选举有关的是委员长声明，党没有进一步提名，选举将是公开投票。他认为这给了他一个较好的机会。他描述他参加选举的目的是由于认识到蒋介石需要某种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抵销他的专横、固执己见、以及总的来说是不民主的方法。他认为他能比其他候选人更好地做到这一点，这是他能提供服务的最有效的方法。必须以某种方式做这件事，否则目前的政治体制会崩溃。他谈了他长期协助蒋介石和蒋介石最不幸的缺点，即蒋非常执拗和不妥协，后一点是他的优点也是缺点，最严重的缺点是蒋拒绝与其他人讨论问题，固执己见，专断地发布命令。非常愿意承担责任，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和国家的幸福，这一点他做得过度了。蒋应该摆脱他周围的小集团，引进青年人和更进步的人。李宗仁同意我的看法，即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说服蒋介石改变他的方式。

“关于总的形势，他认为镇压共产党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他以太平天国反叛为例，镇压它用了18年。镇压白朗叛首也用了8年。这不能仅靠军事手段，而且要求政治改革。如果美国和苏联

之间发生战争，这当然影响中国内部问题。在这件事上，他询问中国是否应保持中立，我答复说，我的政府已作好一切应付意外事件的准备，在我看来几年内不可能爆发那种战争。在此期间，中国会变得更强大，她将为使那种战争不可能发生作出更大的贡献。”

文献27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4—248

南京 1948年4月2日

我们得知，委员长确曾考虑接受行政院院长职务的可能性。积极组织国民大会的胡适博士告诉我们，这一问题正在广泛讨论，可能会有好结果。他指出在宪法之下，总统一职可能变得象在法国一样，主要是礼节上的元首，行政院院长将执大权。行政院院长一经任命，便可安心职守，因为要有立法院2/3的多数票才能使他辞职。胡适又提到，委员长并没有宣布他将为总统候选人。在这个问题上，现任司法院院长的居正，曾宣布他可能竞选总统。

孙科积极竞选副总统，也竞选行政院院长。他认为，宪法禁止当选为立法院院长的人充任政府其他职务一项，不适用于竞选总统或副总统的职位。

副总统的竞选现在减为孙科和李宗仁两人。假如委员长决定就任行政院院长，那么很可能设法使孙科当选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任命委员长为行政院院长，并使李宗仁任副总统。

文献28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4—548

南京 1948年4月5日

4月4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天的紧张会议中，委员长坚决表示，他不愿做总统候选人，并劝程潜和李宗仁不要竞选副总统，让文人来担任这两个职务。程潜马上同意了，但据说李宗仁很生气，并说让他退出竞选太迟了。他与左右整夜开会，决定在国民党外独立竞选。如果他失败了，也许会有麻烦。

看来代表强烈反对陈氏兄弟，任何被怀疑是他们操纵的提案都受到非难。提到这种操纵时，随之而来的是反抗国民党内的操纵，这也可以从反对操纵的鼓掌中看出来。

委员长今天公开劝告党员，投票分别选举胡适和孙科任总统和副总统，因为他们都是文人。

文献29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4—648

南京 1948年4月6日

委员长宣布他愿意退出总统竞选，从其他方面为国效劳，并劝告国民党选举非党人士做总统候选人。这些事的结果是确定了他的主宰地位；获得了国民党内对他的领导的拥护，扩大了他的权威。

不管这是否是有计划的，委员长这一行动是巧妙的政治手腕。这一行动的动机无疑产生于需要国民党内更加团结，国民党由于

派系纷争和对他的领导能力不满日增而削弱。委员长忧虑党内分子利用国民大会攻击他的政策，以致促成国民党分裂，所以他明确决定冒险退出总统竞选，就任次要职务，并建议国民党支持非国民党候选人。国民党对此建议的最初反应是情绪沮丧。尽管在新宪法下总统权力大大减少，但国民党对政府的控制将因此减弱，而且目前的危机也使国家需要一个有力的舵手。在一系列的会议之后，CC系表示拒绝与非委员长任总统的政府合作。黄埔系威胁宁愿投奔共产党，也不愿服务于除蒋介石以外的任何总统之下。国民党领袖联合提出总统之职非委员长莫属。因此，委员长屈服于国民党的命令，他今天同意参加总统竞选。

如上所述，这一手腕极大地加强了委员长的地位。他以试求新政府中的次要地位，来答复共产党的批评——说他是“独夫统治”。所以，共产党现在被迫攻击“国民党政府”，而非“蒋政府”了。他又公开主张容纳非国民党分子担任次要的职位，并要求此种职务由文人而非军人来担任，以扩大新政府的基础，借此回击国内外对他的批评。而国民党内一些人则对一个委员长不占首要地位的政府不满。尽管如此，蒋得到他们明确坚定的保证，他们保证在未来继续实行他的政策。最后，由于宪法规定总统是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所以委员长仍旧可以保持对军队的控制。

在讨论过程中，委员长坚持选举副总统应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进行，国民党不提出其本身的候选人。他不愿对任何候选人予以个人的支持。这种情形可能将增加李宗仁在副总统选举中获胜的机会，而孙科原想身兼副总统和立法院院长二职，但遭到反对后，他选择了立法院院长之职。

文献30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4—848

南京 1948年4月8日

在去广东之前，我拜访了委员长，他看来比过去几个星期更高兴。他知道巴尔将军与我同行，并要求我们赶紧回来，因为他需要巴尔将军在涉及军事装备的研究方面提供建议。他还认为，有些与美援有关的问题我应随时与他讨论。今晨外交部长(王世杰)表达了同样的愿望。

委员长要求我带信给国务卿，表示他个人感谢国会赞成援华法案，以及国务卿在此行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解释他拒绝允许国民党提名他作总统的理由时，他说：

(1) 他强烈感到，当宪法第一次生效时，不论总统还是副总统，都不应是军人，阻止选择军人任那些职务的唯一办法是他退出竞选。他以袁世凯开始的军阀统治的暴政为例，说明国家应利用共和政体，选举文职人员任高级官职。

(2) 根据宪法，总统权力非常有限，他还不如在某个从属的职位上多作贡献。他引了一句成语说，在从属的地位上，他可事半功倍。但他承认，他为退出竞选的一切努力似乎没有成功，他不得不等候国民大会的选举结果，除非他能使委员们相信，他采取的立场确实最符合国家利益。

我告诉委员长，我对他的态度印象非常深刻，我知道他的态度是真诚的；另一方面，他不仅仅是领袖，而且几乎是中国长期为独立、统一和和平而斗争的象征。如果他不对国民大会代表清楚表达的愿望让步，就会在国内进一步损害民众的士气，并削弱海外的信心。我评论说，在美援计划通过的重要时刻，建立立宪

政府具有伟大意义，它将为中国的进步与改革提供潜在的可能性。我继续说，共产主义不仅仅是军事运动，而且是社会和政治运动，在任何国家，它都不能仅靠军事力量征服，诸如较好的地方政府，改善税制，保护公民权利和普及教育等都同样是必要的。我认为，他作为总统，会有更多的时间用于那些大政方针，以代替承担他迄今负担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对此他评论说，即使他成为总统并奉行上述理论，继续实行各种方针也是必要的，否则不久就会遭到挫折。我答复说，在我看来，尝试代表责任制度和训练其他人接受责任制度，而非总是事必躬亲，似乎是他的新职责的组成部分；他不能永远管理整个国家，现在是训练他本人和其他人适应那种程序的好时机。他答称这确实必要，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

以上谈话的气氛最为阴暗，它向我们表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改革之路将是最困难的。但是，虽然形势危急，若人们真正有志于改革，取得一些进展也是可能的。此刻中国人在各种行动中尤为需要劝告。与援华计划有关，如果我们提供他们急需的胜任的顾问，他们必能接受我们的劝告，使局势有所改善。

文献31 司徒致国务卿

893.50恢复/4—948

南京 1948年4月9日

在今早国民大会闭幕前，委员长发表了90分钟讲话……他详细检讨了经济形势，……还详细分析了各条战线的军事形势，强调在每个县组织地方防御的重要性，并表示虽然有必要在目前撤出一些要地，但共产党可以被遏制，并最终予以消灭。目前，必须集结部队攻击共军。在6个月内基本清除黄河以南的共产党军队。

“讲话”在显著的段落中指责“外国人”应对目前中国人失去信心负责，宣称外国人关于政府崩溃迫在眉睫的谈话影响……士气……。

“讲话”的目的看来是打击已经影响到国民党中国的失败主义，激励代表，并通过他们激励人民作更大的努力。

文献32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4—1548

南京 1948年4月15日

据可靠消息，作为政学系代言人的张群总理提出，选举委员长做总统，并赋予宣战权力。据报告张君勱(国社党领袖)正尽力从中找出宪法依据。经最后分析，有迹象表明宪法有赋予总统宣战权力的条文的话。

……张群希望继续任总理，但前外长王世杰也在谋求那一职务……

文献33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4—1748

南京 1948年4月17日

蔡锴(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今天极有把握地宣称，宋子文在最近的谈话中告诉李(济琛)将军，政府有可能在大约3个月内崩溃，并表示随着蒋失去权力，政府希望立刻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合作。蔡还宣称，孙逸仙夫人正积极为国民党工作，并在军队、政治和教育各界获得广泛支持。蔡暗示李济琛希望在6

个月内发动军事起义。宋的估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我最近访问广东时，宋没有表明他感到政府崩溃在即。但是，他声明他最近见到蔡锷，他认为如果中央政府垮掉，蔡会与他合作。

文献34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4—1948

南京 1948年4月19日

国民大会今天以2430票对269票，选举委员长为中国第一任立宪总统。大会昨天通过了戡乱暂行办法，授权总统采取紧急措施，不受宪法第39条与第43条约束，但立法院依第57条第二项之规定有否决之权。如果1950年12月25日以前，戡乱时期未宣布结束，大会将举行特别会议，考虑延长该法。

该法的效力在于，允许总统会同行政院，随时颁布紧急法令，不必先经立法院同意；但可由立法院以2/3多数修正或废止。就新选出的立法院的组成来看，似乎不可能集合2/3的多数票来反对政府的一个法令。所以，该法实际上给予了总统无限权力。

文献35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4—2148

南京 1948年4月21日

与共产党关系密切人士在最近与我会谈时，作如下3点声明。(1) 如果委员长撤退军队，和谈可以恢复；(2) 如果承认目前的“国大”是非法的，且委员长不做政府领导人，仅保留其他任何职

务，和平亦有可能；(3) 周恩来现在建议，在执行反政府的破坏计划时，采取吸引自由主义者和人民的政策，直到委员长认识到形势为止。

上述大意表明共产党希望谈判解决，愿意与政府谈判，如果委员长不领导政府的话。至于第二和第三点声明，我们认为共产党的宣传攻势，他们不承认国民大会的合法性，也不承认“国大”代表的合法性，认为这些代表仅代表了蒋委员长的意志，并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因此，在大会期间，共产党大大增强了其宣传攻势，并在国民党控制区频繁进行破坏活动。他们显然认为，现政权由于最近的美援而巩固并保住了权力。所以我们可预料他们将采取更粗暴的反美宣传。

许多国大代表，特别是华北和满洲的代表，作为改善他们选区选民的条件的代表者，希望扮演重要角色。但国民大会受到控制，限制表达批评政府的观点，国大代表修改宪法的权力也受到限制，除非修改增加总统权力。有许多——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代表灰心丧气，他们曾希望国民大会成为影响政府在危急关头采取更积极和建议性政策的媒介。由于委员长和内阁部长们对大会所作的报告普遍具有不现实和含糊其辞的特点，代表倍感沮丧。除非委员长作为新的合法总统能够表明有能力使政府采取有效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行动——对此大多数代表表示怀疑。共产党对合法国民大会的攻击将会有日益增多的同情者。

我们以前报告了政府内部大量的不满，这种不满是此次国民大会的显著特点，甚至遍及委员长领导的上层。国民大会和随后的政治策略都无法减少不满。新政府的建立不可能给委员长的危机增加人们对他的改善现状能力的信任……委员长的反对者也许已经拟定了推翻他的政府的时间表。4月16日，上海领事馆的领事报告了积极促进李宗仁选举的甘介侯的如下声明：“李宗仁组织希望用改良的方式接管政府，以便加强政府，使之能够与共产党

谈判结束内战。”在李与香港、华南的持不同政见者之间，不存在政治合作的障碍。还有理由相信，李会得到穆斯林分子和来自华北的领导人的支持。在这种形势下，存在着某种计划以取代委员长，或者逼蒋与共产党议和。然而普遍认为，委员长的反对者并不想公开发起一个反蒋运动，只有在他们对现领袖的让位完全绝望时，也许才能激起他们付诸行动，取代蒋的领导。政府各层领导、华北和东北的代表以及整个国民大会，都将李宗仁的副总统选举视为政府力图推进建设、争取民心的象征。因此，如果李宗仁竞选失败，势必使政府陷于分裂。

文献36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4—2348

南京 1948年4月23日

接近李宗仁的消息来源一再报告说，李宗仁与委员长已经完全决裂，他计划如果竞选副总统失败，便采取某种“行动”，至于是何种行动，则未具体指出。其他资格较低的人士猜测，可能是地方军事反叛的方式。南京四郊大部分是两广军队，我们不知道他们忠于李还是忠于委员长。根据目前的消息，我们认为军事政变虽然可以想象，然而却很渺茫。李宗仁也许会由于认为在委员长那里受到冷遇和国民党机构拒绝他在目前危机中为国效劳而感到失望，于盛怒之下会干出事来。我们认为，如果有行动的话，那也是以后才会发生；也许可能和香港和华南一些意见不和者联合起来，确有李与他们联系密切的迹象。副总统选举或许要到6月24日或25日才能结束。

文献37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4—2348

南京 1948年4月23日

国民大会副总统选举举行第一轮秘密投票，结果如下：李宗仁754票；孙科559票；程潜522票；于右任(中国监察院院长)493票；莫德惠218票；苏福林214票；全部选票共2760张。由于候选人得票数均未达到半数以上，第二轮秘密选举将于4月24日举行。除非选举规则在明早以前改变，第二次投票的候选人将是得票最多的人，那就排除了于右任、莫德惠和苏福林。李所以得到大多数选票，其原因在于他尖锐地批评政府，倡导改革，这些政绩在代表中广为传颂。程潜在前面三人中是最没希望中选的。于右任失败是肯定的了。4月23日下午没能进行第二轮投票表明，国民党领导人正寻求时间来想办法对付这种意想不到的发展。

文献38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4—2448

南京 1948年4月24日

第二轮副总统选举的结果：李宗仁第一，1163票；孙科第二，945票；程潜第三，616票。由于没有候选人得到法定的过半数1523票，第三轮选举于4月25日在同样三人之间进行。如果仍无人得到过半数票，第四轮选举将在第三轮中得票最多的两人中进行，投票中得票最多的人将被宣布当选。

选举一直以有秩序和适当的方式进行，但4月23日下午，大

会厅外突然发生短时间的暴力行为。当时，广东代表组和其他人在张发奎引导下，对公开发表讥贬孙科的文章表示愤怒，并冲击了《救国时报》的办事处。

文献39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4—2548

南京 1948年4月25日

4月25日清早，程潜与李宗仁先后宣布退出副总统竞选，留下孙科为唯一的副总统候选人。今晨的会议上代表极度混乱，会议未采取任何行动便休会了。今晨本地中文报纸刊载了两位候选人退出竞选的消息，李宗仁的拥护者以广告形式发出声明，说他退出是为了政府的和谐和利益，并以此证明那些说他欲逼委员长离开中国的下流谣言是无稽之谈。在上午的会议中，于右任担任主席，代表们表示李退出竞选应得其拥护者的同意，并要求主席予以同情。于右任大哭起来，说许多事情令人遗憾，而且应该举行另一套新选举了。

一如我们从前所报导的，李氏曾受委员长强力压迫，要他退出竞选，他一直予以拒绝。李的左右说，李有意就任副总统一职，冀以批评政府缺点并提出补救措施，作为他竞选的政治纲领；如果竞选失败，李将从军队退休，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实现他的政治纲领。李的拥护者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曾成为有组织的学生示威攻击的目标，此地拥护李宗仁、抨击孙科的中文报纸曾被暴徒捣毁，警察却不干涉。据说这是由拥护孙科的代表主使的。据可靠方面的消息告诉我们，委员长曾召见白崇禧，并以秘密军法审判胁迫他不要支持李宗仁而支持孙科。

我们对这些初步发展的反应是，李受到国民党机构和黄埔系

的极重压力。他以退出竞选来反抗这种压力，从而使他处于国家需要他而非他谋求官职的地位，这合乎传统的中国做法，并因此使一般人民和有关党派相信是反对派在策动阻碍他。在一个自由和不受左右的选举中，李宗仁几乎必然得到多数票。大多数代表希望出现一个行之有效的政府，但国民党机器紧紧操纵着国大，这使他们很失望。因此，他们认为李当选就等于满足了他们的目的。下面一句话可以看出最近的发展对代表们的情绪的影响。这句话是“这比推举曹锟的选举还坏，曹锟至少还是出了钱的”。

我们再说一句，在双方情绪高涨之时，无法预测双方最后采取什么行动。不过，国民党本身无疑在原则问题上分歧很大，这与通常政党为了自身利益而分裂的情形不同。关于目前领导及其政府之效能问题是原则性的。我们估计可能造成这样的局势，或者否决现领导，或者现领导(包括委员长及其亲信)自动引退。因为蒋委员长尚未正式接受总统一职，且据悉他对此仍犹豫不定。

在目前情形下很难预言最后的结果。可靠方面人士说24小时内将决定局势。我将继续报告重要的事件。

文献40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4—2648

南京 1948年4月26日

4月25日下午，孙科宣布退出副总统竞选，声明没有对手竞选是不民主的。这是委员长指示他退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下午开会并通过决议，认为一切候选人退出都无效。国民大会今天休会。李宗仁的左右表示，李的退出是一政治策略，以使各方面了解到委员长、国民党嫡系和黄埔系等对李的拥护者的威胁恐吓。委员长以惩罚威胁白崇禧，令其不得支持李宗仁，并与

程潜一致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李便决定退出竞选。昨天白崇禧发表声明，说李退出是由于拥护李宗仁的人不断受到恐吓，在这种情况下自由选举是不可能的。程潜与李宗仁合作开始于委员长召见他之时，当时委员长要求他退出，把票让给孙科，还答应偿还他的全部竞选费用，此建议被程拒绝了。

今天各党派连续不断地进行紧张的政治活动，甚至消息最灵通的人亦感困惑，看不清结果如何。不过非常清楚的是，最近的发展严重分裂了国民党。一般国民党员和无党派分子，可能包括大多数文武官员，已经相信只有得到比过去见到的更多的自由、更有效和有利的领导，才能使国家渡过目前的危机。他们希望这样的领导可由于实行新宪法，以井然有序的方式产生。委员长和政党机构对国民大会和立法院选举的干涉，以及大会对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讨论和目前对副总统选举的干涉等，已使那些盼望有效的立宪政府的人充分确信，委员长打算利用新宪法作为维持他个人独裁统治的工具，并仍然与过去一样，和统治国民党机构的 CC 系及统治最高指挥部的黄埔系密切合作。

毫无疑问，大多数政治上清醒且与国民党党务机关没有密切关系的中国人都注视着目前的局势，并且认为委员长应负其责。在竞选副总统初期，委员长让陈立夫操纵孙科竞选，孙科已明显失败时，他就不顾自己对自由选举的承诺，亲自干预以左右其结果。委员长的干涉肯定激怒了许多拥护他的人。在此之前，由于人们还保持着对委员长的尊敬，认为他为国效劳，是中国必不可少的领袖。也由于人们害怕委员长的报复，所以，国民党及政府中的一些不满分子在言行上还只是秘密反蒋。但是，程潜和李宗仁的联合行动以及白崇禧关于李宗仁退出竞选的解释无疑促成了民主宪政的赞同者共同结成政治联盟，反对派系扩张和个人独裁统治。

大会现定于27日上午再开会，由代表投票决定每一候选人的

退出是否可以接受。李宗仁的代理人现在声称可得1800票。国民党大多数党员现已不受国民党领袖的控制。青年党坚持自由选举，张君勱的民社党却还在慎重考虑中犹豫不决。在这种局势之中，代表们倾向民主、宪法和反蒋，似乎完全有可能使李宗仁当选。委员长如何应付这一失败（包括拒绝他的领导），现在还不可能预见到。许多可能之一是他拒绝任总统。局势中虽有许多混乱现象，但民主力量已出现，并在抗议独裁和反动中表现出来，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使我们感到高兴。

大会召开后，三个竞选者宣布，他们拟重新参加选举。

文献41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4—2748

南京 1948年4月27日

副总统竞选中的政治花招所造成的混乱在昨日大半天里仍在继续，今天上午才稍有澄清。26日上午，胡适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指定的解决副总统选举僵局的特别委员会，宣称所有候选人都同意参加竞选。此后不久，李宗仁一派开始传出消息，说李将不参加竞选，正计划回到北平去。就在此时，委员长告诉胡适的委员会，说他对所有候选人仍参加竞选颇感欣慰，劝告国民党要根据他过去表示过的代表有投票自由的愿望来行动，还说候选人不应互相散布诽谤的谣言。使混乱进一步加剧的是李宗仁本人随后告诉记者，说他愿意放弃竞选，今日即飞北平。这一声明随即被胡适否认。委员长昨晚召见李宗仁，谈一小时后，说服了他再参加竞选。大会将于明日开会，进行选举。

李此次的立场加强了地位，并获得代表们的同情，代表们继续指责委员长和党务机关不民主地干涉选举程序。青年党和

民社党发表声明，要求国民党应“更民主些”。根据目前消息，自由主义分子已成功地对控制政党机关的CC系挑战，李宗仁似乎有可能当选。

文献42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4—2948

南京 1948年4月29日

三位主要竞选人同意不退出副总统竞选。在国民大会主席团通过继续进行选举决定之后，4月28日举行第三轮投票。结果李宗仁1156票，孙科1040票，程潜515票。拥护李宗仁的票数减少，以及在第三轮投票时普遍表现出来的态度和冷淡的情绪，使许多观察家揣测，在第四轮投票中，为使孙科能获胜，可能对投票者施加更多的压力和威胁。

4月29日举行第四轮投票，结果李宗仁获1438票，孙科获1295票。主席团当即宣布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在读票接近尾声时，李显然将获胜，他的拥护者为表示对投票满意，越来越吵闹，围着正在大会会场上的李夫人高声欢呼。在此以前，投票一直是安静和有秩序的。南京群众对第四轮投票的关注是明显的。大会进行的情况被广播出来，似乎南京的每台收音机都在播放。只要可以收听收音机，就有人群聚集。

大使馆以后将详细估价目前事态的影响。初步的估计是，这一事态象征着CC系的彻底失败，对公开决定支持孙科的蒋介石也是一个严重打击；这一事态还表明国民党内反对派对以CC系和黄埔系为中心的党务机构的独裁进行挑战的胜利。蒋介石将如何使自己适应这种新发展，以及反对派能否有效地组织起来，实行李所宣扬的改革政纲，现在不得而知。李似乎是大会中所有不

满和反对分子的核心。现在的问题是：他能否进行有效的领导，将国民党及政府内的这种情绪凝聚起来，形成富有效率、积极进取的反对派。

文献43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5—148

南京 1948年5月1日

上个星期，政府的军事地位相当恶化。包括潍县失陷和西安被围。在潍县陷落之前，共产党的猛烈攻击是罕见的，在削弱强大的防御工事和优良的供应地点时，使用了重炮。邻近的国军指挥官没能提供救援，空军合作是不完善的，大部分是无效的。整个防御战的协同和指挥明显地缺少空军合作。由于政府的海军封锁毫无效果，共产党夺取潍县，使他们从辽东半岛至苏北的交通线畅通无阻。政府缺乏进攻的能力，而且，只要共产党愿意，就可以集中主力夺取长江三角洲。

据不完全报道，包围西安看来会使胡宗南在渭河一线的防御随之崩溃。据报告甘肃军队正重新控制西安到兰州的公路，他们不可能把共产党赶出西安平原。向北防御的四川现在受到威胁。

其他战线相对平静。满洲的共产党人继续修整和恢复铁路交通。根据目前的情报，他们下一步进攻的打算是无法预料的。共产党现在控制了半个湖北省，主要是汉口以北和以西地区。在这一地区，据报告他们大规模征兵和整编军队，特别是从邻近的山西省招募兵员。据报一些部队向西渡过洞庭湖。政府组建了常德战区行营来加以防范。据报少数共产党干部在九江附近渡过长江，政府看来无力阻止共产党军队进军到长江北岸的南通附近。

我们相信，共产党现在正组建军事力量，并集中主力准备进

一步发动攻势。到目前为止，共产党通过不断消耗削弱政府的力量，靠孤立一些战线，靠分散的突然袭击和不断骚扰交通线，使政府处于防御地位，他们通过这些办法，赢得了胜利。政府的经济和军事地位同时进一步恶化，普遍崩溃似乎不可避免。但我们弄不明白为什么共产党要放弃现在成功的战略，这种战略花费的人力和物力是少量的。

尽管在潍县战斗中共产党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夺取了一个对他们没有直接价值的地点。但如果共产党准备向长江三角洲发动大规模攻击，这会有巨大的战略重要性。同样，共产党进占西安平原和湖北西部，可以解释为期望在重要的战略地区集结，以进一步发动大规模攻势。

我们认为，这些发展也许表明共产党战略概念的变化。对那种变化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他们感到美国援助，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援助，将改善国民党军队的地位，以致他们必须在国民党有能力阻止他们之前加速完成他们的军事计划。还有，共产党无疑认为，我们的军援将会增加对经济援助的保护。最后，苏联也许正建议作此明显的战略改变。它期望看到共产党迅速扩大其控制，防止中国国土在美苏战争中可能发展成美国的基地。

文献44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5—348

南京 1948年5月3日

仅为选举总统和副总统而召开的国民大会，现在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1948年委员长表演的隐退奉化，成功地确定了他个人的权力。但争夺副总统的结果否定了他的策略。副总统竞选无疑是大会最重要的发展。毫无疑问，投票没有作弊嫌疑。孙科代表

国民党组织中反动的人选，假若他当选，则意味着继续旧的政治政策和肆无忌惮地维护既得利益，重振党和政府的希望也将随之破灭。对于希望最后战胜有活力的共产主义政策，这种重振是必要的。不管李宗仁将来实际表现如何，他在竞选中成了不满分子和进步分子的象征及核心。这些人对现政府领导失去信心，他们要求新的人选和新的更有效的政策。与丧失信誉缺乏成就的现当权集团相比，李代表着有效政府的要求。在缺乏经验和组织的情况下，他的拥护者向国民党组织挑战并获得胜利。李能否成为有活力的领导者，使这些人结合成有力的反对派，实现李的竞选政纲，目前不得而知。李的胜利对 CC 系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他们不仅未能执行委托给他们的最重要的任务，并且由于向委员长预报失误，而严重损害了委员长的地位。反对派的批评多数针对委员长本人，说他企图取消民主程序。实际上，对他的许多批评加之于 CC 系更合适，但这不利于他的威望。由于他曾公开强烈反对他现在必须与之合作的人选，故处境愈加困难。他如何使自己适应这种形势现在还无从知晓。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仍同过去一样——是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如果他反对并打击李，便会迫使李铤而走险，因为李已表明意欲积极参与国事。另一方面，委员长是重实际的人，也是一个政客，如果他断定李代表国民党中国的主要力量，并断定不能消灭李，那么他会决心联合李，同时放弃自己过去的一些权力。据报他对李当选非常愤怒，他现在可能真是太老了，加之专权过久，致使他自己不能适应。或者他亦可能再表现出他仍是中国的头号政客。一切取决于他自己。

国民党最初是个革命政党，现今它仍保留着强烈的革命传统。它仍以实现孙中山的主张为任务。香港和国外的国民党各派系采取了改革的口号和政策，而且在最近几个月来，甚至连国民党里较保守的各派人也在以同样的语调谈论。这种对改革的关注起源于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压力。国民大会确认了委员长的地位，但否

决了他反对改革的政策。按他目前的法律地位，他可接受并实行或拒绝人民对变革的要求。

但是，李当选也给了这个要求以合乎宪法和法律的地位，这种情况可能会迫使委员长在他的政府中容纳新人才，采纳改革政策，两个主要的失败候选人孙科和程潜，已开始组织他们所谓的改革集团，这一事实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共产党迄今仍无反应。正如谣传所说，除非他们确有理由相信李宗仁愿与他们妥协，并几乎按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容纳他们参加联合政府，否则他们一定会感到失望。因为他们认识到，孙科当选会有利于助长共产党的革命形势继续发展。

应予注意的另一派是在香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宣称，委员长从政坛消失指日可待。现在知道该会与宋子文已遥送秋波，这种不相称的结合有时是有用的。该委员会称，近数月来与李宗仁保持着密切联系。如果这些话属实，那么所称的“指日可待”可能是有根据的，在大会中的斗争只是委员长、CC系、黄埔系和李及其合作者的生死斗争的第一回合而已。如果内战和经济恶化继续使目前的不幸发展，李及其合作者似乎的确可获得最后成功，李或是自愿、或是为形势所迫与共产党达成谅解，这种可能性日益增长。我们必须谨慎地注意事态的发展，但我们相信，我们应努力使委员长接受目前的形势，并支持比较开明的政策。

文献45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5—648

南京 1948年5月6日

何应钦（联合国军队参谋委员会的中国首席代表，中国驻美

军事使团的首席代表)暂时接受了总理职位,他正与来自各阶层的组织协商,以便较好地提出他的计划和内阁。以后几天里,他希望见到委员长,如果委员长同意他提出的内阁和改革计划,将予以公布。

我们得知,委员长希望顾祝同(中国陆军司令)任参谋长。如果这一可能的任命是目前内阁的人选,这并不是件好事。

文献46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5—748

南京 1948年5月7日

目前我们获悉的最好消息是委员长拒绝了何应钦要求的改革,并命张群留任行政院院长,组成新内阁。

但是,我5月6日拜访委员长时,他同意我认为应向他提出的各点建议。第一,他答应支持晏阳初的复兴计划。我详述共产党问题不能仅靠军事手段解决,除非政府厉行改革政策,使人民相信其命运会比在共产党统治下好一些,否则不论作多大的军事努力或有多少美援,都不会成功。他同意上述见解。当我认为目前在军事、财政和经济方面的情形非常严重,而人民和政府的士气尤其低落时,他也表示承认。在我看来,唯一的希望是厉行改革,使人民相信政府已不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真的有意付诸实行。我说现在他已当选为总统,宪法正在付诸实施,美援正开始到来,这正是他进行必要的改革的良机。但是如果他现在无所作为,那么在采取某种必不可少的措施时,他想有所作为就晚了。他的表情似乎看出我已倾向于李宗仁了。我接着说,委员长也同意,绝大多数中国人、甚至激进的学生,并不要中国共产化,但他们对现政府不满。因此,在这一问题上要争取大多数人,就要表现出

政府比共产党更现代化、更新、更民主和更自由。而共产党呢，我强调说它是落伍于时代的集权主义和独裁政治组织的代表。我认为，似乎他也同意，主要问题是精神而非物质，总要有些方法唤起民众和军队的士气，否则一切计划和美援都毫无效果。当时在场的蒋夫人特别同意这一点，我认为她会为改变这种状况尽力的。

为答复他问我有什么特殊建议，我说行政院长的10点计划似乎提出了一个行动纲领，现在是应该证明这10点不只是纸上谈兵、而且表示政府愿将其毫不延迟地付诸实施的时候了。

上述一切似乎希望不大，我们担心这代表了委员长目前的态度。他可以象他表示的那样同意，但我们觉得很难相信他还能做为一个向人民灌注新精神的有才能的领袖；我们也很难相信，他真有意着手必要的改革。

文献47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5—848

南京 1948年5月8日

立法院的选举使国民党陷入同样的困境。这种困境曾使党在国民大会中苦恼，并一直无法使之完全从中解脱出来。在立法院773个席位之中，国民党承诺使青年党保证得到80个席位，民社党75个席位。随着国大选举的悲惨经历而来的是，国民党被证明不能实现同样的承诺。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未经国民党提名，党员不得参加竞选。但许多党员无视这个规定，自己申请提名，参加竞选。当最后宣布统计数时，民社党仅赢得14席，青年党仅8席。因此，许多国民党员独立竞选，击败了官方的国民党提名人，就象在国民大会选举中发生的一样。

没有立刻宣布选举结果，国民大会和随副总统竞选而来的骚乱成了头条新闻。但各种利益集团悄悄开始组织起来保卫它们的权利。当国民党提名人建立“国民党中央执行部正式提名立法院候选人联谊会”时，请求提名选举的人则建立了“普选立法委员联谊会”。这两个组织和少数党成员开始派代表访问陈立夫（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张励生（内政部长）、谷正纲（社会事务部部长）和其他负责人士，为他们的观点辩护。国民党中执委无法在这种事上作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它正全神贯注于国民大会选举的争执和副总统的选举等更紧迫的问题。但据报告，4月18日决定，在所有地区，得到最大多数选票的候选人将考虑入选，但那些为少数党保留的名额除外。

最后国府委员会宣布一项决定，企图快刀斩乱麻。决定是国民大会的成员增加300人，立法院增加150人，并允许少数党候选人与那些未经国民党提名但获得较多选票的国民党人共同竞选。这一决定实际上皆大欢喜。但它又遭到现立法院的否决，而立法院未解散前，它是有权否决的。

党的领导人为了给少数党的人让出位置而强迫排斥合法国大代表，造成了不愉快的后果，因此他们变得谨慎了，并开会考虑此问题。据《新民报》报道，他们在5月1日的会议上决定由孙科、陈布雷（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吴铁诚（立法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张励生、陈立夫和谷政纲等参与组织那些得到最多数选票的人作为立法院委员。他们显然决定，因少数党参予而疏远国民党委员中有影响的集团并进一步分裂国民党是不值得的，党已经被国民大会中粗暴的争执削弱了。而且，在孙科竞选副总统时，少数党也没有坚定地支持孙科，这也对他们的上述决定具有影响。少数党的强烈反应立刻出现。据报一个青年党发言人声明，如果国民党不坚持其承诺，不仅他们的党从立法院撤出，而且要与民社党“共同发表宣言，痛斥国民党违反三党

协议，并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援助”。国民党指定的候选人的联谊会也公布了一封给蒋总统的公开信，指出他们在选举中失败是由于他们由党指定和支持，要求他为了党的声望和纪律，寻求一项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5月5日，委员长召见民社党的两名委员，根据苏福林（国府委员）后来的描述，委员长告诉他们不可能给予在选举中被击败的青年党和民社党的党员以任何帮助，但他真诚希望在政府的执行部门提供广泛的合作。

两党声明，他们拒绝接受国民党采取的立场，并声明他们不考虑参予国家或地方政府，直到立法院给予他们曾承诺的席位。如果双方都不动摇，少数党势必撤出政府，国民党会失去它的“民主花瓶”。而国民党正是靠这一“民主花瓶”向外国观察家证明，在中国不再是一党政府。由于不论哪一方都不可能走到极端，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某种妥协，为此他们现在正加紧钻营。雷震正作为国民党的调解人工作。仍有可能的是增加席位的总数，这被证明是唯一的出路。无论怎样解决，都将意味着对受到严重挫伤的国民党的机器的又一次冲击。

当双方为解决选举纠纷合作时，新的立法院根据宪法规定于5月8日召开首次会议。到5月7日晚，立法委员的注册人数达到370人，比必要的法定人数155名的两倍还多。

文献48 司徒致国务卿

893.032/5—948

南京 1948年5月9日

5月8日，新的立法院举行了简短的开幕式，没有出现问题。少数党抵制会议，他们反对国民党承认所有得到多数票的候选人

作为立法委员的决定,那样会将少数党的原承诺的155个席位减少到22个。寻求打开僵局的谈判正在进行。

文献49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5—1348

南京 1948年5月13日

李宗仁的主要顾问甘介侯在最近去北平作短期旅行前的谈话中声明,李和他的追随者正为中国准备一项改革计划。在将计划给委员长之前,允许他在几个星期的短时间里表明他打算奉行的行动路线。然后计划将送给委员长和行政院院长,供他们考虑。除非完全接受这项计划,否则李将激起一次政治危机。委员长将被允许保留作总统,如果他同意此职务类似法国总统的职务的话。行政院院长将被迫辞职,李将提出他自己的内阁。尽管未作专门的声明,甘暗示他也许任行政院院长,然后李集团可继续执行它自己的计划。甘声明,他们完全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可以预料,支持李的人占压倒优势,以致不必要使用暴力。

文献50 司徒致国务卿

893.20/5—1448

南京 1948年5月14日

已宣布任命现陆军司令顾祝同任参谋长……新的陆军司令是余汉谋。这两人长期以来在军事上一直无所成就,避而不战。他们擅长投委员长所好,从军事观点看,很难想象这个糟糕的任命。我们唯一的结论是,在军事方面做不了什么事来改变他们目前懒

散的政策或阻止军事迅速崩溃的进程。

如果这些任命表明了新内阁组成的迹象，那么政府掌政的前景甚至比我们猜测的更暗淡。权威的新闻消息来源今晨列举了一个可能的内阁，机构的改组仅仅是新瓶装旧酒。张群继续任总理。我们的情报表明，在其主要之点上，新闻消息的来源可能是正确的。

上述的种种事态发展不难使人得出结论，同国内事务一样，军事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问题在于这些事态究竟有何结局。我们认为，以李宗仁为核心的改革运动已达到了不可否认的程度，特别是如果李准备给予必要的领导——表明他的决心，并能博得民众的支持。最近，在与李济琛（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的交谈中，我强烈感到，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次极为关注事态发展，并相信民革得到广泛的支持。

委员长本来有机会抛弃他周围的腐败集团，和新的力量结盟。但以上的任命只是进一步证实了我们最可怕的担心，他没有能力认识中国最近的发展，并使自己适应这些发展、变化。

在我们看来，委员长的这种盲目和固执只会意味着他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要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将被他正要扼杀的那些力量剪除。这发生的越早，那改革势力重振国家、控制共产党的潮流、并最终在中国将其作为一个势力加以消灭的前程就越大。我们认为，在处理我们对华关系方面，以上的前景现在就该铭记在心。

①

文献51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5—1448

南京 1948年5月14日

阁下：我有幸试图对最近的政治事件做一估价。虽然我早就有意提供这些估价，但由于事态并未明了，只能继续观察。现在，我准备提交事实报告，并附上解释性的评论。就是现在，中国事态仍是变幻莫测、错综复杂，这在中国是习以为常的。

国民大会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结果是不顾委员长及其亲信的坚决反对，选举了李宗仁。委员长不顾选举自由的承诺，使用各种强制手段，这使他大丢面子，这也许是在他的领袖生涯中第一次不能维护他的意志。由此而产生的欣喜甚至在政府中也是广泛的，因为李被普遍认为是建设性改革的象征。

最重要的问题现在在于蒋委员长在这些进步的计划中是否会欢迎李作他的助手，在于他本人亲自领导执行这些计划，或者他憎恨李的成功，不理睬他并试图挫败他的努力……这种迹象远未消除。据传说他对待各种选举李的人和组织——包括两个少数党怀恨在心。而陈立夫的辞职是对其失败的处罚。不管这些说法是否属实，但它确实表明了目前人们的普遍看法。我个人仍然坚持认为，他想做好事，但如此深陷在中国专制统治的传统和他自己的习惯中，如此深信任何对他的无可争辩的统治的抵抗和对他的政策的批评都是受共产党煽动，以致他简直无法自拔。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他，那就是同情的劝告，但这必须是非常具体和公开的，以便冲破他的偏见的外壳、他的铁的意志和无知的恐惧。中国人不断要我向他说那些他们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我将继续尽量谨慎地去做，但我担心若不进行剧烈改革，美援不能达到预

期的目的。

在副总统尚未上任前，我审慎地与各方脱离，以避免谣传和误解。李宗仁一直忙于起草改革计划，打算送呈总统，争取赞成。如果李对答复不满意，如果在有效的尝试后他确信仍不能有所作为，他将脱离政府并领导一个独立的运动。一有可能，我会尝试得到此计划的文本，同时在政府主要机构充实后，我准备将一些具体的建议提交委员长。周围的政治变动很少，唯一的新闻是一两个人拒绝接受给予的职务，除非承诺不予干预。

几个星期来，政治事务占据了委员长的时间，以致他不能过多注意军事问题。军事局势日益危急。当然还没有人敢于采取任何主动行动，那些官位稳固的人则悠然自得。在空洞地谈论调换训练营后，唯一的改善是宋子文来到这里，并受权立刻安排在广东训练3个师，在台湾训练4个师，在南京训练2个师。在前两个地方训练的师完全在他领导之下，由孙立人将军（中国陆军代司令）协助。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这些新训练和装备的军队能帮助控制南方各省，或者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可以派他们去北方，再由那些疲惫不堪、损失巨大的前线部队回来接替他们的原防线。在军事训练方面，宋子文先生的权力扩大到广西、福建、江西，可能还有湖南和台湾。

总之，形势正如今天表明的那样，可能的趋势似乎是：

(1) 蒋委员长开始戴上新头衔，由于更民主和进步的措施加强了宪法，这给了他唯一的机会来抵销增长的不满，并领导得到民众支持的反共行动。

(2) 由李宗仁打头阵的运动将公开向委员长挑战，并团结国民党内部的不满分子和有公益精神的非共产党分子。蒋可能被允许保持他的新职务，但所有紧急权力则被剥夺。这可以导致与共产党的和谈：(a) 一个联合政府；(b) 区域分割；(c) 在美国和国际保护下，共产党被承认是合法的。

(3) 无论是委员长还是李副总统都将不能立即有效地阻止中央政府的崩溃。只有地方派首领和共产党成为国内强大的决定性因素。现政府可以退到长江以南，在广东恢复力量，发起另一场革命。

(4) 国际关系发生某种无法预料的变化，也许使上述任何趋势变得更好或更糟。

文献52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5—1548

南京 1948年5月15日

5月10日，在与大使馆官员的谈话中，李济琛将军无拘无束地讲到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计划和政策。李声明，委员会的基本目的是在中国建立新的国民党政府，代替由委员长、CC集团和某些军事领袖构成的领导。这个领导、特别是委员长个人强烈地相信其一党统治，相信其统治政策，并相信其继续执政有利于民族利益。但是，这种领导的政策普遍消极，缺少民众支持；它仅靠党的机器保持自己的权力，这种权力又转过来靠各种贪污的行径来维持自己。所有这些行径引起对现政府不满，随之而来的是人民的反抗日益增长。这迫使委员长把保住权力作为优先的问题，改善政府甚至内战都相对的不那么重要了。李的结论是，现政府如果在目前的进程中不受抑制，则必定在混乱中毁灭，随之而来的是整个国家落到共产党手里。李说明，他的运动在军、政、财各界得到大量支持，他们都担心国民党的地位全面崩溃。他拒绝指出具体支持者的名字，但证明了他密切协助李宗仁的事实。他说明打算带着组织联合政府的观点，在国统区与共产党进行协商。他没有证明这一行动是在他的新政府组成之前还是之后，但他说会议将由他召集或领导。

他说明有必要与共产党和解的两个理由：首先是任何主权政府或守信用的政府，无论它在什么条件下结束内战，都必定得到人民的支持；第二点，必需结束内战，以便给他的或其他人的政府以机会，在政治和军事上重新将国民党分子统一起来，能够有效地抵抗共产党的发展。

李声明，他清楚与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合作的危险性。他说中共会从苏联得到充分的指导，在联合政府中按苏联的要求行动。中国人现在转向共产主义是因为共产主义给他们提供了“生存”的机会，而在国民党统治下没有“生存”的可能。他认为，在联合政府组织中，他可获得行政和军事的支持，这可以阻止共产党扩张，东山再起。

李清楚而合乎逻辑地说明了他的立场，他显然准备并决心贯彻这些计划。他反复重申，现政府的政策和行动有利于共产主义扩张，并以他过去在广东消除共产主义的经验为证据，证明他对如何解决问题的认识。

我们相信，李计划的行动将在整个国民党中国得到广泛的支持。我们以前经常报告说，由于在内战和其他领域的努力没有任何具体成就，对现政府的不满在增长。委员长最近的行动疏远了国民党的大部分人，包括许多以前的支持者。他最近不同意何应钦任满总理职务……这也许很能表明与黄埔系的关系破裂。在这种情况下，李的出现有可能在党内得到广泛的欢迎，很少有人怀疑他能吸引国民党中国中最有才能的人参加他的政府。如果李在抵制共产党的控制方面是真诚的，他过去的经历也证明了他在这方面的真诚，我们认为有理由假定他能组成比现政府更有能力阻止共产主义扩散的政府，现政府仅仅在不懈地追求失败方面是著名的。

文献53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5—1748

南京 1948年5月17日

阁下：我有幸报告威廉·蒲立德先生（前驻苏联和法国大使）日前访华期间的行动。总而言之，他一直相当坦率地向他的中国朋友说，您坚定地阻止更充足援华的政策，特别是军事顾问，而这是出于个人的恩怨。美国政府中最受尊敬的上层人物——他无拘无束地提到他们的名字——和许多国会领袖在这些问题上与您有基本分歧。巴特沃恩先生与您一样，有反华情绪，但他和国务院其他更好的人只有服从您的命令，无权做别的事。巴尔将军和我完全是二等公民，我们完全屈从于您的意志。中国人只要坚持到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之后，他们可以指望得到他们要求的更充分的援助方式，因为杜鲁门先生不会重新当选，然后新的政策可因日益增长的美选人的真心支持而付诸实施。一些真正第一流的美选将军将被派到这里，帮助他们消除共产党的威胁。中国人——由于他们对于任何人的行动都倾向用自私的动机观察——以此推论蒲立德先生正希望被任命为下届大使。

我毫无穿凿地将此消息通报您，这完全是因为我与蒲立德先生的私人关系一直非常好。但撇开个人争执，就这些观点而言，它无疑使蒋委员长和他那些法西斯式的助手更加相信靠军事力量——现在只有可能靠美国的物资援助——才有可能消灭共产党叛乱。我向蒲立德争论说目前中国争取更自由和民主的方式的一切微弱的努力都被他的言论抵销了。正如您所知，我总是认为，任何美国……援助都没有用，除非结束内战。现领导虽然太愚笨和太不称职，过于被个人或政治因素所专横地控制，没有美国专门

顾问的劝告，将一事无成。但是，正像我坚定认为的那样，共产党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社会和人类的问题，不能仅靠军事力量解决。在中国，政府的失败不仅是因为不完美的训练和后勤。公众的信任越是迅速减弱，军队中的士气越是恶化，对改革的期待就越是迅速增长。普遍认为，只有蒋委员长改变其个人专断和无能，改革才能有希望开始执行一项社会化的政策。才将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改善行政体制，使一般人民与其要共产主义，不如要这种政策，并愿意为维护它而斗争和经受苦难。鼓励蒋依靠不断提供的美国援助，只会导致他更加固步自封，并阻碍一切使他思想现代化的努力。

同样，在现政府内部，我特别注意到两个特点是有用的。一是靠精心计划的公开性。我正焦急地等待布赖恩先生到达，另一点是重建农业计划，如果这个计划真的可以首先训练公民摆脱CC系和其他政治干预的话。

文献54 司徒致国务卿

893.03/5—1848

南京 1948年5月18日

立法院5月17日选举孙科任院长，陈立夫任副院长。孙实际上未遇反对，得到608张选票中的558张。立法委员反对党的控制，他们在该院决定不承认党提名的候选人，这一点他们成功了。他们集中于力量击败陈，将陈作为警察机器和反动力量的象征。在选举日公布的强硬宣言中，他们宣布反对选举将派系和集团利益置于党和国家利益之上的人作副院长。但他们未能联合足够的力量……。

文献55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5—1948

南京 1948年5月19日

委员长今日下午与其首要顾问开会，企图找到对目前行政院僵局的可行的解决办法。陈立夫是最活跃的顾问之一，陈自当选立法院副院长后，更极力表示首先需要国民党内团结，然后政府才能进行改革。陈的观点意在加强委员长内心日益增长的看法，即张群不是领导新内阁的人物，因为他无力提供强有力的领导。CC系主张委员长提名宋子文任行政院院长，委员长看来似乎想接纳此建议。宋已为商讨此事来南京，若确被推荐，也许会接受此职。陈更主张提名何应钦任副院长，仍任白崇禧为国防部长，以弥补蒋和李宗仁之间的裂痕，并使后者积极与政府合作。这种操纵结果如何，无从预料。由过去的行动看来，不能忽视CC系企图恢复已失去的对政府的控制而施此巧妙操纵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宋自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后，一直与CC系眉来眼去，他能提供充分有力的领导，从而使CC系的活动遵守规范。这种可能性亦须记住。CC系数月来声言要担任革新运动的领导，至于CC系的所说所言究竟是空谈还是确系真情，尚有待实际考验。再者，李宗仁是否会采纳他们所规定的路线，或者还是仍保持谨慎态度，现在还无迹象可寻。

总之，局势仍动荡不定。

文献56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5—2248

南京 1948年5月22日

5月20日上午，以简单而感人的方式举行了新总统就职典礼。蒋委员长发表了简短的无懈可击的就职演说，如实现其演说的内容，解决中国内部问题会有长足进展。仪式中唯一的缺点是大大忽略了李宗仁，他在外交团晋贺时被置于背后。

同时，立法院的僵局更加严重了。张群于5月1日前往重庆，因而放弃了出任职务的念头。陈立夫先前曾告诉委员长，张群不可能希望在立法院获得信任票。目前两个主要候选人是何应钦与宋子文，即使宋子文是CC系的候选人，二者均无在立法院获得多数票的把握。

目前的斗争似乎已超过针对个人的阶段，到了国民党内部对委员长的领导大举反叛的地步。做为CC系的候补人宋子文不能保证获得多数票，就是迹象之一。另一迹象是5月20日委员长命令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议案，结果未获通过。由于此次失败，他曾责备陈立夫，并令陈立夫从中央执行委员会辞职。大使馆将设法探悉此提案的性质。5月20日晚，委员长设茶会，招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出席者尚不足2/3。对如此一个通常被认为是君命的邀请不予遵从，加之内阁不能组合在一起，据说已使委员长的心情高度神经质和犹豫不决。

由CC系提出、经委员长赞同的目前的行动计划是：

(1) 最后一次要求何应钦组阁，并要求他明确表态。对何将施以尽可能大的压力。

(2) 如果何拒绝，将由宋子文组阁。如果他感到能取得立法院

的多数票时，他将接受。

(3) 如果宋拒绝，应命令何担任该职，并争取立法院通过。这样迫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委员长的对抗公开化。那时宋可被任命掌管美援计划。

国民党内的反叛毫无疑问较委员长在李宗仁选举时遇到的困难更严重，因为这是对委员长多少年来赖以立足的基础的内部反叛。如果他在此时失败，要恢复控制就困难了。也须承认，陈立夫本人已在极困难的境地中受到打击。面对整个国民党内普遍的大反叛，不象其他许多国民党的领袖，蒋仍能掌握优势，操纵自如。这足以证明他能公开玩弄政治，就象在幕后一样。

李宗仁在此期间的活动混沌不清。据目前所能确知的，他似乎很消极，这可能部分地是因为一场激战后的神经松弛，也可能部分地是由于领导脆弱。他曾私下说，他现在不知道该做什么，因为委员长控制着军队、政府的财政和国民党组织。有一段时期他甚至考虑前往美国，因为他在美国会比在此地更能有所成就。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发展据称似乎是真实的，王耀武将军已被免除其司令及山东省主席等职务。这是国民政府的一个严重损失，因为他是中国最能干的指挥官之一，并在其故乡山东省任主席期间有非常成功和优异的政绩。反对他的因素是近一年来，王曾直接或通过亲信左右考虑在他自己领导下，在山东建立自治政权。他曾与许多美国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并在最近数月试探美国官员：如果他感到南京的发展需要如此行动时，他取得美国财政和军事支持的可能性如何。此事现在一定已为中央政府所知。王氏可能由邓文仪将军替代。因此，山东状况很难改善，因为邓从未统帅过军队，在南京任军事发言人都不能胜任。不过他是黄埔毕业生，完全忠于委员长个人。刚才收到山东省参议会电报，请求在国民政府之外对山东予以财政及军事援助。

文献57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5—2448

南京 1948年5月24日

在我前往台湾作短期访问之前，委员长请我拜访他。我发现他心情比前几天所传说的平静。蒋夫人不在场，可能是因为她的兄长(宋子文)可能被任命行政院长而使她不便在场。

我利用此机会表达了我对目前中国局势的一些看法和我认为应采取的一般措施。我告诉委员长，美国人民对国民大会产生的以及目前在立法院日益明显的摩擦深感烦恼。目前是毅然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候了，应当任命一位能担负此种行动的行政院长。委员长此时打断我的话，表示完全同意此点，并称他确曾希望自己担任行政院长，且对他的计划均已走入歧途表示遗憾。

我接着指出，李宗仁代表的改革运动代表了中国一种不可扑灭的力量。现在正是改革之机，委员长如不作此事，有人会作的。我建议他第一步应先解散CC系。委员长表示他大致同意，并称希望我能随时向他表达我想到的任何事情。他说他明白目前局势的危险性，而未来又有赖于目前发生的事件。他继而说张群任行政院长的问题已不存在，因为他缺乏魄力。在回答我的询问时，他决定不要宋子文，因为宋不能在立法院中获多数票，而且广东方面迫切需要他。委员长说他非常希望何应钦能接此职务。

我问委员长是否反对我去台湾旅行。他立即回答说他不反对我去台湾，并称如需要我时，他会请我回来。

在此次会见后，傅泾波拜访何应钦。何应钦对委员长相信他会接受行政院长一职表示非常惊讶。

文献58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2/5—2448

南京 1948年5月24日

5月23日晚，何应钦终于拒绝了总理职务。由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赞成，委员长提请立法院赞成翁文灏（国家资源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在冷清的会议上，没有提出其他人。最后投票以499:94批准。翁被承认在经济事务和个人正直方面是合格的人，但他没有力量，没有私人追随者。委员长向立法院证明这一选择是正当的，根据是翁将讨外国新闻界的喜欢，他作为经济专家，将是监督执行美援计划的合适人选。

选举翁基本上意味着没有为国民党内的政治危机找到解决办法，其解决只有拖延。我们认为，翁将发现他本人处于不愉快的地位，在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的委员长和难以对付的立法院之间，他将无可奈何。

文献59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5—2648

南京 1948年5月26日

在我们看来，李济察元帅作为政府领导人出现，在国民党中国将受到除委员长那些最亲密的助手外的所有分子的广泛欢迎，……正如我们以前报告的，在有政治意识的个人主义者中，普遍担忧现政府缺乏有效的领导，这促进了共产主义迅速扩散。共产党的军事成就、政府经济困难、人心浮动、委员长在组成政府的任

命上的手腕、他目前寻找可接受的总理的困难以及他为此职务选择了政治上无足轻重的人，这些都在加剧这种担忧。深受弊政和领导无能之害的群众，日益把造成困境的责任加到委员长和他的亲信身上。委员长近来威望大损。在这种形势下，政府领导的更换会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欢迎，如果新政府能赢得人民的信任并推进民主政策的话。中国目前极度需要鼓舞人心的领导。李济琮将军被普遍承认是称职的行政官员，他的爱国精神和个人品格也无懈可击。他可能会得到有政治意识的分子的信任。李调解中国内战的政策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人们对现政府有能力作出成功的军事解决失去信心。鉴于上述因素，鉴于李济琮在军队的基础和他是委员长之后在中国较年长的军事指挥官这个事实，并考虑到他与各省政府现领导人的密切关系，我们认为完全有可能的是，他的运动可以证明是国民党内意见不同分子的结合点。如果他的运动从香港移到国民党地区，可以吸引足够强大的支持，使之能够产生有效的政府。

关于相对无效率的现政府和假定李济琮领导下的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政府间的问题，国务院会理解，涉及的因素太多，无法做出肯定的判断。但我们相信，现政府缺乏并将永远缺乏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能力，除非能找到必要的鼓舞人心的领导，团结人民，恢复国军的战斗意志，而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不能指望委员长提供那种领导，因为他没能力改变现状，所有证据表明他打算坚持个人统治，这导致了目前糟糕的状况。除非我们冒险卷入中国事务，担负起直接指导中国军事的责任（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的），可以预期政府的地位将进一步崩溃，最终被内部的诸如由李发起的革命取代，或者直到它被共产党取代。目前不可能明确预言，李将军领导的政府在利用国家、政治、军事和反共的经济资源方面，能比现政府更有力量和更有效率。不过，那种政府会有较大程度的公众支持和信任，基础会更广泛，可以指望吸引和利用比

现体制更多的人才，但这些能否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尚难肯定。可是毕竟李济琛、白崇禧、李宗仁的两广（两广省——广东和广西）成为全国省政府的典范，这一点是鼓舞人心的。

文献60 司徒致国务卿

711.61/6—948

南京 1948年6月9日

6月4日，新任苏联大使罗申约见我时作了自我介绍。他询问我对中国形势的印象。对此，我相当坦率地予以答复，描述了每个人都知道的真实情况。他问我是否认为委员长也明白真实的军事处境？我答复说，他知道事实，但可能不知道其含义。罗申自己评论说，至于战略地形方面的现实，委员长的战区司令们多半在隐瞒委员长。

文献61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6—948

南京 1948年6月9日

在6月5日的大使馆会议上，巴杰（西太平洋美国海军司令，海军中将奥斯卡·C·巴杰）讨论了他对目前中国军事形势的看法，并表示确信，共产党占领满洲和华北，会使苏联在远东的战略优势增加到威胁美国利益的地步，如果美苏之间爆发战争，苏联的东方防线会是坚不可摧的。他还表示相信，国军现在缺乏阻止共产党占领满洲和华北的能力，主要是因为缺乏有效的计划和有力的领导。而提供高水平的美国计划参谋人员，会使形势转向有利

于国民党。他得出结论说，他认为他有义务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这里的形势，并建议向中国政府指派美国计划参谋，参与指导政府的反共作战行动。

6月8日，巴尔接到魏德迈的电报，要求驻华军事顾问团说明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并介绍美国参与国民党军事规划的情况。魏德迈的要求提出“为陆军部长准备简要的介绍，以在参院委员会前作证”。

我们从以上的报告中得出结论，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变得关心政府在华北的军事地位变化，关心共产党不久将占领华北和满洲的局势。我们汇集了巴尔和巴杰的建议，可能会被参谋长联席会议赞同和接受，他们知道华北在美国战略需求中的军事意义，同样清楚事实上政府的军事缺陷主要是未能沿着南京最高参谋部的路线设想和执行适当的计划。我们知道巴尔和巴杰提出的行动的含义，同意采取那种行动是必要的，如果中国形势的恶化被制止、形势转向对我们有利的話……。

文献62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6—1048

南京 1948年6月10日

中国政府由于得到我们的情报而惊恐万状。情报要求在中国的美国人注意，军事形势在恶化，那些不愿在共产党控制下的美国人应在交通正常时撤离。我们考虑到，可以利用这一情况，推动中国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改善华北的军事形势。我们感到，对于美国，总体说来支持中国的责任重于提醒单独的美国人的责任。我们感到，在其他任何情况下，我们的警告不可能被注意。

因此，我于6月5日会见委员长，告诉他我们对华北军事形势恶化的关心，我们决定劝告我们的公民从那个地区撤出。然而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反对我方的那种行动，因为会严重损害国民的士气。我说我对没有事先与他协商便采取那种步骤犹豫不决。如果他能使我相信，他准备采取我的军事顾问巴尔的那些必要和有可能稳定华北军事形势的措施，那么我说我准备推迟向美国侨民发布这一通告。蒋立刻表示，他完全心甘情愿地、最大限度地接受我们对军事问题的劝告，他说他会给予美国人全权去制订和监督执行计划，并授权计划人员指派人对执行他们命令的情况作必要的调查。他询问我有何看法，我提醒他注意对美军顾问团的命令的限制，并且我们不愿承担完全不属于我们的义务。他对此表示不解，并询问我们在这方面的政策是否可以重新考虑。我答复说，当然有重新考虑的机会，如果有更多的证据表明现在提出的劝告正付诸实施，机会就会增加。

然后他问到在军事领域的具体建议。我说，作为总统，他应该把对军事行动的日常指导委托给得到巴尔将军密切协助的国防部长，他们应向你报告主要问题。我还提出，应为各战区建立自治和独立的指挥部，以便使指挥渠道合理化和系统化，这些指挥由司令部指导和控制。蒋赞成这两个建议，并同意考虑充分授权指挥华北和满洲的最高司令。

6月6日，傅泾波会见蒋。蒋反复重申，他期待美国人的建议，特别是在军事问题上。他说他深知政府现状非常严重，他仍试图为国家尽最大努力，但感到业已衰老，精力不如往常，并担心完成不了什么大业。他表示他期望与美国人密切合作，他没有直接说，只是暗示政府中有影响的分子反对那种政策。结束谈话时他说明，他有自己的理由尽可能保持与美国的直率的和信任的关系。

从以上和其他我们报告过的与委员长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蒋

坚定不移地决定保持坚定的反共立场。他承认没有我们的援助，他无能为力，他不仅心甘情愿地接受我们的援助，而且接受我们的劝告和指导。我们相信，他的这些态度完全是真诚的。但他在政府的内部集团中遇到巨大的困难。这些集团主张不惜任何代价结束内战，并坚决反对与美国合作。我们已报告了这种情绪的不满程度，它确实有在有影响的人中间存在。当对战争厌倦达到那种程度时，毫无疑问这种情绪会产生，并确信政府的事业是失败的事业，认为我们既缺少主意，又没有能力向政府提供其生存所必需的足够和合格的援助。

尽管我们情报详尽，但有许多迹象表明，那些拥护和平，主张与共产党联合的人为了撤换委员长并通过谈判结束内战，已经开始实行一项计划。我们相信这一计划确实存在，但还谈不上这种威胁迫在眉睫。如果他们作出这种尝试并取得成功，几乎肯定会导致转向地方自治，损害现政府的稳定，并可能会加快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确信，我们必须向蒋提供由他认可的和必要的支持，除非我们准备坐视共产党在中国的影响极度扩大，并接受不远的将来整个国家被共产党控制的前景。我们充分了解，美国的资源有限，我们到处承担义务，我们知道那种行动的危险性，我们还感到，如果我们不作出选择，我们就是玩忽职守。

文献63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蒋介石/6—1148

南京 1948年6月11日

大使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对我们说，他仔细地观察了委员长两年，觉察到他正明显地衰老。即使委员长在谈话中不断用笔记下

别人讲话的要点，但仍不能象过去那样迅速作出决断；他越来越不知道他的指示贯彻得如何，越来越健忘。傅认为，委员长已变成一个疲乏的老人，不能有效地应付事务，日趋丧失威信，不可避免地迟早会被解除职务。

虽然如此，傅同意假如委员长下台的话，国家将会重陷分裂的看法。他建议采取适当方法，劝委员长放弃国民大会赋予的紧急权力，找一个强有力的总理实行必要的领导。困难在于委员长长期支配中国局面，找不出一个有分量的人来代替他领导。

文献64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6—1448

南京 1948年6月14日

阁下：我有幸报告中国最近的政治形势。由于局势动荡不定，这里又经常发出无线电报告，我暂不在本文给予评论。

决定性的问题仍然是蒋委员长的人格和个性，他完全了解目前形势的恶化状况。他耐心听人们说，假如不改弦更张，灾难不可避免。他好象决心按宪法对他的新职务规定的原则办事，但实际上他办事方式很少改变。

我曾希望，任命何应钦将军为国防部长之后，真正赋予他指挥军事行动的权力，巴尔将军可以同他密切合作。我曾为此力促委员长。他也保证同意，但条件是，必须随时向他报告有关事务。我为此同何将军谈过不止一次，他欣然同意并表示尽力而为。然而委员长不久就发出了一道命令，说一切军事行动必须根据他的指示办事，而他的指示是通过无能的参谋总长顾祝同将军发出的！

白崇禧将军的国防部长职务被解除，这可能是由于他在选举中帮助李宗仁的缘故。以后他被委以重任，指挥黄河和长江之间

的五省军队，但不允许他组织这个地区的民兵——这是他一贯强烈要求的，并且其中有些地方，例如武汉等城市周围，也被划出他的管辖范围。他一气之下拒不接受任命，去了上海。委员长对此并不懊悔，并且说这没有什么关系。他似乎怀疑广西派系反对他。这样一来，他失掉了同舟共济的一些人，而这些人本来经过一切考验，既忠于他又忠于国家。

几天前，我从可靠的方面接到李济琛将军从香港写来的信，要求同我接触。他暗示共产党问题不是不可能解决。经过一些犹豫，我把这封信交给委员长。他看了以后，表示怀疑李将军，究竟有多少能力影响共产党。我回答说，我关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所有非共产党人士能够以国事为重，抛弃前嫌，面对共同的危险联合起来。我接下去说，他应当领导这一努力。他表示同意，并授权我酌情处理，但不要直接给李将军复信。

近来出现的这些情况，可能你已熟知。我对努力影响委员长的想法已经比任何时候都感到灰心。我可以很容易见到他，并被邀请同他进行无保留谈话。但没有一个中国人胆敢这样和他谈论。甚至他最亲密的同伙也是如此。这些人都悲哀可怜地期望我去同他谈话。然而我眼看着这江河日下的局势，已感到无力挽救。我有时感到困惑，他的顽固执拗程度究竟有多少是出于他的性格和习惯，有多少出于他对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怀疑和恐惧。有件事可以肯定，假如我们能向他保证，我们将和他一起对付他的敌人和抵毁他的分子，但他必须不折不扣地实践他的诺言，我们几乎可以让他同意任何事情。自然这是不可能的。目前我们最好的策略是忠告和敦促，而不是象他所希望的那样，深深地卷入中国事务……

反美情绪广泛扩展，具体表现为抗议我们扶植日本……解释这种现象相当困难，认为它完全出于共产党或苏联的挑动，太过于简单化了。打入教职员和学生中的共产党代理人所做的巧妙的宣

传和组织，自然有助于制造这些运动。但这么多人卷进去，其中包括许多平时亲美的人，说明运动本身有其使人易于接受的原因。这也许主要是由于自上世纪末就产生的害怕日本的心理，我们无法想象其反应和深度。由于对我们在日本的行动所做的歪曲报道，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官方的报道；由于公布德雷珀报告和类似报告而产生的误解和错误推论；由于讽刺说我们为了准备对苏联作战而不惜牺牲中国；自然也由于有意和持续不断的恶毒宣传，反美情绪更加扩大化。另一个真实的原因是人们对现政府的普遍不满，美国却同这个政府的存在和缺点有着不合理然而却是想得通的联系。学生比其他阶层的人更敏感，他们极度失望又没有出路发泄他们的爱国热情。在目前令人沮丧的情况下，煽动反对美国扶助宿敌日本，自然非常有吸引力。除了这种心理和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反政府人士的利用外，还有自私和缺乏远见的工商界人士，他们想避免与日本竞争。举例来说，利润很大然而效率很低的上海纺织工业主，他们想把持上海和东南亚的市场。因此，极左分子和愚蠢的资产阶级利益奇怪地结合起来，反对我们在日本的做法。我们无法使这些做法一点也不产生合情合理的误解。

文献65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6—2548

南京 1948年6月25日

……政府的军事形势继续恶化。前线指挥官把所有与敌人的接触都报告为打了一场大仗，他们或者撤到安全的设防工事内，或者简直就不战而降。南京最高统帅部大概没有从前线指挥官们那里获得真实和具体的作战情况，对于它向前线发出的命令，指挥官们是各取所需地执行。目前尚没有军事总崩溃的现象，但也没

有出现阻止形势继续恶化的显著因素。中共军队由于物质和粮食的缺乏而感到困难，但仍然占有军事优势，而且形势肯定会这样继续下去，除非国民党人能发挥进攻精神，改进指挥效率。……

文献66 司徒致国务卿

893.032/6—2548

南京 1948年6月25日

……立法院除了做破坏性的批评外没有其他行动，在这个时候，行政院拿不出能吸引大众热情和支持的积极具体的办法来。这个新的立宪政府没有多大成功的希望。不管旧政府有多少缺点——缺点的确很多——它有时还能够采取某些有效的行动。目前，从最初的表现来看，新政府还不具备这种能力……

文献67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6—3048

南京 1948年6月30日

阁下：我有幸向您报告我最近到北平旅行时获得的关于反美情绪和其他目前状况的印象。由于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引起了对我国的攻击，特别是在报纸编辑人、教员和学生中间普遍流传，非常强烈。燕京大学的学生加入北平学生联合会，因此我取消了在该校6月29日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但在典礼几天之前，我到那里过我的生日。这使我有更多的机会，深入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我曾同他们分别举行了几次会谈，最后一次是会见城里去的学生代表。所有这些会见都在报上广为宣传。我这样做的理由见1948

年6月14日我给您发出的电报末段，但我的感觉却比我以前的想象强烈得多。大部分学生团体中——假如不是所有学生团体，无疑普遍有所谓的“职业学生”，他们巧妙地煽动和组织了最近的学生骚乱，但他们无法制造目前普遍存在的情绪。最有力的原因大概有如下两点：

(1) 苏联长期以来用通俗易懂的读物向学生思想渗透，影响之深出乎我们料想之外。

(2) 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不满，认为它是所有困扰的根源。他们情绪沮丧，并不惧怕共产主义，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比他们目前的境遇更坏了。

反美情绪产生于以上两个因素。苏联的宣传经过深思熟虑并显得富有条理。他们想推翻我们支持的政府，我们的援助及其目的被严重歪曲和误解了。日本的事例被用来证明我们的“帝国主义”意图，说我们准备在将来对俄作战时利用日本和中国。对他们说日本重新武装对中国威胁是假设的，至多是遥远的将来的事，而已经丧失外蒙和即将丧失内蒙和东北(满洲)，则是当前的危险，他们似乎根本听不进去。向他们讲述俄国人在上述地区的行为，他们半信半疑，或者简直无动于衷。这真是一种令人费解的变态心理，但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心理，因为学生们今日所想者标志着整个国家未来的想法。

中共近来对恢复政协和谈又表现出细微的兴趣。难以理解的是，他们并没有把蒋介石的引退作为先决条件。他们似乎不再顾及他的下场。他们暗示，假如我们美国人真的希望和平，我们应当撤走所有美军，以表示我们的诚意。他们认为，撤走美军是我们表示进行调解的方式之一。我对此正报着一种友好而消极的态度。我对他们保证说，大门是敞开的，如果他们愿意走进大门的话。

在首都和上海，沮丧和失望现象愈来愈严重，标志是疯狂的

通货膨胀和更加疯狂的谣言。照这个速度演变下去，很难设想局势还能维持多久。宋子文认为崩溃不可避免，正集中一切力量加强武装广东。在达到此目的以前，他甚至对邻省如何都不加以考虑。

如果没有美国持续不懈的指导，军事形势不可能改善。这比任何时候都更明显。然而，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提醒我们，假如给予支援而不顾其他因素，结果只能使局势更加恶化。我不需要再次评论进行进步的行政改革和土地改革的必要。但我冒昧再次敦促改善我们自身宣传的价值。我们焦急地等待布利安先生到来。我们还认为，一个或更多的美国知名人物来此演讲两三个月，将有所裨益。真正知名人士呼吁爱国主义立场的讲演，会引起知识分子群的注意和倾听。我心中想到已故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以及芝加哥大学校长B·M哈钦斯，麻省理工学院校长K·坎波顿和哈佛大学校长G·B柯南，等等。

五 统治的崩溃

司徒雷登报告了国民党中国1948年惨淡岁月里的厄运。共产党正赢得这场战争，而蒋介石则无视规劝，误失军机。他挑官选将仍旧任人为亲而不是任人为能。通货膨胀的程度令人瞠目。失败主义使政府心灰意冷。到年底，司徒已经不对蒋抱任何幻想了。

失败使得司徒一蹶不振，他日益挑剔美国政策，认为美国情报方案毫无效果；对华援助从未充足，且没有用场——仅能延续战争。而中国需要和平。

这一信念表明了司徒与其大使馆同僚的尖锐分歧。他们的一致之处都相信，国民党中国将不久崩溃为一些自治地区，或者，政府将不得不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但他们在美国所取方针上认识不一。外交行家们论证联合政府的危险性，极力主张建立自治地区政府以继续抗争。司徒则怀疑地区抵抗的有效性，竭力寻求国共联合的可行性。他相信美国主要目的是维持中国的独立，并提醒华盛顿，中俄具有敌对传统，毛泽东能够被促其沿袭南斯拉夫的

铁托政策。

司徒所抱的国共联合的希望，在1949年初消逝了，1月21日蒋突然暂时引退。这一非常之举使副总统李宗仁能够向共产党谋和。但共产党拒绝了。李宗仁除继续抵抗别无选择。

预料到国民党必将垮台，现在，司徒力主将美国对华政策来个颠倒，他大胆倡议美国在共产党中国的角色，并请求准许他与共产党领导讨论这一问题。但杜鲁门政府反对与共产党接近，未加批准。

文献 1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7—648

南京 1948年7月6日

过去一个月里，中央政府的威信和权力低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突出表现为开封一线的军事溃败和中国法币在商品和外汇市场上的跌落。据报，似乎除傅作义外，国民党指挥官员皆避而不战，临阵脱逃。南京最高司令部承认开封已为共产党攻陷，守军未作抵抗。而且，共产党进攻部队中甚至还有若干国民党部队参加。最近鲁南战局也呈现出类似情况。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认为除个别事例外，不可再依赖国军作战了。

经济恶化也值得注目。法币贬值后公布的新生活指数，引起工薪阶层的抗议。他们理直气壮地声辩，按这一指数，他们的收入尚不够购买生活必需品。虽然他们言之有理，但果真将指数增高到能满足基本需要的程度，政府和私营企业必将破产。物价虽

能稳定一时，但很少或甚至毫无办法阻止其他方面暴涨及由此引起的与日俱增的不满情绪与社会动荡。

如同以往一样，政府对此似乎一筹莫展。军队也好像无力稳定任何战线或把局势恢复到对政府的有利处境。行政人员皆坦白承认他们无法遏制目前的恶性通货膨胀。

如前所报告，蒋委员长因国家状况遭到普遍和直接的指责，因未能对目前形势采取有效措施而遭抨击。无疑，蒋委员长也知道这些批评及其份量。但他的反应却是，在可以信托的位置安插他的亲信来保护他的地位，至于这些人是否早以无能或贪污或两者兼有而臭名昭著，则全然不顾。

鉴于蒋委员长不能以其权力改善时局，地方军政长官被迫考虑区域谅解或组织区域政治结合以应付南京政府失败或权力崩溃的局面。

如上所述，由于现政府威信和权力无法避免的衰落，地域主义和特殊主义是那些自谋生存或另谋出路的人们的自然反应。现在尚不能预计什么事件会使总统与任何可能的区域领袖间发生分裂。这也许会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公开行动或任何类似的有损总统的威信的事件引起。但无论如何，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所担任的角色是不愉快的。普通人心目中，总把我们和政府拴在一起，以为是我们扶持政府继续当权。我们常常被诘问，为何我们的政策要保全一个似乎已自取灭亡的政府而其实反而是替共产主义蔓延铺平道路。我们虽以蒋委员长的反共的坚定立场来回答这种诘问，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立场也仅仅是徒有其名而已。蒋政权若再继续下去，整个国家将陷于混乱的深渊，共产党也将因此夺权，或者，使急于保住自身的地区领袖取得权力。

文献 2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7—1248

南京 1948年7月12日

上周的诸事件将政府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并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未来事态的可能模式。据交通部长俞大维、外交次长叶玄绰及教育次长韩里悟(音译)反映，目前街谈巷议的是人们普遍怀疑政府的继续存在。这些舆论导致政府各界出现了日益增长的沮丧心理和失败情绪。我们也都怀有同感。渲染一时的“河南决战”^①仍未见分晓，而显而易见的则是大批共产党军队也许已穿过陇海铁路，或许已隔断徐州。总之，政府损失惨重，部队减员无法补充。据传教士们报告，共产党在上个月就沿蚌埠以北的乡村进行组织，并控制除重兵把守的据点以外的一切地区。零星不断的罢工浪潮与上海和长江流域城镇的抢米风潮呈现出日甚一日的内乱。而枪杀北平学生^②的后果对政府来说不堪设想，它使学生更加醒悟。

各省地方军政长官与南京军政长官一样对局势忧心忡忡。在地方，国民政府统治的崩溃无疑是指日可待了。

正如我们所观察的那样，蒋委员长作为一个政治因素，其重要性正日益缩小，这已是确凿不移的估计了。人们普遍地谴责他无能，诅咒、责备他顽固地拖延内战直至自取灭亡。同时，我们意识到，他并不愿意放弃所握的权力——尽管他一定意识到他的

^① 国民党军为摆脱中原战场被动局面，部署重兵，寻歼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进行“河南决战”。人民解放军以华东野战军为主力，发起豫东战役，歼敌9万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战略意图。——译者

^② 7月5日国民党北平当局命令军警向北平的学生游行队伍开枪，打死学生18人，打伤100多人，逮捕37人，制造了“七五惨案”。——译者

日子是屈指可数了。就象我们以前所报告的那样，几乎可以肯定共产党不会与包括蒋和其他同党在内的任何政府讨论和谈。而目前政府进一步抵抗共产党的能力看来也好象山穷水尽了。

我们曾报告说，相信随着政治势态的新进展，结果很大可能是采取一些地方政府形式。至于这些地方政府间将是何种关系，现政府是否因此得以幸免而继续存在，还是现政府被移植或限制到有限的地位，在目前还很难说。

这种形势下，我们不得不考虑我们将要充当何种角色。在这种考虑中，只有少数几种因素我们能够当然把握。其中之一就是，现政府的处境业已恶化到我们的影响大概无力保持其现状的地步，因为它对人民的声望以及其领袖对人民的声望都同样消失殆尽。它并没有进行它所应该进行和能够进行的努力，以求得自救。而我们，则被普遍地看成是政府原则上的支持者，没有我们的支持政府就不能生存，我们要对维护一个不得人心的统治负责，并与它的失败卷在一起。如上所述，如果地方政府出现，那么，国民政府或许消失或许成为其中之一，并且实质上是几个地方政府中不最重要的一个政府。我们认为这些事态发展极有可能。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将不得不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决定我们对各地方政府支持的性质和程度以及我们与它们的关系的性质。确实，我们应将地方政府的出现当成现政府自然演变的一个明显迹象。如果我们将来在这个国家施行我们的影响，那么，就必须采用与以往不同的方式。我们发现，人们纯粹是基于我们的援华方案延缓了国民政府不可避免的崩溃的考虑，才厌恶援华方案的。

文献3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7—1648

南京 1948年7月16日

各种报道及灵通消息表明，现中国政府的寿终正寝已不要很多日子了。但无论如何，政府决不是没有很大的残留实力，这种残留实力一直表现出对李宗仁的轻而易举的牵制，就象选举所表现出的政府衰弱与人民不满一样。尽管政府活力很容易被低估，但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的继续冲击，加上政府又不能进行果断改革以缓和局势，将迟早置政府于死地，这一点看来是很少怀疑的。如果政权易位，某一统治或某些统治必将取而代之。

现政府一旦寿终正寝，各种可供选择的局势将会出现。而最有可能的是：(1) 共产党主宰全部或大部中国。如果国民党抵抗一阵但并无主要的改革行动，尤其会这样。(2) 出现一些地方政府。(3) 比较自由、较得人心及较有成效的国家政府取代 CC 系控制的国民党，这样至少能维持象中国目前这样名义上的统一。若后两点中的任何一项得以变成现实，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必是一个多少可以依赖的重要因素。

民革有如李济琛将军、冯玉祥将军及蔡廷锴将军这样著名的杰出首领，其个人影响会可望获得极多的军事支持者。如果他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政府，这一集团的最基本方案是要求耕者有其田，立即停战，组成全国联合政府，这正与中共目前的政策相符合。并且，民革不仅与十分活跃的香港中共代表及广东地下党组织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而且据称也基本上理解中共领袖人物的主张。不过，李将军及他的某些随员坚持说他们的目标基本上是反共的，现在的联合仅系一种必要的临时性的权宜之计，其方案仅

仅是为了能够获取当今中国广泛的民心支持。

民革为了准备这一政变以取代国民政府（这一政变已向美国官员作了大致的介绍），正在国内执行一项计划以争取那些得宠于蒋和失宠于蒋的核心人物的拥戴。

当然，在这一集团发起公开取代现政府的运动之前，难以判断最终谁将支持民革。如果这一运动基础雄厚，也许他们的政变计划能够成功。如果现政府彻底垮台了，民革会在可能产生的一组地方政府中起决定性作用。

文献 4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7—1748

南京 1948年7月17日

阁下：我谨报告，7月16日晨我晋谒蒋委员长，向他提出我认为是在目前极端危急的局势下稍有指望的唯一忠告一事。他曾问我有何消息，我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消息是共产党将在下月召开大会，大会议程中有组织联合政府的意图。据大使馆收到的来自香港的消息，李济琛打算在最近的将来成立西南地方政府，并试图建议与共产党联合。中共广播谴责铁托和其他一些人，公开将自己投入克里姆林宫专政下的世界共产主义。将上述事态与广播相联系，构成我将提出的建议的背景。这建议即是，由他（指蒋介石——译者）来召集几个受到一般人尊敬的领袖，敦促他们为了中国目前真正面临的危机抛弃所有的个人与政党偏见。这个危机就是共产党得胜后，中国将丧失国家的独立。这已不再单纯是国民党对中共的一个政党的政治问题，而且也是民主和自由与受莫斯科操纵的少数人专政两者的基本原则之争的一部分。中国革命与抗日战争都是为了争取国家独立，但这种独立现在正处于危

机之中。在这危机中，他与所有其他人，应将国家置于其他无关紧要的问题之上。

总结这次访问的情形，最显著的印象是徒然白费。我很怀疑蒋委员长是否有那种伟大品质，使他能够召集那些不完全顺从他的领袖人物，并视他们如同志，让他们各抒己见，最后求得意见统一、决策一致。20年来的习惯，加上中国的传统观念，这是难以改变的。即使他有意与这些人携手合作，大概也不会十分宽大开诚地交换意见。而只有开诚布公交换意见才可以换取信任，同时也可以改变群众的印象。任何联合发出的宣言都表明了这些限制，并且不能使人信服。蒋仍想拉拢其所宠信的人，但结果更糟。除了这样一个极为诚恳和迫切的联合号召以外，无以动员已趋消极与绝望的中国人民，使他们看到政府上层发生的新气象。除我已进行的努力外，进一步的敦促就只能是暗示给他较可能多的美援，或是说服他放弃他自己的见解。但这两种情形都是违背他本性的，所以可以肯定结果差不多是不幸的。因此似乎是应当允许他自行其事而能在相当范围内采纳他人的建议。否则，早晚会出现逼他放弃权力的运动。他好象认识不到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不安的极端形式，中国历史经验教训中所总结出的恩威并施的方法是不能扑灭共产主义之火的。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坚持不懈的勇气在以前的抗战时期极能唤起广泛的抗日意志。但可悲的是，到现在它们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解决问题所需要的迥然不同的方式的障碍。

文献 5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7—3048

南京 1948年7月30日

阁下：我谨就中国的共产党问题的可能方案加以论述。主要的是以中国百姓的民生为出发点加以评述。

目前比以往更明显地表露出，任何一方都不能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即使中央政府垮台或瓦解为地方政府，中国广大地区也有足够的反共情绪来维持旷日持久的抵抗。在最近的将来，共产党本身也难有希望接管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家。正如您在中国时中国人民所表明的那样，中国人民至今尚无共产主义的准备，也不具备推行共产主义所需足够的久经锻炼的全体分子。

举国上下几乎不惜代价地渴望和平。政治上的有识之士在国共两党之间已很少选择了，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国民党更加自私自利、腐朽无能。也没有理由认为这是通常意义上对执政党的不满。失望和不满继续渗透到政府和军队各界。维持抵抗的主要因素只是蒋委员长的顽强意志及我们业已给予的或他们今后仍渴望的美国援助。

基本症结是经济——这是民生的一个主要问题，然后才是政治。民以食为天，知识分子(包括学生)也一样。而共产党则比人们预料的更关心民生。他们显然感到仅仅彻底平分土地尚不够，在农业中甚至还必须增加工业化和机械化。他们已尽量调整策略，努力争取地方商人、小业主甚至大城市的资本家和实业家。

倘若不久后对和谈的压力强大到不可抗拒的程度，那么，在那些仁人志士眼中最佳的——或最少遭人反对的——方案将是什么？看来有两种可能的方案，一是从政党意义而言，国共两党仍

旧维持各自的权利和权力不变，但这不可能指望共产党加以考虑。再者就只能联合政府，或者是在象征性的全国政府下划疆而治。非常可能的结局是两者的混合。如果这两项方案中的一项确系漫无止境的政治动乱和经济危机形势下的唯一选择，那么，在中国人眼中它是不是迅速结束这场动乱和危机的最佳方案呢？

估计共产党宁愿继续战斗，因为他们正节节取胜，并有希望最终取得更大优势。但假如获得这种控制的优势，他们必将为恢复问题所困扰，并自然而然会引起公愤，最终会转而发现，他们并不能解决民生问题。政府领导无论现在或是将来除了我们别无依赖。鉴于我国的执政可能更叠^①，看来需要使我国的对华政策适应最近势态以便保持起码的延续性。

我们完全相信，除非确实开展充分的、大张旗鼓的改革，以赢得人民信任和拥戴，我们所予的任何数量的军事指导和军事物资，都不能造就中国的和平与统一。很难设想现在的当政者会进行——那怕是试图进行——这种改革；同样很难设想能够采取迅速有效的方法来改变当政者目前积重难返的态度。然而，若改革的开展无法保证，增加军援的意图就应从各种实际出发深谋远虑。即使在最有希望的情况下，这种援助也可能要从明年1月起约两年以上的时间，方可达到目的，因为需要时间来整训新师、收复失地、提高士气。

不论我们现在如何看待联合政府，能否从政治家的长远眼光出发考虑，在有助于避免与共产党联合所产生的危险的前提下，扩大对新政府的军事和经济的援助。军事援助当然仍照原方式，包括改组、整顿全军。没有这些，政治稳定与经济恢复就没有指望。经济援助将包括重建计划，这主要在获取和平后以贷款为基础来进行。如果现行的农村恢复计划象我们希望的那样富

^① 指194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杜鲁门与杜威谁能问鼎白宫，这时尚未分晓。——译者

有成效，那么这种经济利益形式将会与公民意识和开明观念相辅相成，我们也就能够加强诸如现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选举自由等项条件，并开展一个坚强有力的公开性运动，以抵销共产党的少数派统治的企图。这样，最终结局将是各党派在民主程序下为各自的施政方案开展竞争。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美国希望在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方针上继续扮演积极角色，那就必须在两种分明的对比中做出选择，或者增加军事援助以期出现所需改革，使现政权永远维持下去，或者援助必将从目前冲突纷争中诞生的任何形式的国家政权或松散的地方同盟政权，通过我们的重建计划来改善经济、满足民生、矫正民心。

文献 6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8—1048

南京 1948年8月10日

中国局势继续恶化，前途黯淡，冲击政府的浪潮仍未平息。我们相信，对我们来说，是审时度势并决定我们进一步的行动方针的时候了。

现做如下概述：

1. 军事方面：战争中共共产党节节胜利。他们掌握着主动权，保持着攻势作战的全部优势。而政府军看来缺少作战意志和能力。投共消息时有所闻，但却未曾听过共产党投向政府军的说法。除少数分散的中心城市如北平、天津及若干交通线外，华北、西安以东和长江以北的绝大部分地区都被共产党所占据。共产党目前看来要肃清鲁境的残余国军，以作为向南对南京发动全面进攻或向平津地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序幕。在华中，分布于长江以南的

共军在农村加紧活动，制造混乱，其意显然在于进一步削弱政府，准备未来的大战。在华南，虽然共产党游击队活动较少，但可以从容行动，政府没有军队与之对抗。

这是一幅黯淡的图景。人们或许指望能设法改变这一局势。然而政府毫不理会合理的作战建议，坐失军机。这多是由于政府及军队领导无能堕落，由于蒋委员长任人唯亲而非任人唯能。在分配急需的军需供应时，有作战能力的人，如傅作义，则名列榜尾，几乎要他们自力更生。而早就确立的训练新军和补充军队计划，不是没有执行，就是执行太慢，实际上对未来数月的紧急局势不起作用。军事局势的危急一目了然，但看不出有应付这一局势的意志和能力。

2. 经济方面：通货膨胀仍然迅速地呈螺旋上升之势。物价已到了天文数字，其上涨之快，使政府来不及印出每天所需钞票。结果，以物易物就日益成为一个定规。

3. 心理方面：在连年战争与破坏之后，如今，包括国共区域内的上下层人民的最大要求是和平。鉴于绝大部分人看到目前情况下没有一线希望，这一要求也就更加坚决。失败主义情绪盛行全国，甚至部长阶层也是如此。人们几乎毫无例外地相信，如政府不大加改组，恢复聊以度日的生活水平就毫无希望。因此，大家几乎不顾一切代价渴望停止战争，有着压倒一切的和平愿望。然而，蒋委员长所求的则只是军事上战胜共产党，没有人能够动摇他的决心，实现和平。

4. 蒋委员长本人：普遍都在批评蒋委员长领导无能，但却没有人能提出谁能取代他。是他维持着这泱泱大国，没有他，中国的崩溃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与他的长期相处证明，他不再能够标新立异、推行改革，也不能撤换庸官选挑能将。除非他能够团结一切力量扭转目前趋势，相当时期以后他将不可避免地被唾弃。然而，蒋委员长是有策略计谋的人，并且，有证据表明他正

试图寻求一种办法，一边继续与共产党交战一边防止中国地方割据的再现。他派前行政院长张群去华北、西南活动，提出地方自治以换取地方继续效忠南京。我们有理由相信，张群此行并非徒劳。有一种改组国民党的积极而剧烈的运动，使自由主义分子在政府中占有更多的位置。现在表明，在翁文灏院长领导下，政府正勇敢地致力于经济、财政改革，这一改革不久即可公布。但是，除非这些计划中的有力措施能产生奇迹，从而维持蒋委员长与国民党的统治，我们将会看到与共产党有某种妥协或者发生地方分裂，或是两者一并出现，而这最为可能。

虽然目前某种形式的联合政府似乎很可能，但我们相信就美国立场来说这是最非所愿的。我们这样说，是因为包括有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的历史，很清楚地表明了共产党用政治手段控制整个政府及进行获取某种国际承认的能力。我们怀疑一个共产党政府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除联合政府外还能够借其他方式获取全国政权。因此，我们愿建议：美国应谋阻止联合政府之组成。欲达此目的，最好的方法是继续给予和增加（如果可能的话）对现政府的援助。但局势的恶化已到近乎崩溃的地步了，也许靠我们的援助来改变事态的发展已为时过晚。为了保证成功，看来我们要担负起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重大责任。鉴于我们必须大规模地担负指导中国的事务，这种规模事实上会使我们卷入我们力量所不能及的义务中去。

如果事态的进展极可能导致与共产党和解，那么，我们相信，应当在划界而治的分散联盟的基础上运用我们的影响安排停战。这种划界将尽可能将中国的大部分给没有共产党参加的一个或数个政府治理。一旦蒋介石本人表示和解姿态，则华北、东北、西南等地方领袖势必更为热衷。而西部中国或者与大元帅一起崩溃，或者作为蒋下台阶梯的一级。那时，当我们确信地方派能够继续与共产党抗争并肯定能维持自己统治时，我们就应义不容辞地支持

这些地方派。他们将为未来全国民主运动东山再起提供一个政治上的滩头阵地。当然，谁能充当这一角色有待于事态发展而定。但我们相信，一旦这一情况出现，我们应准备立即行动以鼓励将会出现的并肯定会坚决反共的任何人士。

假如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国民政府的崩溃会导致地方主义的出现，那么，我们可以指望在这种崩溃后的一段时期将没有敌对行动。但不能指望这种纯地方主义的努力会自己消除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这正是我们能发挥影响之所在。由于目前共产党控制区经济不佳，若我们能从经济上加强地方政府，我们可望能防止赤化。非共产党地区一时的经济繁荣，或者，那怕是暂时缓和，都将奠定中国的反共属性，并相应削弱共产党地区老百姓对共产党的同情，进而发展壮大非共产党地区，到时将东山再起，消灭中共军事力量。因此，我们最主要的问题是，这一相对和平的时期一旦到来，我们即应将我们对国民政府的援助转到羽毛未丰的地方集团。我们相信这种情形不久将出现。

文献7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8—1048

南京 1948年8月10日

我已同意将上述电文^①发送给您，它表明了我与大使馆高级专家的一致看法。我完全赞同他们的时局分析，但对其在时局分析基础上所得出的关于美国应采取的行动方针的结论则不敢苟同。

我相信，如果极有可能产生某种形式的联合政府，那么，对我们来说，是否可以认为这将照旧符合美国利益。我们已往过多

^① 这里指“文献6”一文。——译者

地卷入道义上的责任，现在又深深地卷进所承担的义务，这就使得我们无法回避这一问题：是努力帮助还是竭力阻碍联合政府的实现？当然，其他一些国家与共产党联合的教训应引以为戒，共产党那种玩弄权术篡夺政权的娴熟手段也不可低估。但我们也不能忽略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的有利之处，这些联合政府业已得到国际承认。我们同样要认识到，不能指望现政府或任何反共联合体以军事或其他手段彻底根除赤患。

中央政府分崩离析成一些地方政府，这使得我们援助非常棘手。几乎每一地方政府都需要由一位或更多的强大领袖支撑，如果他们真正反共，会立即面临尖锐的财政问题，这些财政问题会使其他问题更趋复杂，最终将有助于共产党的渗透。并且，或许因为自然缘故或许因为政治阴谋的缘故，这些政府必将发生领袖的更叠。他们也将既以诱人的条件换取我们的援助又以我们的援助与对手甚至与共产党讨价还价。所导致的经济及其他方面的困境将加重现在的不满情绪和失望情绪，也使反美情绪火上加油。而共产党则坐收渔利。当然，如果分崩离析势所难免，并且，如果能维持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权的松散联盟，我们会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一名义上的政府提供帮助。

如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看来我们有两种选择：

(1) 我们向国民政府提供彻底的军事援助(包括军事指导)以促进大规模改革，并在改革过程中规定进一步的援助。这将更多的介入中国内政，也许所花费用要远甚于目前。同时，也要对由此引起的剧烈的反美情绪及其直接后果有所准备。到时公共心理中将不再是共产党问题，而且共产党必定会有效地利用这种反美情绪。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也许能粉碎共产党的军事实力并获得某种解决。但这并不是我们干涉的结束。

(2) 我们将继续促成、帮助和谈大门的开放，继而帮助改组军队、恢复经济。我们将坚持以一定的民主保护措施为条件，包

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选举自由等等，避免少数派控制、秘密警察等专权方式。我们敢肯定，共产主义的阴谋权术将会昭然若揭、毫无市场。积极提倡公民意识教育，推行文化交流，提高民生，这些将进一步有助于民主思想的传播，并且也会一般地加强中国对美国生活方式的自然向往。那时，无论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还是在国际冲突中，中国就自然而然地、理智地成为我们的伙伴。

从上面两份电文中，不难看出，一旦中国出现分崩离析的局势时，在美国所取方针上，我们是有分歧的。我们一致认为虽然这一危机尚未到来，但已不会久远了。我们应该准备应付它。我们极其期待国务院能就美国所采取的方针的一般观点有所表述。

文献 8 司徒致国务卿

893.24/8—1648

南京 1948年8月16日

我和委员长在牯岭共度周末，并做了几番长谈。他对世界共产主义阴谋渗入中国相信到了如此顽固的地步，以至他决计与共产主义决一雌雄，不管有无美国的支持，也不管结局如何。他坚信，中国共产主义的兴衰成败必对整个东南亚产生深远影响。现时的一切和谈都不合时宜，因为共产党人必将趁机抬价。

他也知道中国必须改革。然而，改革如此强烈地遭到军事形势及其伴随而来的各种弊端的影响，使得他在军事形势改观之前力图改革问题上犹豫不决。在他看来，我们的农村复兴方案会至少探索出某些改善的道路。

对于美国对委员长及其政府的不断指责——这些指责抨击政府腐败无能，一筹莫展，委员长相当恼火。他说，正是因为洞悉政府腐败无能，他才不断地谋求美国的支持，尤其是各种文武顾

问形式的援助。也只有美国的援助，改革才能进行，进而才能体现物质援助的意义。他怀疑美国领导人能否全面地理解他致力的事业及其推动力以及这场斗争中美国利益的真正所在。他重申他一直坚信美国的理想，并在共同的威胁面前寻求富有成效的紧密合作。

这时，委员长问我是否能赴华盛顿述职，向您陈述中国的实际情形。我回答说，我相信我的快信和电报已向您清楚地报告了中国问题的全部细节。我当然随时准备在您指定的时间赴华盛顿。

我深知，德国问题的困境以及联合国大会的准备占去了您的全部时间。我也明白即使我被召回华盛顿，您也绝不可能真正地在中国问题上花费时间。我更认识到我回华盛顿并不能起到增加美国对华援助的作用。当然，我愿在我的职权内尽力为您效劳，为遭难的中国助力。但我本人以为，我的华盛顿之行会引起令人不快的推测，并徒增蒋委员长的企望。

文献 9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0—1448

南京 1948年10月14日

阁下：我荣幸地向您报告中国内战的最近势态。

总的说来，政府正陷入极度惊恐之中。军事形势不可收拾。共军已在数量上超过国军，加上他们战术有方、士气高昂，使得共产党能够随意攻击任何一座城市。而国军的主要缺陷除了战略不当外，也缺乏战斗意志。士兵们或团伙或单个地向共产党投诚，作战的指挥上毫无斗志，军队不求进攻但求龟缩防守。在长春，共军一支步枪就可以换取国军6人安全逃离。在济南，一支全副美式

装备的共产党纵队直进该城。财政问题甚至比军事更尖锐。以无异于警察国家的方法来控制物价和外兑率，这种企图将不可避免流于破产，此种迹象正日益明朗。在财政问题上，我们在认识所及的范围内努力支持政府深谋远虑、鼓起勇气进行改革。他们的各种对策大概也千方百计设计出一套可行方案。但即使有最善良的意图和最有效的控制，他们也难以避免预算失调的结局。政府目前每月五六十亿美元赤字。这种军事与经济的互相影响使得百姓生活于困苦之中，并孕育了不满和绝望，最危险的因素也许是食物短缺并禁止百姓买卖。能忍耐磨的中国人民能够忍受一切，但一旦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吃、烧无从着落，就会发生骚乱以及所有随之产生的灾难。

政府尤其是蒋委员长遭到尖锐的谴责，比以往更加不得人心。大概还没有过如此剧烈地指名道姓抨击他们，指责他们无法提供保护，不能提供聊以度日的生活条件。这实际上已不是什么道义的或政治理论问题了，即便知识分子眼中也如此。这种不满情绪甚至在南京政府各级官员身上也显著扩展。

李济琛将军从香港发来一封私人信件。总领事馆已译成英文。信的大意是，他声称在以后数月中将宣告成立一个新的联合政府。由他任主席，毛泽东任副主席，以前引退的冯玉祥将军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据称，李要我将此消息向您转告，敦促美国政府与蒋介石政府断绝关系，支持即将成立的新政府。正如我以往所言，此运动的意义在于人们几乎普遍的对和平的渴望——不管和平如何获得，在于对现领导的厌恶。一旦蒋政府被推翻，共产党将会而且能够立即进行对新政府的实际控制，并进而统治全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通过地方派进行长期抵抗，将不会导致混乱、骚动，并减轻无依无靠的百姓的倒悬之苦。

更使美国进退维谷的是，美国援助着一个不得人心的政府，这仅是在不适当的程度上支撑着这一政府。这不仅在共产党及其

追随者当中激起愤慨，也在中国的其他人士中引起了敌意，他们责备我们，认为是我们使这一不明不白的战争漫无止境地拖延下去成为可能。到处潜藏着反美情绪，那怕轻微的火星都能燃成熊熊烈火，在政府失控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势必产生严重后果。倘若目前能够组织有识之士举行投票选举，结果也许是100%的反对现政府。这样，我们随时都可能发现我们遭受这样的指责：我们支持一个不代表人民意愿的独裁统治，违反了自决权利这项民主原则。

所有这种极为消极的气氛，也正是当今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我仍相信，百姓对政府的敌意主要是因为政府无能。如果政府能为人民提供某种形式的稳定和经济恢复，那么，大部分人民会同心同德地拥戴它。而其中的有识之士也将通过宪法程序纠正充分认识到的腐败与混乱。总之，他们将目前的结局归咎于国民党然后才是共产主义或任何其他革命运动。在这种沉闷而又盲目、绝望的心境下，他们认为目前是最灾难深重的时期。

问题的核心当然在于庞大的军费开支，军官无能，士兵厌战。对这一问题若没有美国的支持，无论那个政府或者委员长本人都难以整顿。一旦军事指挥胜任，军需供应充足，有可能在某一地区清除好战的共产主义，并在美国的影响下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如果这一点证明确实可能，^⑤必将意义深远，它将表明民主力量战胜共产主义意识和策略的巨大优势，或者，它更能够导致和谈。可是，如果因为美国全球政策的缘故认为这种政策不可取，或者似乎不切实际，那么，我们不久将面临这样的抉择^⑥，是否撤出我们的陆海军人员及军事设施、中断进一步的实际上是使共产党统治得利的经济援助对美国利益较为有利，还是象现在一样按兵不动，努力通过别的非武力程序缓和势态。

是否有这种需要：在势态变化产生新政府之前，与国共两党扩大外交政策，避免将来撤出中国的灾难性后果。这一过程除了

物质上的损失外，还有信誉的损害以及连续性的中断。潜在的危险日益迫近，尤其是在青岛。并且，如果沈阳和天津间的战况继续不利于国军，那么，在华北的美国侨民的命运也将休戚相关。

文献10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0—1648

南京 1948年10月16日

目前共产党显然正迅速取得军事优势。但他们面临内部的政治、经济困难。随着军事局势的发展，其地盘日益扩张，但问题也将会增多、复杂。解决问题的主要困难是缺乏足够的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这些人多在非共产党地区，他们或者是国民党党员或者是国民政府的职员。因此，倘若共产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取代国民党，并与这一改组过的政党建立联合政府，这将有利于共产党，行政问题将得到解决，而后他们再逐渐取得对行政的控制，同时会造就一个多党制的具有民主色彩的政府。这将是他们极可能采取的、合适的行动方针。

仍无迹象表明现国民党领导们会自动放弃政权。也无迹象显示国民党对其命运有何积极方针。现在，政府的文武官员几乎对阻挡共产主义洪流不抱希望。可以坦白地承认，军事战线或经济战线的又一崩溃即将来临。因此，除了委员长的亲密随从以及一定级别的军官外，没有多少人坚定不移地拥戴他。迹象日益表明这些人更多的是出于对命运的共同恐惧而凑合在一起——如果共产党得胜的话，而不是出于什么对国民党事业的坚定信仰。但至少有一位杰出人才，即张治中将军，公开提倡立即和谈、结束内战。那些相信并效忠于委员长的人目前是三心二意或者全无信心，而那些并不支持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又没有赖以依靠的领袖。假如，

正如共产党所企图的那样，由共产党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并组成一个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参加的新政府，国民党多数人都将认可党的领导权从委员长转向李元帅或其他人。这样，委员长的权力将被其以前的支持者所夺取，并被劝谏接受离任。

尽管我们认为以上情况极为可能，但目前姑且不要当真。委员长面临的另外几种选择是，或者在南京一拼到底，或者将政府及其领导成员转移到其他地区。第一种选择看来不太可能，委员长不太可能征集部队进行死守南京的努力。同样，迁都会在全国范围内被公认为认输。倘若他企图将政府迁至某地，他就会发现附和者寥寥无几，革命形势将更加推进，现政府作为一种政体将信誉扫地。而且，看来也极不可能形成一个颇具影响的反共召集点，无论是移迁他处，或者流亡国外。

就象国务院所洞悉的那样，我们始终认为，除非美国能够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控制势态的变化。否则，共产党操持下的联合政府的产生是极为可能的。

如今这一时机也许已经过去。在为时已晚的情况下，探求美国方面如何能不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而能阻止进一步的军事灾难并因此可能产生一定形式的联合政府，这是较为困难的。国民党军队已彻底厌战。士兵屈服于共产党的宣传，一有机会就开小差的事例不知其数。

结果，政府尤其是蒋委员长比过去更加不得民心，越来越遭到人民的谴责。这倒不是反对政府和蒋委员长本人，而是反对他们无能提供保护及聊以度日的生活条件。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援华政策在政府眼里并不比在共产党眼里好多少。人们谴责我们，因为美国支持继续内战，但又不向政府提供夺取胜利的援助方式，使得中国人民饱经苦难。各阶层人民对内战痛恶不已，普遍认为联合政府是势所必然，这总比内战延续要好。而美国则被横加责备，说这种举国遭难的政治军事困境是美国造成的。我们一点也

不敢肯定我们会左右联合政府以防止其滑向逐步为共产党操纵的那种熟悉模式。但我们简直想不出什么方法来阻止联合政府。也许现在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现时的国民党领导已再也不能充当美国努力阻止中国共产主义扩展的有效工具了。果真如此，我们应在联合政府的构成时期，极为谨慎地考虑我们对联合的态度。我们不提倡现在就抛弃蒋委员长。但倘若在他被全体人民所唾弃（除了由于历史的原因与联合政府成员没有接触的那一小撮人会支持他）以后美国继续支持他，结果将是弊多利少。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构想某种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让委员长引退，并组成联合政府，由张治中与马家（五马将军：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实、马占祥）节制西北，四川、云南、贵州也分别由各省主席控制，这样就可免受共产党干扰，这在联合政府初期是完全可能的。同样，共产党在联合政府的名义下会加紧巩固其北部地区，而宋子文则会在华南获得喘息之机。这期间，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无论谁统治中国，都需要外援，而美国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在美国利益所在地区的局势更为明朗的时候，利用我们的这种地位左右形势。

文献11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0—2648

南京 1948年10月26日

我想就中国局势谈谈个人看法：

如果设想美国并非彻底摆脱中国事务，并非将对华政策限于纯粹的外交活动；如果彻底的军事援助似系不切实际或不明智之举，那么美国就应该准备对付任何形式的联合，而这种联合的条件

较大程度地取决于美国。这是因为，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特别是它在中国所承担的义务是如此这般，以至于我们的态度对中国事态的发展影响极大。

在我看来，从美国向全球的共产主义作斗争这一意义上说，对任何抵抗共产党组织的直接军援皆非明智之举，这只能延缓共产主义的最后消亡，还将激起日益蔓延的反美情绪，并将使当地的美国侨民遭殃。而且，运输、影响抵抗首脑、保证供应的适当使用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将困难重重。更主要的是，这种消极被动或犹豫不决的方针也许正是我们要竭力避免的。我认为，过早地发布宣言，表明我们对于共产主义的打算和一般观点，是不合时宜的，这将不利于我们在华的现存利益，或者，会使我们在未来处于难堪的境地。假如我们对新政权采取模棱两可的灵活方针，那么我们所要发挥的任何影响都会增加。要知道，由现国务卿（即马歇尔——译者）起草的杜鲁门总统1945年12月15日对华声明其很大一部分成为政协决议，这也许还将是新的联合的基础。那时，我们就可在中国事务之外而不是在中国事务之内随着事态的发展调整美国的方针。我们应尽可能避免方针前后不一。

为了把握问题的症结，我们不仅要扫除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偏见与恐惧，而且应该以充满希望、富有成效的精神来敏思、果断。国民党中存在大量令人痛惜和谴责的弊端，而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毕竟具有很多值得称赞的造福于民的优点。假如国共双方的优良品质能互补，融为一体，捐弃前嫌，这将是一个极妙的联合。从我与国民党长期打交道的经验看，若没有这种强有力的新鲜血液的灌输，要取得政绩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无党派自由人士尚未表明他们具有这种改进的能力。

我们真正地反对共产主义的，并不在于其世所公认的社会改革，而是它的专制，它的第五纵队式的阴险以及类似的阴谋手法。它无情镇压与之不一的言行，排斥人权；它无耻地依赖其欺骗性

宣传和其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它的目的，它盲目信奉教条，信奉暴力革命。所有这些罪恶，加上其受命于莫斯科，就象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一样，中国共产主义也都一一具备。问题在于我们怎样遏止、揭露或抵销其在中国的影响。

共产主义的罪恶是道德的或政治的而不是军事的。在中国，军事优势很大部分是历史的偶然。即使我们能以军事手段帮助蒋政府将好战的共产主义赶出某一地区——这是我们充其量能做到的一切，我们仍然必须在教育及其他进程上帮助蒋政府，这样才能使非共产党地区显示出名副其实的民主优势。否则，军事上的胜利仍将难以维持。

这种机会在未来的联合政府中存在的可能性很大。一般地说，我们有两种有力的优势。一是中国人民的本性。大部分中国人民并不希望中国共产化。甚至那些较激进的学生，他们加入中共更多的是由于对国民党的失望而被吸引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人是个人主义者，他们主要虔诚于传统的社会模式和文化依附，而不是抽象的事业或意识形态。他们对美国有一种本能的善意和信任，而对俄国则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和憎恶。另一优势是，中国需要技术援助和经济援助，而这只有我们能够提供。任何共产党控制的政府都必须解决这一难题以免象现政府这样遭至不满。我们就能以此为条件从根本上影响集权程序的执行。各种基本自由、有系统的公开性、生产性的事业等等，都将在那些本质上与我们信仰相同的人们中间产生令人鼓舞的道义影响。这就有可能导致各政党的重组，而他们的纷争无论怎样混乱都将不会引至军事冲突的破坏性后果。此外，还将出现一种新的政治结构和普遍情绪，这至少可以指望极可能如我们所愿望的那样从其他程序上加以发展，以此来传递美国对中国人民的友善。

文献12 司徒致国务卿

811.20200/10—2748

南京 1948年10月27日

中国事态的发展迫切需要适应当务之急的情报政策。其他一切努力均应着眼于这一目标。我们再不能白费口舌奢谈美国生活方式，而必须竭尽全力与共产主义较量，姑且置长远规划于不顾。

中国百姓对于共产主义最终取胜的趋势一般都毫不关心。鉴于政府对群众的号召力已丧失殆尽，我们至少必须独自艰苦作战，告诫中国人民，一旦共产党或共产党控制下的联合政府取得对中国的统治，他们就会陷入深渊。我们绝不能悠然自得地勾划我们美国锦绣蓝图，希望以避开共产主义洪流，而必须立足现实，全力以赴来设想赤祸的真正面目。鉴于苏联、南斯拉夫以及其他铁幕国家的现实，我们必须促使中国人民深明：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都面临着奴隶般的恐怖统治，而他们都曾一度错误地相信共产主义能造福于人民。

为了这一目标，美国新闻处必须立即以全部新闻媒介强化反共宣传计划，新闻报道应以共产主义威胁为方向。时间容不得我们在中国大做美国校园生活、洪水控制之类的广告性宣传。我们的新闻媒介应大力解释美国对世界和平目标的努力，并雄有力地证明共产主义为当今世界安全和人类幸福的主要障碍，将共产主义的重大威胁暴露无遗，让人民来决定他们的取舍。特别是我们应解释并证明，在一个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自由丧失，灾难横行。

同时，我们应利用亚洲经济委员会援助方案的每一事实，向

世界表明我们对一切反共势力的支持，并且，一切有损于中国政府遏制赤祸的行动，我们都应不惜代价加以避免。一旦出现联合政府，我们即应全力以赴地支持尚存的非共产党势力，以毫不含糊地表明美国——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绝不向共产党控制下的政府中的共产党势力提供任何援助。这样，通过我们目前的这种宣传方针，就会加强非共产党集团的力量，并使他们获得动摇分子的支持。

文献13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0—2848

南京 1948年10月28日

阁下：我有幸对国民政府急剧恶化的趋势作一番概述。

大使馆总的认为，在目前这一形势下，我们必须在两国允许的范围内尽早决策，以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因素，推动中国事态的发展。大使馆设想美国政策可有以下选择：（1）向蒋政府提供彻底的军事援助，并附以作战顾问及其他所需项目；（2）对共产党占优势的联合政府取不明确方针，以我们的影响削弱或减轻共产主义因素；（3）除外交事务外，美国全部官方事务撤出中国，但这将对各种形式的美国的个人财产产生不利影响。我以为，我们的军事专家会认为第一点脱离实际，第二点优于第三点，并且有希望实行。

当然，在最后否决第一点前，我要提醒的是，一旦鉴于某种进一步考虑而采取第一点设想，它不是没有其有利环境的。至于目前阶段是否可取，所需何种财政及其他负担以及如何交付未来当局，我目前尚不能回答。

我试图对多少具有爱国精神、自由理想和热心从公品质的政

府领导们的意图加以解释。但普遍有这种感觉，他们并不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而似乎苟且偷安，坐等我们来解其倒悬。并且，他们妄想以俄国来要挟我们——这并非全错。他们很清楚他们的岌岌可危的处境，深知他们无力回天。但民族自豪感以及对别人批评的顾忌使他们不敢坦白承认这一点。我坚信，他们衷心地愿意让美国顾问控制其行政事务和军事事务。至于平民百姓，他们要饭吃，要和平，至于谁来提供，这对他们无足轻重。他们欢迎美国援助，并将感恩不尽。估计中国的有识之士起初会出现善意的误解和谩骂，但最终也将欢迎我们。目前，中国知识分子正处于一种激进的反美情绪中。他们认为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使一个不得人心的政府继续内战的责任。这一内战使国家和人民陷入了经济及其他方面困难深渊。我们任何进一步的军援都被他们视为延长战争。当然，总的来看，他们理解我们的善心。许多人也得益于与美国的关系。除了较紧迫的经济危机外，他们担心我们的援助会更加加强一个封建、无能、堕落的政权，使他们无法在政府的罪恶与共产党卓有成效的专权之间作出选择。

蒋委员长无疑欢迎我们的这一决策，同意我们积极参与内政事务，只要不侵犯中国主权。但他本人则无法挽回其威信的丧失，也无法立即改正其不良旧习。中央政府的要员、省级官员以及地方行政长官估计也象委员长那样欢迎美国介入，只是他们不敢公开表示罢了。

蒋委员长仍在北平。他显然想继续保持他个人对决定性的满洲——湖北一线的军事控制。可以说，政府所以这样支撑着是因为蒋委员长个人的坚定意志。而他所以如此是由于他希望这样会导致美国对未来当局增加援助。但他也开始显得极度的紧张不安，日渐愤怒暴躁，最近甚至有些神经质。现在他还在继续活动。他刚飞到承德，即乘吉普车与地方官员一起四处巡察4小时之久。蒋委员长完全意识到目前决定性的较量的重要意义。不过在这一战役

的结果见分晓之前，不要指望他作出政策的根本性改变，而其他政府领导人士除了等待与担忧外，无所作为。

在新年之际政府可能建议实行联合，并发起一场巨大的政治攻势，估计这会动摇国民党员目前的忠诚状态。

文献14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1—1048

南京 1948年11月10日

我们已确切得知了委员长的意图，他表示，只要他还活着，就继续与共产主义一拚到底。委员长相信他终将取胜，以为目前的军事局势并非不可收拾。徐州守军将阻止共产党向长江流域推进。

除了那些与委员长交往甚密而且难以在共产党统治的政府中生存的人外，并非所有的人都对胜利充满信心并愿战斗到死。当然，一些官员倒是相信国军能暂时保持长江防线和黄河防线，并认为，美国的干涉将容许政府在华南建立基地以挽救政府，然后政府再次北伐取胜。持这种观点的人指望美国干涉，并得到蒋委员长的怂恿。

但大部分老百姓以及除了蒋委员长及其紧密追随者以外的所有政府官员，其态度与上述相反，他们听任共产党尽快取胜，认为只有立即停战才是全国人民的最大福利。上周，张治中致电委员长，敦促和平解决国共冲突。委员长将张召至南京。大概由于与委员长颇有交情，张抵南京后，即被授命向苏联大使谋求和平方案。张表示，虽商谈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他们将继续会谈。监察院副院长刘峙也与苏联大使馆进行了一次类似会谈。副总统李宗仁也倡议停战和谈，并声称委员长是和平解决的唯一障碍。就目前来看，主和派尚无逼蒋和平解决的方案，这也许是他们部分地

因抵抗派的固执断言而犹豫不决。抵抗派断言：只要美国干涉，仍能挽回局面。

一般说来，政府内现处于胶着状态。大部分官员麻木不仁，无能为力。例如，地方军事长官对委员长的守卫南京的计划犹豫不决，但他们不敢劝谏，不敢面陈撤出南京的意图。同样，主和派由于搞不清美国干涉是否有望，加之害怕委员长一怒之下，迁怒他人，等等，他们中间也没有一个人胆敢或愿意将和平愿望付诸实施。同时，南京城中恐惧情绪急增，某些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国防部长何应钦将军）正私下准备飞往广东或其他地方。蚌埠难民蜂拥南京，带来了许多共产党进攻蚌埠的传闻。如今，共产党发行的货币已在黑市场上开价。但江北更倾向于金元。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国家权力是否能有秩序地从现政府移交给新政府。主和派显然无法使其愿望变成现实，除非发动军事政变取代委员长。因为后者目前尚无意自愿放弃权力。相反，蒋委员长固执之下，很可能想死守南京，最终节节失败，全军覆没。因此，这就难以由那些能够且愿意与共产党和谈的主和派组成临时看守政府。而一旦现政府以蒋委员长及其追随者的灭亡或仓促的逃亡而告终，权力崩溃的诸种惨局将不可避免，国内将更为混乱。在此种结局下，虽然国民党仍控制中国的一隅，但无论怎样继续军事抵抗，都将分散无力，外国侨民也将承受更多的危险，中国百姓同样更为遭殃。

文献15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1—1548

南京 1948年11月15日

在最近与蒋委员长的几番谈话中，事件已发展到这一地步：他

正认真考虑将中国内战问题作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而提交联合国。我本人也确信，宋子文正力劝蒋采取这一方针。我认为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民政府难以使公众理解共产党叛乱就是外国侵略。至于为何中国人对共产党统治的扩展普遍漠不关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认为这些赤色力量同样是中国同胞而不是某一外国列强的代理人。蒋认为，将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也许会迫使苏联采取方针，与中共融为一体。如果联合国准备考虑中国问题，也许会作出努力来实行停战，从而暂缓他目前的军事危机，求得喘息之机。

既然目前军事态势继续恶化，共产党即将控制全国，蒋以为，在这一阶段中，通过联合国将苏联扯到中国舞台上，国民政府并无所失。

可见，这一方针的缺点是：〈1〉美国对国民党的广泛援助，包括军援，可能被苏联在联合国用来作为攻击美国的根据；〈2〉苏联人也许认为这正是难逢的机会，来表明自己参加了“为把中国从反动的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摆脱出来而进行斗争的新民主主义阵营”，并趁机公然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人民的英勇战士；〈3〉联合国已因西方世界的一些重大问题而负担沉重，也许难以承受复杂的中国问题所加给它的额外负担。

无论如何，既然委员长显然在考虑此事，盼望国务院提出见解，以便在蒋再次提出此问题时使我有所遵循。

文献16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1—2948

南京 1948年11月29日

蒋夫人在华盛顿的露面以及共军威胁南京的紧迫局势将会引

起美国对中国事务的关注。如您所知，蒋夫人赴华盛顿，意在为丈夫的事业游说，以谋取对现国民政府的军事上和道义上的支持。她无疑会在国会及国会诸委员会中造成一个有效的印象。并且，无疑也会赢得美国人民的同情。

国民政府机构及公共事务机构中的大多数领导的目前态度是，既不愿蒋委员长操纵国家事务也不愿共产党控制政权。人们之所以还或多或少地承认蒋的统治，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美国政策将左右中国形势。我们现在面临这样的选择：或者支持这样一位领袖，他已民心丧失，军事处境日益恶化，即便有美国的军事指导和物质援助也无济于事；或者坐视共产党统治下的联合政府的建立。如果我们拒绝蒋夫人的增加援助的请求，蒋委员长将会在国民党内的压力下交出权力。但是，其继任者将同样被迫向节节取胜的共产党让步。另一方面，如果蒋夫人得到美国增加援助的许诺，可以想象，蒋委员长将依然如故，继续执政。同时也将激起中国百姓的反美情绪和反美浪潮。

文献17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蒋介石/12—148

南京 1948年12月1日

阁下：我谨向您报告蒋委员长在最近动乱的数周中的所作所为。蒋委员长依旧操纵国务。到目前为止，其全部同党皆听命于他。蒋本人也宣称他的命令必须服从不怠。天津失陷后，他表示要采纳我的建议，由最优秀的人员组成总参谋部，总筹军事事务，只要获取他的认可，即可贯彻执行。他还于当晚召见国防部长何应钦将军，要他具体负责。但为时不长，蒋即飞往北平去独自指挥满洲会战，而何将军则对此一无所知。这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所以，实际上一切照旧。但是，几乎所有他周围的人都日渐对其独断专行不满，并强烈希望他从国务中引退。这些人一直想向蒋公开挑明这一点。但正如蒋昨晚所说的，他们并未公开表示。

真正的利害得失全仰着蒋委员长的个人心境，而其心境则影响着事态的发展。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战争的继续是由一个人的不可屈服的意志主宰着。而蒋自己则将他的决心解释为明确的责任感，即共产主义罪大恶极，祸国殃民，他有责任与之战斗到底，不管结局如何。他表示，假如他对此有所松懈，那将会亵渎神圣的信仰，成为千古罪人。他每天祈求上帝赞许他的决心。他同时又是一位孙逸仙的追随者，三民主义的教导加上基督教的教诲更使他的行为充满了自信和安详。蒲立德先生(国会对外经济合作共同委员会顾问)与蒋交谈了一晚后，惊诧不已，问我该如何解释蒋的沉着平和，解释蒋的不顾军事失败、财政危机与人心渐失等困难因素而对前途所具有的信心。

这种无所畏惧的信心诚然可贵，但却成为国民党同僚谋求局势改善的障碍，也成为国家的灾难。如果他已经将权力委托给国防部的话，最近的军事抵抗的结果也许会好些。蒋昨晚说，他将尽可能坚守淮河一线，继而坚守南京，然后继续在广东等地抵抗，直至他死去为止。

他一直希望美国能立即提供援助，寄希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到时，中国将加入反苏联盟。我原指望杜鲁门总统对他的答复能最终打消他寄望于美国援助的念头，但他显然仍不气馁。我向他表示，我一直企图说服蒋夫人取消美国之行。如果蒋夫人与我商量的话，我也将竭力劝止。最后，我努力解释说，他所希望的任何形式的以及在确切时间里的援助是极不可能的。但我的解释恐怕同样徒劳。

是否在共产党突破淮河一线后他的主张才有所变化？或者，是否他的同僚能终于有勇气公然反抗他？在本电文送到您那里时，也

许就能够明了。总之，他业已失去其领袖的地位。其所以还保持着目前的地位，只是依赖于以前的同僚的忠诚，而不是人们对其观点的拥护。时局的发展非常有可能出现停战，并恢复和谈。据未证实的消息，苏联大使到时将在国民党控制华南、共产党控制华北以及美国承认俄国在满洲的权利的条件下出面调停。

文献18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2—1648

南京 1948年12月16日

12月13日上午，张群以蒋委员长的使者的身分和我谈话。他说，蒋委员长从各方面得悉，人们希望他从政府的积极操纵中引退，甚至美方也有此意。因此，蒋委员长希望在此问题上听听我的意见和忠告。我们交谈了两小时，张一直以中国式的交谈方式兜圈子，直到最后才表露了此行的意图。他强调说，要委员长引退的是美国。我最后回答说，大多数美国人民当然有此印象，这就是，绝大部分中国人民感到蒋委员长是和平的主要障碍，应该从权力统治中引退。而中国人民的所想所愿正是美国拟定政策的基础因素。张群又说，据蒋委员长说，美国既不相信中共与俄国有紧密联系，也不相信俄国是中共的后台老板。我回答说，就我看来，美国相信中共与俄国在目标和手段上是有密切联系的，中共执行着与俄国相同的政策。但这并不是说，美国就认为苏俄军队和技术人员实际上参与了中共的内战。我继续说，美国政府和人民所希望的是建立和实行中国的自由与独立。现政府应该朝此方向努力，让中国人民明白政府的这一方针。国民党不论与哪一方谈判都应立足这一明确原则。如果国民政府能够以这些原则来激励中国人民，在与专制主义威胁的艰难战斗中获得中国人民的支

持，那么，国民政府必将在自由中国的任何地方得到美国政府的同情和支持。我表示，一旦中国的和平得以实现，人权与独立得以维持，假如国民党要求继续抵抗的话，它势必得到所有的非共产主义世界的支持和同情。

张要求让外国出面调解目前的局面。我反复强调，这须由中国人自己作主。是实现体面的和平还是激励中国人民继续抵抗专制肆虐，这须由中国人抉择。美国关注的是，中国人民期望什么、愿意支持什么。我表示，政策方针不应立足党派基础，支持或反对蒋介石，或他的派系，或他的政府，政策方针应超越政党，着眼于人民的权利和国家的独立。

张群表示理解并将慎重考虑我的话。我说，他应该行多于思，他以及政府内外的其他中国领导人都应从速地干一番建设性的事业。

文献19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2—1948

南京 1948年12月19日

12月17日上午我应邀访问孙科。孙科极其苦闷。他希望我这位朋友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提出高见。我解释说，若无代表美国之全权，我不能提供此种帮助，但我本人对此问题的看法是明确的。于是孙科请求我尽可能以个人身分帮助他。我向他阐述了美国的困境：美国政府反对共产主义的全球扩张，也希望遏制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扩展；但另一方面，美国不能靠支持一个丧失民心的政府来达此目的，那将有背于民主原则，而美国正是因为共产主义违反民主原则才反对它的。孙科非常困惑，又提出一系列问题，对此，我指出，人民的全部愿望在于和平，尽管此种愿望还

不能通过宪法程序表达出来，但这确是显而易见的，就象中日战争中中国人民拥戴政府积极抗日的民意显而易见一样。蒋委员长抵抗到底的决心，过去和现在的确具有一种个人勇气和爱国品质。但是，作为总理，他（指孙科——译者）的问题在于是否支持委员长，即，要么支持他，那么面临的是不得人心，军事失败，财政恶化；要么背离他，那就要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国事，提呈委员长，也就是说，如果劝说蒋委员长放弃紧急处置权，放权给行政院，将不涉及委员长的引退问题，那样将对委员长更有利。当然，委派给行政院的权力应是完全的、真正的。

孙博士又问我是否知道蒋夫人美国之行的结果以及马歇尔将军目前态度的有关情况。我说，据我所知蒋夫人访美并未引起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国务卿极为关注中国事务，但他在援华问题上确很为难，在国会开会之前，局势并无多大进展。我怀疑，在目前状况下，中国权威人士的决策深深受到其对美国军援的期待的影响。

随后，孙科又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诸如，共产党是否期望和平，是否信守诺言，是否不继续以武力颠覆中国，等等。我指出，这类疑问都很恰当，但我对这些猜测无法回答。孙询问我是否与中共领导人有直接接触。我给予否定回答后，孙提出要查明如何与中共接触，弄清他们的态度。他想知道共产党是否与苏联大使馆有所联系以及大使本人是否从事调停。我力阻他这样做。于是孙又表示希望由美苏共同调停。我指出，只有在国共两党共同提出这一建议后，“此建议才可能被认真考虑。但我个人倾向于最好由中国人民排除困难，努力寻求一种解决方案。孙科说，行政院所作出的有关和、战的任何决议都无不受到立法院的牵制，而立法院约有1/3的票数被CC系控制着。那样将同样引起众多的争吵。

接着，我对他总结了 my 劝告：他和他的同仁应该从全局出发，考虑他们从现在起能否以军事的或政治的方式有效地与共产

主义抗争；并无外部因素能够为他们扭转局面，也无外部因素影响他们的选择。我相信，中国大部分有识之士是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及其残酷的专制政策的；他们加以重视的应该是保护个人自由和国家主权，而不是维护国民党及其领袖。我保证，不论何种形式，只要它能造福于中国人民，有利于中国的独立，美国政府都将提供同情和帮助。我本人对他所提出的问题深表同情。

文献20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2/12—2048

南京 1948年12月20日

内阁局势一片混乱。甚至委员长的亲信同僚也坚信蒋委员长必须下野以谋取和平。看来唯一支持委员长继续抵抗到底的是胡适，他与委员长一样笃信唯一的光荣道路就是继续抵抗，而来自蒋夫人那里的据说是有利的消息更使胡适坚定不移。

此外，委员长的左右亲信，甚至包括张群，也深感蒋目前无所作为的政策后果惨重，主张进行某种变革。认为和谈乃最佳方案。但是，他们中间还没有人敢于直接要求委员长引退，以保证某种和平协议的产生……

同时，孙科仍旧徒劳无益地致力于组阁……而委员长则劝说胡适组成一个小型“智囊团”，胡适不从，因为他反对这种所谓的“下议院”，孙科因自己无力劝促委员长放弃权力而怨恨不已，后来又迁怒于美国，尖酸地责备美国，说我们坐视政府崩溃。

显然，在胡适的支持下，委员长仍然死抱着一线希望，认为美国迟早会给予他以充分支持从而挽救政府的崩溃。

文献21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2/12—2048

南京 1948年12月20日

12月7日，立法院讨论将中国问题提交联合国一案。但在委员会的讨论中受阻。看来不可能有更大的起色。因为这一议案无法证明中共与苏联的同谋关系，同时也觉得联合国毕竟也无能为力，因而遭到否决。

大约有300名立法员在南京。立法院目前的工作大量限于讨论国家困境，弹劾政府官员，并通过一些无足轻重的议案。新闻报道也很少提及立法院的活动。

文献22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2—2148

南京 1948年12月21日

我谨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报告。下面我将概述我本人对于中国政治形势及在这方面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

如您所知，我原先希望通过向蒋政府提供军援，尤其是有条件的军事顾问形式的援助，来保持长江以南以及沿海地区不受共产党武力的侵犯；希望在上述地区通过美国的技术顾问和经济援助来改善地方政府，改善民生，使之与共产党统治区形成鲜明的优劣对比。国民政府将严守疆界，与共产党井水不犯河水。那样将可能使双方民意日益显露，从而产生和谈解决的基础。这一设想是否切合实际？结局是否证明我们的努力富有成效？现在看来，

这已是无关重要的了。

要对付现实，人们必须首先对付蒋委员长。目睹数月来他如何民心丧尽，人们如何普遍地盼他早早引退，这确实令人伤心。大部分政府各界官员都希望他引退，几乎全部有识之士也都有同感。人们所以反对他，主要是因为蒋所发动的战争毫无希望，并给中国人民带来难以忍受的经济困苦和灾难。不难看出，现在蒋倒成了共产党人的宝贵财富。他置人们的劝说于不顾，拒绝移交指挥大权，这就等于为共产党颠覆中国开方便之门。在涉及美国的许多显而易见的问题上，他糊里糊涂，仿佛美国的军援才是结束共产党的统治的唯一选择。扶持这样一个丧失民心的人物继续当政，势必有损于基本的民主原则，并将激起人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支持，导致更强烈的反美情绪。

总之，美国官员都认为这种援助为时已晚，尽管产生新的中国领袖。抵抗集团或许能在中国南部和西部坚持一阵，并维持一个松散的联盟。但在我看来，目前情况下向他们提供军事援助非属明智之举，它必然使我们陷入中国沿海及内地的复杂事务之中。

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寻问美国对华政策有何变化，寻求我们对中国的见解，并不厌其烦的征询我们的意见，即，通过规劝蒋委员长引退或到国外考察等方式消除他对事务的控制，这样是否对美国合适。而蒋委员长则迫使孙科从速组成新内阁。但新总理不仅困难重重，其对同党核心要员的提名也一一被否决，而且也遭至来自委员长的干扰。孙科博士为此心灰意冷。政府甚至表面上能履行功能的内阁也难以组织。各类集团都劝说蒋在内阁中组成一个小班子，以便让他们全权处理行政事务，而蒋自己则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总统之权。但一般认为，这只有在他以某种借口引退牯岭或其他地方时，才有可能，问题在于他目前并无此意。但无论如何，当蒋委员长一次次劝胡适担任总理的努力失败后，他又

让胡适到南京进一步商量。他建议胡组成一顾问团性质的“智囊团。”但胡指出，“智囊团”仅系一纸上内阁，并无实权。

12月17日，我与孙科、胡适进行了一次长谈，孙、胡所提的问题再次说明了政府的窘境。与胡适的谈话尤为低沉，因为他代表了忠实于蒋政府的爱国理想主义的典型。胡的论点是，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共产主义统治暴虐、独裁，因此，不论蒋有何缺陷，必须支持他，因为只有他明了大局，并一直为之毫不妥协地战斗，他是国民党中唯一能够挽救中国官场的腐败、消弥政界的罪恶的人。胡适坚信，一旦蒋被迫引退，中央政府必将垮台，共产党将以他们所提出的条件接管政权。因此，胡适想知道美国是否能在战争中助蒋一臂之力，以防共产党统治全国，实现其最终目标。胡眼噙泪水地向我说，鉴于我们之间的长期友谊，我应该告诉他：他该如何向蒋表示，他能在其他方面做些什么。胡表示，为了国家利益，他已决定放弃学术生涯。我告诉胡适，蒋政府目前的主要软弱之处在于民心而不在于军力。军队士气低落，人民对政府大失所望，对政府的事业毫无信心，在此境况之下，美国是无能为力的。我一直力劝蒋委员长重振民心，但无甚效果。我希望胡适能够象他30多年前一样，成功卓越地领导一场在自由和民主基础上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胡也表示，战后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才华回归到与他相宜的学术领域，对此他后悔莫及。后来，我们又讨论到这一问题，即一旦组成以共产党为主的联合政府，美国应采取什么方针。至于共产党统治是得以继续维持还是有所削弱或缓和，这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取决于非共产党人士的参与程度和影响程度。另一因素是共产党统治初期因其种种限制而采取的宽容方针，这虽然系一权宜之计，但共产党意识形态与自由思想的相互作用必将产生持久影响。

然而，我更倾向认为，在这些因素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美国对华政策。目前中共及其他中国人士的态度是一目了然的。前者

坚韧不拔地追求其目标，但在技巧上表现出惊人的灵活。

如果我们以保证实行基本自由等为前提条件，向中央政府继续提供经济援助，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些前提条件遭至破坏或威胁的任何时候停止这种援助，并将理由公诸与众。这些援助可用于工业工程及农村恢复，并鼓励民间机构的发展计划，如教育、宗教等等。这样，我们的宣传才会更富有效率。并以一种建设性姿态，表明我们帮助中国人民的愿望。倡导民主制度和国际自由往来，显示我们对中国的民族独立由来已久的支持，而不必过多地卷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以及对苏联扩张野心的征讨。

如果设想美国仅有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即要么与即将组成的新政府共处，要么完全撤出中国，那么对前一选择的解释将是：共产主义只可用其他方式而不是军事方式战胜它，并且也只能最后用非军事方式战胜它。

最后，我认为，新组成的商业、宗教、教育以及政府等机构必将倾向保守，倾向于维持现状，而不是鼓励新鲜事物。因此，我由衷希望美国政府在全球反击共产主义的同时，能洞察中国各界明显的进步与改革因素，这些因素强烈地吸引着具有理想色彩的中国青年，它们根本不同于奄奄一息的国民党。也许这一想法天真而不切实际，但我敢相信，在我们的帮助下，能够排除目前的疑惧、偏执及共产主义的败坏，美国将比其他任何党派更能嫁接中国这棵古老的文化之树。何况，这种努力要比撒手不管，听其自然要好得多。假如中国共产主义同样追随俄国模式，扼杀人民自由，我们坚信，迟早会出现象孙逸仙、蒋介石、胡适以及中国其他历史英雄之类的人物，群起而反，发动一场新的革命，团结中国人民共同与共产主义暴政殊死搏斗。那时，当我们确信这场革命富有生机并合乎民心的时候，美国即可给予慷慨援助。同时，我以为，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帮助中国人民开启民智，改善民生。使共产党明白我们这种支持的自由价值，也让全球在苏

联体系和自由体系中间做出抉择。

文献23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2—2948

南京 1948年12月29日

我相信有必要向您陈述在未来援华政策问题上我与我的高级同僚的分歧。他们坚信不疑的论点如下：

在目前军事处境中，任何组成的联合政府都将不可避免地为共产党所控制。我们不仅领略了欧洲的共产党政权或为共产党所操纵的政权的本质，事实也证明中共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并无本质区别。下列事实可见一斑：1943年毛泽东主张盟军以欧洲战争为先，太平洋战争为后；最近毛泽东、刘少奇声称与俄国结盟，诋毁美国；最近中共在沈阳对美、英、法三国总领事的通讯联络横加限制。

由此可以设想，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政府必将有损于美国利益，并最终得不到美国的道义的或物质的支持。因此，美国政策应改弦更张，这一政策应有助于我们激励中国境内的民主人士和抵抗领袖，有助于维护继续下去的私人商业活动，有助于保护美国对中国的商业、教育和宗教投资。

因而，目前的援华方案(至少是大米和小麦)是否继续下去以便救济中国人民并增加其对美国的好感，这是值得商量的。这种继续援助将有违于“援华法案”的初衷。“援华法案”第六款认为援华计划“旨在鼓励中华民国努力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旨在维护并巩固中国的个人自由和民主制度。”

此外，我们绝不应忽视这一事实：对一国人民的援助就等于对一国政府的援助。应该明白。在4年战争中，我们试图将对苏

联人民的帮助与对苏维埃政府的帮助区别开来的努力一直没有成功。战后初期，美国计划用于改善波兰、南斯拉夫及其他卫星国人民生活的援助实际上是加强了共产党政府的统治。这很值得我们引以为戒。中共在国家结构、政党组织、新闻限制、国家化方案以及对外贸易垄断等方面都如出一辙。毫无客观理由令人信服这一点：美国的经济援华会有助于中国人民而无助于共产党政府。而且，即便给予这种援助，也并非出于美国的过剩物质，而应从美国复兴西欧计划中分派。所以，美国继续对华援助应限于纯粹人道主义范围，仅对一些非官方的救济组织如红十字会等提供帮助。

我们必须准备应付来自共产党政府或其他虚假环境的奉承讨好和娴熟的宣传。这一切都无非是为求得美国的经济援助而策划的。我们应保持坚定，保持正常的美中关系，维护美国的既得利益，等待有利于我们的时机，积极鼓励中国的自由人士。

文献24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349

南京 1949年1月3日

我愿对蒋委员长的新年文告加以评述。我对文告最初反应良好。它庄重而又调和，对共党的辱骂之辞也明显减少。蒋以惯用的方式检讨了自己对民族困苦的责任，并表示个人的进退得失绝不悖于新的民主精神。

但文告进而也暴露了不幸的缺陷。全文表现出一股傲慢的宽容，以一种掌权者的自负不凡的口气与反叛者交谈。从而忽视了残酷的现实：军队能力土崩瓦解，金融制度的最终失败，人民对和平的普遍愿望，以及他本人下野的必然性。

另一缺陷更为严重。他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作出让步，但实际上毫无表现。就在本周早些时候，他还决定让副总统行使全权，自由地采取任何能造福于民的新政策，但显然由于蒋固步自封，由于蒋被共产党的战犯名单（蒋名列榜首）所恼怒，由于宋子文及其他强硬派的影响，他又收回了起初的决定。蒋的文告看来是国民党内部各集团妥协的结果，他的五项条件每一项都代表了这些派系的态度。而蒋对这些派系的协调又必然加剧内部分歧。共产党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态度强硬，毫不让步。在步步取胜的形势鼓舞下，他们企图完成彻底消灭国民党凶恶势力（如陈立夫）的任务。而陈立夫的支持者们现在则在考虑如何应付共产党。至于说，共产党是想消除国民党的现存领导和组织结构，还是根除他们掌权道路上的任何障碍，这尚有待势态发展。但看起来，由于国民党自身的缺陷，它必将让位于富有生气的共产党意志。一旦共产党铲除了这股势力，他们将计划组成某种形式广泛的联合政权，并与某些边远地区政治上的反对派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无论如何，新年伊始，一个新运动已经展开，并将是结束全国军事冲突的开始。预计蒋委员长试图在必要时撤往台湾，在那里建立其抵抗基地。

文献25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849

南京 1949年1月8日

共产党在节节取胜的情况下对和平势力大浇冷水，表示停战必须以他们所提条件为前提。另一方面，蒋委员长的新年文告已掀起日盛一日的不可抵挡的和平潮流。除蒋委员长外，国民党要人已准备行动了。但这时共产党公布了战犯名单，在新年广播中

肆意谩骂，对蒋委员长的新年文告粗暴抨击，并在最近广播中要求废除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的一切条约。这一切都意味着共产党的强硬态度，使国民党和平分子灰心丧气。当然，这对蒋委员长来说，则是更强化了他的信念，坚固了其继续抵抗的决心。据报，蒋正结集所有军队，企图在京沪地区全面抵抗。同时，他将大批金银财宝运往台湾，计划以台湾作为继续反共的堡垒。空军总部、海军和工业机械也移往台湾，并指定陈诚为省长，其子蒋经国为台湾国民党部主席，其意图是显而易见的。总之，蒋委员长的新年文告的影响是无可置疑的，不管其语气如何谨小慎微、模棱两可，但新闻报道和公众给予的理解和解释已蔓延成普遍而又强烈的国统区和平运动。很难想象蒋委员长能够反对或扭转这种深入人心的力量，也很难想象他能在和平一旦幻灭时能够重新组织那怕是形式上的抵抗。在目前的计划中，他是以台湾为落脚点，作为他继续抵抗的前沿阵地。

蒋委员长的这种心理变化使得副总统及其寻求和平的部长们处境尴尬。蒋日益坚信不可能与中共和谈，坚信继续抵抗是唯一出路，这就使先前兴奋万分的和平人士的政治活动全面瘫痪。白崇禧最近的活动引起蒋的怀疑，据说李宗仁也受到监视。所有这些看来使内阁中的“主和派”进退维谷，并将导致蒋与李、白为首的“主和派”之间的公开决裂。因此，最近的势态发展最有可能这样：共产党继续增加军事压力；国民党的抵抗意志进一步削弱；李宗仁为首的主和派抵制并谴责蒋委员长的专断。

文献26 司徒致国务卿

893.01/1—1549

南京 1949年1月15日

本周中，政府从南京迁移的准备工作已日渐明朗化。虽然隐瞒这种庞大的迁移工作较为困难，但政府仍决定秘而不宣。结果，各种消息、报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之，这些消息表明，随着南京所面临的军事威胁日益增长，政府南撤计划正初步执行。一般说来，南撤的地点是广东和台湾。

外交部也私下承认了目前各部档案的转移计划以及政府各部紧急撤退的试验性计划。外交部并无意图隐瞒档案的包装发运。但官员们声称他们并不知道发货去向，并否认有某种全部撤退的决定。

其他人士也透露，政府各部下令于本周内将档案文件打包送交交通部南运。关于全体人员，一位可靠人士透露说，80%的政府人员必须作出选择，或者领满3个月薪水后辞职，或者从南京南撤。其余的20%将作为政府要员留在南京，伺机最后撤出。这位人士还说，政府行政机构包括银行，正移往广东等地。所训练的陆海空部队正移往台湾，台湾也是政府藏银纳金的地方。立法院目前并未开会，直到二月份都没有安排会议，成员四分五散，一些人已在台湾露面。

上述情况显然证明两点：第一，一旦共产党或联合政府接管南京和广大的国统区，由于政府全部档案转移和富有经验的政府人员的分散，势必造成共产党在行政上的极大困难。其困难程度要比我们原来设想的严重。此种局势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促进共产党和谈，因为国民党谈判分子已再也不能交出完整的行政机器

了。

第二，外交使团会面临这一问题：国民政府最后请求使团随政府一同撤出南京。这一朕兆日益明显。政府显然只想留下一些要员在南京以便最后空撤，这就很大程度上会要求我们预先撤出南京。但无论如何，政府档案和行政官员分散于华南和台湾，很难想象政府行政能继续运转。若外交使团根据政府的要求转移，我们设想可能随外长或外交部行动。从目前迹象看，目的地也许是广州。

总而言之，我们极可能被请求转移。可以认为，目前迁都计划的采纳和实施，会使国民党有时间在南方建立政府，继续行使全权，因而它极有理由要求我们随之迁移。我们将根据国务院的指示随时报告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并汇报有关的形势发展和我们的观点。在国务院尚无指示或指示尚未到达之前，我们将根据先前的指示留住南京。外交使团中的其他使节也普遍倾向于留在南京，无论环境怎么变化。事实上，许多使团都在观望我们的行动，然后亦步亦趋。

文献27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蒋介石/1—2249

南京 1949年1月22日

昨天下午，副总统前往机场为蒋委员长送行。副总统回府后即派秘书甘介侯拜访我。他报告了事态发展并要求我们支持代总统。他陈述了李宗仁在其不明不白的职位上所面临的困难，请求美国总统或政府是否能发表声明或致函表示赞许和支持李宗仁的新职务。我对此未置可否，答应将此请求转告美国政府。

经过斟酌，我们认为此时此刻美国政府应保持沉默，蒋委员

长是否已从权力统治中引退尚属可疑，而李宗仁的法定职务及其权限尚未明了。在过去数月里，我们一直拒绝发表任何声明来表示支持蒋委员长统治下的中国政府。因此，我们的任何有利于李宗仁的言论都可能被认为是偏袒一方，看成是对中国内政的无端干涉。

文献28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1—2249

南京 1949年1月22日

从蒋委员长的引退声明中可以看出，副总统接任新职位是以宪法第49款为根据，并受此款限制的。此款规定“若总统因故不能行使其职责，将由副总统履行之”。

但宪法对此种情况下的总统与副总统的关系并未作进一步的规定。总之，此款有两点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副总统继承了总统所行使的全部权力；二是总统并非永远离位，因为副总统仅是在总统的位置上履行权力。这就意味着总统随时可能合法地回位，从副总统哪里收回其权力，从而再“行使其职责”。

文献29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2649

南京 1949年1月26日

1月25日，共产党在其电台广播中就政府的派遣和谈代表的建议作出答复，表示接受政府建议，但要政府接受共产党的条件而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共产党发言人声称：“国民政府早就丧失了

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只有不久即将召开的没有国民党反动派参加的新政协所创立的民主联合政府，才有这一资格。因而，我们允许国民党反动政府派遣谈判代表并不是承认它这一政府有任何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而仅仅是因为它手上还掌握着一定数量的军队。”接着，中共发言人又说，政府应该认识到，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军队处于劣势，政府必须接受毛泽东的 8 项条件。并指出，北平方式是谈判应该仿效的榜样。

可见，这表明，共产党已冷淡地重申，他们不允许政府作为完整党派进入新的联合政府的企图。他们将决定有些国民党分子——如果确有此事的话——可以作为个人被接纳到新政权中。同样明显的是，共产党将要求交出剩余的国民党部队以便“国家化”。而李宗仁一直坚持的是，只有给予平等的条件才可进行和谈。共产党广播表明，李宗仁必须在彻底投降与继续抵抗之间作出选择。我们相信他将选择后者，在华南、西南继续抵抗。

文献30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2—549

南京 1949年2月5日

阁下：我谨向您报告中国发生的灾难性事件的深远影响。这些事件发展之快，使大使馆几乎全赖电报向您报告。

战后，尤其是去年下半年，我们亲眼目睹了传统型的中国政府体制的衰败和没落。国民党的最初宗旨是反对封建王朝——正如太平天国革命一样，但是，尽管它具有一种民主思想和现代革命精神，最终这些思想和精神还是丧失殆尽，并进而逆转，走向传统方式。至于蒋介石本人，他无疑为人正直，富有献身精神，但其观念和手段仍是非民主的。政府也不乏正直、自由人士，但体

③④⑤

制则滋生、培育着罪恶，并进而导致自身的毁灭。它变得如此的腐败无能，如此的不得人心，以至于那怕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即使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恐怕也会爆发另一场革命。

早在国民党执政前，这一政党就有一些比例不小的独立分子，并且，无疑获得许多人的支持。这些人被中共加以有效地利用，对中共的成功极为重要。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许多理想主义的学生都跟随他们。这也许是彻底清除中国士大夫特权阶层的催化剂。至于是否反面会产生一个更为专制的政府体制，现在尚难定论。

对共产主义形态的反感使美国政府公开宣布同情并支持蒋介石政府。但是，对国民政府的领袖及其追随者来说，中共一开始就是政府以武力征服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以政治经济相对抗的竞争对手。多少年来的个人恩怨更加加据了党派的对立。而令人痛苦的是，人们误以为美国政策是与卑鄙反动的官僚政客同流合污，而不是支持那些代表新的高尚的社会秩序的先进人物。这种看法当然不免天真，但这有助于我们解释共产党的恶毒的反美宣传，也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几乎所有的青年和大部分无党派有识之士对美国政策激烈抨击。

这很有讽刺意味。我们美国以自己的革命赢得了自由，并充当着世界民主政权和人权的捍卫者。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受到象中国这样的衷心的欢迎，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对中国那样提供慷慨无私的道义上、物质上的援助。而现在，中国的反共领袖们谴责美国，因为我们没有象拯救日本那样拯救中国。其他中国人也抨击我们，说我们加强了一个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并干涉中国事务，使毫无意义的内战得以延续。同样，我们为中国人民谋求幸福的动机也被指责为美国的反苏目的。

当然，我们仍拥有许多未来斗争的宝贵财富，中国人民对美国的友好愿望仍然无减。我们在中国的文化行动卓有成效，中国

人民已从中了解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传统。这将使中国人民不再会温顺地忍受专制统治。一旦共产党掌握政权，行使其传统的暴行，势必会疏远这些人。到时我们就可以在中国的边缘地带继续发挥我们的影响作用。总统的就职演说将公布美国政府的坚定、有力的对外政策，影响深远。

李代总统正为获取和谈大胆行动，表现出他的坚忍耐力和无私精神。他政策公开，迫切希望及早改善民生。鉴于人民的和平要求及政府的软弱无力，李很有可能有所作为。他希望向中国和世界明白无疑地证明这一点：中共是否愿意接受和平并真正地实行民主政体。如果中共拒绝和平与民主，李、白(崇禧)将在广西集结力量，在人民的支持下继续抵抗。

总之，外侨可能在一段时期内遭受严重粗暴和不公的待遇，尤其是美国人，大使馆准备详细记录具体事实过程。迄今为止，种种迹象令人担忧。天津、沈阳、济南以及北平，都有一种不祥之兆。

同时，我冒昧地提议，我们应采取一种沉默和观望的保留态度。这期间美国新闻局采取攻势，传播强烈的思想意识和切实信息，以此代替美元和军事的力量(美元和军力今后仍会需要)。美国的经济合作总署计划应予中止，只有各省的农村恢复联合委员会仍具有继续援助的价值，它们可以改善民生，普及人民的民主意识。

代总统一直献身于政府改组，他应该也能够执行下去并获得支持。倘若共产党正如我们所担心的那样，是一种暴政统治，我坚信，将会迟早爆发出反抗的烈火。如果这种反抗运动顺应民心，我们就可毫无保留地向它提供支持。

文献31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2—1949

南京 1949年2月19日

今天上午，我的桌上摆着两份截然不同的材料。一份是来自华盛顿的美国新闻局的报告。其要旨非常明确，摘录如下：

“众议院51名共和党代表要求高级军事、经济、政治顾问小组就中国局势提出报告。这些代表声称，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将是美国的‘巨大的、历史性的’失败，并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他们致函杜鲁门总统……建议组成专门委员会，并提交七项特别问题，要求澄清美国对华政策……”

“信函尖锐批评了战后美国对华政策，这一政策促成了结局将是灾难性的国共联合政府，指出这一政策的危险性将如同捷克斯洛伐克所显示的那样，使联合政府处于铁幕的笼罩下。

“信函进而声称，共产党的胜利指日可待，这将不仅构成对美国的巨大威胁，也是自由力量的失败。”

另一份材料是致拉帕姆（中国使团主席、经济合作署主任）的信，摘要如下：

“我们身居上海的基督教徒深感有迫切必要提醒您对下列关键问题的注意，希望您严肃认真地加以考虑。”

“1. 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亲密程度仍一如既往。我们希望美国政府采取恰当的行动增强这种亲密度。”

“2. 我们强烈反对向任何中国军队提供军援……整个中国饱受战火摧残，濒临崩溃。任何外部势力延长和加剧这种流血、困苦局面的企图，都必然使中国人民疏远对这一外部势力的感情。”

“3. 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对目前的中国局势不要持任何先入之

见，而是保持一种坦率开明的态度，多多联络中国人民中的建设性势力，并根据时局的变化，修改对华政策。

“4. 我们要求经济合作署不论政治环境如何，继续援助全国各地的中国人民，帮助恢复经济，帮助农村恢复。我们希望这些援助尽可能让非官方机构经办，在这些机构中是存在着精明能干、忠诚正直的负责人的。”

共和党国会议员的观点也许部分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中国的基督教徒则有自己的立论根据。但这却说明了一个问题：同样反共，方案不同。类似的各种论点数不胜数，这使我们极为棘手，很难做到既实行一项明智有效的对华政策，又不违背美国的基本原则和全球计划。无论我们如何纠缠以往的实际利益，一切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应付目前的局势。

设想国会议员批评的意图是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将构成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这一点无疑恰如其分，我们有必要毫无差错地阻止这一威胁。国会议员的不言而喻的结论是，美国应向现政府提供足够的财政援助和军事援助。这显然大错特错。最基本的错误是，我们为了国家利益而向中国提供这种援助必然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明确的意愿。战后初期中国政府所赢得的民心已被蒋政府丧失殆尽，即便有美国的可观的援助，仍无济于事。倘若我们向现政府提供更多的援助而不采取其他行动，则无疑点燃一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烈火，就象中共所做的那样。

可幸的是，仍有许多其他因素可以防止我们所担心的灾难。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宣传运动正揭露着共产主义的罪恶，告诫中国人民对这一国家独立和人权构成威胁的大敌引起注意。另一方面是，通过美国，通过经济合作署，通过对台湾的关注，通过对改善中国民生的努力，在中国的改革中向中国人民提供建设性帮助，并通过我们的宣传机器广泛宣传。这些都有助于激励中国人民的反共信心，在一个新的领袖领导下，我们可以全力向他

们提供物质援助和军事援助。

文献32 司徒致国务卿

893.01/2—2349

南京 1949年2月23日

在李宗仁与孙科为首的“广东派”的权力斗争中，李宗仁处于劣势，因为他没有许多可以控制的军队，缺乏财力，而且由蒋委员长和CC系控制的国民党官僚机构也并不效忠他。设在汉口的白崇禧总部向汉口的美国领事陈述了李的不利处境，并要求美国援助。

但是，李近来一直积极准备，以争取民心对他的和平方案的支持。重要迹象之一是决定立法院在南京而不是在广州开会。这无疑是对孙科总理公开宣称的意向（在广州开会）的挑战。在立法院会议上，孙科当然地受到激烈的谴责，被指责为提倡南迁、从事投机。许多立法员在记者会上说，上海地方立法员已通过一项决议，控告孙科“背离”代总统，呼吁行政院重回南京。

更为明了的迹象是，李宗仁在南京召集监察院会议，通过一项支持李的议案，并宣布行政院联席机构将在南京办公，何应钦已来首都。李还策动南京、上海的重要报刊，颂扬他的和平与改革方案，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指责孙科内阁“逃跑”。可以肯定，上海、南京的银行界和商界是支持李的，那些无甚见识但人数众多的百姓阶层，他们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但苦于战争破坏他们的家园，这些人也支持李。

某种意义上说，李目前的处境与他竞选副总统的时候颇为相似。那时，他成了一名反对蒋委员长和国民党专断独裁的象征，并在选举中成功地赢得了所有非嫡系党派的支持。这一次他仍是

一种象征，象征着全中国的和平愿望。只要李的和平努力能够取得明显的进展，或能成功地阻止中共跨越长江，他将能维持并利用人民对他的拥戴。

李也意识到他的劣势，但他很精明地利用那些视他为和平希望之星的人们的支持，以便既弥补他与广东集团的裂缝，又可以尽可能多地赢得国民党实权人物的拥护。他向我们表示要求援助，并计划经济与政治方面的改革，以努力巩固他的地位。这些努力的成功程度将会奠定他的强大实力，这可以使他与共产党谈判时处于有利地位，或者，在共产党恢复攻势时，他继而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抵抗领袖。

文献33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B/3—1049

南京 1949年3月10日

阁下：我谨请求授权予我与中共高级领导会谈，讨论美国与中共之间的一些问题，以期达成彼此了解。至于这一会谈何时安排、如何安排，则由我相机决定。

中共日益表现出它的反美情绪。随着它向沿海和内地的扩张，这种反美情绪会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其对美国的攻击也将不仅限于持久的谩骂式的广播。中共的反帝宣传的措词有些则是克里姆林宫所怂恿的共产党路线的表现。但毫无疑问，我们对国民党的军事和其他方面的援助也是一个因素。甚至大多数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是否同情中共，也对美国的援助甚为愤慨，这既因为他们对政府已大失所望，也是因为我们的援助延长了中国内战。中共对美国的敌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具有对所有非共产主义信仰的猜疑心理。这种猜疑心理渊源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也

是中国人的独特个性。总之，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党派象中共那样疑心重重。而这种疑心看待外部世界总不免具有先入之见。因此，美国的诸种行动只要涉及到中国，他们就认为反动透顶。我相信，中共对美国的攻击除去全部的宣传目的外，也还有许多天真的误解因素。假如能够消除或减弱这些误解，必将能为遗留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从积极意义上讲，如果美国的民主影响能继续渗透到共产党中国，减轻其独裁势力，必将对亚洲和其他地区的稳定起重要作用。

我希望我不仅作为美国官方代表与共产党接触，而且也作为一个久居中国、致力于中国的独立和民主进步、致力于为造福于中国人民而联络两国关系的中国人民的朋友与共产党接触。无论他们怎样将我等同于好战的帝国主义分子而对我不加信任，我希望我以前的活动以及我与中共许多人物的个人交往是不会被他们所忽视的。

一旦接触，我将首先提醒中共，美国对中国的友好感情源远流长。美国政府和美国私人慈善事业或机构一直对中国善意为怀。1945年12月与1946年12月，杜鲁门总统两次发表声明，以及马歇尔使华，也都说明了这一点。中共不能对此做出美国自私自利、意图卑鄙的解释。从那以后，美国政府一直初衷未改。但是，美国政府对苏联合作的经验以及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策略和目标的观察，不能不影响到对中共的看法。我们同样有所顾虑，就象中共对我们有所顾虑一样。我们担心中共会建立一个独裁政府，在那里，言行受到限制，新闻与信仰毫无自由，使用高压手段党同伐异。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人民享有选择并采取任何形式的政府的充分权利。而在一个专制体制下，人民是没有自由表达他们思想的机会的。这一专制体制所带来的并不是“解放”和“新民主”，而是凶狠残暴的专政政府，一种少数人的趋向没落的统治。一旦这一制度在中国建立，必将通过共产主义战略所提倡的暴力

革命走向“一个世界”。或者，共产主义继续在全世界掀动暴力反抗，导致混乱，这都将给美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带来威胁。美国政府将呼吁支持首先组织起来的反抗组织，这些组织将唤起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个人自由，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自己解救自己。一旦如此，我相信美国将以一切力量帮助恢复中国人民的解放。当然，这必然会带来人类的苦难和经济的破坏。因此，目前应努力消除彼此的怀疑和误解，为了共同利益而互相合作；这对各方都极其有益。美国人民的顾虑也只有在中国实行基本自由和建设性的友好对外政策时才能烟消云散。我深深地关注着中国人民的幸福事业，期望着中国真正的民主进步的政治进程，也正是这一点驱使我为时所热爱的中国作出最后努力。我相信，美国人民除了希望中国独立、和平、经济恢复和民主以外，别无他求。

以上是我的大概意思。我想以非官方的身份向中共传递上述想法，而不是作为最后通牒或威胁的形式提出。我希望以一种友好的态度来陈述这些观点。如果这些观点具有说服力，也许会使中共在某些方面得以接受。相反，如果我的努力毫无效果，恐怕就应放弃任何通过谈判获得解决希望，而应谨慎考虑此种局势下我们应采取的其他方针。

我个人认为，我们应大力倡导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基本自由，在这两点上下功夫，以作为与共产主义战斗的武器。民族主义能够在中国的有识之士乃至中共中间引起较大反响。鉴于对俄国的疑惧，中共一定不会对此低估。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我们的对华政策上看，中国的民族主义都是有益于美国的。关于自由的出版物也许更为重要。中共很大部分要依靠对舆论的控制，而他们自己则一直宣称要争取出版自由。若他们拒绝出版自由就会违背民心，暴露他们的专断企图。我们突出这两点，就能与共产主义的反动专制战略形成对比，并将在亚洲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以此

⑥7

表明我们所依靠的不仅仅是财富和军力。如果必要，在晚些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这一方针。我们通过这种思想和信息的交流，也就不担心俄国对中国的赤化了。

马歇尔将军离华两年来，中国政府的地位和美国政府的威信持续下降。而我则几乎不能扭转这一不幸的趋向，为此我非常惭愧。但是，为了美国的事业，也为了中国的自由事业，我将愉快地尝试这一最后的努力。我并不幻想我或其他某个人能影响中共的政策，使之具有较大范围的宽容因素，那只是一种天真的空想。但是，鉴于目前问题的迫切性，此番努力是值得的，它至少使我们探明我们应该采取的措施的程度。

文献34 司徒致国务卿

893.50恢复字/3—1649

南京 1949年3月16日

尽管我们的援华方案试图给予中国政府一个喘息之机，以便它有机会励精图治，求得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然而，中共一直有效地占据着新区和重要地带，歼灭了国民政府所残余的王牌部队，迫使政府求和。因此，所期望的改革并未实施，经济形势仍日趋恶化。国民党中国笼罩着一片灰心和失败气氛。

鉴于此种局势，我们被迫撤出我们的全部军事顾问团。一俟1948年援华法案基金用完，此计划即付诸实行。继续以某种形式援助中国是否有助于我们的在华目标，这是我们迫切需要考虑的。最近数月政府军屡战屡败，反对全面援华的理由比以往更加充分。但是，也许军事性质的援助除外，在其他方面继续实行某种援华方案无疑在目前国共和谈的休战时期对加强代总统的地位极为必要。

中国时局风云变幻，以至于国会还来不及考虑并实行新的援华方案，形势已千变万化了。同时，这种变化的趋势也很难预料。目前刚刚开始的和谈可能要持续数月，这期间，在敌对双方所统治的地区内，政治、经济将有显著发展。另一方面，和谈也许不久即告破裂，重新恢复战争，共产党将逐一解决，吞没全国。第三种可能是，达成某种和平协议，在短期内也许会导致一个联合政府。至于哪一种可能性（或者诸种可能性的综合）会在不远的将来出现，还很难确定。这使我们很难勾划援助方案，以便使这一方案产生有利于美国的影响。因此，看来我们目前应采取的唯一可行的政策是根据变化的形势灵活制定援助方案。就数量而言，只需一个稍有节制的拨款以继续提供某些象棉花之类的基本农产品以及石油、化肥、大米，以防止国民党中国的经济恶化，维持政府的外兑，并加强政府谈判或抵抗的力量。这些援助也可以包括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方案。在中国的美国代表应继续敦促国民政府实行基本改革，以维持政府的生存。如果这一路线能有所作为，取得成效，并进而产生一个新的政治集团，出现一个坚强有力、积极进取的反共领袖，我们就能够恢复并扩大援助方案。

文献35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3—2849

南京 1949年3月28日

李宗仁在正式就职后的数月中政绩突出，对此我们恐怕未予重视。他在宣誓就职时还是四面楚歌。李所承袭的对象并非辞职放权的统治者，而是暂且引退的独裁者，而且这一独裁者仍在幕后操纵着实权。李所继承的又是即将崩溃的国家政权和大势已去的军队。前途没有比这再暗淡不过了。但是，仅两个多月时间，李

以其合乎民心的和平行动赢得了大多数有识之士的尊敬和拥戴。他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和平，使中共不得不在政治宣传上处于守势。李业已达到和平攻势的初步目的——共产党同意举行正式和谈。他也已甩掉了可鄙的孙科和蒋记内阁，取得了对行政院、立法院和监察院的控制，并加强了白崇禧及其完整的桂系部队对他的忠诚。他还获得了行政院何应钦的帮助和支持，何的威信和声望在国民党将领中仅次于委员长。而且，所有这一切并未使得李、蒋之间反目成仇，李反而得到蒋的许诺——尽管语焉不详——他将在适当的时候出洋。当然，这并不说明这些微小成就就足以使现政府领袖就能与共产党或蒋委员长——CC系分庭抗礼。

李宗仁是位爱国人士，他能够通过各种努力聚集中国的爱国分子，形成远东建设性的进步力量，他也需要与西方保持友好的合作政策。我们确信，他目前的宗旨是抵制北平共产党的无理要求，坚持正当的解决方针，并且，如果必要，他将最终恢复武力抵抗。李作为遏制远东共产主义的有效工具，对世界和平事业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鉴于这些原因，我们相信，继续给予经济援助至少在和谈时期似有必要。相反，若我们不能提供在现有规模上维持数月的经济援助，李的地位势必岌岌可危，其谈判代表势必在谈判桌上屈服于共产党的强硬条件，那样，也就无从指望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抵抗共产党的侵犯。

文献36 司徒致国务卿

323司徒雷登

南京 1949年4月12日

和谈破裂后，代总统势必请求我随他南撤。最近局势的发展看来需要我们考虑美国的政策。中国政府南撤广州。美国及北大

西洋组织使团的其他首席代表决定仍留南京。这种情况将会涉及以下因素：

(1) 估计这一邀请不会象一月份那样，而是由代总统正式提出。可以设想这一请求将在李及内阁撤出南京时提出。到时，首都将不再留有对全国的主权，而外交使团是应指驻首都的。

(2) 一月间，人们除了拥护和平方针外，对蒋委员长及孙科的任何其他政策毫不支持。现时，我们必须注意到李宗仁政治威信日趋增高。如果他被迫在军事上实施自卫，防止中共和谈期间发起精心策划的行动，如横渡长江，以确保政府领土，他会很好地保持抵抗状态。

(3) 在北方地区，美国领事馆官员遭到共产党干部的不公正的待遇，中共也公开宣布了它的对外政策，这些事态再次证明中共对西方首先是对美国的敌视。若中共一直拒绝承认领事官员的官方身份，那么，他们对委任给另一政府的外交使团的官方身份的承认程度有多大？或者，他们将如何对付？

一月间，我本人主张、国务院也决定，美国使团与其他使团留在南京，促成我们这种举动的因素仍然是有根据的：

(1) 一旦共产党人以武力越过长江，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有效的军事抵抗的可能极为渺茫。

(2) 外交使团南移广州会毫无疑问地加强李政府的力量，予其拥护者以道义上的鼓励，但并不能造就南部的抵抗意志。

(3) 使团南移广州将会对侨民和长江地区的美国利益产生严重影响，美国侨民将认为美国政府无视他们及他们的利益。

(4) 共产党一旦横行于长江中下游城市，在南京的外交使团会对共产党有所影响，这将使他们颇为棘手。

(5) 国民党已民心丧尽，尤其一旦李的和平努力失败而委员长重新执政，更将不得人心。若我们随之南撤广州，必将丧失与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而我对中国有识之士的个人影响也将付诸

东流，而且我也难以改善处于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的美国侨民利益。

(6) 留在南京也可能被共产党地方政权置之不理，嗤之以鼻。那时即可将关系恶化的责任归咎于共产党，而我们也不会失去跟随我们的中国朋友。

我这些对时势的审度，建议国务院加以考虑。此事重大，切望政府在留与撤之间做出选择。我绝对相信，我们作何选择，北约组织的其他使团都将与美国协同一致。而北约组织使团一旦作出抉择，也必将为大多数其他国家的使团所效法。我们大使馆同僚最为关注的是北约组织成员国的使团特别是美英使团应协同步骤。

我们面临三种可能的行动方针：

(1) 接受李的请求，随李氏飞往广州。

(2) 置李南撤于不顾，美国使团与其他使团按兵不动。

(3) 在李请求南撤而南京尚未被占之前，华盛顿将我召回述职。

我业已与周末到达南京的克拉克和默钱特讨论过此事。克拉克赞成第三种选择，默钱特尽管未看到本电文，倾向于第二种选择。大使馆参赞琼斯则认为第一或第三选择比第二种选择更好。我个人较倾向于留在南京(第二种选择)，其理由如我一月所述及本电文所陈。

代总统尚无南移或未来计划的建议。我估计一旦和谈破裂，他即会向外交使团发出邀请。望国务院及早指示，不胜感激。

六 大使离华

到1949年，摇摇欲坠的国民党统治已不堪一击。在这一年的春天，共产党发起攻势，横渡长江，4月24日占领南京。次日，共产党军队突进美国大使馆，进入司徒大使的住处。国民党政府溃逃时，司徒业已决定住留南京，美国国务院也同意他的决定。其他西方列强也效仿美国，留住南京。共产党人在美国大使馆内加岗设哨，对使馆人员严加限制，但并无伤害。

在留华的最后数周里，司徒维护被共产党所占领地区的美国利益，对共产党要人之于美国的态度加以评估，并向如黄华这样的共产党官员解释美国立场。黄华曾就读于燕京大学，此时他是南京外事局负责人。黄在1949年之夏就设法安排司徒与毛泽东会谈。司徒本来也同意会谈，希望以此影响共产党政策的改变，但遭到国务院反对，国务院担心这样名声不佳。

于是，司徒准备离华返美。他是派驻国民政府的大使，不能不明不白地久留南京。他也拒绝到广州（国民政

府总部)或台湾,他知道,他去广州或台湾任何一地都将丧失他得以影响共产党领导者的机会。因此,他决定直接飞回华盛顿。共产党官员因他拒绝会见毛而愠怒,对司徒离华从中作梗,直到8月2日司徒才离开南京返美。从此一去不返。

文献 1 司徒致国务卿

124.931/4—2549

南京 1949年4月25日

是日早晨6点40分,12名武装的共产党士兵冲击了大使馆,他们劝使中国门卫打开使馆大院大门,直奔使馆官邸后门。在那里,他们向服务人员询问了使馆内有多少中外人士以及大使的住处,然后立即登梯上楼,逼近大使卧室。此时大使尚未完全睡醒,共产党武装士兵的突然出现,使大使有些吃惊。当时这些士兵没有威胁大使。率先闯进房间的人讲话嗓高声粗,怒气冲冲。随后进来的人显得较为有礼,说他们“上来看”。他们在卧室里转了几圈,检查了房子里的物什,并表示这里的一切最后将物归原主,属于人民。他们盘问了傅泾波先生,不过没有搜查他的房间。他们拒绝让安德堡进入大使卧室,用枪逼迫他返回自己的住房。士兵们搜查了安德堡房间,并查询他的国籍。此后又检查了别的房间。然后,他们离开了住宅和院子,什么东西也没动。他们告诉一位仆人,大使不能离开这个院子。不过这没有被传达给大使或他手下的任何一位官员。他们没有查看院里的其他房间。

文献 2 司徒致国务卿

124.936/4—2649

南京 1949年4月26日

今天早晨，试图从大使宅邸和邻近住宅出来工作的使馆随员被武装士兵拦住，强令返回院里，不得开车或步行外出。进入院子里的人员同样不准出去。但是，使馆中有些开着吉普车或步行的美国雇员却被准许随便出入。大使馆将根据局势的发展继续向您报告。

文献 3 司徒致国务卿

124.93/4—2949

南京 1949年4月29日

在使馆办事处院里警戒的士兵4月28日曾一度禁止美国工作人员出入。但是，最后允许所有提出要求的人徒步进出，如果他们不携带东西的话。禁止携带食品、自行车、女式大衣和手提包出门。他显然是在执行既不明确又没有理解清楚的命令。一群在马路对面人行道上走来走去的武装人员不时对他准许或禁止出入的行动指手划脚。他们属于同一部队。琼斯成功地建立了进出大使馆的登记制度，这里的卫兵为此感到满意。但他在拐弯处却被几个粗暴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拦住，没到办事处就折了回来。共产党士兵的反复无常掺杂着无知、对美国人的敌视，同时也表现出一种权威的发泄。

为了尽力拿到准许工作人员来往办事处的通行证，以便进行

工作，或者至少要求说明我们被禁闭的情况和原因，克拉夫和哈里斯走访了位于前行政院办公楼的新成立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与警戒办事处的部队长官长时间交涉以后，他们才获准进去。军管会大楼一片混乱，与其说是政府机关，勿宁说象兵营。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说，军管会主席刘伯承、副主席宋任穷都还没到南京，但报纸的报道正与此相反。他把我们提交的附有美国政府财产清单和大使馆工作人员名单的信拿给某个上级官员。20分钟后，他回来说，现在还没人能讨论通行证或禁闭外交人员问题。他也不想讲出何时能见到负责官员。今天，克拉夫将带着信件再次去军管会，要求刘伯承一到南京就同我会晤，以便我抗议他们闯入大使宅邸。

文献 4 司徒致国务卿

839.00B/5—1149

南京 1949年5月11日

正如国务院所知，原军调部共产党成员黄华目前是南京军管会外事局局长。到南京前，他在中共北平市政府担任同样的职务。黄是燕京大学校友，傅泾波的同班同学。上个星期，傅打电话到黄的办公室，并留下姓名。次日，黄回电说，他去看傅有所“不便”，问傅是否愿来看他。后来傅去了。黄客气地接待他，并问起他们的“老校长”。尽管他谈话时几次提到我，但很谨慎地不称呼我的官衔。他说他不承认我为大使，也不承认留在南京的别国大使，因为我们是派驻国民党政府的使节。他补充说，一俟时机成熟，应该由美国首先采取行动，与人民民主政府建立关系……

傅建议黄先去看望他的“老校长”。黄表示愿意前往，但又说不能马上去。傅在谈话中两次提出共产党士兵4月25日闯进大

使卧室。当傅第二次提到此事时，黄含糊地表示承认，并转述周恩来的话，说周对此事件深感不安。会见历时1个小时，主要是黄在谈。黄对傅的态度相当友好，一直送他到大街上……说他会打电话过来。如黄华不主动邀请，傅将不再造访黄。

文献 5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5—1349

南京 1949年5月31日

鉴于国民党政府行将失败，甚至可能灭亡，我们探讨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地位问题后，考虑到共产党人坚持互相承认的现实，申述大使馆的意见如下：

第一，只要国民党政府存在一天，并且被美国承认，所有外交人员的外交地位不变。由美国与国民党政府间协商确立的地位不能一下子垮掉，而且不受目前共产党军事胜利的影响。如需要的话，我们驻布鲁塞尔大使1914年到1917年继续驻留即为先例。

第二，只要国民党政府还没有真正灭亡，我们与中共的接触只能限于有关美国人的福利和财产方面的咨询与抗议。

第三，国民党政府灭亡后，我们的地位类似美国撤消承认的国家里的外交人员。这种地位将一直持续到从新当局那里接到撤离的明确通知之后，再经过一段适当的撤离时间。

第四，国民党政府灭亡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可经国务院授权，就一般性问题与中共交换意见，尽力确定是否存在事实上的政府。我们设想此时共产党已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并建立起外交机构。我方避免任何含有承认的行动。

第五，如果确认存在事实上的政府，大使馆将如实向国务院报告；需要的话，将提出我们认为予以法律上承认的可行条件。

诸如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利益，条约义务，等等。

第六，大使馆感到，中共在承认问题上，从其目的和理论出发主张必须绝对和立刻互相承认。他们的态度表明其采取的是典型的共产党立场。他们认为，外国使馆和领事馆不会给中国的利益带来什么好处。共产党显然不了解，现有的这些机构最有利于确认事实上存在的共产党政府和合乎需要地承认它的存在。同时，中共似乎把接纳外国外交人员看作是放弃自己经过艰苦斗争赢得的主权，而这种主权没有对方的直接让步是不应该牺牲的。他们显然认为，目前的外交机构把他们的政权置于低下的地位，并且显然不明白，从他们组成新政府的时刻起，直到得到广泛的承认，在任何情况下，他们的外交都处于劣势。

第七，大使馆相信，如果中共确信外交和领事人员主要从事政治、商务、间谍与宣传等活动，共产党对相互承认的态度可能会继续下去。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他们之所以对大使馆采取这种态度，也是基于他们对大使馆的存在为难，没有确定采取什么步骤。

第八，最近有迹象表明，南京可能被保留为中共政权的首都，而且我们认为，新政府极有可能建立于“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因此，我们认为大使馆撤离后，使馆的办事机构应在南京保留，直到确定首都不在南京，或者共产党要求我们离开。即使政府永久性地设在其他地方，也有使馆办事机构继续留在前首都的先例，直到可以方便地迁移到新的首都……

文献 6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13/5—1449

南京 1949年5月14日

黄华的一名部下，原燕京大学学生昨天以个人身份拜访我。谈话很快转到政治问题。我们讨论了各种问题，诸如美国领事馆在中共控制下的中国的地位等……。在我们会谈以后，我的年轻的朋友迅速向黄华汇报，黄后来要求约见我……。我猜想黄华拜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是否有必要接受黄华的拜访。

昨天晚上，黄到我宅邸拜访，逗留了近两个小时。我们的谈话是友好而不拘礼节的。我竭力不发表政治言论，直到互致问候以后，他先谈到这方面的问题。然后，我认真地讲到各国人民、特别是我本人的和平愿望；也谈到尽管这是民众的普遍愿望，但危险局势依然在发展；谈到对下场战争难以描述的恐惧；谈到我深信目前的紧张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都是——是出于误解、恐惧、猜疑，而这些通过坦诚相见是可以消除的；谈到美国和其他非共产党人士对中共主张的马列主义的恐惧，所谓世界革命、必须推翻资本主义政府，等于宣布颠覆性的干涉或武装侵略是既定政策。黄说起中国人民对美国援助国民党的不满，以及美国政策中的其他“错误”。我对此作了简要的回答。

黄问起我的计划。我告诉他我接到的指示，并补充说：我乐意多留一段时间，以表明美国人民对全中国人民的幸福的关注；我希望保持以往的友好关系；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能多少有助于恢复这些关系，这也是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愿望；我的奋斗目标是统一、和平、真正的民主政府和国际友善。对此，黄也知道，我在中国一直为此工作。

对美国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承认共产党中国，黄表示了极大的兴趣。我答复说，这些条件加上有关缔约的公认的国际惯例，才是适当的基础。他对我就武装力量在华、特别是海军在上海的现状的解释极为吃惊。我方认为，这是由于在内乱和战争造成局势混乱期间，美国人的生命需要保护。他似乎从未这样想过，显然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解释说，国民政府问题是内部事务，共产党目前还没有政府；国际惯例是任何得到本国人民明确支持，并有能力和愿意履行国际义务政府可以得到承认。因此，美国和其他国家无所作为，只有等待中国局势发展。我暗示大部分国家会效仿美国。我解释了外国领事馆与事实上的地方当局保持非正式关系的作用。

黄详细陈述中国有必要与外国保持商务及其他关系。他说已向所有部队下达命令，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和利益。我们还讨论了闯入我的卧室一事。他答应在军事形势不断变动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查明侵犯者。他解释说，第一批进城的中共军队在对待外国人的问题上没有思想准备，并且没有得到适当指示。

我询问了有关中共内部的一些情况。他们筹备政协会议和联合政府的计划似乎仍处于初期阶段。我的印象是，中共由于局势发展提前，有点不知所措，尤其对接管上海的重任和管理它的能力忧心忡忡……

文献 7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5—2449

南京 1949年5月24日

……代总统要求我们发表声明，对国民政府予以支持……。我非常同情李宗仁及其他决心抵抗共产党的人士。但我认为，迟至

今日美国政府发表任何声明，都难以有效地改变战局，避免我们更深地卷入中国混乱的政治局势……

文献 8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B/6—649

南京 1949年6月6日

“毛无意效法铁托，而企图成为亚洲的列宁”，但愿真的如此。毛泽东成为列宁比毛泽东成为铁托对我们更为有利。因为，想当亚洲的列宁与想当巴尔干的铁托相比，傲慢而又猜疑成性的俄国人会更加憎恶前者，俄国人从1920年7月以来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必须亲自领导这场革命（当时在第二届共产国际会议上，他们把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与原则强加给所有的外国共产党）。在这场巨大的努力之中，他们实质上没有能力担负起表率的责任。只要毛敢于自立为亚洲的列宁，苏联与中共之间势必产生分裂，如果不是一场战争的话。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我们对这种说法提出异议，即“仔细研究共产党的宣传会证实，他们极少提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而是单单强调毛泽东思想”。南京的书店现在摆出了许多苏联鼻祖的译本……中共……丝毫没有显出不服从苏联领导的迹象，而是毫无保留地甘心接受……中共不仅热心于为苏联服务的口头表示，……而且在关于中共与苏联的满洲工业计划中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

所有这些证实，马克思主义有许多形式，在中国扎根并茁壮成长的是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如此精通列宁主义关于世界革命的纪律和效忠观念，以致现在，甚至他们处于最光辉的时刻，无论言论或行动上，也没有向世界显露出一点儿人们可能从中预测毛

泽东有任何离经叛道的想法……

文献 9 司徒致国务卿

711.9316/6—849

南京 1949年6月8日

6月6日，黄华邀请我喝茶。在场的只有林克（燕京大学校友）和傅泾波。谈话主要由黄华引导，很快就转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上，更具体地提到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从这次讨论中，我得到两个明确的印象：

第一，中共急于想让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抛弃国民政府。黄华说它已完全失去中国人民的支持，正在逃亡。只要中共军队拿下广州，这个政府即被击溃。

第二，对中国在外交领域行使独立自由的权利高度敏感。

我们第一次会面时，黄已提出外交关系问题……。我再次解释美国为什么只能处于被动地位；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发展纯属内政，其他国家不应干涉；出现新政府时，我们要确定它是否真正代表中国人民，是否愿意和有能力维护至今公认的国际准则。我接着说，共产党政权目前不过是一个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并牢固地占领着日益扩大的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现在仍有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名义上处于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而且直到目前共产党还没有全国范围的行政机构，好让其他国家与之联系。我指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达以后，仍留在南京的各使团团团长（苏联除外），可以被中共认为具有重要意义。他引用了毛的《新民主主义论》，大意是说中共愿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与主权完整的条件下，承认任何国家。

我提醒他，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我们完全承认中

国人民有权利拥有他们希望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但另一方面，如果这样的政府执行威胁双方互利或致力于推翻别国的政策，那么这显然就不仅是纯属于中国的问题了。

我进一步努力解释占领区领事馆的状况，不过没有成功。黄华重申中共对外国领事馆的态度是基于它们最初是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设立的，并且与国民党政府有关系……当问我……（国民）政府迁移到台湾，我们如何行动时，我回答说，我们外交使团极有可能不随它去那里，我认为这也是其他有关国家的立场。他回避答复诸如中国首先共产化、还是工业化，联合政府是否尽可能包括国民党自由派人士与其他具有民主精神的人士等等问题，说这些完全是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的问题。

在讨论中国需要复兴经济之后，我问我能为未来我们两国间的相互关系做些什么，这是我一直首先关心的大事。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中国需要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中共只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政府”，断绝与它的关系。象往常一样，他反复说美国政府“过去的错误”，即错误估计国民党的力量，保留军事顾问团，以及不断援助国民党，等等。鉴于前边谈话回顾了“1948年援华法案”，我仅指出，法案曾推迟装运一些物资，后来不断运到的援助物资并不在美国政府控制之列。

我接着表示了许多美国人的看法。他们对中共明显地拥护共产主义理论普遍抱有恐惧。这种理论鼓吹通过暴力发动世界革命，直到所有其他国家通过革命或通过严密组织的颠覆活动，实践共产化。这种恐惧在相当大程度上说明了美国人的态度。

会谈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讨论的其他几个话题将分别电告。会谈是坦率的，几乎不时越出中国人的一般礼节。但两人对我十分友好，并以各种不拘小节的方式表达了他们个人的友好态度……

文献10 司徒致国务卿

123. 司徒雷登

南京 1949年6月8日

在最近与黄华的谈话中，黄催促我提供回国述职的细节，包括明确的日期在内。黄几次提到7月1日，这是我在首次会谈中提出的暂定日期。我避开直接回答，说我们撤离要看关闭沈阳总领事馆的谈判进程而定。然而，由于我同意修复这里空军武官的飞机，希望乘这架飞机回去，因此，共产党以为这与我撤离的日期有关。如果我能接到国务院指示，批准我在此后的30天里代表美国进行磋商的话，那将是有益的。

在准备动身期间，我想知道国务院对我未来的打算。国务院肯定得悉我的英国同行和他们的外交部最近交换的意见，一旦使团团长离华，除非正式承认未来的中国政府，他或他的继任将不再返华。这个逻辑是无可辩驳的，然而就我的特殊情况而言，我认为如果还能进一步为我的政府效劳，那将是在华盛顿停留一段时间以后，重新返华。国务院如果同意，或许能拟出让我重新返华而又不违反国际惯例的某种方案。

最近北平与南京关于中共内部情况的电报表明了我要求重返的理由。我认为，如果能说明新政权采取更独立的民族主义，抵制亲苏路线，大批国民党内外的自由主义者就可能与新政权合作。我确信，我们最有希望的政策将取决于这一发展方向。考虑到有种人为煽动的反美情绪，我在这里继续存在也有某些象征性的价值。

与此相关的问题当然是将来留在南京的使馆人员……以及国务院在我撤离南京以后，是想保留大使馆办事处，还是把它降到

文献11 司徒致国务卿

7010093/6—1349

南京 1949年6月13日

共产党对外交使团采取的一系列限制措施，使许多使馆的主要官员开始怀疑留在这里是否明智。首先，共产党要求，以私人名义登记官方汽车。要求每个大使在官衔之后加上“外侨身份”。登记以后，根据各外交代表机构的大小，他们任意将汽车限制在1至5辆。对绝大部分使团来说，此举等于被削去双脚，而且构成对官方活动的直接干涉。最后和最重要的是，由于恢复使用海外商业电报措施，外交使团不能发送密码电报。至少已有一个使团就此向当地外事处提出非正式抗议，但没有结果。

外交使团要求会见地方当局一事引起了一些风波。然而，外交使团的团首是法国大使，他出于涉及法中关系的政治原因，不愿采取主动或承担责任。不过在他的建议下，上星期在4个使馆举行了一系列小型会议，参加者包括留在南京的所有使馆的主要官员，讨论采取单独而又互相呼应的行动。由法国大使起草了同地方当局接触的计划。这个计划以公认的外交代表机构的特权和豁免权为基础，并经英国、印度等国大使和我认可。结果因其他大使强烈反对而被搁在一边。最强烈的反对意见是，如果在此基础上与地方当局接触，一旦遭到断然拒绝，或得到冷淡的否定答复，那么各使馆至少要被迫撤走，或者使他们的处境更艰难。既然大家现在都不准备采取这一步骤，或者不了解本国政府对这次接触有何要求，既然缺乏一致的意见，就无法进行相互呼应的行动。然而，外交使团这个未成功的尝试可能具有下列有利的结果：

第一，将促使那些没有得到关于他们未来行动指示的主要使团去请示；第二，暂时使那些喊得最起劲的使团领导人平静下来。他们抱怨并要求一致行动……

文献12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B/6—1949

南京 1949年6月19日

我于6月11日晚间去上海，16日乘夜间的火车返回。真是不虚此行。直接的目的是与美国商人和传教士会谈。我分别会见了每一个组织，每次约有25人参加。他们似乎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我本人亦如此。我会见了个别人士和各种小团体，谈话内容大同小异。还有几次接触了中国人。一次是与燕京大学毕业生；另一次是与基督教会的领导人。更有实际意义的也许是某些政治上活跃的中国人士极为秘密的来访。一位是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另一位是和平代表成员之一李蒸。

傅泾波陪同我前往，与章汉夫进行了长时间谈话。章在这里的身分相当于黄华。

中国及外国的老板都担心劳工纠纷。鉴于共产党过去的宣传，他们陷入绝望。不过新当局目前看来并不比个别工厂里的工人更激进。工会似乎介于两者之间。除非中共领导人能够采取比其早期理论方法更现实和宽容的路线，否则他们可能疏远劳资双方。

上海之行给了我充分的证据，中共地方当局急于发展国际贸易，并想充分利用上海，促进工业、交通、生产和建设。为此，他们特别需要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他们很想知道我为什么去上海，我对他们接管后的印象如何，以及我对这些问题的一般态度。这些究竟仅是解决局部问题的努力，或纯粹表明临时性策略转

变……尚无定论。由于他们体制严密，加上上瞒下欺，其意图究竟如何很难知道。而外商则视之为冷漠无能。我的印象是，这主要是由于组织性严密，自由选择的余地极小，并使有关人员只知道从命而不讲实效。更重要的是，此行使我看到，他们转向关心在国际援助下的经济复兴中的民族利益。他们中至少有一位是有影响的中共领导人。这给了我一个机会，坚定而又策略地坚持原则来影响他们的政策。我们认为这个原则对于公认满意的合作是必要的……

文献13 司徒致国务卿

123 · 司徒雷登

南京 1949年6月30日

6月28日，黄华按约定的时间拜访了我。他说他接到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说，如果我希望访问燕京大学，他们会欢迎我到北平的。此建议的背景如下：

6月初，傅泾波在一次与黄谈话中，并非根据我的指示随便问到：是否有可能允许我去访问我曾工作过的大学。前些年每逢生日与毕业典礼，我都赴北平燕京大学，这已成了惯例。黄当时没说什么。但两个星期后，更确切地说是6月18日，在磋商我回华盛顿述职时，黄自己向傅提出：是否有时间让我安排一次北平之行。傅没有表态，只是说两个星期前他自己提出过这项建议。傅和我都没有再提此事，但黄显然把它放在心上了，送来的口信（几乎是邀请）就是答复。

不管北平认为此项建议是我还是共产党人主动提出，我只能把黄带来的口信看作是毛和周表面上邀请我访问燕京大学，实际上是与他们会谈。接受邀请肯定会使他们高兴，并使我有机会陈

述美国的政策，以及对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担忧，对中国前途的厚望，而且还将使我能够带给华盛顿关于中共意图的最权威的报告。此行将是迈向相互谅解的一步，并会加强中共内部比较倾向自由主义的反苏分子。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同最高一级的中国共产党人非正式会谈。机不可失。它将表明美国对中国动荡的政治潮流持坦率的态度，并有可能对未来中美关系产生有益的影响。

从不利的方面来说，在我返美述职之前到北平去，无疑会在中国引起谣传和猜测，并且可能由于美国人的批评，使国务院处于可想而知的尴尬境地。我的外交使团中的同行们也可能误解，认为美国代表出尔反尔：先是提出一致对付共产党，而现在又率先与它接触。并有可能成为使团团长们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纷赴北平的开端。此时去北平也诱使我想在返美之前去广州作类似旅行。

访问两个首都都有可能非常有效地表现出美国对全体中国人民的关心，但也可能被看作是一种调解姿态，不正当地干涉中国内政，并很可能被中共误解，抵消访问北平的任何成果。最后，此时美国大使前往北平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本人在国内外的威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方朝着承认共产党政权跨出的第二步（第一步是我留在南京）。

我的清晰印象是，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毛、周和黄都十分希望我成行。当然，我没向黄答复毛的口信，只是应付说，虽然我乐于返回燕京大学，但今年看来却不行；我比原定回华盛顿的时间已经又推迟了很长时间。我还说在没有完全修复的铁路线上旅行，对“一个老弱的人”来说可能是个负担，等等。谈到使用我的专机时，黄提到有来自地面共产党高射炮群的威胁，下达适当的命令至少要花几天时间，并且总要冒些风险。他接着说，现在乘火车3天之内就可到达北平，并补充说我可以利用铁路交通的一切

方便；如果认为有这种需要，我也可以坐飞机去北平，而且有可能得到批准。可以认为，乘专机去北平的荣誉会多少抵消上述消极方面。

我对此情况作了充分说明，供国务院考虑和决定。当然，我作好了旅行的两手准备。如果国务院认为有必要，请及早指示，以便答复黄。不胜感激。

文献14 司徒致国务卿

893.00/7—649

南京 1949年7月6日

我们应该对毛泽东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拍手称快，因为它空前明确地表明了中共最高领导人所持的立场。文章以清楚和尖锐的措辞谈到如何将“马列主义科学”应用于中国社会，还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过去28年的历史作了精辟的论述。根据中国近期的发展，我们没有理由再去琢磨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也没有理由在毛自己确定的各种准则和目标之外，再添枝加叶。在我们看来，毛只不过补充了他以前的著作、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阐述的政治理论、以及自从去年11月刘少奇发表《论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以来，中共在许多重要声明中表达的与苏联团结一致的观点。与以前中共论著相比，毛的文章增加了关于警察权力专政及其合理化的议题。

文章坚信中共征伐的正义性。文章的主要基调是毫不动摇地忠诚于依靠暴力进行世界革命的教规；效忠作为革命力量中心的苏联；对所有反对力量刻骨仇恨；信仰专制主义以及与其他任何政治或社会理论不可调和的共产主义。令人恐怖的流血斗争，对毛和他的同志来说只不过是改变中国政体的外科手术。

关于利用警察权力以及其他国家强制机构，文章显示了斯大

林主义的政治理论对指导中共行动的巨大影响。警察国家的存在有极大的合理性。毛和斯大林相信，在将来遥远的某个时候，全人类都要走“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的道路”。当前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的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在“人民”的名义下，毛想把它的权威置于形成俄国式专制的同样基础之上。而且威胁说，如果反动阶级分子“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预示要搞劳动营也未尝不可。

除了没有无条件承诺在任何战争中与苏联站在一起（中共的宣言迄今避而不谈）之外，文章使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变得不能再紧密了。与此相反，它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敌视无以复加。毛的以下论述说明了这种团结一致的联盟：尽管中国存在很大的经济问题，她目前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但要从英国或美国得到援助的想法是“幼稚的”，因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

毛向党内外强调，他确信与西方不可能妥协。这表明他意识到，在中国有一大批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中，不相信共产主义是唯一的道路。这些人渴望中国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不愿意在与西方为敌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工业化。文章用大量篇幅驳斥亲西方的中国自由主义分子信奉的一些观点，诸如西方式民主的重要性；与美英的联系；独立于苏联，等等。文章明确说明，持这种观点的人将被认为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要适当加以制裁。

文章的其他方面也值得注意。文章一问一答，为阅读方便而采取段落交迭、表达简洁以迎合没受过教育和训练的读者，有趣的是这些都与斯大林的文风颇相似。文章指出：社会的最终目标是阶级消亡，“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这表明中共党员远不象毛声称的

那样，受过良好教育、思想一致。“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这一断言表明，农业社会化或集体化在中国将伴随着破坏与损失。毛的农村计划显然不仅仅是简单的土地革命。关于国内经济，毛声称：“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这就是说，只要条件允许，政策就会变。对外贸易对中国的重要性只是一笔带过，目的是要强调服从中国工业化的需要，并自力更生，独立于西方世界。这再一次证实，政治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重于经济考虑的程度。这种指导思想表明：毛并不担心美国的经济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再也没有如此清楚地表明……“毛现在不会被收买”……

文献15 司徒致国务卿

125.633/7—149

南京 1949年7月11日

……沃德感到他在关闭沈阳总领事馆的问题上正取得进展。我认为，我继续待在此地对加快处理沈阳总领事馆的关闭和撤离，作用不大，……我最后定于7月18日撤离南京。如果国务院及早批准，不胜感激……

文献16 司徒致国务卿

123.司徒雷登

南京 1949年7月13日

……我建议，在我离开南京之前，不要向这里、华盛顿或广州的新闻界透露我的新的旅行计划。虽然我和包括机组在内的

同行人员都还没有拿到出境签证，我仍然希望能于18日离开南京……

文献17 司徒致国务卿

123. 司徒雷登

南京 1949年7月14日

回想起来，我感到中共领导人曾利用机会建议我今年可以非常愉快地在燕京大学过生日。我只能这样解释，他们迫切希望我能主动去北平，以便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谈。不仅黄华在这里两次提出此事，而且据我在北平的朋友们说，毛公开说过，如果我希望访问母校，我在北平会受到欢迎。我得到另外的消息说，在这次名为私人访问期间，毛和周期待款待我，并和我会谈。7月8日，卡伯特从上海报告说：“中国朋友告诉我，他从北平听说，你向周恩来询问你可否回燕京大学看看，并会见他。周没有明确答复。”

当我拒绝北上后，我感到这使他们多少有些丢面子。特别是在这里主动提出的黄华。我的怀疑被黄华的副手于最近发表的言论证实。他就我及随行人员在申请离境许可证明时遇到的种种困难对傅说：“假如司徒去了北平，这些小问题早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傅感到，自从我告诉黄我认为不能去北平起，共产党当局上上下下的态度都变得强硬起来。我们在这里的私人关系亦如此。我认为事情已有所变化，但吃不准这到底是出自对我拒绝访问北平的懊恼，还是毛在7月1日文章中制定的正统路线的一般反映……

文献18 司徒致国务卿

123. 司徒雷登

南京 1949年7月14日

我认为，我必须告知国务院，我在申请自己及随行人员的出境许可证问题上陷入了困境。他们正告我，也许不能按计划于18日动身。我们7月11日才拿到申请出境许可证的文件。申请书规定要找“担保商号”（即由地方商业公司担保，撤离的外国人不欠债务，没有未缴纳的税金，也没有悬而未决的民事或刑事诉讼问题。同时，担保者对撤离中国人员在实际离开前的任何非法行动承担责任）。我们原以为，不会要求我个人及随行人员作这种事，因为我们都是使馆人员。然而，共产党当局同样要求我们做到这一点，至少我的随行人员是如此。在过去24小时内，我们谨慎探询地方银行和与使馆订约的中间人，以确定他们是否愿意为卡伯特、欣德尔、空军武官以及机组人员作保。到目前为止尚未如愿。现在我们已征询美国的商号能否接受，如索康尼吸尘设备公司，加州得克萨斯公司等。但还没有从外事处得到答复。黄华说我本人可以不要求“担保商号”，但需要让“某个朋友个人担保”。我想黄自己会作为我的担保人签字。这实际等于取消了这项要求。

我以前所以没有报告这类复杂情况，是因为原希望此事会作为一般手续处理，问题不大。然而，离我计划动身的日期只剩下三天。我越来越担心，也许不能为我的随行人员在当地物色到任何保人。甚至如我最初的理解，对我也不放弃这种要求。傅在前两天已无法与黄联系磋商此事及其他与我撤离有关的次要问题。这样我们就无法接触到任何主管人员。如果黄华都不采取措施，我将按共产党对担保人个人或其他方面的规定行动，我想国务院会

同意我的意见。另外，国务院还可以考虑，如果我按期启程，并避免与共产党当局进一步纠缠，能否就委托留在南京的随员作我们大家的担保人一事，提供方便。我还不能完全肯定这能否被接受。

除非得到不同的指示，如果这里行得通，我就着手为我的随行人办理“担保商号”这件事。希望能得到比我本人申请出境更为宽厚的结局。我十分感激国务院及早给予指示，并将及时报告进展情况……

文献19 司徒致国务卿

123. 司徒雷登

南京 1949年7月15日

早晨，无线电广播报道，委员长已抵达广州，对政府所在地进行期待已久的访问……。我想他会逗留几天。设想我访问广州（如果我按期启程），正好与他不期而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不利的猜测和曲解会随之产生。对此如能避免则应予以避免。使公众舆论相信此时委员长和我访问广州纯属巧合是不可能的。共产党无疑会认为，我的撤离计划不那么简单，并从中大作政治文章，甚至我的外交使团的同行们也不大会相信，我们在广州同时出现不是巧合。昨天在同英联邦的同行举行的小型午餐会上，他们提到委员长访问朝鲜，并说共产党肯定会把我此时撤离共产党中国同这些事件联系起来。因为他们的宣传机构已经给“碧瑶会议”贴上“美帝国主义阴谋”的标签。我的同行们认为，这是不幸的巧合。他们当然没有提到我计划的广州之行。我认为必须转告上述考虑，以引起您的注意。给我的指示如有变化，要迟至7月18日才能在冲绳传给我。7月18日仍然仅仅是预定时间，因为我们

的离境许可证还没有批下来……

文献20 司徒致国务卿

123. 司徒雷登

南京 1949年7月15日

大使馆已将飞行计划的细节通知共产党地方当局，其中包括空军武官的飞机远至冲绳的航行图和预定的启程时间。我们确信，中共军队会适当地警戒。空军武官昨天试飞成功。

空军武官和我考虑了通知国民政府的可能性，但认为没有必要，弄不好还要冒安全方面的风险，故放弃了这个想法。然而，根据国务院7月14日828号指示，同意适当地通知广州和台北的中国空军，同时要求保证安全导航。但是，我们不会为得到这一保证推迟启程。

以下给克拉克和埃德加：请将你们的通告通知美国航空公司有关当局的指挥所：我计划于7月18日8时乘美国C-47飞机离开南京。飞行路线是从南京96°起飞，在海上25公里处转向那霸137°，冲绳，高度10,000。沿这条路线将在上海以北飞行大约50公里。由于现在可预料我本人和随行人员会被推迟获准离境，飞机可能拖延一或两天。有关的中国军队将于19日和20日实行警戒。我们将迅速告知上述计划的任何变化……

文献21 司徒致国务卿

123. 司徒雷登

南京 1949年7月18日

根据我所了解的各方面情况，此时访问广州是不可取的，应予避免。这种感觉与日俱增。我从北平得到的所有报告，加之共产党地方当局的迹象，都证实毛和周由于丢了面子，对我拒绝他们“邀请”我访问北平忿恨不已，并且认为这是美国政策的明确表示。虽然我并不否认这样做不无裨益，但我在拒绝北平之行后，马上访问广州，并与委员长会晤（这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肯定将其看作是有意侮辱。他们会对此做出强有力的反应。我对中共领导人的任何影响纯属个人性质。我飞抵广州，看望他们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而且未来我在共产党中国的有用之处会因此丧失殆尽。一旦此间知道我去广州，而不直返华盛顿，美国人在上海和汉口面临的重重困难会加剧，而且会扩及南京和北方的各个城市，我也不能排除中共对大使馆和其他在共产党中国的官方机构进行报复的可能。

我在李代总统大势已去之际前往广州，不可避免地会增加委员长的胜利感和威望……我赞成国务院不让我毕恭毕敬地去北平参见毛主席；由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改变航程去拜见蒋委员长也是不明智的。我相信国务院会理解我对有关问题的忧虑，并且愿听取你们的进一步意见。……

文献22 司徒致国务卿

123. 司徒雷登

南京 1949年7月18日

北平当局没有答复，我再一次被迫改变预定的撤离时间……
(司徒于8月2日离华)



封面
书名
前言
正文